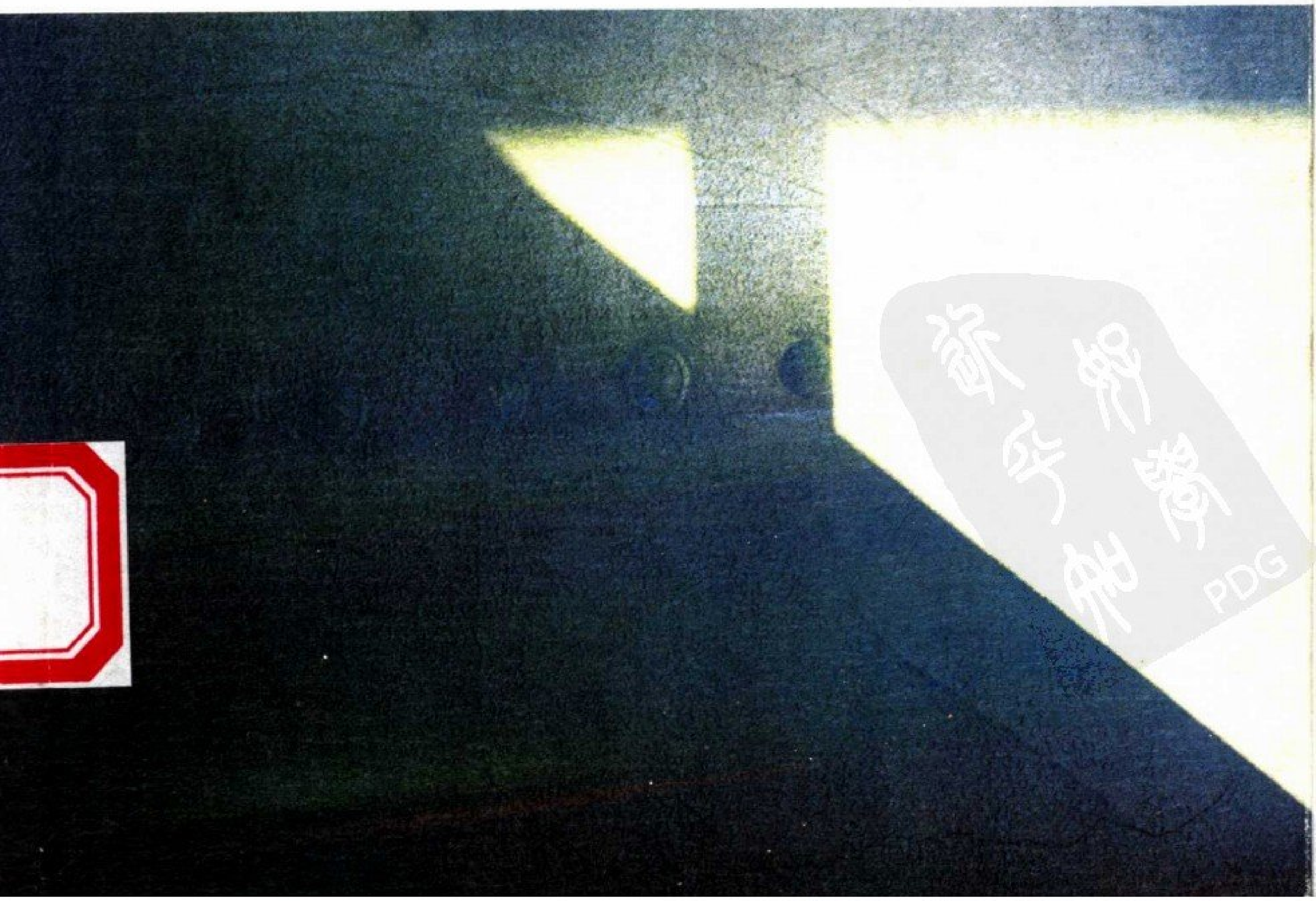
完美罪行之友

[西班牙] 安德烈斯·特拉别略 著
李德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3



■ 《完美罪行之友》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3”评选中西葡拉美文学大奖作品。本书为西班牙当代作家安德烈斯·特拉维略新作，曾获2003年度西班牙“纳达尔”奖。小说以一名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和战后均作恶多端的警察厅长莫路易斯被杀案为主线，艺术地再现了西班牙战后半个多世纪所发生的一些社会变化和社会现象，抨击了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完美罪行之友”俱乐部由小说家、律师、警察、银行职员等成员组成，以聚读会的形式研究各国侦探小说，探究所谓“完美罪行”的基本原则。后来成员们果然遇上了一件凶杀案，被杀的是聚读会的主持人、侦探小说作家的挚交，凶手也是聚读会成员，一个为父报仇的银行职员。小说写法独特，充满悬念，故事中人物和现实中人物在相交叉，真假难辨。作品结构严谨，语言洗练，对话生动，情节扣人心弦。

ISBN 7-02-005062-X

9 787020 050628 >

责任编辑：任吉生　胡真才
装帧设计：康　健

ISBN：7-02-005062-X 定价：23.00元

I551.45
T380

完美罪行之友

Los amigos del crimen perfecto

郑州大学 *04010226292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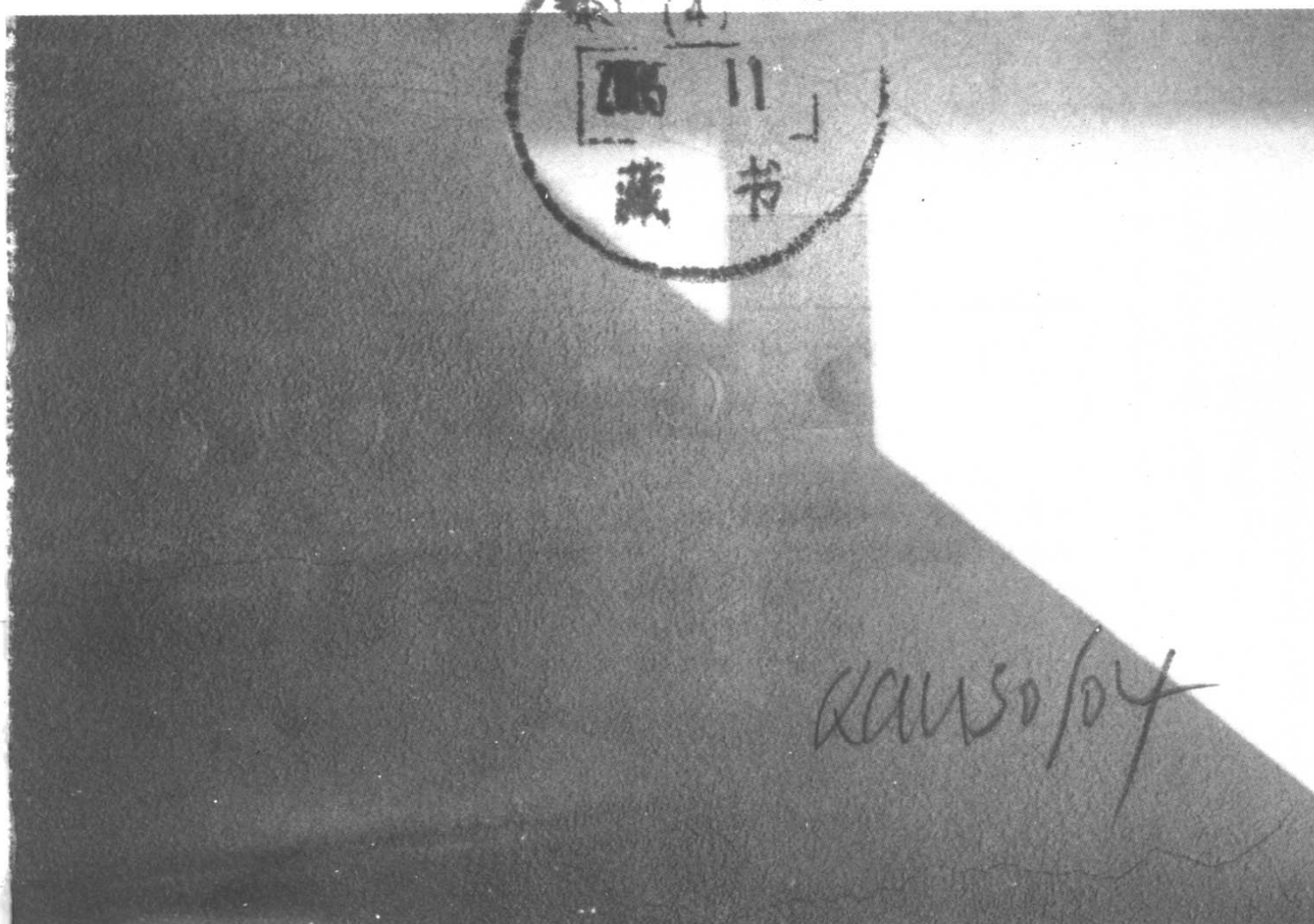
-6

[西班牙] 安德烈斯·特拉别略 著

李德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郑州大学图书馆
(4)
[2005 11]
藏书



K445.50/04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 - 2004 - 0542

Andrés Trapiello
LOS AMIGOS DEL CRIMEN PERFECTO

© Andrés trapiello, 2003
© Ediciones Destino, S., A., 2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完美罪行之友/(西)特拉别略著;李德明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7-02-005062-X

Ⅰ.完… Ⅱ.①特…②李… Ⅲ.长篇小说-西班牙-当代 Ⅳ.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0512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任吉生　　装帧设计:康　健
责任校对:杨　康　　责任印制:王景林

完美罪行之友

Wan Mei Zui Xing Zhi You

〔西班牙〕安德烈斯·特拉别略　著

李德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3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9000
ISBN　7-02-005062-X
定价　23.00 元

出 版 说 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和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因而，当 2001 年度的评选揭晓，6 部当选作品中译本面世时，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兴趣。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 8 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

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谨严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一项新创的事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信心倍增。我们相信，2003 年度的评选活动和 6 部作品的出版，也一定会继续获得成功。而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并恪守评选的原则，这项“世纪工程”在整个 21 世纪的进程中必将获得持续的成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黄宝生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叶廷芳　石南征　刘玉山　刘海平

何其莘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赵德明

聂震宁　黄宝生　管士光　潘凯雄

秘书长

仝保民　刘开华

西葡拉美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赵德明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孙成敖　朱景冬　张广森　赵德明　盛　力

作者以不同寻常的娴熟笔法讲述了一群喜爱侦探小说的朋友们的故事，他们追求一种完美罪行的幻想，直到社会现实把他们卷入某种超出自己美梦的事件中为止。最终他们明白了渴望公正往往会唤醒对复仇的渴望。这样，小说就变成了对复仇情绪的道德思考，而作者则成功地把读者带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结局中。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El Jurado considera que en los amigos del crimen perfecto Andrés Trapiello cuenta con extraordinaria maestría literaria una historia de un grupo de amantes de la novela policiaca que persigue la quimera de un crimen perfecto, hasta que la realidad social acaba enredándoles en algo que excede sus mejores sueños. Al final comprenden que el hambre de justicia suele despertar la sed de venganza. De ese modo la novela se ha convertido en una reflexión moral sobre el sentimiento de la venganza, mientras tanto que el autor consigue llevar al lector un final sorprendente.

Jurado de la major novela

Extranjera del año siglo 21

致中国读者

神秘的胡真才先生带来一个相当惊人的消息。在遥远的中国,有可能出版这本为纪念《堂吉诃德》而构思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纪念侦探小说而作的小说。我不知道中国是否有这类英国著名作家柯南道尔按照塞万提斯的方式写作的文学传统。实际上,侦探小说的构成要素非常简单:一具死尸,一两个有假线索的犯罪嫌疑人,一个凶手,一名侦探:他通常要对付所有的人——他的上司、警官,甚至包括雇佣他的事主。

在西班牙,佛朗哥独裁了四十年,对于东方人来说,大约相当一代皇帝统治的时间,那个时期很少有真正意义的侦探小说问世,至少那四十年的时间里是如此。可能是西班牙没必要出版侦探小说,因为我们看到的本地人杀害本地人的案件已经太多了;而这些案件都是由可怕的秘密警察匆忙、草率、蒙骗式地"破案"了。但是,随着西班牙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放松,独裁制度逐渐瓦解,第一批侦探小说出现了,毫无疑问,原因是文学作品中的死人渐渐代替了实际

生活里的死人。

我这部长篇小说也提到这些实际生活里的死人，杀害他们的方式是卑鄙无耻的，凶手却逍遥法外。这样真正的凶杀，卑鄙无耻、然而逍遥法外的凶手，世界各地都有，但是在独裁统治下其方式却格外地草菅人命，其范围格外巨大。

有可能阅读这部长篇小说的大部分中国读者不知道我们这里说的独裁统治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佛朗哥将军是“哪路神仙”。简而言之，佛朗哥将军是个法西斯军人，他在一九三六年发动政变，反对合法建立的共和国政府，结果导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在残酷而血腥的战火里，有一百万人倒下牺牲了。在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呐喊声中，佛朗哥赢得了胜利；五十万人流亡异国他乡；在八到十年的时间里，在西班牙历史上最黑暗、最冷酷、最血腥的镇压中，近二十万人牺牲在西班牙的监牢里。

这样的镇压是如此的冷酷和粗暴，似乎是要说服居民：检举、控告是没有用的，更别想什么起义暴动了。因此刽子手们就成功地适应了环境，以至于他们可以工作时杀人，下班后当亲爱的父亲和模范的公民。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准备遗忘。这就是本书的打算：如同堂吉诃德针对十五世纪骑士小说的态度一样，我的作品要对常见的侦探小说来一次正经的戏谑模仿，打算给侦探小说这类作品“套上枷锁”。

本书扉页上出现的引用柏拉图对话中的一句大概可以说清这个问题的症结。

假如正像歌德说的那样，宁要不公也不要大乱，那么本

书的主人公在想:遗忘是不是比公正更好,或者公正比遗忘更好;我们的主人公还认为:如果为了文学和生活而需要拯救“诗意的公正”,而法庭的公正不得执行,可是法庭又高尚地不允许我们扮演刽子手的角色,于是,公正就只好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了。

每个国家都知道自己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时期:人们由于担心犯罪和罪犯(包括直接犯罪和对犯罪负有政治责任的人们)不受惩罚而选择了亲手复仇之路。

塞万提斯说,小说写出来就是为了寓教于乐的;我的作品也没有别的“奢望”。

此外,假如中国读者能在心里用自己的亲友来代替书中主人公的名字,我会加倍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中国读者在通过知己的范围内充分理解并且表达出全人类共同的情感、痛苦和愿望了。

(赵绍天译)

译者前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一群钟情于侦探小说的读者。

他们聚集在一个名叫“完美罪行之友”的俱乐部——也称为聚谈会——里。他们当中，有侦探小说家，有律师，有银行职员、钟表商、饭馆老板，还有神父、警察、报社编辑，以及其他职业的男男女女。他们每个星期四的下午在咖啡馆里聚会，研讨各国侦探小说经典作品，犹如中世纪炼金术士那样探求所谓“完美罪行”的基本准则，各个争先恐后、眉飞色舞、唾沫四溅、振振有辞、天花乱坠地阐述各自的观点。但那一切全是纸上功夫，因为当到了现实生活中，面对一桩牵涉到他们的真实凶杀案件时，这个俱乐部——聚谈会的成员们，除了直接作案的银行职员波埃和钟表商马尔洛维，间接作案的警察马格利特，被害人堂路易斯的女婿、侦探小说家帕科·科尔特斯及后者的好友莫得斯托律师外，其他人都怕引火烧身，从而逃之夭夭，不再在“完美罪行”聚谈会露

面。

那么，那是一桩怎样的凶杀案呢？

那个“完美罪行之友”俱乐部—聚谈会里有个成员，名字叫波埃，二十岁，从乡下小镇来到首都马德里，在一家银行供职。他是个遗腹子，父亲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被不公正地关在集中营和监狱，受尽各种苦难，死里逃生。内战后，正当父亲和全家开始忘记昔日的苦和恨、希望过上平静生活时，竟然祸从天降，他被“错”抓，经受了严刑拷打和百般折磨之后，落得遍体重伤，从警察局出来后，不久死去。波埃是看着母亲的眼泪长大的，一直牢记着那个折磨和迫害父亲致死的凶手的名字。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同警察马格利特到后者工作的警察局，意外看见了那个人，也就是堂路易斯。同一天，他从马尔洛维那里学到一点手枪射击本领。后来，他以某种手法将堂路易斯骗到郊外，想代表父亲对其进行审判。他只想吓唬吓唬他，听听他说几句求情的话。“实际上，我很希望那支手枪不扣动扳机；让他生活在我们大家一直生活的恐惧之中，把他的地狱带到这个炼狱里。”但是，堂路易斯哪是那种轻易被吓唬住的人，他要掏枪“自卫”。波埃意识到自己可能像父亲一样惨死在堂路易斯手下。于是，双方厮打、搏斗起来。最后，他同马尔洛维向堂路易斯开了三枪，一枪打偏，一枪打在大腿上，一枪击中头部，将其杀死。

这部小说的情节就是以这桩凶案为主线展开的。

堂路易斯是马德里一个警察所所长，他集各种政治矛盾和社会冲突于一身。西班牙内战期间，有百万人死在战

火里，五十万人流亡异国他乡，二十万人惨死集中营、监牢里。堂路易斯是那些残杀、迫害狂的代表人物。战后，他继续为非作歹；但是，他不但逍遥法外，而且受到晋升和嘉奖。不过，他始终生活在恐惧之中，患有“刽子手的恐惧症”，害怕种下的仇恨种子发芽，害怕某一天被他迫害的人所杀害。而以波埃的父亲为代表的遭受迫害的人们及其亲属，虽然想忘掉过去的一切，但堂路易斯们的依然我行我素、依然专横跋扈不能让他们忘记往事。往事非但不可能如轻烟般地散去，反而像沉沉的迷雾压在心头。波埃在幼年时点燃的复仇火焰，如今变得越发高涨起来。

堂路易斯的女婿帕科·科尔特斯是小说家，也是“完美罪行之友”俱乐部—聚谈会的主持人。他依据波埃的话，即凶案的一半在于死者的过去，从而从岳母那里了解到岳父过去更多的不义行为。他一一分析了西班牙内战和战后长时间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认真思考了一些表面上稳定实际上蕴涵着复杂内容的现象。堂路易斯被杀是这些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又是这些矛盾和冲突发展、激化的必然结果，是内战的一个直接后果。从而，当警方调查无果，将凶案归于一个叫做“格拉波”的恐怖组织——人们戏称，西班牙多亏有恐怖组织，所有无法侦破和不愿侦破的案件都可以推到它们的头上而不了了之——时，帕科·科尔特斯一步步逼近了凶案的真相。在“侦破”过程中，帕科·科尔特斯感触颇多。他说：“我已经放弃了侦探小说的写作，而一桩完美罪行却出现在我的面前。”

帕科·科尔特斯二十二年倾注全身之力创作侦探小说，

始终追求描写一桩完美罪行,但是无果而终。那么,什么是“完美罪行”呢?完美罪行俱乐部的朋友们聚谈时,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有关作案人、受害人、地点、时间等特点,但更为重要的是,完美罪行应该如同一块好手表,不慢不快,准时发生;且大部分完美罪行之所以从来不会被警方侦破,是因为有一系列没有尽头的巧合。堂路易斯被杀案就是如此。有时巧合把本是完美的东西搞得杂乱如麻,有时把只不过草草做的案子变成完美罪行。之所以是一桩完美罪行,并不是因为找不到“那个作案人或那些作案人,而是因为没有具体办法把案子展现开来”(如果把堂路易斯被杀这桩凶案展现开来,又会有二十万人被杀,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由此,完全可以说,堂路易斯的被杀,“除了把一个坏人从世界上除掉之外,我还想不到这桩凶杀案中还有别的动机”,“是生活本身报了仇”,“你岳父死了。你就让他那样死去吧。他和我父亲一样,是为西班牙而死的”,“……应该把这看做结束那内战的一种具有象征意义和诗意的方式”……

《完美罪行之友》为了给堂路易斯被杀的凶案铺垫、烘托相关的政治和社会气氛,艺术地再现了西班牙战后的八十年代一些事件和现象。例如,旨在推翻民主制度的二月二十三日政变,一个老人为了避免重新遭受内战那样的苦难而自杀,帕科·科尔特斯与多拉的悲欢离合,帕科·科尔特斯为之供稿的出版社的兴衰,帕科·科尔特斯与父母的关系,帕科·科尔特斯岳父母之间的貌合神离,波埃与亨娜的悲剧式的恋情,波埃父母一家的遭遇,以堂路易斯为所长的路纳大街警察所内部的重重矛盾,亨娜“吸毒过量”而死和

以她为代表的吸毒群体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部完美的社会小说。

这部小说的艺术性达到很高水平,故事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交叉在一起,真假难辨;真名实姓和代号穿插使用,有意让读者细心阅读、细心分辨,调动读者的艺术联想能力。说到代号,是指在"完美罪行之友"俱乐部里,或依据其面貌特征,或依据其性格特点,或依据个人爱好,每个成员都有相应的代号,而这些代号分别源自侦探小说经典作家的作品中的人物。小说悬念颇多;情节中安排许多"三岔口",稍不小心,就有可能被误导。作品结构严谨,一环紧扣一环。语言洗练,不乏俚语、习语。对话形式多样。这一切使小说读起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爱不释手。

《完美罪行之友》这部小说曾获得西班牙"纳达尔"二〇〇三年度奖。它的作者安德烈斯·特拉别略(1953—)的其他作品还有:小说《神秘轮船》、《厄运》、《白昼与黑夜》等;《神秘轮船》获得西班牙"布拉萨 & 哈内斯"一九九二年度国际奖。《逝去的脚步》收入了他最初的十本日记。散文集有:《灰色西装的经典作家们》、《塞万提斯的一生》、《武器与文学》、《四路街之夜》等。《文学与内战(1936—1939)》获得"堂胡安·德·波旁"一等奖。诗集有:《传统》、《光秃的树枝》和《也许是个真理》,后者获得西班牙国家"评论"奖。

最后,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在本书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了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教授埃玛·马丁内尔博士的热情帮助。在此,向她表示衷心感谢。

2004 年 6 月

苏格拉底:依你看,什么最为糟糕,是对人施以不公还是遭受不公?

波罗:我认为遭受不公是最为糟糕的。

苏格拉底:什么最为丑恶,是对人施以不公还是遭受不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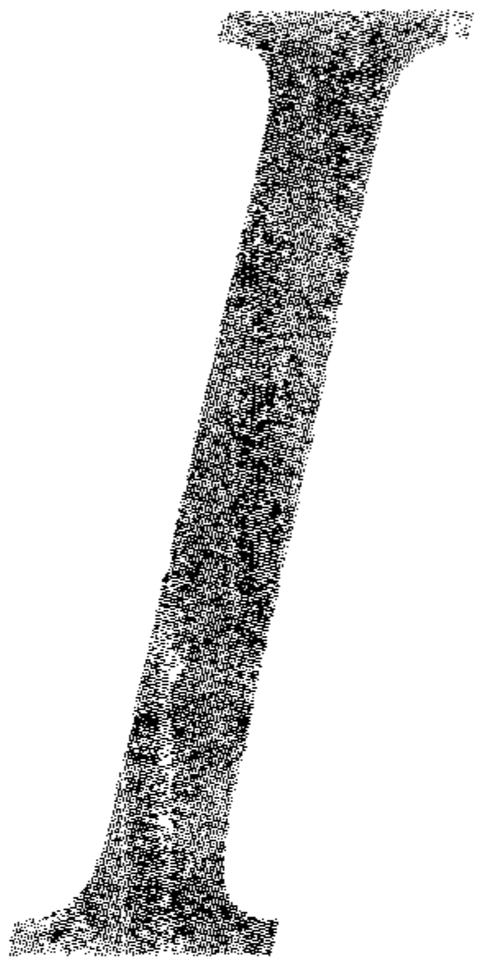
波罗:对人施以不公。

苏格拉底:(……)我们把这一点暂且放在一边。现在来审视一下我们有着不同看法的第二点。在众多的邪恶之中,如同你认为的那样,对人施以不公的人受到惩罚,还是如同我认为的那样,对人施以不公又不受到惩罚,是最大的邪恶?

摘自《高尔吉亚》①

---

① 这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前427—前347)的作品,记述他的老师、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的言论。苏格拉底善言论而无著述,其言论大抵见于柏拉图的一些对话中。《高尔吉亚》又译《智者篇》。



德雷从来没有想到，一只门铃能像犰狳那样哼叫个不停。

叮叮……叮叮叮……叮叮……

他本来在床上睡着了。身上穿着风雨衣，连鞋子也没脱。他吓了一大跳。一双破旧鞋子，倒霉的颜色，满是泥巴。他伸手摸了摸左轮手枪。他在那个小房间里已经呆了整整十个小时。按门铃的那个人停歇了一小会儿，但是，很快又重新发起了进攻。铃声好像一支曲子，一会儿短促，一会儿拉长。德雷睁开眼睛，有什么刺了眼睛一下，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眼睛有时候就是要痛的。是想和他玩猫捉老

鼠的游戏呀。铃是猫,他是老鼠。他惊愕而邪恶地向四周扫了一眼,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地。眼睑灼痛灼痛的。他向窗外望了望,天已经黑透。瓦伦蒂尼老人的家电商店已经亮起了霓虹灯,他的房间被照得一闪一闪的,色彩凄凉、单调。门铃又响了起来。红色和黑色,红色和绿色,一个突显着匠心独运的胸脯、性感十足的洋娃娃举着吹风机,头发迎风飘拂,吹风机断断续续发出嗡嗡声。德雷想,一个句子里使用了那么多从句,那么多限定词;可是,所有的关联词都见鬼去吧,尽管他喜欢它们。他用眼睛盯着手举吹风机的姑娘的头发,那发型也是匠心独运的作品。门铃又叮当地响了声,直刺他的脑心儿,犹如一根编织针刺进了鼓膜。这时,他感到空空如也的胃里好像有电流通过。撰写、创作侦探小说的人把肠胃的咕咕叫声称做"死亡先驱"。他从床上坐起来,不弄出响声,那下意识的动作犹如猫儿猜测危险在哪里。他从老鼠变成了猫儿。

当铃声不再鞭笞德雷时,他听见门外有警察的呼吸声。他们在执行命令,说不定任务很简单。他们要骗他打开房门,把他打死在性感洋娃娃身上反射出的光旁。他们肯定没有穿警服。是这样,最后,他将倒在地毯上,同霓虹灯的洋娃娃作二人表演。德雷从乱糟糟的响动推断,门外要有三四个人。又开始叫门了。

哒,哒,哒……

现在,是猛烈的敲击声,一声紧似一声,是用手枪把敲击的。德雷累极了,他的小说已经写到最后了,死人他是看够了。

房间里充斥着雪茄和麦芽威士忌味，麦芽也好不麦芽也好，反正是威士忌。上午，他放下报纸——他在这张报上读到多拉之死的消息——，不知怎么一下子把杯子碰倒，酒洒在地毯上。他本想抓住杯子，倒把床头柜上的酒瓶碰倒了；他动作笨拙，没有挡住瓶子，瓶子掉在地上，碎了。地上到处是尖利的玻璃碴子。顷刻间，那儿酒气冲天，宛如酒精蒸馏室一般。玻璃碎片仍然散落在地上，威士忌有一部分已经蒸发。这事发生在十点钟左右。随即他让罗夫伦酒吧送上一点吃的、威士忌、香烟和浓咖啡。他没有让服务生进来，那是不想让后者看见地上的碎玻璃和洒淌在地上的威士忌。但是，霍埃这个为罗夫伦效劳的小伙子，皱了皱鼻子，嘴角上浮出一丝邪恶的微笑。霍埃是个好小伙子。

“德雷先生，我不知道您在做什么，可是，房间里威士忌味是那样浓烈，只要点燃一根火柴，整座楼房都会炸飞的。我这样讲给您，是因为我知道莫洛先生是从什么地方弄来那种饮料的。”

德雷从门缝递给他一张二十杜罗的纸币，把他打发走了。他一人独处之后，把咖啡喝进肚子里，但是剩下的血红汉堡包碎屑依然扔在屋角里，散落在玻璃碎片中间，仿佛是狗吃剩下的。一只猫。一只老鼠。他好像一只老鼠被捉住了。不，他不是老鼠。

“喂，德雷，我们知道你在里面，开开门。我们想和你谈一谈。我们来不是找你麻烦，是州长派我们来的。”

“欧尔松，你见魔鬼去吧，也请告诉奥斯汀先生，他也去地狱吧。谁敢第一个闯进这房门，我要让他全身布满八音

符。以后发生什么嘛,等着瞧吧。”

“德雷,你放聪明点儿。喂,”这时,德雷听见欧尔松压低声音,问身边的人,“你知道吗,德雷说的八音符是什么意思?”

德雷脑海里闪过欧尔松的大脑袋。

欧尔松的一个帮手顺着过道跑到尽头。他的脚步声听得一清二楚。过道狭窄,墙壁涂刷的漆料令人喘不过气来;两侧共有十几个房间,门也是墙壁那种颜色。过道尽头有一扇窗户,通过玻璃望出去,目光所及更是令人不安的东西,一座院落被灯光照得明亮,把一个人从高处推下去,说他是逃跑时摔死的也是可信的。那人试着打开窗户,锈迹斑斑的合叶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是老鼠和猫同时发出的那种尖叫声。他把半个身子探到窄小的院子里,仔细巡视,看是否有消防楼梯。

“欧尔松,告诉你的帮手,我不会愚蠢到那种程度,钻进有消防楼梯的洞穴里。你们如果想从窗户爬进来,那就必须去请蜘蛛人。你们尽管准备随时放火烧掉房间,但如果这样做,你们一直搜寻的东西将会炸得满天飞。我身边有一瓶莫洛的那种东西,你们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当你们看见这些纸币烧成灰,飘浮在星空中时,也许想开开心,野餐一顿,带上你们的姑娘,让她过一个浪漫之夜。”

“德雷,别废话。快开门,听见没有?我没有那么大的耐心了。我要一下子结果了你。”

“我听着呢,欧尔松,别大喊大叫的,别打扰我。”

“帕科,在家吗?”

“我说了,别打扰我;快点给我滚开,不然我要把铸排机里的铅块全都塞进你们肚子里。”

他想,“不然我要把铸排机里的铅块全都塞进你们肚子里”不符合德雷那样的人,便用×把铸排机涂掉。那几个×犹如一梭子机关枪子弹,随着圆形弹膛的跳动而哒哒响起来。一架苏制 M－32。像德雷这样的人不会关心铸排机,他有生以来肯定没有见过铸排机。对装有圆形弹膛的M－32也没有见过。他不喜欢苏联人。一个历史那样久远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为侦探题材提供任何留芳百世之作,存在下去有什么意义?

“德雷,你到底开不开?”

“欧尔松,你没有学会问点别的东西?”

“帕科,在家吗?”

有人在叫门。

帕科过了好一阵子才弄清楚,那天上午自坐在打字机前大约过去了多长时间。吃剩的小吃土豆炒鸡蛋扔在地上的小盘子里,他的小猫波依罗特在盘子里一口一口地咬着吃。他和多拉分居后就养了这只猫。桌子上还放着半杯威士忌,瓶子摔到地上以后就剩下那么多了。

他工作时,是那样聚精会神地投入到人物和故事情节中,都不能分辨现实中发生的事;他全力、近似狂热地开动脑筋而想象出来的东西,随着一字一行地写下去好像渐渐成了现实中有血有肉的了。

威士忌洒出来时,弄脏了好几页稿纸,不过大部分酒液流到了地毯、地板上。可是,当两个男人快要血淋淋地死去

时，一瓶威士忌是何许物也？

“帕科，你在里面吗？”

“这就来。”帕科从房间最里面喊着说。

他站起来，但好一阵子没有移动脚步，而是俯身站在打字机前，在从滚筒上伸出的稿纸上阅读着。

那是一台老式的万得乌打字机，高大，笨重，漆黑。是一座真正的灵台，经得起地震和故事情节的考验。对他来说，老式的万得乌和德雷·威尔逊使用的特殊口径、老式的史密斯－威生是一样的。不过，帕科有生以来并没有见过史密斯－威生，只是在一本书的插图上见过它的样子罢了。他有好几本关于火器、枪炮的书籍。几百个男人被字模准确地击中而死在字键撤钮中间，多少颗脑袋在无情的砍刀下滚落在地，多少犯罪现场在火燃——“火燃”这个字用字母 q 和 m 覆盖了——变得模糊不清，多少凶手、坏蛋、无拘无束的人、下流人、告密者、二流子、无耻之徒、混混、小丑、不务正业的人和卑鄙之辈向打墨胶辊讲述了他们的全部罪行，多少女人在那些人的怀抱里同样蒸发了，而这些人在与罪行斗争中得到的惟一补偿是那转瞬即逝、短暂而不能自控的一分钟爱情？案件中的多少骑士没有走出那座无法替代的梦幻大山？

“帕科，开不开门？”

“这就开。”

他继续阅读刚刚写完的那几个句子。他很可能在心中暗暗地想过，担心德雷和欧尔松那两个人在他去开门的瞬间会自行其是，做出法理不容的事，从而使他最近两个星期

的劳苦付之东流。

他只剩两三页的文字便能结束那部小说，但仍然不知道是德雷杀死欧尔松，还是欧尔松拿下德雷的首级。他觉得这两种结局都可行可用。两种结局都挺合适的。

德雷是个浪漫派，做事果断，从本质上讲，很像他本人。欧尔松杀死了多拉，而他很爱多拉。但是，多拉背叛了他，是她的两面手法把她引上了一条危险道路，当然啰，这条路的尽头就在底特律一个贫民区出口处的一条肮脏、阴暗的胡同里，一天晚上，欧尔松在那儿把她打发到另外一个世界。她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行为放肆，姿色出众。他钟情于巾帼英雄一类的女人，一直对她们怀有恋情，也正是她们总是给他带来不幸。坏女人。我们男人为什么喜欢坏女人？当他不敢对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时，便常常在自己的小说中自问。在书中，这页文字呀，那页文字呀，时不时地有人用卡片汇集的随便一个句子替他作答。至于欧尔松……

“出了什么事？屋子里全是威士忌的臭味。”

“你好，莫得斯托。今天早晨，波依罗特吃鸡蛋饼时把酒瓶子碰倒了。”帕科这样回答，说着又坐在了他那台形影不离的、奉若神明的万得乌打字机前，脑子里想的与其说是刚刚回答的朋友的问话，毋宁说是他的小说。

星期一，莫得斯托·奥尔特加常常不与家人共进午餐。下午三点或三点半钟，他离开办公室，在外面随便吃点什么，便向朋友佛朗西斯科·科尔特斯① 家走去；佛朗西斯

① 佛朗西斯科的昵称是帕科。

科·科尔特斯是作家，创作破案、侦探和一般阴谋小说。两个人坐上一会儿，接着走出家门，找个酒吧喝杯咖啡，步行去参加 ACP[①] 聚谈会的每周例会；这个聚会在毕尔巴鄂街心花园的商业咖啡馆举行，四点半钟开始，常常拖到六点半或七点钟才结束。

“小说叫什么题目？”

莫得斯托·奥尔特加一边隔着帕科·科尔特斯的肩膀读着，一边向稿纸上瞟了一眼。

“只一小会儿，莫得斯托。十分钟。请坐。我今天必须写完这部小说。等着我交稿呢。我等钱用。我欠两个月的房租，还要给多拉送去一点。”

两年来，他小说中的女性大部分叫多拉，和他前妻的名字一样。或者叫多洛蒂娅，或者多洛娣，或多莉，或多莉塔，或得沃拉。有的女性是完稿后在校样上更改名字的。不过，一开始都叫那个名字。他企图感动她，重新引诱她，请她原谅他对她做了那事，让她相信事情再不会像以前那样。有时——像现在这样——他叫人把她杀死。他那是找个方式方法告诉她，他很绝望，为了爱什么都可以做出来。另外一些时候，他把她送到忏悔所；但是，一般情况下，他每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总是面对自己的命运，跌进优雅的阴暗深渊，走上自我毁灭之路；男人们那样对待她，她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那些男人中没有一个像她那样年轻，像她那样具有绝代之美；她生活中的那个男人，或者说他，佛朗西斯科·科尔

---

① ACP 是“完美罪行之友”的西班牙文缩写。

特斯——他曾是她生活中的男人，现在不是了，但希望重新成为那样的人——还在等着她呢。

科尔特斯创作小说时，很喜欢命运这个词儿，因为每当它出现在面前，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必须屈服于这个词儿，接受这个词儿，就像面对的真是命运一样。不过，帕科却恰恰相反，婚后两年多拉把他从身边赶走、他不得不离开家的现实，实在不能接受。正因为如此，他写作时喜欢把她带在身边。

“过会儿再写吧，我们要迟到了。”莫得斯托提醒说，但从他的声音和表情来看，他并不愿意催他走。

佛朗西斯科·科尔特斯漫不经心地阅读最后几个句子，力图重拾思路。

“实际上，”莫得斯托立刻补充说，那时他的朋友开始用力敲击坚硬的键盘。“聚谈会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没有一个人关心准时赴会。人们去，不去，都随便；有时甚至谁死了，过了好几个月才发现。于是，一个人前来询问，某某在什么地方，在场的人耸耸双肩；又过了两三个月，一个人到聚谈会上，带来可怕消息，说某某病得很重，大家大吃一惊，心想，是不是我呀，再过两三个月，那个人走了，死了。我是想对你说，我们生下来是为了死去的，我们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劳驾了，莫得斯托，别那么悲观、沮丧。你少说两句好不好？你在分散我的注意力。”

莫得斯托·奥尔特加是帕科的一个好朋友。是“他—她”的好朋友。与多拉分居事宜，就是他出任的律师，不过，

他们很久以前，即在成立 ACP 聚谈会时就认识。他的办公室在巴尔迪尼亚斯将军大街，他也负责民事和刑事各方面的各种事务，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务。他是个表情严肃的人，无冬无夏，好像总是穿着同一套西服：不灰，不蓝，不深，不浅，不是呢料，不是棉料，不是化纤，不是亚麻。或者说，那是律师工作服。他头发很短，用推子理的，已经完全花白，唇胡短、硬、挺，向前长着，好像防雨罩一样遮在嘴巴上面。双眉总是直挺挺的，使他的样子看上去十分可怖。他像小鸮一样忽而把脖子移向这侧，忽而移向另一侧，动作猛烈，间隔时间分秒不差，对于他这个并非五十出头而是六十好几的人来说太急剧了。作为律师，应该说他讲话不多，总是像个痴呆病人那样倾听。他还有些怯懦，胆小怕事。

“我真弄不懂，莫得斯托，你是怎么当上律师的。”他的朋友时不时地这样对他说。“你对法官说些什么？”

最终，德雷被真正地困住了。他被堵在房间里，无法逃脱；他怎能插上翅膀飞出去，怎能穿过枪林弹雨，更何况他身上有物证，即手提箱和箱子里的钱，指控州长奥斯汀先生杀害了多拉，杀害了迪克·科尔曼，杀害了萨莫埃尔·G.K.内维尔，还指控这位先生肆无忌惮地诈骗，此事传遍了底特律全城。

“告诉我一件事，欧尔松，”德雷说，“尼特死了吗？”

“死了，永远地死了。”

帕科可能不是个凶狠的人，但是个凶狠的小说家，他重拾思路，犹如外科医生美美地吃完午餐后重新拿起手术刀。

他的朋友奥尔特加坐在狭窄的客厅里。帕科·科尔特

斯命令他缄默不语，他并不感到不快。他知道，某些高峰只能默默地征服。

律师躺在沙发上，管它多长时间呢，他没有脱掉大衣，如同那天上午德雷做的那样，穿着皱巴巴的风雨衣，关在房间里。不过，莫得斯托·奥尔特加并不知道德雷在城南圣安琪儿大街一座楼房中的那间小屋子里到底做了哪些事或者没做哪些事，尽管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多久：他是他朋友小说的第一读者，若不是因为他对他从来没有做过评论的话，还会是他的最佳评论家。他认为他的作品是奇异的，是一大奇迹，如同闪电将它的宝剑直插云端。

他打开电视机。从家具、图画、沙发和扶手椅来看，在这间房子里完全可以发生各种各样流血的暴力罪行。

“帕科，”他的朋友莫得斯托又对他讲起话来，“你对墙上那张画不感到头痛？”

他指的是几朵菜花大小的花，葡萄颜色，从踢脚板一直爬到天花板。

“你应该知道，这里的一切都是临时的，租给我时就是这样。”小说家回答说。“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打好行装，重新和多拉住在一起。”

“两年了，你一直这样说。”

莫得斯托看了眼电视，机顶上放着一尊绿色石膏人像，是个中国人用绳子提着两只水桶。

“把音量放小点。”他朋友从书房对他命令说。

电视在播放一次法院的庭审。这两年总是这样，播音员说那是一次历史性的庭审。一个男人走出来，登上讲台，

同时另外几个人进进出出，不大关心那儿正在发生的事。

传来万得乌打字机的愤怒、持续、永恒的击键声。

听到劈劈啪啪的响声，莫得斯托意识到帕科·科尔特斯产生了真正的灵感，脑海里想象着后者的脑袋一定像台轮转机把他的丰盈思想快速印刷出来，而他的思想核心是要按照比司法大法更为神圣的法律原则维护世界秩序。他，作为律师，根本不相信司法。但是，他对生命及生命奥秘却怀有一种久远的尊重。正因为这种原因，他崇拜科尔特斯……

“帕科，你还没有告诉我给小说取个什么题目。”

“《州长的肮脏交易》，你等一等，让我写完。”他听见朋友一边央求着，一边不停地打字。

“我觉得书刊审查不会让你使用这个题目。”

“已经没有审查了，莫得斯托。”

他是律师，尽管如此，他常常忘记佛朗哥[①] 已经死去。是习惯势力。在法庭上，事情差不多一直是老样子。有的法庭，独裁者的肖像消失了，但却没有动一下手拿走耶稣蒙难像。

德雷无法杀死奥斯汀先生手下的任何一个人，他们都是警察呀。他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读者这个时候已经知道欧尔松和他的帮手骂声不断，但是小说结尾不提一提底特律这样城市里多少得到点尊重的警察局，是不合适的。他要对领导层进行清洗，不过必须请个人关心一下忠厚的纳税市民。他的出版商老埃斯贝哈——死去的埃斯贝

① 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独裁者。

哈的侄子,小埃斯贝哈的父亲——,关于这事一直这样对他说:“你如果写情节中出现法西斯警察的那类小说,就写社会小说吧。我们的准则再简单不过了:世界上到处是坏人,坏人比好人多,比好人活得开心,他们车好,女人美,肚子油水多,但他们比好人愚蠢。这样,好人在一百二十页标准稿纸——每页支付六百比塞塔——里被坏人拳打脚踢、侮辱谩骂之后,最终杀死一半坏人,另一半放在一边,等候处治,因为小说要一直出下去;如果坏人都死光了,我们靠什么生活呀?帕科,你懂得我的意思吗?别烦扰我了。你如果让一个腐败警察出场,就得让另一个警察出场,扶着老太太过街。懂了吗?不必写社会小说。”

帕科·科尔特斯无法忍受他的出版商,但还是和他打了十七年交道。他和死去的埃斯贝哈更合得来些,但和老埃斯贝哈却做不到,根本做不到。

人们对出版商有错误看法,也许把他们想象成为关心文化和重大问题的人,就是那种非常敏感的人,一有时间便用手托着脑袋,不时搔着下巴,像是在思考、沉思。职员、供应商和顾客为了把埃斯贝哈同死去的埃斯贝哈、小埃斯贝哈区分开来,把埃斯贝哈称为老埃斯贝哈,此人继承了一家还算过得去的商号,印制技术书籍呀,家庭百科全书呀,国家公务员考试题目汇编呀,桃色小说呀,和一些放在书亭和西班牙铁路书店里出售的西方小说和侦探小说。他是上届政府的最后一位暴发户。另外,他从不忧郁、悲伤,而是心绪极为不快,总觉得他的公司每时每刻都生存在他叔父一九二九年开创的英雄历史的最后一刻;这位叔父就是死去的埃斯

贝哈或“我的永远安息的叔父”,随便怎么称呼好了。

“欧尔松,你这个臭狗屎!”

这也可以说是帕科向老埃斯贝哈发出的喊声,传遍了整个房间,处在朦胧之中的奥尔特加惊醒过来。

这个议员是另外一个人。电视没有声音,议员们排成一排。有的议员投完票后,并不回到座位,而是向过道走去。

莫得斯托对那爆炸般的喊声太熟悉了。他知道,每当帕科·科尔特斯这样大声呼喊时,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卓越的一点什么就要产生了。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发现小说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全部情节最闪耀光辉的一刻之中。帕科·科尔特斯真正激动了,他在享受着妙趣横生的结尾。他无法控制。他知道他那样子很荒诞。但是,他屈从于他本人构思的小说情节。他太激动了,不能在椅子上连续坐五分钟。他站起身来,放声大笑,一支香烟还在烟灰缸里燃着,又点上了一支,使劲拍手,对他的人物不停呼喊,仿佛他们是些有血有肉的真人,哈哈,哈哈,热情奔放地欢呼,天才就是天才。他重新坐下,写下一页稿纸,变换文具的位置,吃波依罗特弃在一边的鸡蛋饼剩渣,不知多少次把最少两个小时前就已空空如也的威士忌酒杯送到嘴边,把桌子这一侧的东西移到另一侧,字典呀,从中不时获取灵感或抄袭一两段文字的英国小说呀,也移来移去,有时,当确认不再需要时,又把它们送回过道的书架上,然后像孩子似的唱呀跳呀……

帕科·科尔特斯从一大堆写就的稿纸中找出一页,用圆珠笔在上面打出来的两行文字中间写道:“在多拉的单元房

间里,他找到一个信封,里面的照片可以指控奥斯汀先生……”

在侦探小说里,一切都应该可丁可卯,如果不是这样,就必须强制做到。一部侦探小说酷似一本严密的账目,数字不能有任何出入;为此,一个好的侦探小说家首先要做到的是,手上有两三张王牌,如同赌棍一样。科尔特斯认为,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从爱伦·坡① 到柯南道尔②,再到阿加莎·克里斯蒂③。因此,他倒退五十页标准稿纸,在那儿从袖口掏出自己的王牌,把照片装进信封里,当做罪证,毫无顾忌地从门下塞进去。

“欧尔松,你充其量不过是堆臭狗屎。”科尔特斯又大声说了一遍。

欧尔松看见信封塞过来,用手枪对着这张纸片问道:

“你搞的什么计谋,德雷?”

对话部分,科尔特斯常常脱口大声喊出来——他这是为了看看声音效果——,同时在打字机上发疯似的敲击着。

“照片不错呀,欧尔松。你照得很好,不过,我敢发誓,那条母狐狸不是你妻子。”

“德雷,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只小耗子。”

德雷抑制住愤怒,咬紧牙齿,仿佛没有听见,大声吼道:

“欧尔松,镇静点。你妻子大概很宽厚,而这姑娘很会装模作样。”

---

① 爱伦·坡(1809—1849),美国小说家,以神秘、恐怖作品见长。

② 柯南道尔(1859—1930),英国侦探小说家。

③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1—1976),英国侦探小说家。

莫得斯托·奥尔特加又倒在了沙发上。那时间短不了。

帕科·科尔特斯最少还需要两张标准稿纸。他一点儿也不喜欢那种解决方案，因为老埃斯贝哈是不容讨价还价的。他对每页标准稿纸支付六百比塞塔，稿费算到前一百二十页，可是从这页以后，他再不掏一分钱。“那是你的问题，”他常常重复这样的话，“我要多浪费纸张，而且又不能提高每本的售价。庆幸的是，我不像我那‘永远安息的叔父’做的那样，使用剪刀和修枝钳；那时，出版商确实有他们应该有的东西。”科尔特斯心里想象着老板的回答，禁不住骂了他一句，但他要信守约定，把那两页写完。管他给多少钱呢。小说快写完了。他是一个作家呀。或者说，无论怎样，这句话常常挂在嘴上，首先，对多拉，他就说过。他对她不知说过多少次：你应该懂得，亲爱的，据说，我们作家有这样的事，有这些困难。“你是不是说，所有作家都和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这是多拉怒气冲冲向他发出的问话。但帕科十分严肃地对她回答说：“几乎所有作家。至少有的时候。和艺术有关。”

“完了吗，帕科？”奥尔特加在他身后低声问道。他的朋友没有听见他的话。

就剩最后几句话了，他发疯似的写着：德雷，活着；欧尔松，活着；伊万斯、伊梅尔松和欧尔松的其他帮手，活着。但是，对奥斯汀先生，谁也不会放过他。一个像他这样卑鄙无耻的人，必须一枪打死。他要让一颗子弹掀起他的头盖骨。他偏爱经典作家的风格。是欧尔松把他除掉的。使用的是杀害多拉的同一支手枪。事后，他把死者伪装成自杀的样

子,将指控他是杀害那姑娘的凶手。对欧尔松,我们将会很快算账的,科尔特斯这样想。在下一部小说里。很可能要通过多部小说,才能和他算清账。最后几句话在创作者的脑海里回荡,犹如一部将赢得暴风雨般掌声且热情奔放的交响乐旋律。

但是,那里什么也没听见。房子里静悄悄的。房子一片凄凉,房间间数要比他和他的小猫确认的多,灯光暗淡,除了房子女主人租给他的那几件,再没有别的家具了,全是过时的,前几位租赁者使用得很狠,那灯好像让人上吊用的,立柜有全身穿衣镜,每天早晨站在前面穿好天天必着的礼服,请看看这礼服,里子让人好恶心呀。再就是那张沙发,他的朋友莫得斯托倒在上面看着电视,电视还是黑白的呢,好像从垃圾堆里拾来的。莫得斯托·奥尔特加大概又睡着了。他一直是这样。稍稍不留意,就合上眼皮,打一会儿盹儿。他要求给一点理解,说:是我吃药的关系。真不知道,他在聚谈会上一半时间睡大觉,为什么还那样急着去。

“睡一会儿觉和完美罪行有什么关系?”奥尔特加说,他好像看出了他朋友在想什么。

“你能干出犯罪的事,莫得斯托?”

“如果保证不把名字透漏出去,保证不受到法律惩罚,我们说不定会在某一天犯罪的。我本人就……”

“你别夸口,莫得斯托。你连只蚊子都不敢打死……再说,你叫那个名字①。你会帮助杀人犯吗?会把他隐藏起

---

① 莫得斯托,在西班牙语中有“谦虚”、“行为检点”、“正经”之意。

来吗?”

“我是律师,帕科。怀疑就是侮辱:如果是我的顾客,我会的;如果不是,我不会的。我不怎么相信司法,可是更不怎么相信杀人凶手。”

奥尔特加又朦朦眬眬地睡着了,以致不能肯定刚才的对话实有其事还是梦中的情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科尔特斯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如果有适当理由,在合适地点有合适受害者,警察又恰恰不在现场、完全任他去干,他会像其他人一样去作案的。

他曾经想过多次。是这样,从道义上讲是合乎情理的。道义上? 对,莫得斯托·奥尔特加说过这样的话。等着瞧吧,会有那一天的。他开始思索起来。他还在睡梦中。

“莫得斯托?”

电视房间传来深沉、平和、有节奏的呼噜声,代替莫得斯托向他作答。

结尾。佛朗西斯科·科尔特斯喜欢用那种断然方式结束自己的小说,尽管那不是他写的最后一页,而是倒数第二页,以防留下什么疑问,他把那一特权留给最后一页。作家的怪癖呀。作品的名字和题目呢。他把一张没有半点污迹的标准稿纸塞进万得乌打字机。他喜欢那张光洁的纸。这张纸,他写时费的力气少得多,但得到的钱和其他标准稿纸同样多。《州长的肮脏交易》。在滚筒上上移四个行距,用空格撳杆把那一行目测置于刚刚写完的那行文字的中间,思索了一会儿。写上萨莫埃尔·斯皮特。用两个指头。他

总是用两个指头打字,速度像疯了似的,仿佛娴熟地射击机关枪一样。一架装有圆形摆动弹膛的苏制 M－32。

他另外还有许多供选择的笔名:弗瑞德·马迪松,托马斯·S.卡尔威,爱德华·费尔格森,贝特·奥康纳尔,马德·艾尔·杰费尔松,伊特·马尔文·Jr.及另外十多个笔名,他可以随便写上一个。

他在任何东西上都不用实名签字。谁购买一个名叫佛朗西斯科·科尔特斯——此人与妻子分居,生活凄惨,住在马德里埃斯帕尔蒂尼亚斯大街——的人写的小说?死去的埃斯贝哈持有同样的意见,老埃斯贝哈如此,而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命运还没有改善的话,小埃斯贝哈也将坚持那种看法。而他如果真的有胆量用真名实姓署名,谁能相信人们一定将其称为帕科的人具有足够的知识去谈论芝加哥、底特律、伦敦、纽约或法国毫无名气的任何一个省份,而他竟然依照西默浓① 的方式展开他小说故事情节的?实际上,他完全可以把故事情节转移到马德里。不过,那便产生了信誉问题,而信誉问题对于小说艺术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也是无须赘述的:谁能相信像拉瓦皮埃斯这样一个地方会发生纽约、伦敦、芝加哥或马赛那样的犯罪案件?不会发生的。哈米特② 和钱德勒③,这两个人确实是杀人能手。每部小说要杀死八个、十个、十二个人。没有任何问题,具备了逻辑、毅力、锐敏就能破案。真有眼力呀。他们什么都

---

① 西默浓(1903—1989),比利时侦探小说家。

② 哈米特(1894—1961),美国侦探小说家。

③ 钱德勒(1888—1959),美国侦探小说家。

看得一清二楚。《贝城的布鲁斯》[1] 中的侦探就是一个例子,能像雕鸮那样看见东西。他寻找一支掉在树林枯枝败叶中的左轮手枪。夜伸手不见五指。没有一丝灯光。没有手电筒。连香烟的火星也没有。但最终他找到了,左轮手枪半埋在枝叶中。他刚要弯身,准备拾起手枪时,看见“一只蚂蚁沿着圆形弹膛爬动”。经典作家真是天才。帕科·科尔特斯想成为一个经典作家。那一刻,谁也没想到读者会注意一只蚂蚁,更不会想到蚂蚁像小鸡那样早早地归穴或不在那里大摇大摆地爬动,甚至钻到一支科尔特 45 型左轮手枪的圆形弹膛里,但是对于经典作家什么都可以原谅。而对帕科·科尔特斯来说,案件是个十分严肃的东西。案件要写得恰到好处,绝不能像他说的那样,子弹和刀子,千篇一律。他和德·昆西[2] 的看法一样,认为所有投毒案件同正统风格,或者说同中间有流血死亡情节的案件相比较,宛如蜡像同大理石雕像相比较,宛如石印彩画同博物馆里真正的彩画相比较,是完全一样的,都是骗人的。他说,如果毒品贩子不采用那些可恶的新手段而是依照老习惯去砍警察脖子,从而让装备科学仪器的后者得手,让这些毒品贩子统统见鬼去吧。谁若是经典作家,就不得不接受那种情况。所以,读者从第一刻就要知道,他们给你讲述的可能是或不可能是实事,但一定是真实的,或者可能曾是真人真事,说清楚些,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一切,发生在马德里的一切,结

---

① 这是美国作家钱德勒的作品。布鲁斯又称蓝调,是一种音乐形式。

② 德·昆西(1785—1859),英国文学家。

果是些平庸的、无奇的东西，没有谁相信。一个读者对一个出生在托莱多省[①] 托里霍斯镇的、名叫卡西米洛·帕罗莫的杀人犯作何想法？那登在《案例》上很合适，只此而已。用这样的名字，无法登上艺术高峰。一个名叫牛顿·米勒的黑人，他杀死了一家典当行的老板，不是更为合适吗？发生在洛杉矶达温大街——这条街地处海湾前面、港口货场附近——的事，可能和发生在洛杉矶的克斯塔尼利亚的事同样可信吧？不是，当然不是。科尔特斯一直关注报纸的地方消息版，特别是《案例》，寻找该报编辑、他的女友洛利塔·恰米索提供的情节，但从来没有找到对他有用的材料：有时过于血腥，公证过于繁杂，有时又流血不多，不很动人。艺术和侦探小说是那种事的最高表现，寻求亚里士多德式的平衡：中间是德行，或者这样说，不是那样严重。在这里，杀人案件好久时间才发生一两起。可是，那种杀人奇迹，恰如大师的大师雷蒙德·钱德勒善于做的那样，十五或二十个人被活活枪杀，而且有现场，有动因，有嫌疑人，一个五千人的小镇子，一下子死了二十人，真是奇迹。而这里，在一个挂着耶稣蒙难像——它的一侧是独裁者[②] 照片，另一侧是那个死者[③] 照片——的房间里，一个人必须忍受国民警察的大棒……一句话，那太臭了。可以送给崭露头角的西班牙新电影的导演们，但他本人绝不接受。老埃斯贝哈做得对，

---

① 托莱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

② 指佛朗哥。

③ 指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1903—1936)，西班牙长枪党创始人，一九三六年被处决。

尽管他一肚子不高兴，在这事上还是要愚弄他一下：根本上不是社会小说的问题，他追求的永远是构思巧妙的东西。

山姆·斯皮特。啪啪打上三个×，就把萨莫埃尔变成了山姆。山姆·斯皮特。他觉得这样更为响亮、干脆利落、令人信服。另外，这个名字让人记起山姆·斯帕德①。

他低声哼唱起来。每写完一部小说，他都常常兴奋得不能自已。可是，兴奋很快消失，他又回到了沮丧状态。

莫得斯托被欢快颂歌头几个音符吵醒了，听见了准备出发的动静。他们肯定迟到。都过了十多分钟了。科尔特斯从蓝色文件夹抽出几页纸，把新写的小说夹进去。弹簧夹子关上时发出的响声，他听起来犹如天国荣耀的颂歌。

“好了，莫得斯托，我们可以走了。”

“小说不错吧？”

他被朋友的愉快心情感染了，脸上放出光彩，尽管他同时耸了耸双肩。

“你早就知道这些东西是怎样的。很可能比希望的要糟。”

“不会的。你总是写得很完美。我们这些读者不会发现情节中还缺少什么。轻而易举地想出故事来，真让人不敢相信。你是从哪儿收集来的？而且只一个月。在西班牙谁也做不出来。”

“你不要夸大其词。”

“你是了解我的。”

---

① 是美国作家哈米特作品中的人物。

“重要的是，我们半小时之内就要拿到七万二千比塞塔了。”

莫得斯托很高兴帕科还记得把他放进“我们”这个复数代词里。

过了半小时，他们已在叫坐落在布列西亚多斯大街的杜尔西内娅出版有限公司的大门了。

那层楼破烂不堪，地板吱吱作响，朝向布列西亚多斯大街，是死去的埃斯贝哈一九二九年从房主那里租下来的，为了维系埃斯贝哈家族的产业，前者的继承人以同样租金继续租用，卫生状况越来越差。面向大街一侧有十二个阳台，木地板磨损腐蚀，满楼道都是去垢剂和酸醋味，十七八间卧室和房间摆满了桌子和书架，桌子前已经没有任何人就坐，书架上摆放着几千册图书，其中有四十年前的版本，布满尘埃，它们是这个家庭出版社历史和西班牙民族败落的绝好见证。对于牢固的、现代声望不幸之中的不幸是：纯正的语言。

“和第五大道第四十五街口的出版商打交道，同和布列西亚多斯大街的出版商打交道怎能是一样的呢？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他们一边徒步沿着楼梯往上走，科尔特斯一边对他朋友说。“而且没有电梯。”

“而且。”律师对另外一个人说，此人费力地攀登着，呼吸像拉风箱一样，一步紧似一步。

一个女人——她同样是一九二九年的产物，身穿白领黑色衣服——给他们打开房门。

她打开门，犹如把他们引进一部哥特式小说的第一章。一般说来，你看见这位女接待员的面容，就别想活着走出去。那儿一定有个人把你杀了，将五脏六腑毫无顾忌地卖给某个怪僻医生的用人。

那时是下午四点钟，但是办公室的全套人马还都在：秘书，会计，出纳，老勤杂工和老埃斯贝哈先生本人，他坐在栎木办公桌前，犹如船长守在船舵前。样子不错嘛。

“你们得等一等。现在埃斯贝哈先生在同堂娜卡门忙事。我去告诉他，帕科，说你来了。”

“好，克列门蒂娜，您去吧。”

老秘书走进隔壁办公室。这个女人很高大，有一张马脸，她并不怎么掩饰背驼，身子向右肩弯曲，脚步很轻，几乎没有声音。衣领和袖口都浆过；白色衣领这个细微部分用油煎鸡蛋样的皱纹点缀着，再加上袖口的白边，使她的样子更加可怕。

老埃斯贝哈先生有个习惯，喜欢大呼小叫，那样子不大会受到尊敬。他们独处以后，帕科·科尔特斯本人对莫得斯

托·奥尔特加低声说，那个堂娜卡门太太就是卡门·贝索亚，几乎桃色小说在世界一出现就在出版社负责这桃色专题的工作。人们说，或者确切地说，人们曾经说过，那个女人是死去的埃斯贝哈的情妇。

“只一分钟。”

克列门蒂娜走回来后，坐在她的位置上。桌子上摆着电木电话，从一九二九年就没有更换过；电话旁的小盘子里有个酸奶瓶大小的花瓶。黑色小卵石中间长出的仙人球像针插一样插满了饰针，头部顶着一朵胭红色的小花。好像指肚被饰针刺破了似的。莫得斯托·奥尔特加用眼睛注视着那个上了年纪的女秘书，后者都不想麻烦一下，对他笑一笑。可以说在仙人球和她之间有点亲戚关系。

“我一直对您说，堂娜卡门，您别再让我重复了，不要写社会小说。您从一九六七年前就写桃色小说，所以我没有必要提醒您怎样写了。女性读者喜欢年轻、漂亮、贫穷，而男人要下流、潇洒、富有。漂亮女人有点愚蠢，好女人不那么漂亮，但更正派些。漂亮女人风骚，丑陋女人是好妈妈、好妻子、好姐妹。男人吗，是没有变化的：总是很自私，道德败坏。您懂得我的意思。漂亮女人最后变得过分愚蠢，聪明女人最后变得更为漂亮。您在听我讲话吗？女主人公现在爱上了管理教堂修缮的神父，那不是胡闹吗？您是不是认为俄国东西会传进来，我们现在要出社会主义小说吗？您是不是想把我这个从一九二九年就出书的出版社给搞垮了呀？写从解放到现在的神学。那种东西在这儿卖不动。”

帕科·科尔特斯和莫得斯托·奥尔特加不敢离开他们的

座位，静静地听着老埃斯贝哈如何把愤怒喷发出来，他的声音从办公室房门传出来，听得一清二楚。克列门蒂娜小姐想降低老埃斯贝哈发怒的严重性。

“你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喂，这是刚到的。”

她递给帕科·科尔特斯一本《不要做那事，轻浮的女人》，署名斯迈尔斯·赫金斯，这是他的另一个笔名；马诺洛·普列托制作的封面上，像杜尔西内娅出版社所有书籍一样，画着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风衣的男人，他刚刚从一个女郎手里夺过一把科尔特·A－1型指挥手枪，这个女人长着白金一样的头发，也穿件风衣，从领部开口隐约看见风衣里面可能什么也没穿。他粗粗看了一眼封面，便把书递给奥尔特加，后者急切地夺了过去。

“这个就是你讲的那个女人，在运输咖啡时走私绿宝石？”

科尔特斯点点头，表示同意。

那个房间和另外几个房间相通，很亮，但狭长。它的窗户是那样多，不禁使人想起电车。社长办公室两侧的壁龛里各放置一尊石膏像，如同两个卫士守在那里。四十多年的灰尘模糊了两尊雕像的严肃表情。死去的埃斯贝哈在装饰上的全部奇思妙想，都熔铸在了那个艺术标记之上，而这标记作为神龛的圣像从一九二九年创建这偌大出版社就摆设在那里。

“这两个人是谁？”莫得斯托·奥尔特加问道，他那时在抚摩着那本刚出炉的新书，不敢翻阅，那是在控制着浓厚兴趣，准备以后一个人仔细阅读和欣赏。

“是克维多[1] 和洛佩[2]。”科尔特斯回答说。

科尔特斯的回答使律师感到脸上无光。克维多和洛佩这样的大人物，所有人都应该认出来呀。他只嘟哝了句：“当然啰，不是他们，还能是谁呢？”

科尔特斯坐在一张扶手椅里，红色天鹅绒椅背破旧、脏污。他只是想着把钱给多拉送去。难道就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吗？他准备什么都原谅她。你有什么可原谅我的？科尔特斯在脑海里想象着多拉气冲冲地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努力使自己的思维更为寂静些，而且想象着不让思维回音传到他前妻的耳朵里。他养成了这种习惯，小说中的人物在他脑袋里同他讲话，而这一怪癖早已转移到了有血有肉的真人身上，所以只要一想到这些人，就让他们在前额下面对起话来。

他准备原谅她，尽管他没有什么可原谅她的，因为实际上是由于他的过错才发生了那种事。可是，一个作家能有什么过错呢？发生在作家身上的事，与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一点从他们结婚那一天她就应该知道。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女人——他曾这样自我辩解说——，而是因为我喜欢阴谋。而她……

“聚谈会后，我给多拉送钱去。莫得斯托，陪我去吗？”

他压低声音，讲出这话，仿佛他们两人是在医生的候诊室里。

莫得斯托·奥尔特加没有听见科尔特斯的问话，他在用

---

①② 克维多(1580—1645)和洛佩(1562—1635)，均为西班牙著名文学家。

怀疑的心情观察着克维多和洛佩的五官。他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他脑海里有的更多的是油,而不是水。他老了,但他却不知晓。每当他注意自己那完全花白了的头发时,常常这样说:我感觉自己是个小伙子。或者说,实际上已是一个老人。他的想法在头脑里飘浮着,飘浮着,而不是流动着。好像油那样。他不是个思维敏捷的人。正因为如此,他在法庭上不是个好律师。

“这两个人中间,不能有一个是塞万提斯吗?这里不是杜尔西内娅① 出版社吗?他们至少应该把堂吉诃德②摆进去。事情没有一点逻辑。”

所以,他是那样喜欢破案小说和侦探小说,在这些小说里,逻辑是至关重要的。和下棋一样。他也喜欢下棋。而他的朋友帕科是逻辑大王。什么都安排得那样好,一切各就各位。一个细节都不遗漏。如果有时间,他甚至能像技艺高超的糖果师那样锦上添花:在写就的小说里,像亮晶晶砂糖似的撒些意义重大、富有逻辑的细节,即拉着两端就能最终解开的活结。这可以使读者感激不尽,在最后一页登上推理之趣的高峰。可是,在一家名叫杜尔西内娅的出版社却摆上克维多和洛佩的石膏像,能有什么样的逻辑?

办公室门开了,走出一个二百多岁的夫人,个子像耳坠儿那样小,全身萘味,双唇涂得血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穿着花饰织物、丝绸,没有仔细熨烫,好像半个小时前才

---

①② 杜尔西内娅和堂吉诃德都是塞万提斯(1547—1616)作品《堂吉诃德》中的人物。前者是后者的意中美人。

从礼品箱子里取出来。是这样，他们置身于哥特式小说里。夫人的口红抹得那样重，一定刚刚吃了老埃斯贝哈先生的肝脏。或者，至少吃了一棵仙人球。

堂娜太太看见科尔特斯——自从科尔特斯还是个小伙子时，她就在那里碰见过他——，觉得应该对他说点什么，但是她发现他有奥尔特加陪着时，立刻想了一下，深深吸了口气，摇摇头，潇洒地晃动一下，将脑袋抬得老高，没有告别就走了出去，那副样子，比掩饰残酷无情的老埃斯贝哈先生使她流泪表现出的傲然，稍有逊色。所以，她走出去时身子摇晃了一下。她是很看重自己的老人，认识死去的埃斯贝哈，可老埃斯贝哈却让她老泪横流。死去的埃斯贝哈怎么不活着呀，也好洗掉遭受凌辱的不光彩名声？她在自己的小说里就是这样描写羞辱的。

“克列门蒂娜，”那女人命令说，“代我告诉他，我等他打电话，向我赔礼道歉。我在家里。”

她从背景幕布一侧退出场外，帕科则从另一侧走进去。

“帕科，我刚把堂娜卡门打发走。简直要把我们推向破产边缘。关上门。越老越糊涂了。”

莫得斯托·奥尔特加留在外面等候，仍然用眼睛盯着克维多和洛佩。

“这儿从来没有摆过塞万提斯或堂吉诃德的像？”

克列门蒂娜没有理解那问话的意思，看了他一眼，那表情如同仙人球看她一样。

“没有，自从我在这里就一直看见那两个。是永远安息的埃斯贝哈先生在一家石膏店买的，而那店正好在塞万提

斯大街上。”这种巧合她觉得很有趣，不禁呱地叫了声，这声音有点像笑声。“发票还在呢。这儿什么都不扔掉。”

又过了十分钟，他们之间没有说话。那个女人一直用削尖的铅笔头拨弄着火山石子。

“简直是具木乃伊。”老埃斯贝哈在门的那一侧对帕科·科尔特斯继续说着。“她心血来潮，写的小说里有管理教堂修缮的神父，你能相信吗？这是民主的问题。一天，她送来一部小说，书中的公爵夫人同她的司机勾搭上了，尽管这司机喜欢的是这位公爵夫人的女儿。情节写到这儿，还算不错。可是，接下去她竟然想出这样的事，叫神父爱上了司机，喜欢司机的女儿恨透了神父，而司机与神父的关系公爵夫人并不知道。你在听我讲话吗？该死的。我对她说，亲爱的，神父对您做了什么事？您要转到社会小说，还是想写侦探小说？如果想让司机同公爵夫人上床、同神父上床，或同他们同时上床，那是您的事。不过，您有什么必要用葡萄酒毒死他？”

“可怜的堂娜卡门。她不知道在小说里不应该毒死任何人。那是意大利人的东西，他们讲究礼貌，有点女人气。”帕科·科尔特斯突然说。

“你在说什么鬼东西？”老埃斯贝哈发牢骚说。“问题是，我对她讲那些事时，那个可恨的女人像呆子一样看着我。你知道，我是看在我那永远安息的叔父的面子，才同她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他很尊重她。不幸的婶母洛拉呀，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帕科，你想写桃色小说吗？一页标准稿纸是六百二十比塞塔，比侦探小说多二十比塞塔。我给你

六百五十吧。很好卖。这种小说很容易写,事情恰到好处不恰到好处,对女人来说都一样,只要结尾是婚庆场面就行。你现在甚至可以变得下流些。老娘们儿也喜欢那玩艺儿,你懂得我的意思。现在有了民主,可以写那种东西了。但是,绝不要同性恋的神父,绝不要同性恋的男人。怎么样?你也许应该换换品种了。你也快成个呆子了……”

他和老埃斯贝哈在一起时,后者没有一天对他是尊敬的。

“时下我应该做的是,领取这部小说的稿费。”帕科冷冷地回答说。

他小说“结尾”这个词带来的欢快心情,常常不能延续许久,而是被失语症所接替,闷闷不乐,好心情完完全全消失了。

埃斯贝哈站起来,走到身后一张大栎木文件柜——是装百叶帘的那种,无疑,是死去的埃斯贝哈置下的家当——前,拉开其中一个抽屉,从中取出一个很重的绿釉铁盒,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重新坐在桌子上,拉出别在坎肩里面的链子,直到看见链子尽头的一大把钥匙,从中找出一把小钥匙。

会计不在时,老埃斯贝哈亲自支付稿费。他算出科尔特斯的钱数,盒子里还有三倍多的钱,所以在老埃斯贝哈关上那个阿里巴巴的洞穴之前,科尔特斯仗着胆子要求提前支取下部小说的部分稿费。

“你知道我们是家严肃出版社,而不是典当行。”他嘟哝着说,脸上一副不友好的表情……“需要多少?”

科尔特斯变得像德雷一样，比猫儿还敏捷。他想：我还需要五万比塞塔，但是，我如果要五万，他一定给我一万；所以我要十万，他会给我四万，可是，这时候他一定和我想的一样，我不得不要……

“十五万比塞塔。”

这个数字把老埃斯贝哈吓得全身抖动了好几下。钥匙犹如小野兽重获自由从他手中跳离开，如果没有链子连着，早就掉在地上。

“要得太多了。”他阴沉着脸说。

“多拉，请你理解。都四个月了，我没有给你送生活费去。”他那是说谎，因为科尔特斯总是计算着天数，把钱准时送到妻子手里。但是，埃斯贝哈不了解他雇员生活的这些细节。“下两部小说的预付稿费。”帕科·科尔特斯补充说，他没有对乞讨的数目做任何让步。

“我没有那么多现钱。”埃斯贝哈撒谎说，接着数出三十张一千面额的纸币，把余下的放回绿色盒子里。

面对帕科·科尔特斯的敲诈，出版商的脸色非常阴沉。

“签字吧。”

帕科一下子把钱从他眼前夺过去，怕他万一反悔；然后，在他递过来的收据上签了字。

“怎么样，帕科？在我找到人专门写爱情小说之前，给我一部侦探小说和一部爱情小说。对你来说，写一部黑色垃圾和写一部桃色垃圾是一样的。”

他觉得收回了他贷款的第一笔利息，便把桌子上的蓝色文件夹叫做垃圾了。

佛朗西斯科·科尔特斯半个小时之前就好像有了这样的感觉，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此时此刻发生的事，但更有可能的是，克列门蒂娜小姐和老埃斯贝哈把他们杀害了。正如莫得斯托·奥尔特加本人说的，也许他更富有逻辑性。可是，在这种生活中，他什么也没有。

他感到喉咙卡住一颗枣核，不上不下。帕科想，说不定我感冒了。半个小时之前，他并没有想到可能患上感冒。同老埃斯贝哈的谈话使他全身的防御力荡然无存。当他写作时，惟一实实在在的东西是留在稿纸上的文字，其他东西指望不上。多拉正是指责他这一点。她总是这样对他说：你在外面时，那是因为你在外面，而你在家里时，是因为你在写东西。你从来不能属于我一个人。她说得有道理。他给她送钱去，要对她说原谅她。不，不能说原谅她，因为那样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她不喜欢乞讨。他要放弃不良嗜好，女人。女人像尼古丁，像酒精，像毒品。一个人像喜好抽烟一样，喜好案件，喜好女人，喜好小说。是不知不觉发生的。从玩笑开始，使自己自立于社会。他要对她说，他爱她胜过一切东西。如同他虚构小说中的人物——他正是为这些人物虚构小说的——一样，他是他自己的人物，自己生活中的人物。事情没有想到就发生了。一些事引出另外一些事。他每天起床后还不知道怎样结束那一天，恰如在写上“结尾”两个字前的两张手稿里，德雷和欧尔松仍然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两个人之中谁幸存下来，或者两个人都死去，或者同时保住生命。他的情况同他小说中的人物一样。那事我对多拉解释过上百次，她为什么不懂呢？在他身上，

女人不是问题的结束，而是问题的提出。这是现实中的逻辑，尽管他承认他小说里逻辑性更多些，因为写完之后还可以重读手稿、进行合理的安排。怎么能回到过去、让错误不复存在？花瓶摔坏了，怎么能把碎片粘起来而又看不出？他的生活就是一只摔破了的花瓶，缺了几块碎片。这是十分确切的。总是缺一两块碎片。真的，他感到喉咙痛。在一部小说里，他完全可以用几个 X 字母把“喉咙作痛”几个字抹掉，不再让它作痛。在一部小说里，他完全可以把花瓶摔破一段文字去掉，让花瓶继续完好无损。他没有除掉同玛利欧拉的冒险生活，因为他看不出那样做有什么不好。不过，他早应该做到不让多拉知晓、不发生把他赶出家门的事。多拉如果不知道那事，他荒诞地背叛她是不会伤害她的。可是，在生活中，事情都是没有预料到就发生了。从出版社出来，他们必须找家药房。去聚谈会的路上有一家，他放心了。在小说里，事情，特别是无缘无故的事情更容易发生。但是，怎样重新走进多拉的生活，跳到前几章，在那儿改变痛苦的情节，让发生过的事从来没有发生，或者在后续章节中永远忘掉？怎能忘掉她呢？他觉得自己又想得太远了，因为他脑海闪了下，前妻会向他提出那个问题的。然而，现在，那个可鄙的家伙使他记起了，他的生活是一堆垃圾，里面有许多垃圾小说。

“帕科，回答我的问题吗？我对你说的那事，你正在变成一个呆子。喝得太多了。该醒醒了。对你来说，写这种臭狗屎和写那种臭狗屎都是一样的，但你这样可以解决我的难题。那个老太婆的事，看得一清二楚。完全结束了。”

帕科·科尔特斯后来想，是那些难听的话装满了他的杯子。埃斯贝哈点燃一支廉价香烟，他的面孔像巫师一样挂上了光环。他那样子像个老不正经：身穿一套苍蝇翅膀颜色的西服，系着黑色领带，不知那是在服丧还是部、局杂工的标记，他很瘦，气色难看，秃头闪闪发光，胸部塌陷，一双白皙的手像女人一样，指尖被尼古丁染成黄色，指甲像诗人那样脏兮兮的，神经不时抽搐一下，使他不停地发出咳嗽声，频频用不很干净的手帕抹一下嘴巴，仔细叠好以后再塞回衣兜里。脏透了。

“怎么样？你好像得了痴呆症。”

帕科·科尔特斯一直望着窗外。他在想多拉，也在想埃斯贝哈。王八蛋。他担心死去的、永远安息的埃斯贝哈听见他的心声，并小声说给坐在他身边的老埃斯贝哈。他每次给多拉送钱去，都出现意想不到的场面。借来的钱，有富余给她买束鲜花。不，不能送鲜花。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没有比她不希望送鲜花的男人给她送鲜花更为不快的事了。她们愿意把这种事完全留给她们自己的男人，恰如生活中的女人做的那样，把嘴巴上的热吻只留给未婚夫。他也许在想，他没有权利送给她鲜花。送块手帕吧。一块手帕，所有女人都会喜欢的。去药房后，到格兰维亚大街的吉卜赛女人地摊买一块手帕。这看上去有点寒碜。让埃斯贝哈掏腰包，弄到一些钱，可以多破费点，进一家商店。他当头挨了一棒。突然被刺了一下。好的手帕标价三万比塞塔。帕科感到了走运的大胆人是多么快乐呀。另外，我已经把这个坏蛋捏在手里了。很遗憾，没有向他要三十万比塞塔。

“我不想再写小说了，不管桃色的、黑色的，还是绿色的，都不写，埃斯贝哈，一切都结束了。你再别想看见我的影子，因为你是个老不正经，只知道剥削人，搞同性恋的死去的埃斯贝哈是这样，搞同性恋的小埃斯贝哈也会这样。一家子都是搞同性恋的，都是不正经的。”

帕科疯了。他不喜欢难听的话，从来不讲难听的话，他小说中的人物也不讲。对小说是要审查的，他对审查已习惯了。比如，他的人物中没有一个说过同性恋这话，根本没有说过。一九七七年以后，现代侦探小说里是有这种事的。在这种小说里，这类话多极了，让你不堪忍受，狗娘养的，白痴，快死了吧，当王八的，臭狗屎。对他来说，这已经来得晚了。事实上，还是时有发生的。每天都出现十个新的小说家，每天在报上、海报上和电视里都出现好多新小说家。不知道从哪儿跑出那么多来。之后，全都跑到昆卡、希洪、巴塞罗那去。会议呀，研讨会呀，研修班呀。对他来说，知识分子太多了。他书中的人物说过，至少有这样的话：他妈的，或者臭流氓。不对。他是一位南方绅士。在他的小说里没有狗娘养的，而是杂种，没有当老王八的，而是当小王八的，没有挨肏的或挨刀的，而是快死了吧或不得好死的。他们不说难听的话，从不讲脏话，他不把这样的话塞进自己的小说里。所以，“搞同性恋的”这个词在他的胸部击了一下，好像有一大口痰在那里，可是那时，他犹如品尝牛奶咖啡豆那样慢慢地、津津有味地玩味着一连说出的“搞同性恋的”几个字。

“埃斯贝哈，你都听见了，你们埃斯贝哈家族是一窝搞

同性恋的。”

埃斯贝哈听到大骂他叔父、死去的埃斯贝哈和他儿子是搞同性恋的、不正经，一下子呆坐在那里，像块石头，下巴拉得老长。香烟差点掉在裤子的门襟上。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同一天失去了桃色小说女作者和黑色小说男作者，可是说到语言，他从不怀疑科尔特斯，也不对审查担心。

“帕科，你，你是老狗娘养的。”他一边站起身一边喊道。“立刻给我滚出去。”

窗上玻璃颤抖了。

“再见。”帕科耸了耸肩，只说了这么句话。

他看了看桌子上的蓝色文件夹，想拿走。但是，那样做会把事情弄得复杂了。

他同两个埃斯贝哈有二十二年的工作关系，这样辞别太简单了。有那么一瞬间，帕科·科尔特斯的脑海至少闪出他小说中任何一个人物可能说出的十个漂亮的答案。

德雷可能这样说：“好吧，埃斯贝哈，从现在开始你自己去写那种垃圾小说吧……”

萨里的贵族侦探约翰·墨累是最厚颜无耻的：“出来新小说，别忘记继续给我寄，一本不要少。肯定都是杰作……”

突然，他无以言状地喜欢上了“搞同性恋的男人”、“破烂女人”这样的词……

他的另外一个侦探弗兰西斯·亚冯讲话是最生硬的：“埃斯贝哈，快上吊死了算了。”或者这样说：“埃斯贝哈，不得好死的东西。”

可是,帕科·科尔特斯在脑海里听见把那个词同时做了翻译。埃斯贝哈,该千刀万剐的。他也挺喜欢词汇的这种变化。太遗憾了,他在决定放弃写作那一刻才发现这一点。把这些让给年轻人吧。令人痛心的是,他不狠狠地、啪的一下关上出版社的大门,就无法走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但是,他如果想重新得到多拉,就不得不放弃小说创作。生活中就是有如此糟糕的事:许多时候要从应该开始的地方结束,当已经结束了,又要开始。如同那天做的,许多重大决定都是这样。他发现,实际上他很久以前就做出了那样的决定,只是不知道怎样做出的。发生的事情,总是不久前就发生了,闪电,雷鸣,霹雳就是这样。在那个房间里,雷声在隆隆作响。

他要走出办公室时,埃斯贝哈对他喊道:

"喂,你就这样离开我,傻瓜蛋?"

相反,埃斯贝哈使用平民的骂人语言,没有一点难为情。

"我和印刷厂有协议。"他仍然吼叫着。"我和发行商有约在先。付给银行汇票。你知道吗?全年用纸都买好了。现在是二月。这是一架机器,像时钟一样运转。你如果不完成,我要起诉你。我要把你扔进油锅里,活活炸死。"

他在这句话最后又说了遍"傻瓜蛋",这个词的响声如同军曹在战斗中吐了口痰。莫得斯托和克列门蒂娜小姐对视了一下,不知道是否应该介入,把那两个男人分开来,看样子,应该说,他们在里面要杀个你死我活。

科尔特斯走出来时,莫得斯托·奥尔特加已经站起来等

他了。小说家面色苍白，好像要瘫了似的。嘴唇轻轻地颤抖着，神经抽搐，莫得斯托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过。

克列门蒂娜小姐紧张地站起来。她手上拿着那支刚刚用来拨弄仙人球黑土的铅笔。她面对发生的事警觉起来，而她像条老狗似的忠于自己的主子，看样子要把铅笔捅进小说家的脖子里。

埃斯贝哈没有注意到律师在，继续大骂帕科。

“事情不能这样就算完了，不要脸的。”他的吼声越来越大。

“再见，克列门蒂娜。请代为问候您的母亲。”

帕科·科尔特斯总是留下话，问候她母亲。他认为那个老秘书十分感激这种礼貌之举，一位侦探小说作家在上司面前可以失去理智，但在女秘书面前绝不能这样。

埃斯贝哈已经从他办公桌后面走出来，用手上的香烟比比划划，做着击剑动作。

“谁把你看在眼里呀，知道吗，你这个呆小病人？你是在这个出版社成长起来的，就这样报答我和我永远安息的叔父？你想想看，在别的地方有人出版你那破烂东西吗？在西班牙，只有我这个出版社出版书摊小说。我这里是第一家。好，写社会小说吧，留着自己看，活活饿死……你已经是具死尸了。”

显然，这后一句话是从科尔特斯小说里剽窃的，他觉得那些小说坏得很。突然，埃斯贝哈想起科尔特斯拿着借的三万比塞塔，吼声冲上了天。

“马上把钱还给我……你这个挨肏的，强盗，老狗娘养

的。”

“出了什么事?”来到大街上,莫得斯托·奥尔特加问道。他手上抓着那本《不要做那事,轻浮的女人》,好像一棵救命稻草似的。

“我不再写了。”

莫得斯托·奥尔特加跳了一下,换了个位置。他先前在他朋友右侧行走,听到那消息以后,不知怎的跑到左侧了。

“帕科,你在说什么呀? 如果需要打官司,那就打好了。我保证,这个案子我们一定打赢。那个家伙只知道榨黑奴的血汗。”

帕科·科尔特斯默默地走着,没有听清楚他朋友说的那些鼓励的话。他耳朵里响起尖厉的哨声,忽高忽低,最后变成微弱的不和谐音。

可以说,这位小说家甚至都不知道他走出的那一步。

“我忍受不下去了。他是个老不正经。”他这样说,想让他的话变得平静些。“结束了。”

莫得斯托·奥尔特加在科尔特斯身边走着,好像一个名扬四海的拳击手在场上绕圈子。大好人威尔斯,总是那样勤奋、那样大方、那样无所不知、那样浪漫,他的惊险行为将变成怎样的呀? 意大利人汤姆·瓜尔迪,比谁都了解黑手党的秘密,铁面无私,酷爱先辈的传统,面前有一盘面条、一杯马尔萨拉葡萄酒就能够发现最困难的犯罪线索,他的盖世聪明将变成怎样的呀? 马克·弗雷哈迪呢? 这个爱尔兰人对威士忌走私犯了如指掌。他们将永远消失吗? 英国的杰出绅士詹姆斯·惠特拉贝呢? 他机敏、多智、奇才,在英格兰

有城堡,有不讲情面的女管家,有一个不可救药的傻儿子,还具有防御原子弹的聪明,时刻准备帮助伦敦警察厅慌慌张张的检察官解决公认为百年难破的案件。难道他也要用埃斯贝哈先生的钱付给卡戎[①] 船费,永远消失在斯提克河[②] 的对岸?

“不能那样做,帕科。冷静地想一想再做决定。”这时,莫得斯托用一丝声音对他说。“你已经写了多少部小说?”

“正因为如此,莫得斯托。你看看我。加上《州长的肮脏交易》,一共三十三部,而我仍然是这个样子;莫得斯托,这是说,事情很糟。现在,他们想要另外的东西。侦探们是地中海烹调专家,还大谈特谈阶级斗争。以前,高谈阔论的是警察局的军曹和药房店员。年轻人寻找失真的激情,而我不能给予他们。他们喜欢小说中的杀人犯比警察更聪明,小偷比正派人更机警、有运气,无耻之徒比忠厚的人更遵纪守法。坏人是好人,好人是笨蛋。自从有了社会学,就把犯罪的过错归于所谓幼稚或一半敌意。没有人对任何事情有过错,坏事根本就不存在。一句话,问题并不在于谁干了那事。所有人都认为,决定罪行的是受害人周围形成的殴斗场,是对命运的强迫力。而这种强迫力是从受害人身上产生的,是从他同其他人关系中产生的,这就是环绕全人类周围的、通常称为命运的力量和盖然性的关系。你在听

---

① 卡戎,希腊神话人物,在冥河上渡亡灵去冥府的神。渡河时,每个亡灵至少须交一枚银币为船费,富人则须交三个银币。按照古希腊风俗,死者口中都要放一枚钱币。

② 即冥河。

我讲吗？我相信命运，但在一种秩序之内，或在一种混乱之内。因为事实是，没有命运就没有完美的罪行，但是没有混乱就没有小说、没有文学。现在，所有人都想成为电影中的博加特①，而同时又要成为百万富翁，在贝弗利山② 有幢房子，给劳伦·巴考③ 装修一个套间，周末同她在厨房里烤鲜嫩的蒜瓣和墨斗鱼。可以成为侦探，同时栽培玫瑰，可是什么地方有侦探挂着围裙？我们像拜占庭人那样衰退了。规则被破坏了。我们是另一个时代的人。另外，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我没有找到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我拥有过很好的案件，我不否认这一点，但结果是坏人破解了案件。在这种生意场上，一切取决于侦探。在每个地方，在每个时代，罪行差不多是一样的。为爱情、为金钱、为权力而互相残杀。不同的是破案的方式方法。我也不理解小说中的女人。我不喜欢她们。在生活中我喜欢的东西，到了小说里却令人生厌。如同我理解的那样，经典侦探小说是男人的事，和骑士小说一样。杜尔西内娅是什么人？什么人也不是，什么也不是，是个影子，是堂吉诃德的欲望。所以，女人不喜欢《堂吉诃德》。那儿没有浪漫女人出现，没有叹息女人出现。不停叹息的是男人，无论生活中的还是小说里的女人，都不喜欢叹息。告诉我吧。罪行，斗牛和战争，是男人的事。我们怎么办。太阳从另外几座山头露出头。今天，买书的人是女人，她们想用一点浪漫作为补偿。所以，

---

① 博加特，美国电影明星。

② 贝弗利山，美国地名，好莱坞影星集居地。

③ 劳伦·巴考，美国电影明星。

现在就来了男人，把她们脱得光光的，可是对我来说温度是难以忍受的。她们仍然跪着，但用爱情和幻想欺骗她们。我，莫得斯托，我没有找到一个好人物，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都没有找到。我这儿那儿地寻觅着，像人们说的那样，精选着各种素材。而结果怎么样呢？看上去做到了。第一个卑鄙无耻的人可能说，我做的只不过是堆破烂。这人说得对。今天下午我就把这告诉给多拉。至少对我来说，我在小说和生活中的不良嗜好结束了。我洗手不干了。她说得对。”

莫得斯托·奥尔特加一直缄默不语。他没有论据了，惟一想出的论据又觉得说出来有失体面。作为一个律师，也要关注逻辑，但是要特别关注伦理。多拉不会与他重归于好。如果帕科为了重新得到他的妻子而丢弃不良兴趣，他是不能如愿以偿的。她同另一个男人同居至少有一年了。帕科知道此事。她很高兴，自从他们分居以后，第一次看见她感到那样幸福。只要给他们的女儿送生活费，那么对她来说，她前夫放弃写作侦探小说，还是把他作为电影编剧，以钱德勒、以福克纳的方式抬到贝弗利山都是一样的。

“帕科，我喜欢你的小说，许多人也都喜欢。没有女人出现，那不是事实。是有爱情故事的。在《第三笔账目》里，薇奥莱塔和弗雷哈迪之间就是爱情故事，那是你的划时代的作品之一。你应该继续写小说。如果他们不喜欢，就不会给你出版了那么多部。当然啰，你的出版商是吸血鬼，实际上，你做得也许是对的。只是再找个出版商吧。”

“不，这一切结束了。”帕科·科尔特斯说，那语气如同在

挚友和历史面前破釜沉舟的人。“你还没有发现这一切已经结束了？如同电影院的黑白影片。黑色小说……现在都是特艺彩色小说。还是我对你说的那句话：用劈柴生上火，烤帕洛莫斯① 海虾。”

“那些是漂亮小说……我过去一直喜欢。”莫得斯托·奥尔特加唱着说，仿佛那是一段大提琴伴奏的叙事歌谣。

两个朋友沉默了几分钟。莫得斯托本人痛心地发现他刚刚讲话用了过去时。

他们正在穿过圣伊尔得丰索街区。他们从格兰维亚大街的吉卜赛女人身边径直走过，帕科已经忘记买一条仿制手帕。那时，街上行人不很多。他也把药房抛在了身后。他的喉咙已经不痛了。他觉得状况好多了。天灰蒙蒙的，天空很脏，酷似人行道的颜色。房屋有点倾斜，即使发生极轻微地震也要倒塌。而那正是莫得斯托·奥尔特加所担心的，他害怕随时发生地震。稍有传闻，全城就会抖动起来。在意想不到的那一刻变成一片废墟。他觉得心脏埋在了瓦砾之中。他们没有沿着格兰维亚大街行走，也没有沿着瓦尔维尔德大街，而是走在一段堆满烧焦砖瓦、布满喷发浓烟的火山口的路上。看不到他朋友的小说，他的生活将是怎样的？未来将给他们带来什么？他很担心科尔特斯的未来。他像他一样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全部收入只来自杜尔西尼娅出版社，在这二十二年里，除了合作破案小说、侦探小说和一般的阴谋小说外再没有做别的事情。

---

① 帕洛莫斯，西班牙一座小镇，坐落在地中海岸边，以美丽沙滩著称。

“你怎么付给多拉生活费？你知道，你需要什么，在我力所能及范围内可以指望我……”

“谢谢，莫得斯托。除了小说的七万二千比塞塔稿费，我还从老家伙那儿弄到三万。我不想还他。我要开一家侦探公司。我都想好了。”

他在撒谎。那是刚才瞬间想出来的。

莫得斯托·奥尔特加吓了一跳，不禁全身着实抖动了一下，本来在科尔特斯左边走着的，突然从那边转到了右边，并且和那一次一样，不知道怎样发生的。

“帕科，你在说什么呀。我可知道，依靠公众很难维持生活。年轻人可以开始拼一拼。你这么大年纪了，应该忘记电影里演的那种东西。你要记住歇洛克·福尔摩斯① ……”

“我们的福尔摩斯？”

“不，真正的。柯南道尔依靠他的福尔摩斯大获成功，所有人都认为他和他的这个小说人物是同一个人以后，他便变成了伦敦警察厅。以后怎么样？”

“第一个案件他没有能力侦破，一败涂地。我不是柯南道尔。我不是勋爵。事情已经决定了。我要从文学转到生活。我都僵化了。埃斯贝哈对我说过这话，他说得对。弗瑞德·马迪松们，托马斯·S.卡尔威们，爱德华·费尔格森们，马德·艾尔·杰费尔松们，贝特·奥康纳尔们结束了。永别

---

① 歇洛克·福尔摩斯，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所著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中的主要人物。

了，山姆·斯皮特，这是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世界上。从现在起，我重新叫佛朗西斯科·科尔特斯，说得更准确些，叫帕科·科尔特斯。光阴似箭。一切都死了。”

“怎么是死了呢？”律师打断他的话，他有些咋呼。“我从你小说中获得的一切？你描写事物的方法、风格，描绘的东西不是好像仍然在你的面前吗？”

“什么都不复存在了。现在，我成了小说中的人物。我知道我是谁，特别知道，我想成为什么人，绝不是刚刚过去的那个人。现在，也许你是描述我生活的人。”前小说家开玩笑说。“我是自己小说的主人公。我已经不是为小说虚构人物的人，而将是虚构我自己的人。你在听我讲话吧？如同乌纳穆诺[1] 的一部小说。这会引起多拉的激情。”

“乌纳穆诺的东西？”

“不。”科尔特斯说。“恰恰相反，是不再写书。玛利欧拉那事，她知道，是从来不存在的。永远结束了。我们要重新生活在一起，还有女儿。”

“帕科，你疯了。为杜尔西内娅出版社工作了二十二年了。我们换家出版社吧。”他用复数是为了报答帕科。“你要做那事，简直是胡闹。你善于写作侦探小说，就应该专心致志做这事。”

“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你总是对我这样说，律师离罪行是那样近，与其说需要警察，毋宁说需要侦探，罪犯越凶恶，越能造就律师。”

---

1) 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作家。

“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这话?”

“洛伦索也可以不惜一切,鼎力相助。”

他说的是洛伦索·马拉维亚斯,此人三年前就当上了路纳大街警察所的检察官,两个半月前加入 ACP 聚谈会,是最积极、最热情的成员之一。

“在我的最后一部小说,即我刚刚交给埃斯贝哈的那部小说里,我安排了家酒吧,名字叫罗夫伦,那是为他安排的。”

完美罪行聚谈会的朋友们很重视这些关照。帕科·科尔特斯在他的每部小说里,常常插入他同事中某个人的画像,同样不忘记多拉,不忘记他女儿薇奥莱塔,不忘记写进他们对他讲述的事物;总之,这是向朋友们传递的眼色,对朋友们的殷勤。

“看样子洛伦[①] 是个好人。”莫得斯托说。“可是,他在什么事情上能帮助你?”

“说不定愿意做我的合作伙伴。我们可以搞个公司。一个警察,一个律师,一个侦探。这就齐了。洛伦把案件转给我,我来侦破,你为罪犯作辩护。”

“可是,去洛伦那个警察所的人,一般地说,是办理身份证的。”

莫得斯托看不到他朋友的计划有什么逻辑性。

“另外,帕科,你觉得马德里还有可能成立个侦探公司

---

① 洛伦,即洛伦索。在西班牙,称呼比较亲近的人时,常常省去其名字最后一个音节。

吗？现在已经有四五个了，有一大半是多余的。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见过这方面的消息。和诊所的情况差不多。我看呀，如果人们可以去保险公司，就不会在私人侦探公司花一个比塞塔。再说，还有警察处理那事呢。”

“你不要那样想。现在，由于离婚问题以及这么多新东西的出现，人们生活在恐慌之中，需要侦探去暗中监视。这是时尚，人们喜欢追赶时尚。我昨天在报上也看到，自从有离婚法以来，西班牙已经有十五万对夫妇离了婚，而且还在增加。”

“那和你写的小说有什么关系？你的小说写黑手党、走私贩、下流社会，写有的人在紧锁的房间里死去，背部还插着刀子，写腐败侦探和忠厚妓女，写犯罪团伙，写职业杀手……你在曼萨纳雷斯河畔① 认识多少职业杀手？”

“重要的是方法，莫得斯托。你一旦有了方法，什么事情都能解决。那些东西是一个世界。我同警察谈得很多。我像一个对警察机构有了解的人。这你知道。你想象不到他们见到的东西多到什么程度，也想象不到逃脱他们手心的案件又多到什么程度。都是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案件，很需要一个敏锐的头脑。”

“是这样，可是那些案件没有侦破，而没有侦破是因为没有一分钱做后盾。你靠什么生活？人们需要侦探干什么？难道你一天从早到晚跟踪一对男女，就是为了看见他们在什么地方通奸，拍下一两张照片？”

---

① 此河流经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开始也许是这样。如同弹钢琴一样。当你有了方法，就可以解释令你感兴趣的东西。开始是些无关紧要的案子，可求助侦探的人都很有钱，而有钱的地方早晚会有罪行，有罪行的地方，一定有人犯罪，犯了罪，总会有人向警察告发，而另外一些人则想方设法不让警察知道。我就想登上这个轮转车。”

“我不知道……”

“已经决定。我认为我不曾是作家。在生活中和在小说中一样，你如果遇到障碍，就应该时不时地打一下舵……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将永远奔向前方。”

“可是，你写过那么多小说，写过小说之后怎能去做那种事？在西班牙，如果你不是小说家，谁还能是呢？你像其他人一样有才华，甚至高他们一筹，因为说到底，所有人只是写看见的东西。这没有任何价值。你的东西有价值，你讲的东西都是从想象中挖掘出来的。你有生以来从没有到过芝加哥、纽约，也没有到过伦敦，你没有离开过马德里，但是你谈起那些城市时，它们变得活灵活现，好像你就在那里。我真搞不懂，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你没有去过伦敦，而我去过。当我在汉普斯特德散步时，和你在《下午六时茶》中描写的街区一模一样。你还记得你如何描写洛杉矶马杰斯蒂克饭店大火或密歇根湖畔的牧舍吗？你好像就站在大火和牧舍前。我仍然听见鸭子的呱呱叫声。我同妻子送玛尔蒂塔去那儿学习时看见过鸭子。不只是听见，好像现在还看见鸭子呢。帕科，那些人物已经胜过你，在你想到他们之前已经存在了，而现在遍布各地，给世界送去一点

正义、一点秩序、一点逻辑……那太……”

他开始激动起来，甚至很雄辩。也许他在法院里也会变的，话脱口而出。

“不要说那些了，莫得斯托。我同样很感谢你。你也许是个很出色的律师。”

“你可以死去了，”他继续说道，“没有人会发现的。现在，你的人物如果不复存在，读者很可能指控你杀人，指控你破坏、伤害……”

那是辩护词……

佛朗西斯科·科尔特斯——他是破案小说、侦探小说、一般阴谋小说的作者，或者是他身上留下的那种东西——很受感动。但他不是那样的人，即下了决心以后走回头路。正如乌纳穆诺所说——他常常引用乌纳穆诺的话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在做决定方面、在写作方面也是这样，有的人是胎生，有的人是卵生，卵生的人孵几个星期的蛋，几分钟之内就生出决定、生出书来。我就是这样的人，只要看我一眼就知道了。”这种教诲，他从小说中也获取过。要硬，应该硬一些。女人喜欢硬的，读者更是如此。多拉认为他软，尽管从那一刻开始，如同莱诺铸排机对德雷的关系那样，读者对他来说也无关紧要了。证据是，他经过二十二年才同埃斯贝哈家族闹翻。今后，佛朗西斯科·科尔特斯将成为一个硬汉子。下午快过去时，他要去多拉家里，对她说：把箱子收拾好，带上女儿，到家里去。多拉将跟在他身后。可是，他在想，那是多么荒唐的事呢？多拉的家是他的家呀。怎能跟他到他住的家去呢？那里没法住呀。都一样，那是

一种想问题的方式。对。他开始看到一切都会顺利的。

他们快到商业咖啡馆了。那时已快五点了。

“今天下午我就要和洛伦谈一谈。用手头上的钱可以租间底层，租两三个月，开始运转起来。之后，一切滚动起来。生活的轮转车。一大长队。开始走来了，排成长长的一队，妻子有外遇的男人，被骗的女人，互相欺诈的合作伙伴。诈骗，遗产早早地挥霍殆尽，偷窃，欺骗，复式生活，入室抢劫，凌辱……”

那正是他另一部小说的题目：《复式生活》……他本人就过过复式生活，所以，现在落得这个样子……

必须告诉多拉，这个月不能按协议付给她生活费了。他要好好解释一下。她会理解的。坏蛋。不给生活费，她一定不高兴。她会这样想的，他又故态复萌，走老路了。这个时候不能看到不好的一面，而是要看到好的一面。跟随某个人，可以不花费。地铁呀，出租汽车呀，一分钱都不用花。只要有个记事本、一支圆珠笔就行了。

“莫得斯托，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已经放弃小说创作。米拉格露丝除外。”

他们看见山姆·斯帕德和培理·梅生[①] 走过来；由于这两个人满脸惊色，都认为那是国会里发生事变的缘故。

斯帕德问路纳大街警察所的警察马格利特[②] 到了没有。大家回答说还没有到，而由于天快塌下来了，他可能来不了。

---

① 在这部小说里，ACP 聚谈会的成员一般有个别名，分别取自不同侦探小说中的人物，供聚谈会上和谈论侦探事务时使用。
培理·梅生是以美国作家斯坦利·加德纳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中的律师。

② 马格利特是比利时作家西默浓作品中的警长。

"天塌了,什么地方?"

斯帕德看了他们一眼,那神色好像在这样的时候才会表露出来,即一个人怀疑其他人已经知道一个可怕的消息,而对于这个消息,没有任何人愿意立刻讲出来。尽管在现在的情况下,事情完全相反,因为当他们看见无论培理·梅生还是斯帕德都不知道发生的事时,急着把现场的情况以及人们的怀疑和不安一古脑儿地讲给他们。他们现在一下子看到了发生的"历史性"事件:几个卫兵闯进国会,正在发动政变。恰恰在那个时候?对。从"国家高度"来讲,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一无所知。

"那是不可能的。"培理·梅生茫然地说。

不对。已经发生了。正在发生。电视怎么说?不知道。在商业咖啡馆里没有电视机。只是托马斯。就是ACP聚谈会成员的服务生托马斯① 像玛尔普莱小姐② 那样把半导体收音机贴在耳边,在顾客中间走来走去,把他如饥似渴地听到的各家电台抢先播放的最新消息带到餐桌上。

福尔摩斯坐在一面大窗户旁边,漫不经心地看着大街。他手里举着奄奄一息的大烟斗,那是海泡石制作的,是他妻子的礼物。他不时地紧张地抚摩着烟斗。在ACP聚谈会成员中,他可是最为心神不安的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经历过战争、打过仗的,他认为正在发生的是一九三六年七月那些

---

① 前一个托马斯的原文是Tomás,后一个托马斯的原文是Thomas。

② 玛尔普莱小姐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中的人物。

遥远日子里发生在西班牙全部事件的翻版，十分令人震惊。所以，他只是坐在咖啡馆里，从窗户监视外面发生的事。他害怕看见横扫一切、隆隆作响的坦克随时从布鲁内特方向沿着大街驶过来。不过，他从那儿望到的，和平时任何日子一样的景象，小汽车爬上来、驶下去、拐弯转向，平和的报亭卖报人，挂着讨厌面孔的人们钻进地铁或从那儿爬出，他们对正在发生在西班牙的事一无所知。

“和杀害卡尔沃·索特罗[①] 时一样，现在和那时的情景一样，”歇洛克·福尔摩斯庄重地说。“现在这种日子，一天死一个人，实在无法生活下去。”

歇洛克·福尔摩斯脸色煞白，给予他电影中潇洒老者派头的青铜色电烫头发变成了绿色。他双手冒汗，不停地搓揉着，仿佛要得到热量，以掩饰不安的心情，与此同时，用牙齿咬着烟斗。

“我得走。”他说话都没了声音。

可是，之前他想提醒朋友们几件事。他非常喜爱他们，ACP 聚谈会的人使他感到兴奋、快乐。歇洛克觉得，那天夜里将开始逮捕、搜寻、巡逻。

梅生心情沉重地点着头，不知道同意还是反对他的看法。他那时还想着帕科、他在埃斯贝哈的出版社刚刚经历的风波，想着那场政变，想着他自己的家人。歇洛克的话使他丢弃了冷漠态度。他女儿玛尔塔住在巴塞罗那。他想象

---

① 卡尔沃·索特罗（1893—1936），西班牙政治家，1936 年被害。他的被害标志着西班牙内战的开始。

着,三年间,西班牙被战争前线的封锁线分割开来,他和妻子在一侧,女儿在另一侧。他也想一走了之,但不知道怎样说出口。他不想表现得像个胆小鬼。他这一生很敬佩小说中的硬汉子,他们应该传授给了他点什么。

作为一个忠厚的实业家,尼录·乌尔弗① 只关心那事对国家的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事态和一九三六年一样,我们将看到,马德里将一片饥荒景象。”他说。

歇洛克和培理·梅生刚才至少是恐惧不堪,现在又多了饥饿感;那时,在场的人都饿了。

内战期间,尼录·乌尔弗还是个孩子,不太记得战争情景,他对后来人们忍受的饥饿记忆犹新。

梅生又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但还是没有说什么。歇洛克又坚持说:

“苦难来临了……”

“歇洛克,劳驾你了,别再吓唬我们了。还有你,梅生,不要再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了。别一副倒霉相。”斯帕德一边说一边举起胳臂,用手指打了几个响声,呼叫托马斯,托马斯正在另一端接待一个顾客。

一个侦探公司,他这样想着,几乎不必花什么钱。应该给公司取个名字。那几个人在他身边激烈地交谈,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遥远的传言,根本没有把他从沉思状态拉出

---

① 尼录·乌尔弗是美国作家斯托特(1886—1975)作品中的人物。

来。取个名字:阿耳戈斯①,百眼巨人。他心灵手巧,会取名字。瞬间便从脑海中跑出来,而且不必修饰。等到最后,名字油然而生。当需要名字时,请看:《糟糕的事情》,《佛蒙特的钻石》,《艾斯卡特的若即若离的寡妇》,《罪恶的麦加》,《空空的圆月》,《黑糖糖果》,《五张王牌》,《蓝宝石的顶针》,《六指夫人的小会客室》,《离作案现场两步之遥》,《星期一和星期二》……现在他需要给公司取个名字,说话间已经有了。阿耳戈斯,百眼巨人,侦探公司。第二天,他就去办理注册手续。为此,他需要公司招牌。要订做一个引人注目的招牌,现代的,能显示出力量和决心,用箭头形式,表示阿耳戈斯侦探神速赶到需要他们的地方。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国民卫队闯进国会的事。只不过探探头而已。不会再发展了,只是雷声,没有雨。西班牙,多么无耻呀。所以,他喜爱英国、法国、美国、黑色小说。英国警察狗子会闯进英国议会?除了西班牙,谁还能想到那些头戴漆皮三角帽的人,帽子底下是那方方正正的东西,闪着哀凄的光点,让人厌恶?如果可能的话,他要把他的国籍撕得粉碎。阿耳戈斯。如果说题目、名字是小说的一半的话——他这样想——,那么,阿耳戈斯就是半个公司了。此时对西班牙来说是不幸的,然而他觉得未来在向自己微笑。在他的小说题目、名字中,有不少是他倍加喜爱的:《几乎无懈可击》,《你不要再向我索要睡梦》,《一加一等于三》,《我不要审判》,这是《我要求报仇》的第一部分,还有前面提到的《下

① 希腊神话人物,传说睡觉时闭着五十只眼睛,睁着五十只眼睛。

午六时茶》……他应该想一想标识的事。这是成功的另一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带翅双蛇杖[①]。带翅双蛇杖和阿耳戈斯没有任何关系,倒是和墨丘利有关系,可是,墨丘利这个神对侦探公司太合适了:它双脚长翼,而神速对侦探来说是最基本的。一个带翅双蛇杖还挺漂亮,主体长着双翅,一根木杖,两条蛇沿着木杖往上爬,盘成辫状……侦探小说名声扫地,不过,正是由于有这种小说,阅读它、写作它,才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牢固文化根基。

"斯帕德,你在想什么?"

"什么?"

他脑海中的思绪犹如德雷的威士忌酒瓶一样破碎了。他吓了一跳。

"七月十八日那天谁也不相信那事[②] 会持续三年之久,更没有人相信后来又是三十五年……还会烧教堂、烧修道院。"

这后一句话是歇洛克·福尔摩斯专门讲给布朗神父[③]听的,他也是 ACP 聚谈会成员。但是,他仍然注视着梅生,歇洛克发现后者可以同他一起躲到别的地方去。

"……梅生,你还记得那事吗? 你呢,堂贝尼格诺,怎么不讲话呀?"

布朗神父仁慈地笑了笑,轻轻磕了几下烟斗,把烟灰倒在烟缸里;他看见烟斗里没有烟灰之后,笑着说:

---

① 罗马神话中专司贸易、商业的神墨丘利的象征。

② 指西班牙内战。战后,佛朗哥执政三十五年之久。

③ 布朗神父是英国作家切斯特顿(1874—1936)作品中的人物。

“修道院，好可怜呀，已经剩下不多了。但是，说到教堂，再烧掉几座，也不是什么坏事……”

梅生仍然阴沉着脸点头表示同意，他没有注意布朗神父的玩笑；他也取出烟斗。

应该说，那不是ACP聚谈会，而是抽烟斗人的俱乐部。玛尔普莱小姐也有自己的烟斗。他们几乎没有发现、看见每个人都抽着烟斗，那情景将是多么罕见。

“歇洛克，你是让我们一直呆到晚上呀。另外，布朗神父很会开心。是吧？还有你，梅生，不要用那副倒霉相看他。”

马尔洛维[①] 的讲话是地道马德里方式，仿佛总是在马约尔广场的某家油炸食品店要盘鱿鱼段。

在ACP聚谈会成员中，梅生是有名的倒霉相，他是这样，唇胡支棱着，很凄凉，满头白发，如果不是斯帕德而是别人这样叫他，他便像软体动物那样蜷缩起来，皱着眉头；如果是像马尔洛维那样的人说他倒霉相，他的反应更加严重。他对此人没有好感。但是，他不敢阻止他，也不敢反驳几句。当然啰，梅生性格软弱，完全可以认为那个名字是一种嘲弄[②]；如果不是这样，那是因为已经把他放在了同名电视剧的高潮中了。不知道他在法庭上怎样才能不被竞争对手打下去。当然啰，他当律师没有任何逻辑可言，可是，他一生中没有逻辑这一最为明显的缺点，他总是视而不见。马尔洛维的天真和无礼很令他不快，从那时开始再没有张开嘴巴。

---

① 马尔洛维是美国作家钱德勒作品中的人物。

② 梅生在英文中有“石工”、“泥瓦工”的意思。

“喂，梅生，你把什么都看得那么严重。”马尔洛维仍然开玩笑说，毫不顾及他的话在律师心中激起的反感。

马尔洛维是波斯塔斯大街钟表商的儿子，“供应。军需。机械。”当他说到他的父母时，总是把他们称为“我的二老”。我的老头子，我的老婆子……他们家在卡雷塔斯大街还有一家店铺，在波斯塔斯大街上边，快到格兰维亚大街了。马尔洛维有时照看钟表店，有时在波斯塔斯和卡雷塔斯两街之间做信差。由于他是头头的儿子，在这来来往往中得以偷偷找几个小时参加 ACP 的聚谈会。他收藏手枪。实际上，他是继续“他老头子”开始的收藏，收藏的手枪有老式的、新式的，都是正在使用的，最老式的手枪他能够修好，照常使用。他说，钟表教会了他阅读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教会了他摆弄手枪。在很多情况下，一桩天衣无缝的案子取决于手枪。他也不赞成使用毒药，但是，他更不赞成动用尖端的射击学，使用射程千米的卡宾枪或用 X 光望远瞄准装置。“完美罪行如同一块好表，不慢不快，准时发生。”他喜欢这几句话，谁听到了都会吓得呆若木鸡。他刚刚服完兵役。他中等身材，大头，五官，特别是那两道目光，突现了他的刚毅、勇敢，他总是把眼睛瞪得老大，果敢、跃跃欲试。他着装一向整齐，脸刮得光光的，喷洒着男用香水，随时准备扑向并猎获出现在他身边的女人。可以把他定位为马德里一般居民的地道儿子。在波埃[①] 加入进来以前，他还是

① 波埃取自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姓氏“坡”，按西班牙文译法译为波埃。他是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

ACP聚谈会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个。

“波埃呢?”有人问。

“他没来。”马尔洛维回答说。“你们好像在那儿拉屎呢。”

这时,说曹操,曹操到,波埃从大门走进来。

“小伙子,文明点。”歇洛克一边说一边伸长脖子,没有和刚刚进来的那个人打招呼。“你不知道发生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我老头子在蓝色师①,两个大卵子②,打死不少布尔什维克。”马尔洛维说。

“马尔洛维。”斯帕德说,“两个大卵子”几个字把他从心不在焉状态拉出来。“不要在神父和女人面前说这种话。”

神父耸了耸肩膀,那意思是说他并不介意;女人呢,老太婆,玛尔普莱小姐,也对马尔洛维没有好感,表示同意,而另一个女人,全身黑装的姑娘,脸上的肌肉都没有跳动一下。

“好吧。”歇洛克继续说道,没有理会别人打断他的话。“我知道那事,太可怕了。把人抓出来,夜里杀掉,把尸首扔在水沟里、人迹稀少的地方。我和我母亲总去布拉沃·莫里略那儿活动栏杆围起的场地,看看每天大清早抬来的尸首中间有没有我的舅舅。我们连续去了一个月,没有找到他。但是,我们看到的尸首太多了,多得数不清。”

谁也没有说什么。内战的幽灵犹如波埃那只真正不祥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西班牙人参加德军,成立“蓝色师”,在苏联作战。

② 西班牙俚语,意为“非常勇敢”。

之鸟落在聚谈会中间，落在桌子上，落在咖啡杯子、水杯和账单中间，叫着“永不再现”。

咖啡馆里，除了 ACP 聚谈会成员外，还有两个骨瘦如柴的老人，一个可能八十年前到了那里之后再没有移动一下身子，另一个刚刚进来，坐在前者身边。这两个人之间不交谈，静静地，小口小口地呷着牛奶咖啡。看上去，他们好像也是一无所知。

歇洛克的沮丧预言给咖啡馆蒙上了一层哀伤气氛。谁也不敢说反对的话，ACP 聚谈会上，是从不谈论政治的。就连警察马格利特也不愿花一分钟讲讲那时人们极为关心的问题，尽管他能滔滔不绝地讲述执行任务时看到的东西。并不是因为禁止 ACP 聚谈会成员中间谈论政治，简单地说，根本没有人关心那种事。ACP 聚谈会是依照切斯特顿、D. L. 萨伊尔[①]、阿加莎·克里斯蒂、F. 威利斯[②]、克罗夫茨[③]、韦德[④] 和另外几个人组成的侦探俱乐部的形式，成立起来的侦探小说读者俱乐部，是为艺术而艺术、纯艺术的爱把这些人集合在一起，一句话，他们把杀人案件看做美丽艺术中的一种艺术。

斯帕德想加入到谈话中，提出一个问题，但他没有发现他刚来时已经提过那个问题。

“马格利特来不来，谁知道？”

---

① D. L. 萨伊尔(1893—1957)，英国作家。

② F. 威利斯，没有查到相关资料。原文姓名不完整。

③ 克罗夫茨(1879—1957)，爱尔兰作家。

④ 韦德，没有查到相关资料。原文姓名不完整。

是这样，马格利特不在。马格利特就是洛伦索·马拉维亚斯。在那个时候，马格利特是个关键人物。这是很自然的，他一头扎进警察工作中，如果说应该知道多一点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他一定知道。警察，特别是西班牙这样的警察，对谋划政变这种事不可能不事先知道。

“不对。”斯帕德说，“政变就是政变，我了解西班牙警察，除了身处政变之中外，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做事，并不知道为什么。”

“有件事并不是多余的，我们当中应该有个人到路纳大街看看。”梅生建议说。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斯帕德，但后者摇头，拒绝前往。

这时，一个人提议说，“最好再等一等。说不定马格利特马上就来了。”

马格利特一次聚谈会也没有缺席过。他天生是个热心人。现在还是个单身，四年前离开巴斯克地区，这使他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一般情况下，他都是第一个到会，如果公务允许，最后离开会场。

从尼录·乌尔弗所做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出，那天是二月二十三日，出席咖啡馆会议的有：斯帕德，培理·梅生，米拉格露丝，波埃，玛尔普莱，尼录·乌尔弗本人，布朗神父和马尔洛维。他们占 ACP 成员的三分之一，也是最持之以恒的。缺席的有：马克·瓜特拉多，是个小伙子，没有眼睛，给他取这名字是为了纪念无眼侦探马克·卡拉多斯[①]。此人

① 是美国作家 E. 布拉马(1868—1942)作品中的人物。

十分机敏，借助朋友帕金森的眼睛破案；内斯托尔·布尔马，是俱乐部的一个装饰，因患感冒而卧床，那些日子得感冒的人很多；麦克·多兰，是洛利塔·恰米索的别名，是《案例》女编辑，她全身完全男装，西服，坎肩，软领衬衣，律师领带；最后一个是聚谈会年纪最大的成员堂胡里奥·科内尔，他是奥切① 男爵夫人小说中那样的人物，吹嘘不出屋便能侦破一切案子。他很博学，常常说，没有必要绕世界走一遭便可证实各地的天空是蔚蓝的。山姆·斯帕德完全支持这一理论，并且以实际行动加以实践，描写他从未驻足过的城市，而且像那些城市的官方记者一样瞬间写出报道来。马格利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那天的会议记录上，但是实际情况会证明这是错误的，因为马格利特在最后一刻出现了。他没有出现在记事簿上，无疑那是因为尼录·乌尔弗在马格利特在那儿露面之前已经做完记事。

歇洛克·福尔摩斯依然坐在窗边，他还没有找到合适机会起身、离开，而又不愿让别人看见他是胆小鬼。

“我们应该往肚子里填点食了，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的。”

这是尼录·乌尔弗提的建议。尼录·乌尔弗有一家餐馆，潜意识使他记起是吃饭的时候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那张马脸上露出了内战和战后忍受饥饿的表情。

“现在应该在的地方是家，和家人在一起。”他提醒说。

---

① 奥切(1865—1947)，英国女作家。

“像圣诞节的平安夜那样。”

这是斯帕德的刻薄幽默。不会错的。他在小说里也使用这种风格的语言。他与老埃斯贝哈的争论比政变引发的争论要激烈得多,这使他的那种刻薄幽默更为尖厉。

“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反正我要走了。”

歇洛克站起来,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他朋友的评论感到不快,满脸怒容。布朗神父也不喜欢人们孤零零扛着十字架,于是站起身来,想把歇洛克变成西门[①],不过他很平静:如果再次发生宗教迫害的话,他得赶快跑去把教士领巾摘掉,换上另一身衣服,尽管担心人们描绘的事情可能不是那么回事,不得不从圣器室再拿出教士长袍来。

“我也走了。教区可能需要我。”

布朗神父也是从不缺席的。这比马格利特的情况更好解释:他确信教民更为自然地受到坏事而不是好事的影响。玛尔普莱小姐把先前尽量塞到耳朵里的半导体收音机关掉,放在手提包里,也准备离开。梅生钻进他的大衣里,没有说话。尼录不慌不忙地合上记事簿——他那样子像个仪典主持人似的——,意思是宣布会议结束,随后加入到逃兵的行列。担心或不安情绪已经蔓延开来,但是,不会发生什么的,不然十五年后的一天,是不会举行聚谈会的。

只有斯帕德、马尔洛维、波埃和米拉格露丝留了下来。

米拉格露丝是个黑装女人,也是从不张口说话。她谨慎小心。在 ACP 成员的聚谈会上,人们听到她的全部讲话

---

① 耶稣临刑时,帮助耶稣扛十字架的人。

都可以背诵下来。她不喝酒精饮料，不喝清凉饮料，也不喝水，只一杯一杯地喝咖啡。她坐在那里，背部像木板一样平直，聚精会神地倾听，时不时地点点头，但并不把头发弄乱。尽管她面对面地站在你的面前，但像侧身而立，如同法老时代的人、古埃及的人，面孔光洁、细长、苍白，双唇没有颜色，黑色眼窝如同两片百合叶点缀在未名煤玉一样乌黑明亮的眼睛上。她吸烟，一刻也不停，像喝牛奶咖啡那样贪得无厌，但是她并不把青烟吐出来，而是吞下去，好像留在肚子里不引起别人注意。她总是穿一身本地黑装，从不着裙，连夏天也总是穿长裤，黑色罩衫，黑色发箍，深色手帕。只是皮鞋或便鞋大胆地显露出点比较显眼的东西，即鞋面是奶油色、玫瑰色或白色。这些都是她的外表，但是她的内心里只追求一种东西，即要真实，就是说，成为她男友小说女主人公中的一员。假如向山姆·斯帕德问到这事，他会承认的，因为他是惟一知道此事的男人，不是别人而是她对这样的情况耿耿于怀，即斯帕德在作品中赞颂的全部事实都是和他的元配妻子，而不是和她有关。

米拉格露丝曾是斯帕德的未婚妻，但那是在斯帕德认识多拉之前；一天，在路纳大街警察所，斯帕德与多拉萍水相逢，三个月后与其结婚。听到这消息，她心中很不是滋味，但最终还是接受了。他们结婚以后，米拉格露丝在ACP聚谈会里便以麦丽丝称呼了，那是为了纪念帕特里露·海史密斯① 作品中的人物，而她不再来商业咖啡馆，没

① 帕特里露·海史密斯(1921—1995)，美国女作家。

有人问斯帕德，因为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不言而喻的，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但是，当多拉和斯帕德分居以后，麦丽丝重新露面了。斯帕德叫她来的？是麦丽丝自己知道那事，如同从非洲飞来的燕子，径直回到老巢？对于她的再现，还是没有人敢问一个字，他们是不是恢复了关系。她依然是那副古埃及女人样，他呢，依然是无动于衷的表情。聚谈会结束以后，她从咖啡馆出来以后常常和斯帕德在一起。有时则用两个手指——指尖总是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拦住出租车，不说一句话，也不向任何人告辞。可以说，她想像鬼魂那样出出没没。她从不说一个多余的字，不开玩笑，不讲一句可能被歪曲的话。她好像刻意那样，犹如狮身人面像一样总是缄默不语。另外，谁也不知道她从事何种职业。其实她不做任何工作。依靠租金生活。她曾同一个很富有的男人结婚，但财产是她本人的，是家庭财产。

“帕科，你可能不会与歇洛克来往了。他可是个大好人。”

这个“帕科”是指斯帕德，在商业咖啡馆里从未听到过，他给那里的交谈送去了亲切气氛、家庭气息；马尔洛维和波埃感到惊奇，因为如同聚谈会不涉及政治话题一样，人们以您相称，这是 ACP 的另一个规定，但很少有人遵守。

对，歇洛克是个好人，但斯帕德对与埃斯贝哈发生的事并没有过错。

鸦雀无声。马尔洛维和波埃不敢打破寂静，只是过了几分钟，斯帕德为了活跃一下气氛才问了一句，在得知国民卫队闯进国会的最新消息之前谈点什么呢。

“我们不是说了吗，再把真正侦探小说的准则确定一下。”波埃怯怯地说，宛如一个专心听课的小学生。

在所有人看来，波埃在加入聚谈会之前是个学生，像其他许许多多学生一样，在咖啡馆的桌子上复习功课和笔记，常常看见他同一个比他大点的女孩交谈。一天下午，他走近他们，对他们说：你们总是谈侦探小说，而我正是喜欢侦探小说，我坐下来听一听，关系不大吧？

大家看到他有这样的爱好、说话自然得体，感到又惊又喜。歇洛克问：您喜欢哪几本小说？波埃听到用您称呼他，迟疑了一下。他读的小说不多。那学生把脑海中闪现的第一本小说说出来：《摩根大街的罪行》。于是，斯帕德给他取了个名字，说：喂，我们这儿每个人都有个名字。我们叫您波埃，好不好？性格浪漫，面色苍白，身材瘦弱。为什么不叫杜邦呀？波埃这样发问。斯帕德立刻用商量的口气回答：您喜欢杜邦这个名字？波埃仔细地想了想，说，不叫杜邦，叫波埃，好吧，我喜欢。

这是那些年里他们教堂的第一个新人教者，至少是以那种自然的方式的第一人，大家不仅表示同意，而且非常兴奋，马尔洛维和斯帕德本人更是如此，因为 ACP 聚谈会成员中没有一个人对那个有时下午陪伴波埃的姑娘视而不见，她太漂亮了，美貌超群，像天使一样。

她叫亨娜，是丹麦人。二月二十三日那天，她没有和波埃在一起。波埃是在他上课的那所学校认识她的。那是一所一般学校，就在咖啡馆上面，第三层。波埃在一家银行下班后，还要准备考大学。亨娜在同一所学校里教英文，比波

埃大十一二岁。

斯帕德很喜欢波埃。他也很喜欢亨娜。没有给她取名字。她从未表现出加入 ACP 聚谈会的兴趣,这几天参加聚谈,那几天又不参加。

波埃这个小伙子确实性格浪漫,身材瘦弱,面色苍白,表情怯生。应该说,他个头还算高,头发乌亮、平直。他还没有长胡子,两只手很长,青筋暴露。应该给他取肖邦这个名字,而不是波埃,都一样。他讲话声音很细,有时要重复两遍,因为第一遍别人听不清,而他第二遍重复时表情更加怯生。他有分析能力,善于冷静思考,这可以在大家讨论侦探问题或无头案时看得出来。他总是第一个解决问题,即使不能解决,也是第一个讲出别人没有想到、颇具见地的观点。

“好吧。”斯帕德清清嗓子……

人们等候他说点什么。那是一个很合斯帕德意愿的聚谈会。在那里,所有人,不管老成员还是新的年轻成员都把他当做那方面的毋庸置疑的权威那样尊重。

斯帕德讲了好一会儿,他越讲兴致越高,这使他忘记同埃斯贝哈的争吵和那场政变。甚至忘记了他过会儿要去看多拉的事。而这个,侦探小说的准则,当然啰,对于在犯罪学历史上一劳永逸地确立——在侦探小说这个品种之内,而且要注意到他们是“完美罪行之友”——什么是或不是 CP,也就是说完美罪行。

“开始时,”斯帕德总结说,“要多多学习一般杀人案件,而不是国家级凶残罪行……”

“说得好，”马尔洛维支持他的观点，“特别是在西班牙正在发生严重罪行的今天。”

“马尔洛维，不要打断我的话。”斯帕德继续说道。“除非莎士比亚置身其中。对于侦探来说，所有罪行都是一样的，如同对病理学家来说，所有肝脏也是一样的。罪行永远源自超民主行为。把你杀了，你就成了一具尸体。成了尸体，所有人就无忧无虑了。而如果活着，应该展示出许多东西。现在，连最蠢笨的人都会装死。”

斯帕德为他屈指可数的几个听众提纲挈领地总结了一个 CP 的准则。

“所有人都知道，警察说不存在完美罪行，而是粗心大意或能力低下的侦探……”

这时，服务生托马斯走过来：

“我们该关门了。主人发话了。”

“可是，让我们再呆半个小时吧。”斯帕德建议说。

“半个小时，可以吧，但时间长了不行。主人说，咖啡馆空了的时候，就得关门。”托马斯说完这话，便压低声音，好像要给他们吹吹风。“已经传开了，说各军区司令部都要造反了。”

斯帕德没有理会服务生的话，继续他的话题讲起来。

“我刚才说，警察断言不存在完美罪行，那是为了维护他们整体的名誉。但是由于存在着完美的罪行，尽管数量不多，所以仍然有人做出甚至不是完美罪行的罪行，大多数是这类罪行。尽管他们一开始都想成为完美的罪行。绝没有那样蠢笨的犯罪分子，他们作案是想最后去蹲大牢。因

为有完美的罪行发生，也就有了警察，他们的存在绝不仅仅由于有他们以大肆宣扬的神智破获的漏洞百出的案件，而小说家利用这种神智恢复事物的原貌，加以提炼、提高，像经典雕塑家用雕塑准则做的那样，确保一个案件是高质量、完美的。”

他很不高兴，这后一点使他记起了自己，因为正是那天下午他不再是小说家。背叛了没有给他任何指引的准则，更不用说创作出经典作品了。

“好吧，”他清了清嗓子，喝了口金妥尼克润了润喉咙，又继续说道：“第一条准则……”吞咽时有些疼痛，他也许真的得了咽炎。

斯帕德握紧拳头，突然伸出食指……

“……读者和侦探应该拥有同样的机会解决问题。这是基本的。如同去打猎。不能拿着猎枪在洞口等着狐狸出来。应该让狐狸自由奔跑，恰如斗牛场上的公牛。如果问题只是杀死公牛，完全可以在牛栏里杀死。但那是斗牛，是艺术；侦探小说也是一种艺术，依本人拙见，是文学中最杰出的艺术。第二条……”

现在是中指出来陪伴依然僵直的食指……

“作者应该运用罪犯对侦探使用的那样的伎俩和狡猾手段，而不应该运用别的什么。第三条，”现在是无名指加入到前两个指头的行列，“在真正的侦探小说里，不应该掺入爱情情节。女人吗，可以有，但绝不能有爱情。这将充分发挥纯智力机制的作用。如果中间出现 CP，那就应该有什么写什么。随便加点床上动作，但情意缠绵的东西，一点也

不能有。”

米拉格露丝撇了下嘴，表示怀疑和讥讽；斯帕德装作没有看见。

“第四条，罪犯永远不能是侦探，也不能是警察局成员。可以是人人唾弃的一般骗子。”他张开手，指头亮亮的。“第五条，要用推理发现罪犯，不能是偶然地，凑合地，不能是罪犯自愿供认：警察先生，是我，我该坐大牢。《罪与罚》① 中的拉思科里尼柯夫那种状况在我们的 ACP 聚谈会里都出现过无数次了，到了极限了，不能再那样下去了。经典作家的大部分作品用那种方式草草收尾，是可以接受的，其缘由就是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一部无声电影是一部杰作，一幅岩画可以与《侍女》② 相比，可以与威多夫的维纳斯③ 相比，或叫做魔鬼吧，与菲迪亚斯④ 相比。”

他又把手重新握起来，大拇指向上，不再数第一、第二了；他继续说道：

“没有一部侦探小说里不有死尸。读了三百页还不见一具死尸，简直太可怕了，因为将使我们失去恐惧感和报仇心理。一部小说里的侦探，只能有一个。在任何情况下，小说家都不能从家政职员、管家、花工、杂工、司机等中间挑选罪犯。故事情节总是结束得很快，应该严肃：必须找一个有

---

①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作品。

② 西班牙画家维拉斯盖斯(1599—1660)的作品。又称《腓力四世家族》或《宫娥》。

③ 是在奥地利出土的旧石器时期的文物。

④ 古希腊最著名雕刻家，约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

本事的罪犯。如同只能有一个侦探,也只能有一个罪犯,以便让读者把全部的仇恨慢慢地集中在他身上。有些人认为,在侦探小说里,黑手党和犯罪分子的黑社会组织不应该只有一个地点。我不大同意,不过,也过得去。绝不能出现描述段落,富有诗意的风景呀,细微的自然环境呀,不能有。而情节发展要放慢,要分散读者的注意力。要有对话,对话要多。对话形式要多样,要简短,写起来不费力气,读者也感谢你,故事情节不断发展,出版商按手稿页数付钱,每行字长也好,短也好,付的钱是一样的。”

刚一提到出版商,他便闷闷不乐地想起他的出版商。

“破案的方法必须是现实的、科学的。奇迹应该排除在侦探小说之外。在这一点上,连布朗神父都同意。也不能在职业杀手中挑选罪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歹徒、恶棍做的案,而是心慈手软的夫人,或最高法院院长,或面善心黑的人,或作风正派的绅士,或神父做的案。现在,布朗神父不听我们讲了。我有一部小说,小说里的杀人凶手是一个神父。书刊检查官开始没有通过。但是,第二次审查时,我说是个新教神父,就没有再遇任何麻烦。如果整部小说描写的是下面情况,是绝不能原谅的:到结尾时,杀人案件变成意外事故或自杀。如果是这样,读者完全有权控告小说家犯有欺诈罪或者在其家门等候,到时候杀死他。最为重要的是,作案动机是个人因素。什么国际阴谋呀,007那种蠢事呀,什么最后一刻从鞋跟飞出一架超音速飞机,桑拿和十二个天仙救了他一命呀,都是哄小孩的玩艺儿。也不能运用非道德的手段。不能由于在现场发现烟头

儿就发现了邪恶的罪犯,不能由假指纹中找到线索,什么看门狗没有吠叫呀,双胞胎呀,真正血清呀,都不能有。也不能是在门窗紧闭的房间里,当着警察局检察官的面杀人,当然啰,还不能是密码文件,不能是唐人街古玩店后店破解的象形文字,不能是在拍卖店找到的手记或神秘工具,不能是古埃及时代就藏在枕头里的千年之谜,里面还有法老的诅咒……这十诫可以总结为一诫:善良就是善良,邪恶就是邪恶;善良绝不能转化为邪恶,也不能反之;好人不能变成坏人,坏人不能变成好人,孩子们希望在故事里告诉他们应该站在哪一边。特别应该说的是,不要忘记完美的罪行只不过是一个对为生存而斗争的极端比喻,那之中有人类天性的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所以有那么多诡计多端的人把杀人看做美丽艺术中的一种艺术:在天使的恩典之后,是无恶不作的魔鬼。”

斯帕德长篇大论地讲了一通儿之后,又喝了一大口金妥尼克。马尔洛维首先拍手鼓掌,但只拍了五六下,而且最后两下更为用力,那是要引起托马斯的注意;像呼叫更夫那样呼叫托马斯,托马斯感到很不舒服。他一脸不高兴地走过来。当他走到米拉格露丝面前时,后者提出再要一杯咖啡。

“我们已经关上咖啡机了。都快闹翻天了,你们在这儿还好像没事似的……”

他没等那些人说什么,便转过身,向柜台走去。

斯帕德鞠了一躬,感谢服务生退去;他又微微一笑,感谢听众,特别是马尔洛维的支持,当然啰,他没有向马尔洛

维说明有些准则是从范登的法典中摘录的，其原因是与维吉尔① 没有说明引文出处是一样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不能不想到，聚谈会的最后一次聚会说不定是“辞世之作”。他有些悲伤。悲伤加上悲伤。埃斯贝哈，ACP 聚谈会。一切都走到了尽头。ACP 聚谈会的命运将是怎样的？他本人去干什么？如果在西班牙也发生在智利发生过的事，怎么办？侦探小说应该永远存在下去。但是，他已经不是小说家了。这他知道。他意识到，他几年前就知道了。他一直欺骗自己。他如同一直想到这最近二十二年走过的路一样，不能不想到他自己。难道那不是一次小小的哗变。ACP 聚谈会将解散了，将放弃那些美妙的别名，直到那时他熟悉的生活方式结束了。埃斯贝哈也许正在往他家里打电话。一切都走到了尽头。他再次在内心深处痛苦地承认自己的失败。

斯帕德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他预测到那一天是民主的坟墓，是山姆·斯帕德、玛尔普莱小姐、尼录·乌尔弗、内斯托尔、培理·梅生、波埃等人的坟墓……

他脸上没有露出任何恐惧表情。

“马格利特来了。”马尔洛维突然叫起来。

大家同时向窗外望去。看错了。那人很像他，径直走了过去。

“应该见到他呀。”斯帕德痛苦地想着。他的同伴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心中涌动着波涛。

---

① 维吉尔(前 70—前 19)，古罗马诗人。

“真的，我们的名字都取得很好。”斯帕德突然说。

“山姆，现在怎么提起这事？”马尔洛维问。

“脑海里刚刚闪过。”

“我不喜欢我的名字。”马尔洛维不同意地说。“实际上我喜欢另外一个名字。我比汉弗莱·博加特英俊得多。”

马尔洛维做了个他特有的怪相，把右手抬到胸前，从上到下滑下来，仿佛拿着领带、想弄平整似的，与此同时往前伸了伸下巴，张开嘴，那口型好像在说“那东西在那儿”。

他的本名是伊西特罗·罗德里格斯·莱乌埃尔托，之所以给他取名马尔洛维，没有任何侦探方面的特殊缘由。实际上，也许因为马尔洛维很喜欢同女人套近乎，把她们称为洋娃娃、宝贝、瘦猴、塌鼻子、小不点儿，不等对方答话就上去亲吻，一只手搂住女人的腰肢，使其向后仰着，同时用舌头使劲吻舔着，而另一手仍然拿着香烟；他把女人拉到床上，后者几乎都没有发觉，有时读者都不知晓，过后不必谈起那事，各走各的路。度过一个疯狂、无耻之夜，第二天早晨再见，漫长的再见，没有仇恨，像好朋友，各走各的路，犹如大街上的小狗。他觉得那很有诗意。

斯帕德用眼睛盯着他，嘴上挂着微笑。和梅生相反，他觉得马尔洛维很有趣，马德里平民那种的有趣。

那年，斯帕德三十八岁。培理·梅生，按照卡片上的记载，比斯帕德早出生十五年。马尔洛维二十二岁。波埃二十岁，米拉格露丝三十七岁。

每人的卡片上都附有本人照片。在照片上，斯帕德不像三十八岁，而是年轻许多，而培理·梅生则显得更大些，长

着一双狐狸眼睛，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面部表情和善，法国厨师那种面容。

在马尔洛维的眼睛里，可以观察到某种厚颜无耻的目光，当然啰，是那种可爱的厚颜无耻，但它的后面是不幸。哪位读者，包括西方小说读者，或侦探小说读者不是不幸的？但他不像梅生认为的那样骄横傲慢。他是人们说的那种爱开玩笑的人。

那时，波埃留有的发型可以说是不吉利的，两侧鬓角是那样长，好像已经早已过时。他身材瘦弱。也许他妈妈说得对，她认为在马德里吃不饱。

那天，聚谈会有些反常。大家不知道谈什么，但也不想离开那里，回家去。在 ACP 聚谈会的全体大会上，一般情况下大家都觉得时间很短，又要议论犯罪学的最新进展，又要评判最有意义的案例，根本没有时间谈及抢劫一类的未遂罪行。可是，那天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互相询问的，也许因为这一点，马尔洛维对波埃说现在应该保护外国人，并向他问起了亨娜的情况。

“现在这儿发生这么大的事，我们应该把亨娜叫来，安慰安慰她，让她别害怕。”

波埃用眼睛注视着马尔洛维，但面部肌肉没有一丝颤动。人们总是很难知道他在想什么。

没有他女友的卡片，这就说最大的可能是她从未参加到 ACP 聚谈会中来。不过，她出现在一张合影上，ACP 聚谈会保存着几张集体合影。

真的，她看上去很漂亮，瘦弱，表情甜丝丝的。在那张

照片上，她留着平直的长发，金黄，近似白色，像白金，像八月生长在水沟旁的尚未结粒的燕麦，眼睛碧蓝，或者说浅绿，很难说清楚。

“你如果让我说呀，”马尔洛维一边向波埃转过身去一边说，那声调只能认为他要一吐为快，不管你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听，“亨娜是个绝代美人。”

这个词儿有如万国真理宝库的全部真理那样，在咖啡馆里回荡着。

“真的。”马尔洛维又说一遍，他怕没有把意思表达清楚。

在照片上，亨娜穿着天鹅绒的白色紧身运动衫。她就是一只天鹅。

不知是谁的主意，制作那些卡片。

那是当时警察局使用的那种卡片。左上角印有国徽，同一位置覆盖着 ACP 全称字母的拆拼重组。有的卡片上，纸片伸展开来，露出王室苍鹰，苍鹰戴着枷轭，双爪抓着箭头，意欲高飞。ACP 的全称字母的拆拼重组像座迷宫，圆周上布满了错综复杂的道路。像中国餐馆招牌上的方块字。又如一些中断了的道路，很难行走，分辨不清，不知道尽头在哪里，好像最后还是起点。很明显，这样设计和制作是有其含义的，而且肯定地说，那是斯帕德本人所为，因为他小说中有好几部都拥有相同的前提：不仅仅是罪犯回到作案现场，而是罪行把他置于案发的同一地点，或者更为糟糕的是，他作案之前就在那个地方，准备再次作案。

最后，托马斯终于满脸不高兴地把他们赶出咖啡馆，另外两个服务生——他们没有穿工作服，已经一身外出的打扮——等候着，准备整理桌椅。

“我们该关门了，在塞维利亚和巴伦西亚，坦克都开到大街上了。巴利亚多利德也是这样。在马德里，有人说，布鲁内特师正在路上，我们得回家去了。”

他口干舌燥，这样通报消息，好像那些事同样重要似的。关于黑色小说特点——依照这些特点可以把完美罪行同非完美罪行区别开来，此事同亨娜那永不凋谢之美同样是个复杂问题——的讨论那就搁置起来吧，等到平静以后

再说。

四位朋友站起来。

“你们去做什么?”马尔洛维问,那时他们已经来到大街上,在地铁口前。

他们商定返回各自家里。

也许歇洛克是对的。在那种情况下,应该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和亲人在一起。斯帕德只有一个亲人,即他的小女儿;他犹豫了,去多拉的家还是回他自己的家。

米拉格露丝走下路缘方石,站在大街中间,想拦一辆空载出租汽车。没有一辆出租汽车驶过来。此刻,她向斯帕德送去一个眼色,那是富有暗示、意味深长的目光,虽然只持续一两秒钟,但正好与斯帕德的目光相遇,她是想知道一点无需语言表达的东西。波埃发现了那个眼色。他这个人呀,什么微小的细节都逃不过他。他看了斯帕德一眼,后者尽管收到了麦丽丝的目光,但抛到了一边,怎么来就怎么去吧,恰如大街上有人递给我们一张小广告,我们随手扔进垃圾桶,都不想知道上面说什么。

马尔洛维不关心这类暗送秋波的事,而是怀着马德里平民真正儿子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猎奇感,说他要步行到圣赫罗尼莫大道,看看“气氛”。但是,作为马德里平民真正儿子,他也不想一个人去,于是问波埃,和我一块去吧? 去那儿,波埃并不怎么绕路,因为他那些日子住在依莱拉斯大街的一家旅馆——那条街上有一大串客店和旅馆,他那几个月换了好几家——他说,好吧,表情很平静,仍然把手插在衣兜里。

正当大家告别时，突然看见马格利特跑过来，感到很意外。

“你们要走了？要出大事了。我以为你们知道发生事了。”

他怕自己讲不清楚，带来两个意外消息，是刚刚出炉的。一个女人死在佩斯大街的一套公寓里；他一个同事的母亲家里被盗。

“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那是自己想死。”他说。

“那么盗窃一个警察母亲的家，那就是盗贼有意所为了。”马尔洛维补充说。

马格利特是个年轻男人，三十五六岁，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一身运动员装束，衣料昂贵。

他得去那两个地方看看，必须这样做。他们也不去吃点快餐？

大家告诉他，商业咖啡馆刚刚关门。马格利特皱了皱眉头。他只好回警察所。

他穿一条法兰绒裤子，黑色灯心绒外套，美式衣领衬衫，系着方格领带。脚上是一双皮便鞋。没有穿大衣。他从不穿呢大衣、风雨衣，也不穿一般大衣。那张运动员面孔与他又长又细的蓬乱头发十分相称。给他取马格利特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是科学警察中的一员，但和真正的马格利特没有一点相像之处。他这个人很乏味，一家之长，保守，资产阶级，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了，法国中产阶级崇拜的那种英雄，每年平均要喝三百升红葡萄酒。洛伦索·马拉维亚斯，斯帕德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中取名罗夫伦，看上去要健壮

得多,高个子,十分英俊,大眼睛有点细长、碧绿,警察所的同事看到他眼睛的这一奇异特征,便送给他第二个绰号:桑多坎①。

在警察所里,他负责拍照罪犯的照片,用刷子、毛笔和香粉盒找到犯罪现场的指纹,犹如电影明星的化妆师。

马格利特的出现使斯帕德、马尔洛维和波埃松了一口气,因为一秒钟之前他还以为那是世界末日,而现在真相大白,那声震耳欲聋的炸雷只不过那么响了下,并没有带来倾盆大雨。

麦丽丝仍然望着远方,想找辆出租汽车,与此同时,时不时地那样扫一眼斯帕德,看看能否获取点讯息。

"从你岳父开始,所有人都是木头疙瘩。"马格利特转过身对斯帕德说。

他开始工作之前需要喝杯咖啡。夜幕降临,气氛比较紧张。已经对大家下达命令,必须各就各位,随时准备执行任务。

平时,聚谈会结束以后,有些成员想继续喝上几杯,常常跑到特拉法加尔迪斯科歌厅,这个歌厅坐落在福恩卡拉尔大街,其实它是迪厅和俱乐部的低俗混合体,高脚凳上皮革覆面,用镀金圆帽铁钉固定着,三台患有癫痫病的老虎机并排摆放着。大家说服了米拉格露丝,她不再找出租汽车,点上一支香烟,又向斯帕德扫去一眼,但这次时间稍长些,

---

① 意大利作家萨尔加里(1863—1911)作品《马来西亚海盗之首桑多坎》中的人物。

好像催促他,有点着急。

“我有个消息告诉你们。”五个人围着一张小腿桌坐下以后,斯帕德有些严肃地说,“我的这件事不是政变。但对我来说像政变一样:我抛弃了出版社,抛弃了小说创作。我再不写小说了。我像堂吉诃德那样,败下阵来了,但我并没有泄气。我要和莫得斯托成立一家侦探公司:阿耳戈斯侦探公司。”

马尔洛维全身抖动了下,仿佛他用那种方法接受那么多重大新闻。波埃只是注视着麦丽丝,他有猎奇感,想看看这个女人的反应。麦丽丝还像以前一样,毫无表情。马格利特用手捂着脑袋,松了松领带结,让那条新闻顺利通过。

另外,斯帕德讲的第一部分,即他抛弃了出版社,是说给他本人,特别是米拉格露丝听的,而第二部分,即成立侦探公司,是说给马格利特听的。

“不会是开玩笑吧?”马尔洛维问道。

“今天全国被卷入了政变之中,是开玩笑的日子吗?”

马尔洛维低下头,心情沉重。

“你的小说很不错呀。”年轻人强调说。

“谢谢,马尔洛维。”斯帕德承认他说得对,但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他又继续对马格利特说,“我和莫得斯托想过了,你会愿意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你有经验,而且和你的工作又不矛盾。你喜欢照片,可以来拍照,你知道,拍照我们跟踪的人或出现的目标。莫得斯托当法律部主任,你当档案和特别工作部主任,我是执行长官。”

马格利特沉思起来。大家都在等候他回答。过了一会

儿，警察说：

“斯帕德，你如果允许我提个建议的话，我要说你别搞那东西。你的事是合作。听我的，侦探公司不是赚钱的生意。在马德里，有十几家侦探公司，都运转得不好。”

他有些夸大其词，想给他泼点冷水。

“我也可以和你们一块干。”马尔洛维突然插进来说，他重新振作起精神，异常兴奋，仿佛刚刚接受他成为童子军的一员。“我随便做点什么都行，这样可以离开我的老头子，自己干点事。小事可以交给我，跟踪人呀，钻到怀疑的地点呀。我是个好人，能干，英俊，我有三寸不烂之舌。眼下，你可以任命我为行动联络部主任。我负责实用侦探学：假胡子，正反两面穿的坎肩，石墨，铅白，象牙墨……”

“洛伦，你都看见了，连马尔洛维都看到了前途。应该相信青年人。”斯帕德说。

马尔洛维想起了钱德勒书中人物约翰·达尔梅斯的对话，脱口而出，只是改变一下声调：

“‘我每天要二十五美元，外加津贴。太多了，多少津贴？汽油和润滑油，也许还要一两个妓女，一点吃的，威士忌酒。特别是威士忌……我看了他一眼，他把老虎机吐出的钱还给我，就这样……’你们有什么看法？”

没有一个人为他的表演鼓掌。波埃为他打气，做出摘下想象的礼帽的样子，没有张开嘴巴。

马格利特不想争论，但他是一个好朋友，用和缓的语气解释说，当大家的前途还没有着落的时候，那天不怎么合适谈论任何人的前途。

“我得走了。时间晚了。找个时间再谈那事吧。山姆，陪我走吗？”马格利特问道。

“我不能出现在那个地方，你是知道的。”斯帕德不快地说，因为他只想谈论他的生意，对别的事没有兴趣；于是准备散会。

他们离开特拉法加尔迪斯科歌厅。还没有过去两个小时，马德里街上的车辆就少了许多。他们向毕尔巴鄂街心花园走去。但是，当马格利特说要向相反方向行走时，大家停了下来。

“我得去那里。”马格利特向哥伦布大街方向望一眼。“如果有人陪我，我现在就走了。”

“我陪你吧。”波埃怯生地说。

“你不和我去看看圣赫罗尼莫大道的气氛了？”马尔洛维问道。

“我刚经过那里，完全阻断了，进不去。”马格利特说。

“没关系。我闲逛逛。”

“我得去看我的妻子。”斯帕德托辞说，仿佛那是件十分重要的义务。

“你已经没有妻子了呀，帕科。”

麦丽丝在下面捅了他一下，接着没有与任何人告别，钻进一辆出租汽车，消失了。

帕科·斯帕德有句话挂在嘴边上，没有说出来。他告辞说，如果星期四之前那几天不再发生内战，那就那天见。他也向热内亚方向走去。

马格利特、马尔洛维和波埃一起走了好长一段路。走

到哥伦布大街时，马尔洛维要朝圣巴勃罗下街走去，便与他们分手。应该说他是去一处集市。

“再见。”

马格利特和波埃两个人继续赶路。他们刚刚认识，无论在 ACP 聚谈会上还是会外，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话。马格利特甚至不知道波埃的真名实姓，于是他从那里开始。

“我们三个月来一直见面，说实在的，我们互相了解得还不够深。我叫洛伦索。”

他们互相握手，波埃说：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我叫拉法埃尔，拉法埃尔·埃尔瓦斯。”

他很怯生，因而把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洛伦索·马拉维亚斯问他做什么工作，从事什么职业，住在什么地方。波埃给他讲了银行的事，并说住在太阳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

“现在去哪儿？今天晚上做什么？在马德里有家吗？”

对，他有家；妈妈和姐姐哥哥，但他们不在马德里。在马德里没有任何亲人。没有爸爸，爸爸已经过世。

“噢，太遗憾了。”警察喃喃地说。

“好久以前就死了，我没见过他。”波埃说，他想辩白几句。

他们默默地行走了好一段路程。

“我以前什么都不知道，”沉默那阵子之后，马格利特说，他那是为了说点什么。“没有见到自己的爸爸，应该是件很悲伤的事。”

波埃总是那样不吐心声，那样怯生，那样缄默不语，而现在突然表现出对那警察的罕见信任。

“是那样，想象不出有多么悲伤。”

他们又默默地行走了一段路程。马格利特开始琢磨起来，如何甩掉那个小伙子，谈话不时被长时间的缄默打断，很不舒服。他十分健谈，不喜欢沉默寡言的人。而这次是波埃打破坚冰。并且十分自然。

“您在这儿有家吧？”

“你为什么用您称呼我？这儿没有家，家在塞维利亚。”

“听大家说，ACP 聚谈会的规则之一，是全体成员以您互相称呼。”波埃怯生生地说。

马格利特告诉他，以您相称的规则仅仅适用于商业咖啡馆内。

“我刚才对你说过了。那都是斯帕德的愚蠢行动，他常常表现得很荒诞。你在那儿看见过谁以您称呼？”

“我以您称呼所有人。这是他们说的，叫我这样做。”

“谁对你说这种事？”

“马尔洛维。”

他指名道姓地说出这个名字，远没有给他们的谈话增添同志之情，而是使之失去一些热烈气氛。

“你是塞维利亚人？”波埃终于问道，看那样子是使了很大力气的，没有恢复他的沉静。

“对。”马格利特回答说。

“从口音听不出来呀。”

他不习惯以你相称。他觉得很难同人正常交谈。也许

因为那一点，他呆在马德里，才二十岁，没有朋友，住在太阳门的一家客店里。也许这使他受了不少苦。他几乎不对别人讲这些。

“我妈妈住在阿尔穆尼亚。”波埃突然说，他还告诉马格利特，姐姐哥哥和外甥、侄子也住在那里，那个镇子在什么地方，那个晚上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但没有太大兴趣回到客店里。

波埃说话声音很低，目光注视前方，一直低着头。从不正面看人。马格利特很怜悯他。

“波埃，你多大了？”

波埃脸又红了，他内心有些痛苦。

“二十。”

“已经服过兵役了？”

“没有，我不服兵役，因为我是寡妇的儿子。我妈妈是寡妇。这我已经谈过了。我姐姐比我大十七岁，哥哥大十三岁。我妈妈靠我生活。”

“你如果愿意，跟我去吧。警察所里如果有人问你什么，你就说是我表弟。”

做事果断的马格利特是个善于做出乐观决定的人。

“你喜欢侦探小说？”

波埃几乎没有张开嘴巴。

“好，今天就算是一堂实习课吧。”

不到两分钟，马格利特已经从想甩掉那个男孩转到收留、教给他点东西了。他坚定了自己的看法，这孩子不错。

在警察所里，环境肮脏，楼下房间——大部分房门开

着，里面空荡荡的——闲弃着，这和楼上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那儿，电话那一阵紧似一阵的刺耳铃声响个不停，人们大声喧嚷。四面的墙壁上，到处是印迹，不少是黑色胶皮留下的印迹，仿佛过道里常常踢打犯罪分子，警察胡乱踢打，不时踢空一脚；委实荒诞极了，因为一楼办公室只是用来办理身份证和护照的。

他们走上二层，马拉维亚斯的办公室——和其他同事的办公室紧挨着——和照片洗印间位于另一条过道尽头；这条过道也很狭窄，墙壁同样破损、脏污，一片片的油迹和众多剥落的灰片，把墙壁变成了想象中国家的可信地图。

那时，那座狭窄楼房里紧张到了极点。在整个西班牙像斯帕德讽刺的那样呆在家中，犹如欢度圣诞节前的平安夜时，那儿好像在准备除夕之夜的集体舞蹈。从近处观察，工作的效率很低，而且杂乱无章。三台半导体收音机开足音量，正在收听不同电台的广播，一台便提式电视机屏幕上不时出现残缺不全的画面，声音喀啦喀啦，令人心烦意乱；十四五个警察，有的便装，有的全身制服，这些人一圈圈踱步，不知道做什么，好像笼中的野兽，有人从铁栏中间伸进一根铁棍捅打、刺激它们，另外一些人公开反对政变分子的冒险行动，沉默不语，关注事态发展，满脸阴郁表情。

马拉维亚斯，也就是马格利特或桑多坎的首长，听到后者来了，立刻高声喊着走出办公室，问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还威胁说要给他处分，他早就想这样做了。

首长是个干瘦的老头，个子矮小，精力充沛，六十岁左右，着一身灰色首长装，三四缕头发贴在脑壳上，面部的细

小血管，有的泛红有的显绿，好像同时爆裂开来。这好像给他的脸染上一层葡萄紫色，更加突显了他的易怒性格。他还在醉着。他总是醉醺醺的，从中午到半夜，开始是苦艾酒，最后是威士忌、伏特加或杜松子酒，一样也不能少。那天晚上，他满嘴杜松子酒味。他舌头不利落，为了掩饰这一点，像嚎叫一样讲话，喊声骇人听闻，谁知道他这样的人哪儿来的那样大的力气。

“这是谁，来这儿干啥？”

这话是喊出来的，波埃后悔陪他朋友到那里，他不禁往后退了一下，马格利特抓住他的胳臂，防止他倒下。

“是我表弟。是个好孩子，堂路易斯，您的人。”

这好像给野兽喂食一样，因为警长堂路易斯瞬间神奇般地温顺了许多。

“应该早告诉我呀。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一股酒臭喷到他脸上。首长用胳臂搂着他的肩膀，把他拉到办公室。他把马格利特抛在身后，却没有忘记给所有人下达命令，也可以说没给任何人下达命令。

“马拉维亚斯，巴尔科大街那个老太婆的事，你知道了吗？现在马上去那儿，快点。”

他好奇地看着波埃，更加亲切地补充说。

“新生力量呀。”

波埃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受同志之情的侵扰，因为那个陌生人把爪子扎在他脖子里。

堂路易斯的办公室在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幅独裁者年轻时的肖像，像拿破仑一样，佩戴绿色绶带，目光注视着远

方,刚刚打过一场胜仗、战场上扔下百万死尸,可以带着完成使命的心情飞进天堂的人才有那种目光。肖像下方有一面肯定是从佛兰德斯① 军团那里拿来的大旗,他的办公桌上,一尊镀铬金属耶稣像为他做镇纸器,与其说立在一堆胡乱摆放的活页夹上,毋宁说站在各各他②。

堂路易斯终于放开了他的猎物,坐到他办公桌后面。房门仍然开着,他大声通告马格利特和全所人员,“几个家伙同他们必须拥有的东西”做了在西班牙许久以前就该做的事,事情将回到应该回到的地方。突然,传来一个难听的臭屁声,依据可信准则衡量,和真正臭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在最平庸的小说里也是如此,或者说它来自一个如此瘦小的男人未免过于山响,如山石滚动,如雷声轰鸣。

“都是抗生素造成的。肚子里胀气。”他辩解说。

波埃很拘谨。马格利特消失了。小伙子不知道在那间办公室里做什么。

“你是新生力量?”他又怀疑地重复一遍。

波埃动了动眼眉,用模棱两可的表情回答。

“桑多坎,”他像头暴怒的狮子向房门那边又喊起来,那时他桌上的电话正响起来。“把你的表弟带出去。整个一个白痴。”

马格利特走进去,一把把波埃从正在打电话的警长面前拉走。他的几个只会谈“将军,一切听从您的指挥的

---

① 指法国、比利时和荷兰间的地区。十五六世纪使用此名。

② 即骷髅地,耶稣殉难的地方。

人”——他们有一点“同性恋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气味——送别他们。他们来到安全地方时，还能听到堂路易斯的吼声，他喊着说“把门给我关上”，之后喘着军人一样的粗气。

马格利特把波埃带到他的照片洗印间。

“进去。”他一边给他让开路，一边命令说。

房间很小，令人喘不过气来，布置零乱，一切都是临时的，像似隶属于太阳门识别办公室的实验亭，急需改善。马格利特发明一种装置，使他能够在洗印间里舒舒服服地坐上几个小时，阅读侦探小说，而不被任何人干扰。通过合适的电路，门上方的小红灯，依据他是否在工作或点亮或熄灭。

他请他谅解。

“是斯帕德的岳父。”

波埃满脸惊色。

“你不知道？”

很明显，他不知道。

“我们走吧。”他一边补充说，一边把照相机斜挎在肩上，从地上拎起锌皮箱子。他把这箱子递给波埃。

“你将看到一起真正的案子。和小说里描绘的案子毫无共同之处。”

在马格利特和波埃赶到佩斯大街的老太婆住处时，斯帕德正在敲他前妻继续居住的那套公寓的房门，房子的下面是罗马广场。

多拉不愿意帕科不提前打电话就来她那里，更不用说时间那么晚了。那样做一点儿也不合适。原因很多，其中

二个是因为从十一个月前她就同一个与帕科·科尔特斯本人同龄的男记者共住那套房子，多拉不想让任何东西介入那种至少使她重获生活幻想的关系。

“你知道我不喜欢你到这儿来，更何况不提前打招呼。”

多拉不想让他进去。

“女儿在吗？”他后悔问那个愚蠢问题，他为了补救一下，便一边挠着门框一边补充说：

“多拉，你今天太漂亮了……”

她还不满三十岁。她确实很漂亮，但并不像帕科·科尔特斯认为的那样，谈她的美色仅次于人间第一美女爱娃·加德纳[①]。

她身材和他一样高。她肤色黝黑，有一双大眼睛。但是，最吸引他的还是她的声音。他们在一起时，帕科常常闭上眼睛，对她说，给我讲些事或者大声读点什么。他蜷缩在那潺潺流水般的声音中。犹如裹上一块天鹅绒。多么令他陶醉。她有一头大波浪的黑发，眼睛射出不屈的目光，乌亮，炯炯有神，嘴巴不大不小，鼻子端正笔直，面孔典雅、具有女柱像的美。

“……你真的太美了。”

很显然，没有一个人像帕科·科尔特斯那样对她说过如此动听的话，但是他每次说过那些话和相似的话后都沉沦下去，由此她只要稍稍想到要后退一分，就会觉得那些恭维的话令她怒火中烧。另外，她也清楚，那些相似的话，他一

① 爱娃·加德纳(1922—1990)，美国女演员。

定对许多女人说过。

“你来就是为了对我讲那种话?”她冷冷地问;她身体一动不动,一只手扶在房门上,不让他进去。

“记者在?”

没有一个人如此讨厌。

“帕科,劳驾你了,别打扰他了。你有什么事,我还忙着呢。”

帕科是写侦探小说的,因而他十分了解多拉,也十分了解人类,他意识到多拉对他问话的回答只能是一个不字。路并没有堵死。他表现出顺从的样子,请求她原谅。

“很遗憾,多拉,国会发生的事,你知道了吗?”

多拉痛苦地眨了眨眼睛,表示知道了。

“妈妈给我打电话了。她很担心我父亲。她感冒了,躺在床上。但她一得知那事,立即跑到警察所。父亲喝酒多,妈妈了解他,怕他做出蠢事来。”

“我正是为这个才来的。我很担心你们母女俩。所有人都说形势十分严峻。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和家人在一起。我可以进去看看女儿吗?”

多拉差一点说出她们母女俩已经不是他的家人,但她没有兴致争吵,最后露出厌恶和无奈的表情,让他进了房门。

“只一会儿。然后你就走。”

小女孩正在屋角玩耍;她认出爸爸以后,立刻欢叫起来。帕科·科尔特斯用双手把女儿拉起来,往高处一连抛出三次,仿佛是士官生的帽子,小女儿脸上露出欢快和恐惧表

情。

多拉看着那场景，嘴角抹上一丝凄惨的微笑。父亲在女儿身上唤起疯狂的激情，让母亲感到骄傲，同时也有几分不安。小女儿扑到帕科的左臂上，用右手从风雨衣——一件破旧、皱巴巴的风雨衣，和德雷的那件、山姆·斯帕德的那件、山姆·斯皮特的那件一样——的兜里掏出一台铁制掘土机，掘土机带有各种各样的锯齿铁铲和斗车，险些把口袋刮出一个个口子。小女儿拿着那个新玩具，狂呼起来，她那用栏杆围起来的活动场又多了一样东西。这时，她把爸爸扔在了一边。

“我可以坐下，呆一会儿吗？”

多拉耸了耸双肩，仿佛注定不可违抗似的。帕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多拉坐在他对面的一把椅子的边上，想减缓一下疲倦之态，以此提醒帕科，来访应该是短暂的。

“他不在？”

帕科想让“他”这个字传得远些，尽量让它听起来更为礼貌些。

“不在。”多拉回答说；帕科猜不出他不在是因为还没有来还是因为今天不来。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帕科·科尔特斯说。

多拉没有表现得很激动。她丈夫给她讲述的消息，他本人觉得很动人，但从来不是这样，因为没有打动人心的东西。“我觉得，我的小说要被译成英文了。你想到了吗？”“埃斯贝哈告诉我，从一月份开始，每页标准稿纸的稿费要多一些。他发现我可能会成为有竞争力的作家。”“多拉，从

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幸福的人了。”这些就是帕科的好消息。

多拉强作笑颜，想让这笑传达出友善，但她没有做到。

“我还给你带来这个。”

他在另一个衣兜里摸了摸，掏出一个用礼品包装纸包好的小包，递给她。他最终走进戈雅大街的一家商店，买了一块丝手帕。多拉都没有打开包，就放在了一边。

“你不想打开看看？”

“过一会儿。”

多拉不屑一顾的表情刺痛了帕科的心。她不想让步。对她说来，帕科是个危险男人，生下来就是个诱惑者，满脑子道道。因此，夫妻关系搁浅了。在他们共同居住过的房子里，每次见到他，什么打算呀，想法呀，统统不翼而飞了。

多拉仍然觉得他很有魅力。身体比以前还匀称。眼睛有神。帕科·科尔特斯也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和她的眼睛一样。我们很相像，开始时他们这样互相说。她甚至喜欢他的鹰钩大鼻子，和阿拉伯人一样。“犹太人的鼻子”，他变换一种说法，这样做只是因为，他觉得阿拉伯人不喜欢侦探小说。

帕科把目光转向女儿，小女儿玩得很开心。他这样坐在那里，没有开口讲话，那阵子一直看着小女儿，仿佛那就足够了。但是，他在等候多拉打开礼品，他知道多拉知道他在等她打开，多拉知道那就是帕科在等候的。多拉没有反其道而行之，而是动手打开纸包。

“帕科，挺漂亮。”

她之所以说漂亮，是因为觉得比说漂亮极了更少几分

别扭感。但手帕确实漂亮极了。她喜欢帕科这么有品位，知道她喜爱什么东西。他从什么地方学到这么多女人的事？她一想到与她丈夫有关系的女人，心中就很痛苦，一记起帕科是第一个使她忘掉对所有男人的厌恶的男人，而最终又有了那种厌恶之情，心中就很痛苦，这痛苦是那些男人中的一个男人给她造成的，是无法修复的。同时，她觉得如果做到不打开折好的手帕，有意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上的包装纸上，那就是没有完全屈从。

“我和埃斯贝哈争吵了……”

一片沉静。帕科想从多拉的脸上看出她的反应。多拉心不在焉，用一个指头摸了摸手帕上的印花。

帕科也想斟酌一下他讲的话。他喘了口气，露出神秘、饶有保留的表情，补充说：

“多拉，小说的事我放弃了。结束了，我再不写小说了。”

多拉身子都没动一下。她以前听丈夫说过——有时一次次说，有时一口气说出来——我放弃抽烟了，我放弃喝酒了，我不再天天深更半夜回家了，或者抛弃导致他们分居的女人的那些麻烦事。但是从未听他说过放弃写作小说。写小说是神圣的事，是帕科惟一没有用来开玩笑的事。

“什么小说？埃斯贝哈的小说还是你的小说？”

“所有小说，多拉。如果说，到现在为止没有写我的小说，真实的小说，我喜欢写的小说，那是因为我只有能力写埃斯贝哈的小说。”

那一天，他把那个决心告诉了好几个人，但惟一相信他

的是多拉，这也许因为惟有对她他没有撒过谎。他多次对她不忠，但没有对她撒过谎。两年前，当她问他，那么晚才回来，是否一直和某个女人在一起。帕科默不作声，注视她的眼睛。他一直很喜欢多拉的那双眼睛。那么乌亮，那么活泼，那么会说话。那天是凌晨三点多钟，多拉一直没睡，哭个不停，等候他。她丈夫有时夜里出去会朋友，她从未放在心上，而且甚至是她——看着丈夫一整天关在家里干活——鼓动他出去走一走。她对他的那些朋友很熟悉。不是聚谈会的朋友，而是另外一些朋友，这儿那儿的要好朋友，遥远的中学时代、大学时代的朋友，生活中的朋友，各种情况下都能结识几个朋友呀。夜晚出去时，她有时陪着他，每次从开始到最后都是谈论同样的东西，谈论侦探小说，而她同那几个朋友的女人——如果有女人的话——闲聊些家务事，感到厌恶、无聊。

最后不再陪丈夫出去。那次，即我们正谈论的那个夜晚，帕科没有回答多拉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她不得不又问了一次，你一直和某个女人在一起？帕科冷冷地回答，对。多拉的眼睛，那双漂亮的乌黑眼睛重新噙满了眼泪，但还是没有动一下身子。

在帕科的小说里，女人从不哭泣，更没有为一个男人而哭泣。从帕科·科尔特斯脑海里走出来的女主人公，宁愿拔掉自己的指甲，也不为任何男人哭泣。她们用马丁尼酒浇愁，恰如男人用大麦芽威士忌酒浇愁一样。但是，多拉不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女人。另外，多拉不怎么哭。她有生以来哭过两次。那次是第二次。第

一次哭，帕科几乎不知道。他也无法猜测到原因，这原因同那个令人伤心的事件有关，它导致多拉对男人的憎恨和轻蔑，对他们的厌恶持续了十年之久。他们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你和她在一起的次数比和我在一起的次数都多？那个“她”对多拉来说仍然是块布满地雷的领域，因为她不知道应该说同时有好几个女人还是只有一个。她不知道哪种情况更为可怕。帕科·科尔特斯不愿意用真实情况刺伤她的心，也不愿意用谎话抵挡，他稍稍压低声音——但没有低下眼睛——说：有那么几次。

这样的回答对于她所要求的、对那颗颗眼泪——这些眼泪与其说是对她的毋宁说是对他的羞辱——来说过于闪烁其词了，她又把问话重复了一遍。开始，帕科说，难道次数更重要？多拉只是等着他的答话。过了几分钟，帕科承认了，他说，我不记得了，十次，也许十二次。只一个女人？对于所有这类问题，他以前勉强用一个字作答，现在面对那个问题，他却不敢作答，只是眨了眨眼睛，十分谨慎，不让自己表现得像个无耻之徒。多拉无法控制眼泪，最后也不能抑制愤怒，一下子向他扑去，对他呼喊，打他耳光，骂他，踢他双腿，用拳头狠狠地捶打他的胸部，而帕科没有退后一步，没有任何自卫动作，没有把自己身体遮挡起来。就是在那一刻，帕科意识到，他表现得像个呆子：他刚刚失去了他爱恋的女人。但是，他更为痛心的是，多拉一边哭泣一边愤怒地对他讲出这样的话来：你们男人都是卑鄙无耻之徒。他没有完全懂得那个复数包括哪些人。

“那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夜晚呀。一个男人在度过那样

的夜晚之后才是个真正男人:独自一人在一座城市里漫无目的地走着,口中充满不幸的苦涩味,同时感到眼睛被困意淹得辣辣的、被失眠烧得灼痛,灵魂深处有一种焦虑感,想从死亡中得到永恒的安息,不幸那把刀子深深地插在那里,脑海里充满了恐惧感,痛苦刚刚开始,它能否结束,还是无限期地折磨他。"这些想法,这些话,他让他小说的男主人公说出来,十五天后他写出那篇小说,题目恰恰是《夜是无辜的》。不过,那个夜晚,他远没有以他的任何侦探的沉稳想到他自己。

黎明准时到来,但是原谅没有在任何地方探出头来。他想解决问题。多拉拒绝和他说话。她请人把锁匠叫来,换了门锁。帕科坚持回来,他完全认了错。多拉最后让了步。帕科重新走进家门,像负罪在身一样,心中痛苦不堪。但是,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一个姑娘打来电话——在他的那些疯狂夜晚中,他结识了不少姑娘,一次他认识了这个姑娘,不知道她是怎样得到他的电话号码的——,把一切又搞得不可收拾。帕科第一次没有对多拉撒谎,第二次也没有撒谎。我向你发誓——他对她肯定地说——,我和她之间没有任何来往了。可是,如果没有任何来往,为什么把电话打到家里?帕科没有用这个问题反问她,那样做有什么用!为什么打来电话?他诅咒自己命运不好。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一个已不复存在、死亡了的冒险使夫妻关系完全破裂了,而美好的未来、初升的太阳恰恰那时好像正在向他们微笑呢。

帕科一直责备自己,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没有对妻子撒

谎。在人类历史上,为了本单位的荣誉和单位人员的利益,不知多少男人对妻子撒过谎、继续撒谎、将来还要撒谎。由于简简单单的一句谎言,那样的场景每天在世界上千百万个家庭里上演着。由此,看上去世界还在运转着。多亏了谎言。但是,帕科不能那样做,因为他的侦探没有一个撒谎。在生活中,在侦探小说里,应该知道自己置身哪一方。他在两支队里同时打同样的比赛,把事情弄得很糟。这第二次,多拉的父亲堂路易斯最后介入了,他如同反对女儿的婚事一样,第一次他就反对和解,在那些争吵中,他找到了把这个女婿赶走的机会,在他看来,女婿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没有羞耻的人,一个好色之徒,他女儿的最糟糕的对象。于是,他劝他的女儿说,把他赶出去,是个臭流氓,就这样了,你别再让我说那事了。

他还是让那事继续下去了。而帕科每天做的事,就是在他的小说里让所有人都进行监视、侦探,一些人跟踪另一些人,但从未意识到他的后面有两个警察,他们都在路纳大街的警察所任职,而他过去经常沿那条街散步;现在,他走到哪里,那两个警察就跟踪到哪里,而他为给他的小说搜集"素材"——他是这样对多拉说的,那是给自己找个借口——经常光顾那一大串美国酒吧和三陪女俱乐部。他假如像老埃斯贝哈希望的那样写社会小说或"严肃"小说的话——他对多拉允诺过,某一天他会写的——,小说将不会源自贫民窟和工人街区。但是,罪恶喜欢妓女,妓女喜欢罪恶。"这两种东西总是连在一起的,如同粪便和屁股的关系",这是军曹鲍勃·马丁发现蒂姆·弗格森的直肠里有某种

重要毒品，谈到麻醉品时说的有点难忘的话。

而堂路易斯说的“就这样了，你别再让我说那事了”那句话只能意味一种东西。他把他知道的一切及这一切以外的东西，即只有在推测领域可以接受的东西都讲给了多拉。

但是，多拉是从帕科那里得知他去过那种地方，至少知道其中的许多次，她认为那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当她父亲企图把肚子里的毒水全都吐到她身上时，她断然打断他的话。

父女二人相处得不好，但他还是小女儿的外祖父，所以一天，在多拉第二次让人把锁匠请来之前，帕科在家里与岳父母相遇，堂路易斯像惯常一样稍稍有点醉意，或者说正好醉到不让任何人发现的程度，他对帕科说，我只要再次看见你来打扰多拉，或者看见你在离这家一百米的地方，我要给你两枪。堂路易斯站在帕科的面前，只有一步的距离，举起拳头，在他眼前晃动着，小女儿那时还不满一岁，被喊声吓得哇的一声哭起来。孩子的哭声让岳母——这个女人喜欢首饰，电烫头发总是保持大理石样的波浪，指甲染成珊瑚色——惊了一下，不禁暗暗抽泣。多拉也大喊大叫着，站在父亲和丈夫之间，让他们理智些。那时，堂路易斯把双手支在胯骨上，外衣推到身后，惟一目的是让人看见他腰间挂着手枪。他想吓唬吓唬谁时，比如年轻女人，被逮住的人，甚至刚刚从米格尔·安赫尔大街警察学校出来的新手，常常摆出那种架势。那时，帕科只是侧着脑袋注视着那场景，仿佛在欣赏一幅抽象画。他的漠然表情更加激怒了警长，使后者的表演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最后又说了一遍，如果再在那儿看见他，一定给他几枪。

从那以后，帕科再没有去看岳父母，也没有经过警察所看望老朋友。他不得不同意每月同多拉和女儿见面一两次，大部分是下午四五点钟在某家咖啡馆。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喝杯饮料，也不谈一谈女儿未来的打算。

但是那天夜晚，令人担心的是大人的未来。

“帕科，你得走了。”

“他要来？”

“不是。他不在马德里。”

“我得和你们母女俩呆在一起，说不定会发生事的。我可以睡在沙发上。人们都在议论政变的事。薇奥莱塔也是我的女儿呀。”

他们讲话声音很低，仿佛一对情人，这唤起她一点希望，但她感到忐忑不安。

“你也不问问我想做什么？”

“帕科，你要做什么？”

多拉一副厌烦表情。看得出那样的谈话他们曾进行过上百次。

“实际上，我并不知道。”帕科回答说，情绪忧伤。

他不敢向多拉讲出成立侦探公司的古怪想法，但却想说说同老埃斯贝哈争吵的事。

“这一下午他大概一直往埃斯帕尔蒂尼亚斯大街打电话，想请我原谅他。”

他把手伸进手提包里，把借到的三万比塞塔及另外五万递给多拉。

“拿着。我已经不需要了。”

他那是指侦探公司的事，但是，在讲话中有些偏离，他认为这对他比较合适，他追求的是神秘效果，而不是神秘本身。

多拉把钱拿起来，她不知道如何理解那些话。

“这钱比你应该给我们的多呀。”她这样说；她并没有数一数，但厚厚的一沓，看得出来。

“账的事，以后算吧。”

“还是现在吧。也好知道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面。”

“如果日期到了我还不来看你，就把多余的钱还给我，像往常一样，我月底来看你。”

多拉悄悄地数了钱，把应该留下的放在一边，其余的递给他。

帕科坚持把钱全部留下来。

“难道我们不可以成为朋友吗？”

“帕科，我们是朋友呀。现在你应该走了。我得给孩子吃晚饭。”

“我留下来看看你怎样喂孩子吃饭，难道不行吗？”

多拉想了想。

“不行。”

不过，他们的这些话是一串窃窃私语，仿佛两个人刚从噩梦中醒来，躺在同一张床上互相交谈着。

“我爱你，多拉。”

“帕科，好了，别又开始了。”谈话的绵柬在锭子上变成了一丝细细的声音，几乎像轻柔的抚摩。

那一刻，两个人谁也不能再向前迈出一步。多拉站起

来,帕科跟在她身后。他几乎没有力气向陶醉在玩具里的女儿告别。

来到门口,多拉说:

“路上小心点,帕科。早点回家。我们以后再谈。”

几乎两年了,他们相见或分别时,多拉一直没有与他握手,这次却碰了下他的嘴唇,飞快地吻了吻,帕科没有思想准备,好像在梦中,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她已经说了再见,关上房门。

帕科独自一人,站在楼梯平台上,不知道如何是好。多拉吻了一下,是什么意思?他喜欢那吻,和小说里描写的一样。当生活至少有点像他的小说时,他喜爱生活。他又按了下门铃。他知道多拉站在房门另一侧,但不知道她竭力抑制痛如撕心的抽泣,不知道她把双臂交叉在胸前。防御她自己的不幸,她那不是抱着双臂,而是用双手把双臂固定在信念的桅杆上,犹如那是变小了的乌利西斯[①],不让自己跑出门外,去追赶那个她仍然深情爱恋的男人,把他拉回家,同他钻进被窝,一块起床,时醒时睡,用丝绒般的声音私语。

帕科等了一会儿,当他意识到多拉不会开门时,没有心思叫电梯,慢慢步行下楼,像他在自己小说里无数次谈到的众多主人公做的那样,但那一刻一个也记不起来了。

---

① 又译尤利西斯,是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拉丁名。

大约在帕科·科尔特斯离开多拉家的那一刻，司法警察查封了佩斯大街的那套公寓，波埃、马格利特和后者在刑警大队的三位同事已经赶到佩斯大街；夜晚的大气虚幻、寒冷、稀薄，那是一个漫长的夜，谁也说不定会发生什么。

在马德里，车辆稀少时，每辆都像疯了似的行驶着。政变在即，一方面这是可以原谅的，另一方面可以把它们看做政变的同谋，因为车上的人有可能跑去参加闹事或想躲到安全地方。

佩斯大街好像被狂风掠过一样，一片荒凉、古旧、破落景象。那是波埃的第一个死人，他拿定主意，以法医身份出

现在那里。而法医却和法官一样，都不从远处看尸首一眼，把事情完全交给助手，自己溜到一间小客厅里，法医做记录，法官写初步处理意见。那个令人不快的滑稽场面也许与其说归因于现场惨不忍睹，毋宁说归因于这个案件在不适宜的时刻把他们从舒适的值班室拉出来，也许因为这一点他们满面怒容，对马格利特甩出两句酸溜溜的话，埋怨他行动迟缓，没有抬走死尸，也没有照相。

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头，而不是开始报告的老太婆吊死在弹子锁门把上。当然啰，尽管死者有希瓦罗人那样的身高、瘦小的身躯，双膝还是着落在地板上。脑袋耷拉着，面部右侧大部分水肿，吊挂着的双臂有些脱离身躯，仿佛那可怜的老人要飞出去似的。

不可能是自杀。当然啰，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包括身体健壮、上了年纪的法医，看到任何东西能证明是自杀，也没有听到相关的传言。

一个警察没有忘记利用那个机会说几句滑稽话，取笑那个骇人听闻的死亡事件。

暴死者的那套狭小公寓坐落在一座哥特式建筑里，老式出租用房，楼梯恶臭，台阶高低不一；房间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和邻居，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惊恐表情，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在马格利特和波埃赶到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定推测，但互相矛盾，他们饶有兴味地讲述各自的看法。

法官不敢碰一下家具，害怕衣服上粘到油污和脏垢，他站着，开始进行询问；书记员坐在沙发上，对脏污漠然置之，

也不关注自己的衣服会怎样，他用笔记录证词：是谁发现的尸体，死者是否一个人住在那套房子里，谁最后一次见到死者，什么时间，有什么亲戚，如果有，他们住在哪里，死者是个怎样的人，性格怎样，以什么为生……

“喂，波埃，这可是个有趣的案件。自杀还是他杀？”

马格利特早把那个问题忘在一边，忙着用刷子检查每个房门的弹子锁，而那时波埃已经按照他的方式在房子里转了几圈，此刻走到他朋友的身边，看了一会儿他如何工作。

“我说是自杀。是自杀案件。”

由于怯生，他的声音混浊。

“如果是他杀，”他继续说道，“那将是一桩完美的罪行，而我们知道，是不存在完美的罪行的。如果有那么一个罪犯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得认识认识他，但愿给我们留下一张名片。”

“马拉维亚斯，你从哪儿弄来这么一个歇洛克·福尔摩斯？”刑警大队的一个队员听见推理，这样问道。

“是我表弟。”马格利特说。

波埃满脸羞涩，连耳根都红透了。他暗暗发誓，即使瓦特生博士[①] 亲自问他的看法，他也再不会张开嘴巴。

果然，房子里没有任何痕迹表明发生过搏斗或抗争，一切东西都原封不动地摆放在原来位置上，甚至自杀者脱掉了鞋子，谁知道他为什么那样做，把两只鞋放在门下，并排

① 是柯南道尔作品中的人物。

摆着,很干净,仿佛等候东方三博士的到来。旁边有一把好几处仔细整修过的椅子,椅背上搭着一条围脖,可以肯定死者那天上街时用过。邻居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奇异现象。住在对面的女人看见门敞着,喊他,但没有人回答,便跑去叫她已经退休的丈夫,查看死者房屋。

这个乐善好施的人惟一担心的是,看着马格利特用碳酸铅和其他试剂找到他留在大门弹子锁上的指纹,他想告诉法官,尽管有这种证据,但他与那事毫无关系,与此同时他不停地诅咒自己倒霉,说都因为自己心好,才卷到与己不相干的事里。“这事出在我身上,”他重复着说,“都因为我是我。”或者说,因为是个大好人,他这样毫无廉耻地暗示说,难道只因为一个司法错误他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由于不敲碎死者的下巴就无法解开紧紧系在他脖子上的绳结,医生与法官和大权在握的检察官商量后,用手术刀割断绳子,以求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造成骨折或职能部门的干涉,这些部门是警察机构、法医机构和司法机构,都是十分敏感的机构。他们把尸体平放在地毯上。死者的面部呈现着可以想象的最为悲凄的惨状:皮包骨,一侧的太阳穴和面颊被一片黑斑覆盖着,两眼深陷,好像睡着了,在做噩梦。嘴角上恐惧的强笑给他面部又抹上一道悲哀色彩。一个警察检查衣兜,但只发现一盒香烟,已经只剩一半。他看了看,抽出一支,用他本人的打火机点燃,十分自然地把那盒烟收起来。

检查中,发现了老人的存折和一笔数量可观的现金,还有个人证件,一个塑料盒里有几张名片、一个社会保险折、

几张如同旧石器时期的古旧的圣诞贺卡，十几张泛黄照片上的人物好像先于他多年走上了黄泉路。他们寻找药品盒，但是只找到一些健康人惯常的备用药，有几片吃掉了，余下的被弃在一边。是在卧室的衣柜里找到的。某些情况下，那样的死亡是抑郁症用药不当的后果，而一个塑料包底部的药物已经用完，马格利特合上了塑料包。

无论医生、法官还是刑警大队成员都无法搞明白，如果说有人可以在房门的弹子锁上上吊致死的话，那么一个身材如此弱小的人哪能有那样大的力气上吊呢。在场的人大部分认为，最为可能的是他杀这种假设。

那套房间的屋子和客厅都很窄小。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警察和邻居们都必须从横放在过道里的尸体上跳过去。大家谈话是那样热烈，都可以说是在欢庆什么。过了一会儿，法医解剖研究所的职员来了，把尸体运走，这才使吵嚷声稍稍平静些，紧张心情也缓解了些。

当死者的一个侄子出现时，所有的人渐渐撤出去。看来，他是死者惟一的亲人。

这个人四十岁左右，没有教养，没有刮脸，两只手还很脏呢，因为是把他从他工作的汽车维修车间拉来的。他身体肥胖，拖着一个偌大的啤酒肚。他满脸怒容，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个人，因为他闯进了一个看来已经是他家产的地方。他对法官说，他之所以来是因为几个小时前伯父打电话叫他，但从开始他就不隐瞒，最近几个月他与伯父的关系并不像以前那样好，并说至少从一年前就没来看他。邻居那个女人听到这话，把马格利特拉到一个角落里，肯定

地说,最近几个星期至少见到他两三次。马格利特对那女人提供的情况表示感谢,叫她不要同任何人讲话,等待法官问完死者侄子的证词。作证结束后,马格利特立即向法官报告,背朝那些看热闹的人,向他转述了邻居女人提供的情况。这意外透露的情况使案件变得复杂起来,法官心中更加不快,因为他想尽早结束,回家去,于是他宣布审查和询问结束,命令逮走死者的侄子,把所有人赶出去,决定秘密速审。

刑警大队步行返回警察所,要么因为警察所只有几个街区远,要么因为那个特殊夜晚一切都打破了常规,他们必须给那个被捕的人戴上手铐,由两个警察左右押着,沿着那几条古老大街往回行走,街的两侧仅有昏暗街灯和伊莎贝尔式灯笼照明。那种场面如果出现在以前什么年代,一定使观看那支不祥队伍行进的人得出错误的结论,以为歇洛克十分悲哀预言的事开始了:都没等到半夜就开始抓人、杀人了。

马格利特对社会上的紧张气氛十分敏感,命令武装警察加快脚步,提高警惕,走人行道,而不要走在大街中央。

“是你。”检察官中有个人说,他也是个年轻人,高个子,对面前的场面很漠然。“事情很清楚。只看你一眼,就知道你是个少见的人。你要和盘托出。你们这些疯子会很快招供,你们喜欢法官。”

“把你们抓起来,与其说因为你们是坏人,毋宁说是笨蛋。”那个检察官的同伴添油加醋地说着,非常友好地递给犯人一支香烟,后者用被铐的双手一下子夺过去送到嘴边。

“这是个案子，”马格利特说，“喂，波埃，有什么想法。”

波埃出于对他们押送的那个人的尊重，不敢张嘴说话。被逮捕的那个人耐心地忍受着警察的责难。

“那名字是怎么回事？”高个子检察官问道。

波埃没有回答。

“喂，”马格利特坚持说，“理论理论吧。”

小伙子停下来，想让警察、检察官和犯人往前走几步。

“不是常有人用垃圾袋自杀吗？”波埃腼腆地问。“说不定这是个自杀案子。”

“可是，这儿并没有塑料袋呀。”马格利特反驳说。

他很怜悯那个被押送的男人，但不敢讲出如此天真的感情。

“小伙子，你连个想法都没有。”高个子回答说，他听见了那个假设。

马格利特和波埃——他提着箱子——又落后几米，不让别人再介入他们的谈话。

“斯帕德应该做的是把侦探公司的事抛到脑后，放弃写作美国式的小说，来关注我们的事。美国人有什么东西而我们没有？这个就是个很有趣的案件，斯帕德比谁都能讲得动人心弦。”警察说。“如果发生凶杀案，我们掌握了凶杀案，如果有凶手，我们掌握了凶手，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生一死，有了这些，还要什么呀？所有小说讲的都是同样的事，死和生。如果小说从生开始，以死结束，就是文学小说。如果小说从死开始，以生结束，就是侦探小说。这两种都是好小说。”

“我不知道。”波埃说，他有那种习惯，开始时总说个“不”字，那是为了不使任何人感到不高兴。“很可能是这个侄子。我尽管怀疑，但很可能是这个侄子。在那种情况下，他很可能表现得比看上去要贫困。他是惟一继承人。继承什么？那几样小东西，两套旧衣服，一个存折，一套臭气冲天的公寓。如果是他杀的话，谁也不会忘记他将是主要怀疑对象。所以，动机不明显。再说，老人已经八十二岁了，看那样子身体不太好。如果同他住在一起，完全可以一怒之下把他害死。可是，他们几乎不见面。另外，所有人都断言他是个平静的人，温存，有教养。是个大老实人。在家里没有暴力迹象。作为罪行，罪犯为了转移警察的注意力，而有意伪造那个细节，即把鞋子和围脖整齐地摆放着，这是小说描写的罪行。但是，生活不是小说，而是恰恰相反，小说是从生活中来的。所以，我们在 ACP 聚谈会上谈到的小说，一半是坏小说。依我看，这桩死亡案子的关键在于那个人的过去。应该调查他生前的生活情况。这就是一个始于生命终于死亡的故事。而不是那种始于死亡的故事，尽管看上去是那样。在如此高龄，以这种戏剧性、神秘死亡的人中，其关键就在死者的过去。百分之九十九是这样。我是这样看的。如果我们只局限于为一种果找一种因，那什么都无法解释，因为每种果是多种因造成的，而这些因的后面还有许多另外果的许多因。我们把这些就称为过去。”

马格利特用惊讶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你指的是怎样的过去？”

波埃耸了耸肩，以这种方式作答。

夜晚寒冷，街灯灯光好像在四周把奄奄一息的光环焊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尽管大街空荡无人，房子里也是如此，大部分窗户黑乎乎的，那是恐惧的颜色。

夜晚十点钟，他们返回路纳大街的警察所，到了那个时候，堂路易斯的醉意由于抗生素发生效力而加倍严重起来，达到难以想象的“高度”。他的办公室里坐着形容、装束各异的人物，全是男人，人数不下十个，他们的特征是这样的：或者非常年轻，或者同堂路易斯本人的年龄相当，甚至大一些。他们每个人都穿戴得体。年龄最老的内穿蓝色衬衣，外穿大衣。一些人咬着指甲，另一些人观看警察以前享用的便提式电视，第三组人编制和讨论一些名单，按照轻重缓急，草拟紧急行动计划，有的要逮捕，有的加以惩戒以震慑同类，有的要占领多处工会和政治要地。那里笼罩着一种混杂气氛：振奋，巨大恐惧，梦想建功立业，渴望报仇和复仇。如果说佛朗哥死时有人打开香槟庆祝的话，那么在那个幸福夜晚，那些外来人在警察所里摆满了国产白兰地；人们面临着那样一个夜晚，白兰地是抗御它的最合适的酒精饮料。

在那种气氛中，呆十分钟就足以使随便一个人感觉到，那个危险的阴谋已经是成功在握了，国王站在危险阴谋最前面，只等候军事权威了，此人将重新控制国家。

谁也没有注意波埃、马格利特和刑警大队同事走进来，但是波埃一眼就看见了以堂路易斯为首的那帮人，堂路易斯威胁开枪，让西班牙的所有敌人像兔子一样跑出来。

他们把逮捕的那个人关在单人牢房里。旁边的单人牢房关着两个女人等候处治，是三只手，被指控坐在格兰维亚

大街人行道的板凳上伺机行窃。

那场景令波埃十分扫兴，他向他的朋友告别：

“我要回客店去。”

过道里只有波埃一个人，他返身回来，打开那两个女扒手所在的牢房，命令说：

“出来，回家去。”

两个女人从他面前走出来，大门口也没有人拦住。她们都不知道对波埃说几句感谢的话。

波埃来到大街上，径直向那家咖啡馆走去，有的晚上，他常常在这儿吃个奶酪三明治，喝杯非咖啡因咖啡，这是他的晚餐。但是餐馆已经关门，停止营业，格兰维亚大街的其他咖啡馆和电影院也都如此。那一刻，一家电影院正好熄灭广告彩灯，把三个没有思想准备的观众晾在售票处前，这几个人也许是疯子，没有思想，认为第七艺术和政变是可以兼容的。波埃从一个电话亭给亨娜打电话，那天下午他去聚谈会之前给她打过电话，但没有人接。他本想那天同她一起过夜。

她是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女人，但他爱她。他又给妈妈打电话。也无法和她联系上。全国电话线瘫痪了。他很想安慰一下妈妈。战争摧毁了许多人生活，她是其中一个。他想告诉她，马德里一切正常，他很好，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这时，他远远地看见，几辆警用小坦克和军用吉普车向库柏勒[①] 方向

① 格兰维亚大街与阿尔卡拉大街衔接处，竖立着库柏勒像，库柏勒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母。

驶去，哪儿的朋友呀？他想象着，妈妈可能这样问的。是银行的朋友，妈妈，他对她说谎。

汽车、小坦克、警车不停鸣笛、打灯，霎时间划破昏暗、寒冷的夜空，给全城——由于恐惧和不安使这座城市变得空荡荡的——抹上一层虚无缥缈、独一无二的色彩，马德里从内战日子以来一直没有看到此情此景。

随着波埃走近圣赫罗尼莫大道，他惊讶地发现没有人阻止他往前行走。只有一队男人，二十来个，步伐稳健。他们都快把鞋后跟踩进地里了，从这可以看出他们是一队爱国者。快到拉迪时，他们与波埃相遇。在还有几米就相遇时，波埃举起右臂，以罗马人方式向他们致意，但没有停下脚步，仿佛他那样急促促地赶路是因为司令部有人等他。那队人被波埃的十分自然的表示唤起了激情，也一个个举起右臂，高呼万岁，但波埃没有作答。他注视着那些陌生人的目光，感受了生命的快乐和激情，而这些生命好像在宇宙间突然找到了自己的命运。那些人继续向光明走去，而波埃向国会方向行走。他在想，在一座谁也不认识你，谁也认不出你，你也不认识谁的城市里行走，是多么惬意，城市是多么迷人呀。

快走到塞达塞罗斯时，第一道警察设置的路障，拦住了波埃的去路，有一辆警车，过去一点是一辆老式陆虎横在大街中间，几个佩戴军事警察白色袖章的小伙子在那儿指挥着。

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阻拦他，不让往前走。

“我父亲在里面，他是议员。我想知道出了什么事。我

母亲很担心，”他说。

“我们不能放你过去。”

他们看见他过于年轻，还没长胡子呢，不好用您称呼。

波埃不是那种乞讨什么的人。他想转身，离开那里。警察可能对他产生了同情心，便拍拍他的肩膀，递给他一张通行证：

“你对那边的同伴说，”这个讲话的人指了指第二道路障，“来询问你父亲的情况，是我们让你过去的。”

第二道也是最后一道路障设在狮子大门前三十米左右的地方。那儿有几个猎奇的人在等候着，还有不少便衣警察，他们大部分是警官，另外几个人是政府下属的高级官员，局长呀，国务秘书呀，其他人是佩戴军衔的军官，记者不多，伊西特罗·罗德里格斯·莱乌埃尔托也在，他在“完美罪行”俱乐部里以马尔洛维著称。

“马尔洛维，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从后面碰了一下他的胳臂。

“来看看，波埃。”马尔洛维像个音乐剧演员那样回答。“可是，在这儿你要叫我伊西特罗，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会以为我们嘲弄谁呢。都叫我伊西，真讨厌。”

“对我来说，你叫我拉法还是拉法埃尔都一样，随你叫。怎么放你进来的？”

“我说我父亲在里面。”他压低声音说。

“我也是那样说的。”波埃说。

这种巧合不禁使他们两个人大笑起来。身边的人不知道什么原因，用恶狠狠的目光责备他们：当祖国危在旦夕的

时候，不应该为任何事情而发笑，哪怕你想到就要继承一切。外表终归是外表。波埃和梅生一样，觉得马尔洛维这个人不错。勇敢，或者莽撞，马尔洛维在聚谈会后跑回家里，吃了点东西，更换了衣服，换了个人似的，好像到外面约会女人，然后跑到这儿，已经呆了三个小时了。他和几个警察交上了朋友，给他们香烟抽，自告奋勇当听差，跑前跑后。

国会里的情况大致处于停滞状态。谁也不知道什么。所有人都在等候谋反首领，他始终没有露面。真的，开始冷起来了。放眼望去，看见海神喷泉那边有一道魔幻、骗人的薄雾；薄雾从卡雷拉大街慢慢向上升起、展开。裹在薄雾里面的可怕预兆不可能是别的东西：那将最终导致一场血洗的灾难。波埃和马尔洛维本来都不知道害怕，此刻则觉得那么年轻就为西班牙死去未免太荒诞了，到了离开那里的时候了。

他们重又冲破路障，回到太阳门。还有几家酒吧开着门，但不让他们进去。他们走到波埃入住的客店门口，后者向他的朋友告辞。但是马尔洛维想尽量多陪他一会儿。

“到我家去。我一个人。”

他的二老外出旅游，他妹妹睡在女邻家里，他呢，按理要睡在一个朋友家里。但是他不想去那里。那一切都是圈套，他是想多转游转游，看看事态的发展。

“我家里有东西吃。”他补充说，想说服波埃。

他们没有费多大劲儿就找到一辆空载出租汽车。出租汽车成双成对地行驶，都是空载，司机有的傲然自负，有的胆大鲁莽，有的二者兼而有之，波埃和马尔洛维拦的那辆出

租汽车就是如此。司机一个劲儿地炫耀自己，说他本人是个体力劳动者，即使大陆下沉一大半，他也不会离开他的出租汽车一步，用天命论的说法，就是马德里的出租汽车司机一直相信纯哲学。

“无论这些人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能剥夺我的工作。”

马尔洛维的家，说得更为确切些，他父母的家防护得十分牢固，大门安装着几把大锁，并有厚厚的铁板加固，可以说是个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了不起的结合体。一方面，是一座真正的军械库，堪称军队的博物馆；另一方面，是座令人眼花缭乱的钟表收藏馆，有挂钟，有座钟，其他式样的，古老的，还有怀表，它们想把武器和华盖未占用地方完全争夺到手；像波埃这样第一次进到这座房子的人，无一不感到惊奇。

在宽敞客厅的四面墙壁上，没有一个小洞，没有一平方厘米的地方不被那些枪支、玻璃柜、帷幔占据着。在帷幔里，采用艺术的回旋形式，如果是玻璃柜，铺着方方正正的天鹅绒；而对于枪支，即军火库——这里面有各个时代、各个生产商、各个国家的短筒火器，每一件都用漂亮的哥特体珂莱曼达字仔细制作的卡片标明出处——，并在墙壁上裱糊同样颜色的云纹布或锦缎；钟表多得是那样无法计数，可以说包括了开始计数时间以来各个世纪的杰作。

他们丢下打开的、音量很大的电视机，走进厨房，把那只冷鸡和两瓶葡萄酒一扫而光，他们还像两个好朋友似的谈论了侦探小说和破案电影，把 ACP 聚谈会每一个成员过了一遍，马尔洛维并为他们作了有趣的画像，还讲了他自己

独立生活的计划;午夜时分国王出现使全国平静下来以后,马尔洛维向波埃展示了他老头子三十年来在各个商场搜集起来、认真研究、仔细造表入册的宝贝,他继承了父亲的这个嗜好,其热情、认真、仔细不亚于父辈。

那里有小手枪,袖珍手枪,决斗手枪,连发手枪,自动手枪,各式左轮手枪,都按照年代、大小、式样排好,系着饰物,枪筒朝向中间,有些成束,有些成行,有些错落……

“那是合法的吗?”波埃问。

“你是说收藏合法不合法?当然不合法了。不过,我认为对我老头子不会说什么。他在司令部有很大影响。”

在现代武器方面,种类同样很多。

“都能使用?”

“这正是有意思的地方。基本上都能使用。就像你喜欢小狗,把它们解剖一样。一件武器如同一个宠物,如果善于同它和平相处,它将是你的最好伴侣。一件武器会永远保护你,只有你想攻击的时候它才攻击。像狗一样。比狗还有用。因为一支手枪,主人想什么它就想什么。”

“如果我们能把那称为想的话。”波埃暗示说。

马尔洛维装作没有听见。他嘴里全是各种各样的名称,燧石手枪,五花八门的品牌,生产商二百多年前就去世了;史密斯－威生手枪很典雅,镀铬枪筒,象牙枪把;可怕的贝利塔,漂亮的贝尼利,小巧玲珑、威力巨大的亚斯特拉,甚至还有新奥尔良制造,神秘的里麦博士左轮手枪。

“真有意思。”

在波埃的评价中没有半点好感之情。看得出来,他厌

恶武器,但努力掩饰着。马尔洛维没有发现这一点,接着他朋友的话说:

“真的吗?”

看来,马尔洛维是那样厨师中的一个,即只喜欢自己炒的菜。他拿起一支手枪,有毛瑟标记,是卢格尔[①] 于一九一四年亲自制造的,子弹自动上膛,他把这枪放在波埃手里。马尔洛维这样做时好像在做那样一件事,即那不是手枪,而是一个裸体女人,对其有绝对的竞争力,他允许他的朋友抚摩这女人的胸部,并且说“勇敢点,小伙子,摩一摩,我喜欢你好好摩一摩,看看是不是很迷人”。

“怎么样……是不是绝无仅有?”

波埃手上拿着那手枪,不知如何是好,但也不知道扔在什么地方。手枪很重。他甚至害怕放在玻璃柜里把玻璃碰碎。

“我对武器一窍不通。”他为自己辩白说。“对狗也一无所知。狗比猫厉害多了。”

他不想对马尔洛维表现得无礼。

“你放过枪吗?没有?你的问题就在这儿。你没放过枪,不能说不喜欢枪。枪像女人一样,用眼睛看女人是一回事,和她们做爱是另外一回事,非常不同的一回事。武器除了像狗以外,还像女人。你不抚摩它,就不能真正知道对它的感觉。它能使你放松。你带着各种各样问题、带上一箱弹药到射击场。子弹打没了,你的问题也没了。”

---

① 卢格尔是奥地利人,发明多种手枪。

马尔洛维从武器柜里珍藏的一些稀世精致的武器中挑出六七支手枪、左轮手枪，连同各种子弹一起塞进运动包里。

“干什么去？”波埃看见他提着包向门口走去，这样问道。

“你来看看。”

“我觉得现在不应该提着这么多手枪和子弹跑到大街上去。”

马尔洛维说没问题。不必走出这座楼。他的老头子早已修了一条狭长的射击走廊，钢筋水泥，销声，子弹穿不透，是半圆拱的，有白炽灯，回声穴里堆放着褐煤粉，闪着停尸房一样的耀眼灯光。

波埃对那一切扫了一眼，就像是一个决心不理睬任何东西的人。马尔洛维给他戴上耳套，把一支手枪放在他手里，具体地说，那是“春天原野”防卫手枪。之后，他自己也佩戴上防护用品。他前面十二米的地方竖着一个纸人，心脏处画着靶心。他用脑袋做了个动作，告诉波埃那个假人是婊子的儿子，刚刚与他擦肩而过，企图偷他，强奸他未婚妻和他妹妹，把祖国占为己有。怎么办？

“波埃，用枪把他打得遍体弹孔。看你的了。”

波埃用力扣动扳机，但始终打不响手枪。马尔洛维微微笑了笑，不得不像教小孩迈出第一步、第二步那样教他打枪。

“我真不知道阅读侦探小说的人是怎样知道小说里发生的事的，因为他们用手拿起枪之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这如同与神学院学生谈论女人一样。在 ACP 聚谈会的成员中,惟一对这些问题真正感兴趣的人,除马格利特外,就是山姆了,他确实懂得。其余的人连个印象都没有,都不知道什么是手枪,什么是一磅巧克力。”

波埃把第一梭子子弹打完后,将手枪还给马尔洛维;马尔洛维看见波埃检查靶子的弹孔完全失误而露出那种表情时,他与其说为自己毋宁说为他的朋友感到沮丧。但是,他不是那种动不动就打退堂鼓、泄气的人。

“应该掌握手劲。”他说。

接着他自己试射了一下,打了十二发子弹,十发打中头部,两发打中心脏。他的手提包,他的未婚妻,他的妹妹,他的祖国得救了。

他又让波埃试射了别的手枪,他像个酿酒学家,喝几小口就评价每种酒的醇香。

早晨四点半,他们才重新上楼到马尔洛维的家。那一夜,波埃得到的教诲是他不喜欢武器;马尔洛维成了一个好朋友;他们两个人都认为,那场政变是一个真正的份外工作,在各自的工作中没有一天假期,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

对于这段历史的其他人物来说,那一夜同样是难以忘怀的。对于住在城里——内战的幽灵从城边掠过——的大部分西班牙人来说,也是如此,尽管在这里露面的人没有一个做出那种事来,即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事发生在那样不寻常的情况下,就其本身来讲没有值得牢记心头的。

堂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呢,上午十一点他妻子去警察所把他接了回来,怕他继续做那些蠢事。

他的办公室好像那样一个舞台，即刚刚上演一出很长的剧目：空荡荡的，肮脏不堪，一片狼藉，纸杯子满地，里面残留着脏兮兮的白兰地和咖啡，也不知杯子里熄灭了多少根香烟，屋子里充斥着恶臭。

堂路易斯躺在一把舒适的摇椅里，前后不停地摇着，几乎把下巴窝在胸前，仿佛是个被侮辱的人。他形容憔悴，没有刮脸，不讲话，不讲话并不是因为心情激动，而是因为喉咙哑嗓，好像在等候来人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去，如同以前多次发生过的那样。那儿只有一个卫兵站岗，堂路易斯跟在妻子后面，偷偷地、快捷地溜到门口。蛇从农夫的锄头下逃脱出来，不必更敏捷、迅速就消失在了草丛中。

但是，佩斯大街那位老人的侄子还关在单人牢房里，等着有人告诉他犯了什么罪，或者来个像波埃那样有怜悯心的人把他放出去。他也不知道政变到底怎么样。外面，一个卑微的女人，即他的妻子一整夜都穿着那件绒织大衣，手上拿着揉成一团的手帕，双眼因为哭泣和彻夜不眠而变得通红，她不知道询问谁，因为谁都不知道怎样回答，有些人都不愿意听她讲话。

在政变的后续日子里，对那个不幸的男人进行了仔细而系统的审问，内容是堂路易斯亲自拟定的，他对那些事非常关注，想以警察特有的效率铲除那天夜里祖国发生的变化无常的事端。

当然啰，对老人的侄子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折磨，形式五花八门，不让睡觉，不给饭吃，侮辱呀，威胁呀，虐待呀，谁也说不出应该归属哪类刑拷。当然啰，他一直没承认自己杀

害了老人,但也没有坚决否认,回答问题时存在许多疑点。那一切在法官面前是这样结束的,后者命令把他关押起来。

像大部分同事——至少与他特别接近的人——一样,马格利特在二月二十四日清晨六点钟离开警察所的办公室。那时,他的上司正同这些人和那些人谈话,企图让他们知道,他那天下午和前半夜的疑心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是感情的自然表露,使祖国免遭任何有组织阴谋的破坏;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是发生了点事,但结果是可庆的,没有什么人受重伤,机关也没有遭受很大破坏,这对民主和王权是件大好事,二者从事件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不过,那是一声警钟,应该引起注意,王室呀,政党呀,工会呀,一般国民呀,都不应该听而不闻。堂路易斯并不知道他表述的这些思想几小时之后便出现在了铅印的西班牙几家报纸社论中了。

尼录·乌尔弗的真名是赫苏斯·维奥莱罗·梅迪亚维亚斯,塔松内斯餐馆的老板;对他来说,阿古多医生——他在ACP俱乐部里也被称为歇洛克·福尔摩斯——让那天走出商业咖啡馆的人都吓得魂不附体,他一整夜不知道是否应该烧掉记载着ACP聚谈会历史的档案、卡片和记事簿,因为这个名称可能引出误会,从而给大家带来可怕后果;他还盘点了餐馆尚存有的食品,以防真的发生不测。

面对歇洛克·福尔摩斯呢,对他来说那也是最可怕的夜晚之一:他有一个同胞哥哥,已发现其尸体被抛在卡萨·德·坎波[①] 的一条深沟里,两个胡须和头发都很微细的儿子很

① 马德里郊区的一座森林公园。

可能被随便一个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所以，那一夜他寡言少语，手里端着威士忌几乎没喝一滴，用愤怒的目光注视着电视里出现的身影，每当在这些身影中看到国民警察晃动或戴军衔的军人出现、消失，他便认为那里的大屠杀快开始了。

当然啰，对于老埃斯贝哈来说，那一天一开始就不顺，但是他虽然不善于在加勒内风① 中掌舵，却仍然是杜尔西内娅出版有限公司的总管。同一天，他失去了桃色小说女作家和黑色小说的男作家。这已经是事实。与帕科·科尔特斯发生争吵之后，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认真思考了两三个小时，手上的哈瓦那雪茄由于不吸而时不时地熄灭，办公室里和他身上臭气冲天。当老杂工西蒙——他也是送货员、打包工——终于走了以后，克列门蒂娜小姐开始安慰后颈长有粉瘤的老出版商，她是后者忠诚、可靠的秘书，有能力做这件事：应该同堂娜卡门和解，而同帕科·科尔特斯要彻底决裂，这个人越来越无礼、傲慢，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总让她代问她母亲好，而事情是非常明显的，她不能忍受她母亲，她母亲也不能忍受她，再说，这个讨厌的家伙有生以来都没见过她母亲，她母亲和他有什么相干？那天下午，老埃斯贝哈按照克列门蒂娜的真知灼见做了。

“堂娜卡门，”他说，“您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变得不负责任了。您能不能利用几个月的时间，除了您的小说之外再为我写侦探小说？

---

① 系英吉利海峡附近的西北狂风。

您知道得比谁都清楚,您的浪漫小说令我激情澎湃,恰如令我的永远安息的叔父激情澎湃一样。”

他答应她,付给她的稿费比付给科尔特斯的多。五百五十比塞塔。

老埃斯贝哈每页手稿扣下了五十比塞塔,同时仍然使她相信提高了稿费;当他实际上降低稿费时,他是把自己看做生意场上的隆美尔①,所以他没有往埃斯帕尔蒂尼亚斯大街打电话。也没有碰见帕科。

对于帕科来说,那几个小时是十分苦涩的。马德里从来没有像那个夜晚那样又成为一个有四百万具尸体的城市。

山姆·斯帕德这个侦探小说前作家离开多拉家后,像帕科·科尔特斯那样梦游似的向帕尔迪尼亚斯将军大街的“白鹅鸟”迪斯科歌厅走去,并在那里躲了一夜;歌厅里还有十几个顾客,都不适应那里的环境,有的认识,有的陌生,和他一样过着不顺心、不规律的资产阶级生活。他和这些人以及歌厅老板关着店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喝酒呀,抽烟呀,聊天呀,平安无事地呆到太阳出来。那时,有个年轻女人挎上他的胳臂,把他拉走;年轻女人总是围着成年男人转游。他在自己的小说里给她们披上神秘而富有诗意的光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她们时觉得她们和他一样是灰色的、不幸的,她们的一生没有任何神秘、没有任何诗意,隐名埋姓,像他那样,放荡、放纵。

---

① 隆美尔(1891—1944),法西斯德国元帅。因参与谋杀希特勒而自杀。

上午，梅生给斯帕德打了电话。那天和第二天都没有在家找到他。他开始担心起来。第二个星期六，梅生给多拉打电话，她说，自从政变那天她的前夫离开她家以后再没有他的消息。

说到凄惨的夜晚，对于多拉来说那个夜晚是最为凄惨的夜晚之一。那天晚上，她不想告诉她的前夫，她与记者路易斯·米格尔·加西亚·路恩戈维持十一个月的关系已于十五六天前结束了。这位记者厌了，不想等她改变态度，埋怨她仍然爱着帕科·科尔特斯，关心她的女儿胜于关心他。她没有力气也没有兴致否认这一点，与他争辩是非。可是，那天晚上把发生的事告诉帕科·科尔特斯，就是把他重新塞到自己的家里。所以，她躲到门后一直痛哭，哭泣到女儿喊她时，才把她从她自身的深渊中拉上来。过了一会儿，她给母亲打电话，询问父亲的情况，但是电话线瘫痪了，只是到了凌晨两点钟，她母亲在玛丽莎① 作用下哭着对她倾述说，不知能否再多忍受她父亲一分钟，她一直生活在难以想象的痛苦之中。母女俩无所不谈。这样，到了清晨四点钟，多拉开着电视机就睡了过去，一连睡了四个小时，直到八点钟她女儿像闹钟一样把她叫醒；女儿薇奥莱塔是幸福生灵中的一个，那时像往常一样仍然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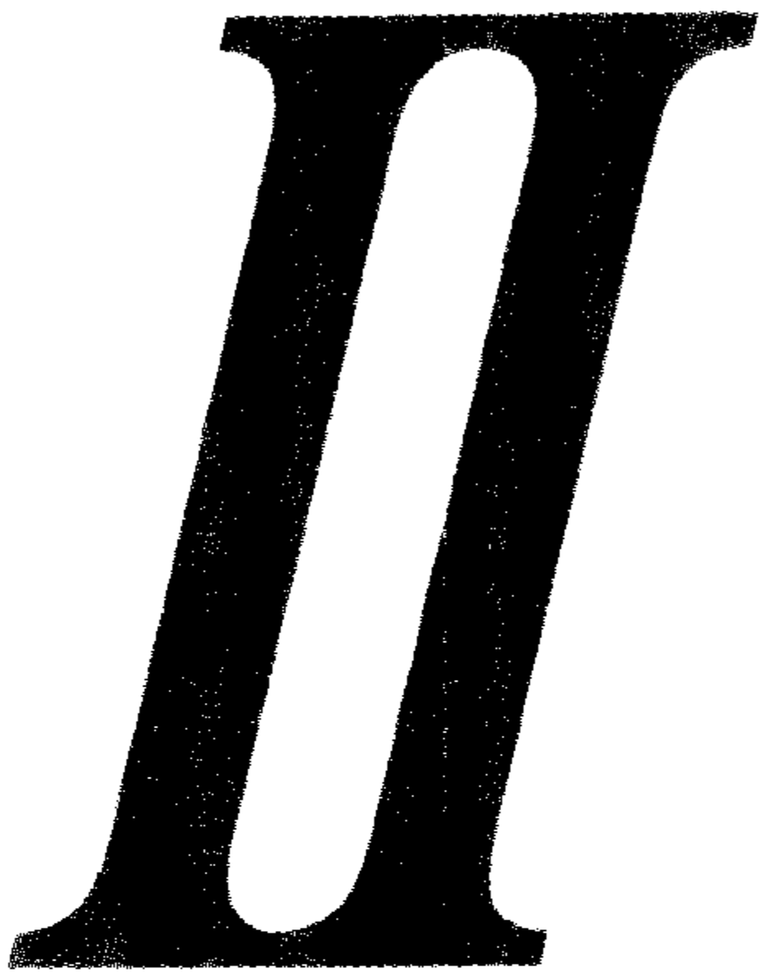
那天夜晚，母亲和外祖母在电话里谈了很长时间。事后，多拉又一次后悔给母亲打电话，因为那样的情况又出现了，她越是需要母亲的时候，越不能指望她。

---

① 一种香甜酒。

对于 ACP 聚谈会的其他成员来说,那也是一个凄惨的夜晚,确实如此,但是对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那个夜晚又向他们证实了,现实要比侦探小说描写的更为混乱、不正常、不公正,因为在侦探小说里总是秩序的逻辑和逻辑的公正常常取胜。说到底,秩序和逻辑是两根绝好的柱石,可以支撑一座坚实的社会大厦。

波埃和马尔洛维呢,自那个夜晚之后,两个人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这并不是说他们很相似,但是相处得很好。一个性格内向,另一个心直口快。一个爱开玩笑,另一个多愁善感。一个满脑子都是五光十色的遐想,另一个孤僻、少言寡语。马尔洛维睡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而波埃只是盖条毯子、蜷缩在沙发上,等到第二天早晨去银行上班,他走后,过一会儿马尔洛维才醒来。那天上午,波埃终于在银行与甜蜜、温存、神秘的亨娜通了电话。





她在等着他。餐桌已经摆放好，电灯关闭，蜡烛点燃。在那柔弱光线里，餐桌上的东西神秘地颤抖着。她觉得步入了四壁紧封的巴旦杏核[①] 之中。她有一刻曾想象过，餐桌上摆满了字典，但她面前的现实是，她已经铺上了天蓝色的桌布，蓝花盘碟摆在那里，水杯和酒杯闪闪发光。她觉得那个小小地方对于努力追求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它有那么一点阿尔卑斯客店的色调和气息。

波埃来了，他手上提着一瓶葡萄酒，他来时经过圣米格

① 巴旦杏为西班牙一种杏树，此处指杏核。

尔市场,顺便在附近的一家酒坊买的。

他对葡萄酒一无所知。他只看名称、商标和价格,但是想买一瓶她喜欢的。像亨娜这样的女人,依照他的经验来看,一定开过许多瓶葡萄酒。在亨娜给他打开房门那一刻,他把葡萄酒递给她,说,我带来了这个。他不知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做,不知道接到邀请到人家做客是否带礼物。在他家乡的镇子里,谁也不请谁。但是他上个星期在罗默[①] 的一部电影里看见,一个小伙子去女友家吃晚饭,给她带了一瓶葡萄酒。波埃想,在巴黎,人们很看重葡萄酒,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西班牙。在马德里,情况一定与巴黎一样。人们都说,马德里已经变成了欧洲的首府,仿佛马德里在世界主义方面打赢了几次世界锦标赛。

在波埃看过的那部电影里,也是姑娘点燃一支蜡烛,等着小伙子的到来。那个细节使波埃平静了许多,因为他也带了一瓶葡萄酒。说不定亨娜也看过那部电影,当然啰,不是和他一起看的。也许在比利牛斯山上事情是那样一种情况,点着小油灯,有餐巾,甚至还有这样的细节,在一只杯子里放点水,然后插进两枝康乃馨,放在托板上。对于波埃来说,那一切都是新鲜的,事情和他家乡的镇子大不一样,他是六个月前迁移到马德里的。实际上,他的那个镇子十分平淡,没发生过什么事。他很高兴迈出那一步,在马德里生活,尽管他把母亲一个人丢在家乡,心中十分痛苦。

亨娜把葡萄酒接过去。小伙子觉得烛光令他心旷神

---

① 罗默(1920—),法国电影导演。

怡,不禁被迷住了。她为这次约会而特意穿了条牛仔裤,白色衣衫的胸部绣了几朵花,她的乳房在花冠处微微地显现出来。在烛光的照耀下,她周围形成一小片阴影,这更加突显了她胸部的秘密,但亨娜并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她是在电灯灯光下试衣的,在这种灯光下看不出任何特殊的地方。是后来点燃蜡烛,关闭顶棚电灯时,那两颗尖圆的东西才富有性感地显露出它们的轮廓来。亨娜如果事先知道的话,也许会在衣柜里再找一件的。她不愿意自己表现得像个厚颜无耻的女人。西班牙人有那样的倾向,即以为她作为一个丹麦女人随时都可以同向她提出要求的男人上床。她也稍稍化了点妆,而以前从未这样做过。眼睛淡淡地抹了些,几乎看不出来。她比他大。也许想掩饰一下年龄上的差距。波埃直勾勾地注视着她。有那么一刻,他必须弄清楚他是否更喜欢她那样,眼睑上的那道蓝色阴影,有好还是没有好。但是,他没有时间,因为梦中的事情总是一闪而过,而那天晚上的约会对他来说,开始时犹如一场梦。

亨娜把葡萄酒放在桌子上,然后帮助她男友脱掉大衣。由于那里的一切都很狭窄,脱掉大衣时,似乎两个人之中就得有一个出去站到楼梯平台上,因为那里容不下三个人,即他们两个人和大衣。

从楼梯直接进到那间顶层式的小厅,这小厅既是工作间、书房,又是餐厅、客厅。最里边有扇门将这个小厅同一间卧室连接起来;如果想在卧室里感到舒服些,只能躺在或坐在床上,因为天花板是那样倾斜,一直延伸到房间的尽头。而那张床,是在一个二十来厘米高的平板上铺了条胡

乱拼凑在一起的褥子，具有北欧特点。作为床头装饰，在墙壁上钉了块印度布料，上面画着不少可爱的杂技蝌蚪。那里的一切精致、细腻、井井有条，看得出女主人有一双灵巧的手。亨娜给波埃作导游，解释说，这套房子不大。波埃一眼就看见床很宽，两侧各有一盏灯，都点着，放在木制小型插座上。桌子紧靠墙摆放着，一个人即使躺着前额都很容易碰到天花板那一侧。那边有两三本书，是亨娜的还是另外一个人的？他想象着，在那张双人床的每一侧，两个人可以共同生活得十分幸福，床头上摆着各自的书，有各自的星期六上午时光，有各自的星期日，消除疲劳，休息……他喜欢那里的环境，幽雅，寂静，而且像他那样孤寂。他想象着，床单散发着熏衣草味、石胆味、蜀葵味，或者安徒生童话中描写的任何一种花朵的气味。卧室后面的浴室，实际上很像洋娃娃的浴室，厨房也是如此，右侧的房门通到那里，它的大小和白雪公主的房子十分相似。波埃在厨房里看见深盘浅碟已经盛好晚饭食用的汤和菜，还有存放面包的小篮，水罐，他带来的那瓶葡萄酒和亨娜买的那瓶并排放在一起。

那儿没有很多家具，不可能有家具。在小厅里，有那张桌子，它的下面放着火盆，两把水烛椅，耳形扶手坐椅推到一个角落里，旁边竖着一个普通、但擦洗干净的纯木书架，上面摆放着二十多本书，还贴着一张马蒂斯① 的女人招贴画，一面摩尔式镜框的小镜子，角落里那盆小花的枝叶碰到了低矮的顶棚。桌子对面有一扇窗户兼晒台，有两道漆成

① 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

地砖颜色，即马车红的台阶通到那里。

亨娜很了解那些有导游的访问应该遵循的路线，最高处是一处平台，从那里可以望到迷人的、宏伟的、独一无二的城市景色。当然啰，平台也不很大。和那里的一切一样，也是依据小人国的比例建成的。不过，那位年轻姑娘十分了解那些东西常常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让波埃在前面走，自己退到后面，好半藏着身子，注视着他面部表情，看看他走到她为他展现出的犹如一块巨大的壁毯面前时，面部表情有怎样的变化。

“哎呀呀，亨娜，我有生以来没有看见过如此漂亮的东西。”

亨娜走近些，她看到男友很高兴，心里喜滋滋的。

把那块地方称为平台未免有些过分，因为它并不比桅顶平台大多少。刚刚能容下他们两个人，那里摆放着许多花盆，大部分栽植着玫瑰、天竺葵，没有多少空地。亨娜甚至不得不说出为这个地方而保留的那句话作为辩白：这些倍加爱护的盆花，虽然很普通，但并不比王宫的金银珠宝逊色。

“我喜欢植物。”她这样说，好像那是一个缺点而不是长处。

波埃很想在那里静静地呆一夜，但他设法做点什么，看样子是聊天。

“马德里居住着好几百万人，肯定只有几十个人偶尔见过这样的东西。”

他感到自己犹如一个被选中的人，命运之神把他送到

那里。

亨娜却没有作答。她好奇地注视着那个学生。她从未邀请一个学生到她家。有几个是结伴来的。她认为男老师同女学生保持个人关系是淫秽的,男学生同女老师保持个人关系也是如此。

过了一会儿,她缄默不语了,因为她觉得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在那个男人的陪伴下,随便一句话都是一种亵渎。

那地方很冷。亨娜走进房间,随手拿起一件衣服披在肩上走出来。

王宫就在附近,她伸手可及,灯火通明,好像歌剧的舞台布景,那是专门为他们两个人演出的,此刻就要开始了。

从那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望去,王宫显得既庞大又渺小,既宏伟又平庸,既使人感到惊叹又是可以改观的,犹如孩童用积木随意搭建的原始房舍。

过去一些,远处社区的无数颗灯光把城市拉近了,卡萨·德·坎波的黑乎乎树林后面,遥远的灯光同遥远的星斗混杂在一起,散落在空中。

“太美了。”波埃喃喃地说。

他即刻感到后悔,又把那句话说了一遍,这说不定会把他看做一个饶舌者。

这时,亨娜发现她披在肩上的大衣并不是她的,而是她男友的,她既希望后者看到这个细节,同时又不想让他注意到。她在感情上开始感到很矛盾。她立刻警觉起来,因为经验告诉她这样的矛盾是强烈、深挚爱情的先兆,而这次爱

情如同她以往的所有爱情一样，将导致那样一种结局，即将给她带来莫大的痛苦。

在那个领域里，波埃的经验如果说不是零的话，起码比亨娜少得多。从他来自的那个镇子，在爱情方面谁也不会拖带很多爱情行装。在那个西班牙内地的偏僻地方，人们的生活轨迹是笔直的，某一天在第一次领圣体仪式上开始，十五年后的另一天在婚礼上结束，不出同一个教堂，连牧师也不换一个。

平台狭小，天气寒冷，使他们两个人挨得很近。他们面对黑夜，面对自己的模糊想法，默默地站在那里。隔壁房间里，蜡烛继续燃烧着。烛光照到平台上已经很微弱，犹如一个受伤士兵用非凡的力气登上那两道台阶，最后奄奄一息地倒在寒冷的土地上。一股微风吹进房间，光柱轻轻晃了下，死去的光线好像唤醒了沉睡的阴影。波埃觉得胃里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山姆·斯帕德在他的小说里称为“蝴蝶扇动翅膀”，“死亡的先驱”。是神经。他的心脏急速地跳动着。小伙子觉得胸膛被飞快地重重地敲击了几下，很不舒服。他不知道那种事“永远”是这样。亨娜也许比他大十岁，所以应该知道事情是怎样的，既然她把他带到那里，给他展示了如此美不胜收的景色，两个人浪漫地欣赏着马德里之夜，也许她希望他把胳臂搭在她肩上，将她拉到他的怀里，恰如她把他的大衣裹在自己身上所暗示的那样；果真，他对这个细节并没有视而不见。如果拥抱她，接下来就必须亲吻她。他当然想吻她。像她这样的女人，谁不想吻呀？

他是个很拘谨的人。她像个从一个少男梦中复制出的

美女，比这样的美女还美，因为她都没有必要在那样的梦中游荡。她把头发梳理成短马尾状，系一条黑色天鹅绒饰带。天鹅绒饰带也发出了邀请，请把结扣解开，将头发散开来，亲情地抚摩，用头发把指头绕起来，闻嗅，被那香气陶醉了，全身早已浸满了那种香气，龙胆香气，丁香香气，蜀葵香气，波埃现在可以吸到一种香脂气味，和冷香堇气味相似。是龙胆香气。不对，是蜀葵香气。不，是丁香香气。波埃想，太美了，她也许喜欢听他对她讲这话。他觉得她是富有诗意的女人。魅力无穷。但是他害怕自己显得平庸，害怕亨娜认为他不但饶舌而且做作。所以，他对那头发、对香堇、对别的鲜花没有说一句话。不知为什么，那一瞬间波埃记起了一件事：一天，在他参加 ACP 聚谈会之前不久，也是在商业咖啡馆里，亨娜对他说西班牙男人很讨厌，向她提出这个提出那个，而她头脑里根本没想到那些事，所以只要出现那种情况，亨娜就会对那个人失去兴趣。对，也许她会想到，如果对她说起香堇，一定别有用心。

另外，用胳臂搂住她的双肩呀，亲吻呀，这些应该是晚饭后的事吧？他不知道那些动作可以是晚饭的序曲。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他希望这样，希望有机会，还是放到最后吧。

波埃放弃了那个念头，没有把胳臂搭在亨娜的双肩上。他本来可以随便找个借口的，比如，天气很冷。问一下，你冷吧？他已经发现，亨娜披在身上的大衣是他的大衣。那么，他们面对马德里之夜，呆在那儿干什么呢？气温下降很多，再在外面多呆一分钟都是鲁莽的。但是，看来亨娜不想离开平台，回到顶楼小厅去。

亨娜比波埃大十岁,这使得她看一切东西都比他清晰,但心情是那样紧张,与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合乎情理的,生活把一颗美好、完整、鲜嫩的果子放在她的身边。她对那样的生活已经厌了,太坎坷了,太没有刺激了,而她几乎不满三十岁呀。所以她希望波埃用胳臂搂住她的肩膀。如果不这样,她在那里等他干什么?她也知道波埃很怯生。她喜欢怯生的男人,喜欢这样的男人胜于那些看见她就穷追不舍的男人。那十岁的差别,她并不愿意使他望而却步或束手就擒,他还是个小伙子呀,正从对她来说已经十分遥远的少男少女的海滩走出来。她觉得在爱情关系上考虑谁应该或不应该主动什么的是很愚蠢的,可是让她犯不犯错误,那个小伙子对她来说太重要了。当然啰,他最终成为她的恋人,但也已不是她的第一个恋人了。他将成为她的恋人。实际上,她毫不怀疑这一点。什么样的男人抵挡住了她的魅力?在她的记忆中没有一个。在西班牙这样一个南欧国度里,一双碧蓝的眼睛,一头金色秀发,还有她那样的身材,她那样的仪表,就好像一把万能钥匙。但是,她不想对他使用这把钥匙。在某种程度上,她把他看做一个孩子,早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弄他了。她有生以来这也是第一次单独与一个男学生共进晚餐。她注意到了那样一件事,就是在群星照耀下,有一道悲凄的阴影落在了她额头上:她感到自己老了,成了个老处女,从那一刻开始不得不在越来越年轻的男学生中间寻找几个小时的陪伴。对那个悲苦的前程,她感到惊恐,于是,她装出轻松的样子,问:

“拉法埃尔，我们进去，好吗？”

烛光迎接他们就像迎接两个在林中迷路的孤儿。

“我们两个人是亨泽尔和格莱特①。”波埃一边紧张地说一边搓着双手，想把手暖和过来。

亨娜觉得他说那样的话暗示北欧是很微妙的，尽管没有直接道出丹麦，但一下子把她拉近了许多。是那个小伙子身上的东西吸引了她。

“你为什么说那样的话？”

“是为了烛光。我愿意一辈子点着蜡烛、点着油灯生活，身边有火气。那是真实的。电灯却不是。火苗不只是火苗②，还有点别的什么，是生命，是热量，是火气，是爱情本身。”

波埃那些话在修辞学上是十分蹩脚的，由此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起来，他不愿意让说出的话就那样飘荡着，他还是想修正一下：

“灯泡是很漂亮，但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灯泡把你从它那里赶走。火苗却叫你去它那里。”他这样补充说。

他说出这样的谐音俏皮话或者说双关语，都差一点咬了舌头，或者说得严重些，都差一点脑袋撞到墙壁上。他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十足的卖弄学识的人。

当时，亨娜是那样一种状态，根本没有想到那是谐音俏皮话或双关语，也没有理解之后的辩白，她在痴迷地倾听他

---

① 是德国童话作家格林兄弟（兄 1785—1863，弟 1786—1859）作品中的人物。

② 在西班牙语中，“火苗”还有“情焰”、“激情”之意。

讲话。她听得见他讲话，但并不总是在听，她做不到这一点。晚餐在不言而喻编织的云雾中进行着，充满了激动和不安气氛。波埃喝完第二杯葡萄酒，甚至讲话滔滔不绝了，和他的习惯大相径庭。他惟一担心的是想知道事情将会是怎样的，这位女老师怎样对他说该回家了。他看见她默默不语，甚至害怕她已经厌倦了。他几乎不可能想象到，实际上，亨娜是处在出神状态，想法很简单。上帝哟，真英俊——她这样想着——，我恨不得在这儿一口把他活活吞到肚子里，他还只是个孩子，是一块苹果糕，比苹果糕还好。她想到这里，脸上不禁露出多少有点厚颜的微笑，有一丝口水从嘴角流出来。

波埃认为这样的微笑意味着她说了点什么。

“是什么使你感到那么有趣、好玩？”

“你。”

“我可不是个孩子。”波埃反驳说，他还是那样怯生；说完又沉默了，低下头，要把孤僻的裂瓣关合起来。

亨娜惊了一下。她想，她一脚踢开了她那个年轻男友的思想大门，他呢，回到自己的思想里，莽莽撞撞地找出那么一句话，把她吓了一大跳。

“谁对你说过你是个孩子？”

“你想的东西有时从脸上表现出来。”

“难道你不是个孩子？”

“不是……我觉得我不是。我从来不是个孩子。我觉得我不可能是个孩子。也许不让我成为孩子。”

“给我讲讲你的事。”

“你想知道什么?”

他们已经吃完晚饭。亨娜早已做好了饭后甜食,是苹果糕。波埃从来没有吃过苹果糕。他很欣赏苹果糕的味道。直到那一刻,他一直认为与之打情骂俏,甚至一起外出的姑娘都不喜欢做饭,更不用说怎么做了,像这样复杂的苹果糕——他认为在苹果里发现了复杂东西——,就根本谈不上了。那个夜晚第一次发生的事真不少,而且每一件都发生在他身上。

“你不想对我谈谈你的事?”

“你先对我谈谈你的事。你在西班牙做什么?”

亨娜讲话之前用手掌把桌布的一道皱纹展开,而实际上并没有皱纹。波埃想,也许想让他去抚摩。对。是那个意思。如果不是这个意思,她不会把皱纹拉得那样近。但是,他不敢去做。亨娜用匙尖挑起一小块甜食,在眼前举了一会儿,在她最后送到嘴里时,又在腭前停了一会儿,仿佛从那里获取的味道直接涌出昔日生活的遥远回忆,那生活她已留在了她的国家,留在了家具库房里。

“你想知道些什么?”她一边问一边露出神秘的微笑,那是告诉他她有许许多多秘密,可以一下子都讲出来与他共享。

“你为什么离开丹麦?”

“我结婚一年便分居了。于是来到了这里。我以前并没有想到这儿来。我在西班牙不认识任何人,以前也没到过西班牙,另外这儿离我丈夫很远,离使我觉得是理想国家的一切很远。”

“丈夫”那个词使波埃感到慌乱。亨娜发现了这一点。

这时,她中断了讲话。亨娜觉得半句真话要比一句谎言好得多。她不想讲述那“一切”中隐藏着的一些事,她一直企图忘掉,而且几乎忘掉了,除非她产生幻想,比如那一刻,吸了三年毒,住房肮脏,荒诞的关系,不负责任地破坏了家庭,像丈夫要结束自己的生活那样她也要结束生活,在她与一个年轻男学生欢度晚约那一刻,他如果还没有死去的话,不知道他漂泊到什么地方,在怎样的洞穴、怎样肮脏的角落里藏身。“毒品”这个词吓跑许多人,所以在那间屋子里她都没想到说出这个词。

“……我来到这里,开始讲课。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直讲课。没有别的什么了。这就是我生活的历史。你呢?”

波埃也有自己的秘密。谁没有秘密呀?都二十岁了,说不定比三十岁的人还多。波埃感到无法讲出来,因为二十岁的秘密是神圣的。他都没有想到是否能活到三十岁。

波埃把臂肘支在桌子上,将双手插在一起托着下巴。

“我的情况要平庸得多。我考试应聘一家银行。考试合格,在我家乡镇子工作三年,之后在马德里申请一个职位并得到批准,于是来到这里,到今天已经度过了六个月,这些日子住这家旅馆,那些日子又住在那家客店。我隔三差五回去看望我母亲,其余的日子就呆在这里。”

“就这么多?你没有未婚妻?”

波埃觉得,亨娜比他大十岁,这一点足以使她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也会问她为什么像她这样漂亮的女人没有一队长长的追求者,但是他还没直截了当提出这个问题,都要

羞愧地死去了。尽管如此，波埃很高兴亨娜向他提出那样的问题，因为这给他一个机会，向她反问，把事情放置在他想放置的位置上，放置在平等的水准上。

“没有，我没有未婚妻。你呢，没有未婚夫？”

他说“未婚夫”这个词时使用了复数。他即刻意识到这未免太愚蠢了。他不知道怎么一下子说出那样的蠢话来。好像说走了嘴。

果然，亨娜没有放过那个复数的“未婚夫”，她直接讲出实情与其说是为了别的什么，毋宁说是为了开个玩笑。她本来很想在一秒钟之内把她的生活完全讲给他，但她没有那样做。她的生活没有多少价值。

“有未婚夫。不多，是这样，只三个。”

她开始注视波埃的反应，但是他面部肌肉都没有一丝跳动。

“实际上，”亨娜表情变得严肃了，想把那事说得缓和些，“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就算做未婚夫吧。”

气氛沉静下来，无论波埃还是亨娜本人都无法正确解释沉静的原因，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对那样的交谈开始感到有些别扭，但是话锋已经达到那一点，谁也不想中断。

“是谁呀？”

亨娜大笑起来。

“噢，西班牙人都是这样开门见山。”

波埃有个习惯的表情，像似抽搐，每每感到不自然时都这样，他抬起手去梳理头发，把垂在额前的头发移开。他只做了这个动作。波埃不喜欢做那样的比较。他和西班牙人

有什么关系呀?

“你认识他。”亨娜终于这样回答说。

“我?”

亨娜的明亮眼睛里闪了一下,那是狡黠的阴影。波埃认为自己败了。

“哈伊梅·科尔蒂纳斯。”年轻姑娘最后揭开秘密说,同时张开双臂,像魔术师做的那样在惊讶的观众面前安排障眼法。

“语言学校校长?一个老头子……已婚。”波埃的惊讶绝不是装出来的。接下来他为自己做出不怎么具有世界性的评论羞红了脸。

亨娜一笑了之。当然啰,那个男人是个老头子。五十岁,在二十岁的血气方刚的波埃眼里更像他家乡的古远的荒山秃岭,同她的三十岁相比几乎是桩罪行。

波埃太年轻了,他不知道那样坦白自己的秘密远不该令他感到不安,而是给予他勇气,因为那是一道裂缝的先奏,告诉他一个绝好的机会已经来临。波埃眼睛射出痛苦目光,这使亨娜的心绪稍稍平静了些。

“我不相信你没有未婚妻。你很英俊。我看见姑娘们在课堂上如何注视你。她们用目光争夺你的爱。你不能说没有发现。”

他不但没有未婚妻,而且在这方面的经验完全可以说是十分可怜的。另外,他没有发现班上的女生已经不同他说话;甚至都不看他一眼,或者说,这是他的感觉。

“在这方面我不大走运。”他思考一会儿之后坦诚地说。

在镇子上没有未婚妻？亨娜继续问道。她抓住那个话题不放，仿佛在快速地一页页翻阅一本小册子。没有，他已经对她说了，没有未婚妻，波埃对她说过。可是，他某一天会同他父母一起回镇上去吧？他没有父亲。没有父亲，亨娜不应该感到遗憾。他本人几乎都不感到遗憾。对于他来说，他父亲只不过是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永远镶在古旧的镜框里，挂在他家客厅里。每逢父亲去世周年时，母亲都落泪，或者说其他时候，谈到父亲时，母亲有时流泪，有时不流泪，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为父亲流泪，有的时候谈到一点可能很让人落泪的事，母亲却不哭，但是另外一些时候，她本来心情很平静，只提一下父亲的名字，她就无法控制自己，眼泪簌簌而下。一般的日子里，他父亲默默地呆在镜框里，这比眼泪还令人焦虑。这是波埃的一部分秘密。有些事是不能谈起的，父亲是怎样死的，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况下死的，他的死对家里有什么影响，他母亲孤身一人，怀着他，还有姐姐哥哥，不得不随便找个工作，用自己的双手做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姐姐哥哥放弃学习，离开学校，随便找个工作，碰到什么就干什么，姐姐十六岁，哥哥十三岁，连小学都没念完。在那儿，在镇子上，没有人帮助他们，父亲家里和住在西班牙另一端的母亲家里，也不帮助他们，谁都不管，谁都不帮助，所有人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因为这一方和那一方都把过错推到他身上，说只有他一个人对发生的事负责。因为那不是第一次。可是，那不是他父亲的过错，如果需要同持相反看法的人不时争辩的话，波埃将这样维护……

这些事他从不对任何人讲，因为谁都不想知道实际情况是怎样的。没有一个人想知道真实情况。人们对自己的感觉和想法都不很叫真，因为真实情况和实际情况一样，说出来都是要负责的。就是他们之间，自己家人之间，他母亲和他姐姐哥哥也不愿意谈起那事。太令人痛心了，他们全家人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折磨，那道伤口还像第一天一样开裂着，谁也不想再用指头触摸。当有人对他说你想象不到那是怎么回事，你想象不到，你没有印象，他都觉得有点在责备他。人们对他讲出那样的话，他心中十分痛苦，因为那事是在他出生之前发生的，而这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他家里有父亲一张照片，镶在镜框里，父亲确实英俊，身体瘦削，头发往后梳理着，嘴大，眼睛深沉、乌黑，目光阴郁，鼻子笔直，前额很高，腮颊那儿有个酒窝。所有人都说他英俊极了，像个演员。所有人还这样说：你母亲年轻时该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他们相识时，一个如此英俊的男人为什么看中了她。原因是和他一样，母亲很漂亮，人们告诉他，他父亲就是这样说他母亲的，甚至他母亲也这样说，她感到骄傲，同时有些害羞，她很愿意记起那时候发生的事，波埃从来不知道母亲谈到最后是以笑声还是哭泣结束；对，他们像一对电影演员。镇上有几个女人认识波埃的父亲，她们对他说，你出落得这么英俊、这么招人喜爱，可是，这是你父亲的功劳。镶在镜框里的那张照片不是他父亲的单身照，而是他们两个人，是母亲和父亲的合影，是结婚照，父亲身穿西装，翻领上戴着服丧标记，是为某个人，随便一个人戴

的,给谁戴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那些年都为某个人服丧,服丧一个接一个,一些接一些,到处都是死人,各种各样的死人,这可以让人们为随便一个人服丧。你随便说个地方,那里就有死人和不幸。他母亲戴着珍珠项链,他父亲死后,家里需要钱时,这又是首先卖掉的。正是由于那张照片,波埃才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生前是什么样子。在家里时总是记起父亲,父亲做了些什么事,如果你父亲在这儿,你父亲留在这儿,你父亲去了那儿,如果你父亲活着,如果你父亲那天不去马德里,讲这些事,但从来不讲那天发生的事。那是一九六〇年的一天,他父亲去了马德里,并且与他的朋友雷米西奥在雷蒂罗公园意外相遇。那是意外相遇。警察从不认为是意外,因为当以某种固定方式思考时,就没有任何意外,有的只是,邪恶总是躲着、藏着,从来不会停息。而警察和善良则有时间休息、休假,他们为维护秩序出了很大力,需要时间消除疲劳,需要睡觉,需要同家人团聚,需要正常的娱乐,邪恶就利用这些空当儿,从世界最阴暗角落破坏他们的基石,把建立起的秩序毁于一旦,而那只是自然法而已,用放荡代替真正的自由,等等,所以把他逮走了,因为从原则上讲,警察从不相信一个有前科的人说的话,特别是他用“意外”这个词为自己辩护,警察就更不相信了。他们不仅仅生活在错误中,而且也以谎言为生。还生活在放荡之中。如果一个人能够意外找到真理的话,谎言只能是为坚持错误而做的多年顽强、固执、持续不断的努力。波埃还记得,他小的时候,母亲躲到家中角落里不住地哭泣,或者晚上做衣服时趴在缝纫机上流泪,如同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某

些场景,电视里常常转播这样的电影,是些让人哭泣的戏剧。家中已一贫如洗,能嗅到破布和烂葱头味。他还记得母亲给别的人家干活时,他整天呆在一位女邻居家里。是位好邻居,到处都有好人呀,是个乐善好施的女人,当大娘大婶、奶奶、叔伯奶奶都在同一镇子却没有人照看他时,这位女邻照看他,那件事发生以后,所有人,甚至臭气冲天,无法到任何地方的人都不和他们讲话时,这位女邻居发了善心,像亲人,从那以后比亲人还好,她把他同自己的孩子一起养起来,不问他父亲是否对那一切有过错,是不是走了厄运,是不是因为这个可恨的西班牙,这个可恨的政府,她惟一关心的是让那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尽量把几个孩子抚养成人……

奇怪的是,战后并没有杀死他。波埃求他姐姐,求他哥哥,再给我讲讲父亲对你们讲的事。一天,他们给他讲了,一天他拉他们去打鱼,或者一天买了第一辆卡车,母子四人到路边小店吃点小吃,庆贺庆贺。他也常常对母亲说,妈妈,再给我讲一遍,爸爸和你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她,一个充满幻想的女人,回忆起那个下午在巴伦西亚发生的事,是一九三八年七月的一天,他们碰见几个从前线回来的人,大家一块儿去一家酒馆吃东西,给他们煎了几个鸡蛋,是一个民兵从农村带来的鲜蛋,爸爸和妈妈就是在那儿相爱了。母亲讲的话,波埃都能背诵出来,犹如一篇童话故事,他绝不允许哪怕为了简化情节而丢掉一个细节。三十二天之后,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结婚了。有什么可犹豫的?以后就是那些事了,就是战后发生的那些事了。他把她带到他的

镇子里。在镇子里,家里人一直对他不满意,埋怨他和一个比他们地位低下的女人结婚,而且又是那样漂亮,他们总是这样说,她引起了街谈巷论,引起了怀疑。他父亲央求她,看在上帝的面上,安赫琳内丝,你别化妆了,你如此漂亮,谁也不会原谅你的;你就别把心思放在那上面了,你不化妆已经很漂亮了。母亲还经常对他讲到一个长枪党徒的告发,那是后来的事,即当她认为那一切都过去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太粗心大意了,谁能告诉我们这一点呀。安赫琳内丝在回忆往事讲到这里时,总是唉声叹气。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从这个集中营到那个集中营,安赫莉塔① 跟在身后,那时母亲还正怀着孕,又必须急促促地赶路,探视地点,在树丛后面,离卫兵只两步远,为了让他们高兴,装作没看见,每次都要给他们带点吃的,或者给点钱。头两个儿子都失去了,一个得了脑膜炎,另一个营养不良。一个两岁,另一个三岁。而他,拉法埃尔,最后给他取了这个名字,这是那个儿子,老大的名字。他叫一个死人的名字,可能因为这一点,他的性格才那样严肃。可是,那一切都过去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谁也没有再记起那事。有时在家里,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讲讲过去的事,那是怕有人偷听。从来不在孩子们面前讲。在家里不谈论内战,但是内战是一切,内战毁灭了一切。这就是发生的事。那是不幸,是灾难。但一切都是意外。警察一直不相信这样的事。但是,意外是所有完美罪行的基本原则,波埃父亲的罪行也是一桩完美

① 即安赫琳内丝,安赫琳内丝是安赫莉塔的昵称。

的罪行。杀死了他,但他和警察想象的事毫无关系。那么,他们想象的是些什么呢?他们从来不知道,从来没对他们说什么。从来没对他母亲说过什么,我们逮捕是因为这个或那个。什么都没说过。而那个"不知道"要比知道一些更糟糕。他只知道他父亲想换一辆卡车,便去了马德里,看另一辆,那时正举办六月样车展销会。就是这么多。但是,他在雷米西奥家被捕了。雷米西奥是个好人,至少一年前就开始跟踪他的行迹了。两个人畅谈过去年代的事和现在的情况。内战期间,他曾是他的长官。他们无所不谈。你还记得吧?我怎么不记得?那个人这样回答说。而他母亲呢,看到丈夫去马德里不回来,便疯了似的寻找,往各地的医院打电话,往国民警察局打电话,往四面八方打电话。开始时,她希望那只是一次失足,我不知道,她想丈夫在哪儿和一个女人勾搭上了,到时候他会回来的,可是她很快开始担心起来,真心希望那是丈夫在外面放荡。她在内心深处已经原谅他了,只要他回来,这样过了四天,当她以为都要痛苦地死去时,国民警察局来人了,一到就对全家进行上上下下的全面搜查。她去了马德里。为什么把他逮起来?我不知道,夫人,我不能再对您说别的什么了。他母亲在卡雷塔斯大街的一家旅馆住了二十天,整天在那儿,希望见到丈夫,想知道为什么把他逮起来。一个警察可怜她,让她呆在大门口,多长时间都可以,没有说叫她走开。母亲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因为她知道内战后丈夫坐过牢,但那以后再没有卷入任何事情中。她哭着把这些都讲给了守卫大门的警察。这位警察对她说,夫人,您想让我为您做什么呢?

我在这儿是个无足轻重的人。那位警察是个好人。喂，夫人，不要哭了，回去吧，他有时这样说，不要把我牵连进去，我如果知道点消息，立刻告诉您。在那位警察的帮助下，她从那天开始每天都能了解到一点情况了。我不能再多说，夫人，他一直坚持说，您这是在把我牵连进去呀。可是，母亲从他那里得知父亲情况不大好，对他看得很严。他看上去是个好汉，您不要着急，因为他如果清白无辜，他这样说，最终会释放的。可是在他被捕的漫长十八天里，她始终没能同他说上话，见上一面，递给他点吃的。还有人说他可能已经病了，因为情况很不正常，比他身体弱的人都在毫无困难地挺着，而他却挺不住了，他可能生了结核病或者别的相似的病，总是吐血，这可不正常，有人说，他从镇子出来时就病了，按逻辑讲，他肺部不该有大量积水。只提问了几次，谁也不会肺部积水呀。没有进行尸体剖检，法官认为警察局的解释是对的。好几年的时间里，那个主持审问他父亲、并在公文上签字的警察的名字像魔鬼一样附着在全家人，他母亲、他姐姐哥哥的身上，是他使他们的生活变成了地狱，不得不赔钱把丈夫刚刚买的卡车卖掉，把生意转让出去，她母亲又卖掉几件首饰，那是家里值钱的东西，而那一切的罪魁祸首是那样一个人，他把父亲同另外一个人混淆了，也许并不是认错人，而是他自己胡作非为，让路过那里的一个不幸的可怜男人为他的过错付出代价。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警察的名字也忘掉了，他们也想把那时发生的一切忘在脑后，因为后来又发生了一连串令人痛心、关系到他们所有人生存的事。

波埃，对，是他，他念专科学校到十四岁，他母亲希望他继续念下去，他适合念专科，姐姐哥哥凑到一起，对他说，我们无法做到的事，你来做吧。但波埃说，我要和所有人一样，于是进了银行，干得很出色，并且继续学习，拿到高中毕业证书，现在想进大学。他们的状况开始好转起来。难道还有他求？他什么都不需要，现在在马德里，他喜欢马德里，感到很幸福。幸福得都要进大学了。进大学！他父亲生前总是讲这事呀。那么，ACP 聚谈会是怎么回事？他接近 ACP 聚谈会，是因为他在马德里孤身一人，没有熟人。聚谈会成员总是谈论书籍，而他喜欢读书。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怯生、胆小。他以前曾多次看见过聚谈会的人。他觉得他们都很古怪，烟斗里一直冒着烟，青烟一圈圈地向上飘去，活像电影的群众演员。歇洛克把自己装扮成那样子，但并不知道歇洛克·福尔摩斯是什么样，他身上那件大衣完全可以说是外套。尼录的风雨衣，像个什么东西呀，波埃注意观察，一天走近了他们。他总在咖啡馆里学习，觉得那儿比图书馆好。人呀，生疏的话题呀，并不干扰他，而是陪伴他。他在银行里整天一个人，之后在客店里也是孤身一人。在那儿，他谁都不认识。这是他母亲惟一放心不下的，可别变成一个怪人。孩子，认识个把人没有？交没交几个朋友？一天下午，他走近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是些什么人。我也喜欢侦探小说，我可以和你们坐一会儿，学点什么吗？

亨娜用双手托着脑袋，不知疲倦地听着。她自言自语地说，我不知道他父亲是什么样子，但他确实十分英俊……

突然，波埃觉得从梦中醒过来。他都讲了半个小时，这

时立刻打住话头。

“好了，我把我的生活都讲给了你……”那一刻他觉得有个巨大的空白。

亨娜也从她的梦中醒过来。她从桌子上站起来，走到他在的地方，拉起他的双手，轻轻地向上举起，那是让他站起来，当把他拉到自己面前时，用双臂搂住他的脖子，深深地多情地吻了下。亨娜吻完以后，并没有放开双手，而是把他引到卧室里，事先并没有忘记朝向烛光吹了口气。就在蜡烛熄灭那一瞬间，阳台上现出神秘莫测的万颗星斗，月亮像展开地毯一样展开它面纱里的秘密。

多拉都六个月不知道帕科·科尔特斯的消息了，帕科·科尔特斯也没有像往常做的那样准时给她送生活费，而是电汇给她。

帕科·科尔特斯这六个月一直关在家里，抑郁症把他击倒了，最后一点积蓄也快花光了，每天下午用威士忌浇愁，但最令人痛心的是，他喝的威士忌并不是他小说中人物喝的那种，产自肯塔基的神秘酒坊，而是来自塞哥维亚的简陋作坊。

这六个月来，ACP 聚谈会的成员在商业咖啡馆举行的会议也没有见到创始人的影子。

在那段时间里，聚谈会的成员们不再议论侦探小说和完美的罪行，他们想找个法子帮助创始人。

关于破案小说、侦探小说和一般阴谋小说前作家的消息实在令人忐忑不安。他在默默地、不间断地、无可挽回地摧毁自己。

ACP聚谈会派了几个人去帕科·科尔特斯在埃斯帕尔蒂尼亚斯大街的住处打探情况。一天上午，大约中午一点钟，尼录、布朗神父和梅生——他最关心自己的朋友了——来到了那里。在那个不同寻常的时间造访，突现了他们在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

迎接他们的是那样一个科尔特斯。即那时他们刚刚把他从床上拉起来。在那儿见到他们，他感到很惊异。他把那些人拆散开来，一个一个地让进客厅里，同时设法把阻拦他们通过的东西移到一边。科尔特斯的朋友掩饰得很好，没有表露出对他家的坏印象，那儿一片狼藉，是那样肮脏、凌乱，和B系列电影中侦探常常居住的洞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德艺成威士忌和国产伏特加空酒瓶扔得满地，烟灰缸满满的，半睡半醒时阅读的报纸乱糟糟地折叠着，小说抛在角落里。

侦探公司的计划由于不切实际，在构想出来的第二天就永远地抛在了一边。对老埃斯贝哈收敛傲慢态度也无济于事，因为那次争吵一个星期以后，即三月二日，他给他打电话时，还一个劲儿地骂他，要求他立刻归还借去的钱，而科尔特斯是不想还的。

在梅生的建议下，他们决定即刻对那个老出版商采取

行动，但是他们面临着一个双倍灾难性的形势。老埃斯贝哈手里握着合同，这就掌握了他全部小说的版权，也就意味着像人们说的那样永久占有下去，因为在继续出版期间或库存册数超过印数的十分之一时，版权就归出版商所有，而且帕科·科尔特斯也怀疑，担心老埃斯贝哈用欺骗的手法重印，那样的话就不可能把重印的书夺过来，卖给别的出版商。

布朗神父拉动迷宫那样的长长的细线，在基督教作家图书馆为他寻找校对者的笔迹。

帕科·科尔特斯非常感谢他的这位朋友贝尼格诺神父不辞辛苦地操办那事，这时他想起了一位功德卓著的多明我神父对神德的长篇论述，便避免坚持那项工作，即澄清那些比任何一个老练的侦探面对的复杂得多的棘手问题。

大家也知道科尔特斯拒绝重新提笔写作小说，但是人们，包括梅生所不知道的是，他曾三四次投身那种工作，结果留下三部小说的令人痛心的痕迹，即每一部都没有写过第十二页。

应该承认——他本人也是这样承认的——泉水已经枯竭。但是，如果山姆·斯帕德想变得机灵些的话，那么帕科·科尔特斯已是一个傲慢的人，没有向任何人讲过他为什么那样抑郁：他觉得自己彻底完蛋了，他确实是这样。

一天下午，马格利特来参加聚谈会，他带来了并不能给人些许安慰的消息。

“帕科的岳父，”他通报说，“想除掉他。他委托我，如果在这里见到帕科，给他带个口信。我跟他说了，已经六个月

了，没有人见到过他。他不相信。他认为我们在保护帕科，把他奉若神明，嘴里还不停地说，他是个不要脸的东西，是寄生虫，是流氓无赖，都两个月了没给他女儿送生活费。我要……”

ACP聚谈会的调解团重新开始工作，做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尝试。

第四次去的人员有梅生和布朗神父，尼录没有去，他们看到客厅的变化着实惊了一下。靠一面墙顶天立地摆放的那八个书架已经空空如也。这是败落和拮据的最明显见证。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的美不胜收的藏书，包括他花费那样多心血完成的侦探小说，写作时使用的辅助书籍，导游图，地图，词典，隐语字典，等等——毫无疑问，在西班牙那里是有关犯罪问题藏书最完整的地方之一——已经走上了不归路，送到旧书店了。

布朗神父和梅生不知多少次在旧书店买到自己喜爱的书，但对他们来说，帕科那样做，心中很是不快，情况严重到了怎样的程度呀。如果说帕科·科尔特斯的泉水已经枯竭，那么他们那些年从中汲水解渴的水井也突然干涸了。

“我的上帝，帕科！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布朗神父张开双臂向空荡无物的书架跑去，假如某个缝隙或角落还留下或藏着几本书的话，他要竭力阻拦它们逃离那里。

“贝尼格诺，不必着急。你想阅读某部小说时，我来给你讲述。所有小说都在这儿。”帕科·科尔特斯变得讥讽了，他用食指那样用力地敲击脑袋，梅生和布朗神父意味深长

地对视了一下:他们的朋友几乎疯了。

他们注视着他的眼睛。帕科·科尔特斯那双长音符号般眼眉下的眼睛睁得那样大,都要从眼眶跑出来了。他已经开始脱发,脑袋上剥下的头发,长长的,硬硬的,蓬乱不堪。

他们了解自己的朋友,他对那些书已不仅仅是爱,而是视为偶像,他下决心卖掉,具体地向他们表明了他忍受的拮据严重到何种地步。

“你应该到商业咖啡馆转转,也好散散心呀。”布朗神父亲切地劝导他。

“不去,贝尼格诺,对于我来说,那一切都结束了。我已经品味不到逻辑。生活没有一点逻辑,没有一点数学的严谨性。你们问问小猫波依罗特。”

小猫本来躲藏在他的怀里,突然跳下去,像他的藏书那样一下子从他眼前消失了。

“可是,书呢?”在那次朋友的聚会上,逻辑学最高行使者问。

“莫得斯托,书已经成为另一种东西。书,如果是些好书的话,它们确实有逻辑。我要重新买回来,我要重新写出来。”

科尔特斯沉思了一会儿,补充说:

“我重新写的时候,要把它们买回来。”

“这是我一直担心的,”布朗神父一边看着梅生一边说。那是开玩笑的语气,对重症病人常常用这种语气说话,告诉他们不要怀疑自己已病入膏肓。“没有一个罪犯不推究哲

理。我还要补充一句，一个侦探小说家更是如此。你如果允许我提一提真正的斯帕德的话，我要说，无赖越是变得无耻，他知道的废话就越多。或者这样说：你怜悯自己之前，去参加你自己的葬礼吧。如同上帝，生活无处不在，帕科。”

“贝尼格诺，感谢你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并且想得如此周到。但是，最好还是把上帝搁置在一边。你知道我对你奉为偶像的布朗神父是怎样想的：他知道的东西，其实在事情之前就知道了，因为切斯特顿总是咬着耳朵给他吹风，但是这里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也没有任何人不告诉我们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当然啰，对于你们这些神父侦探来说，一切都是游戏，甚至拯救也是游戏。可是，我担心的是，一切并不是那么好玩的：在这儿谁都不能得到拯救。”

贝尼格诺是个有耐心的神父，他没有理会那句亵渎神明的话，只是微微笑了笑。

“我真心实意地感谢你们，洛伦索，莫得斯托，贝尼格诺。”

帕科甚至都没有用代号称呼他的朋友。

在离开那里之前，梅生把出发前马格利特交给的他岳父的口信转述给他。帕科用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两个朋友，什么也没有说。他请他们喝一杯，不知道愿意不愿意。不，他们不想喝。帕科想找一只干净杯子，没有找到，只好拿起一只里面还残留着喝过威士忌之后剩下冰水的杯子，把一瓶伏特加最后一点酒倒进去。

朋友们看着他把那点肮脏的混合饮料喝进肚子里，没

有说一句话。

布朗神父觉得应该教训教训他，但是科尔特斯的一丝苦笑把他的想法挡了回去。

那两个人带着莫大的凄凉感离开帕科·科尔特斯的家。布朗神父是不相信存在奇迹的，但他坚信有那么一种奇迹，能让他的朋友有反应，从而把他从坠入的深渊中拉出来。

他们两手空空地回到聚谈会，心情十分沉重。他们把情况告诉给其他人。聚谈会死气沉沉。米拉格露丝——也就是麦丽丝，她一直参加聚谈会——的出现给聚谈会蒙上一层哀痛的阴影，或者说，至少预示将要蒙上这样的阴影：好像这位寡妇每时每刻都记起那个聚谈会的灵魂已经不再参加聚会，越来越自由地在太空飞翔。

麦丽丝去看望他，并把他带到自己家里；那是一处豪华的房舍，很宽敞，老女仆很敬重女主人，她和山姆·斯帕德一块儿住了一个星期，但那也没有效果。

“你不要埋怨我，麦丽丝。可能是饮酒造成的。我没有资格作你的情人。”

“我并不看重那些。”那个女人对他说，“留下来，和我住在一起。”

帕科更喜欢他的那个埃斯帕尔蒂尼亚斯大街的小窝。

ACP 聚谈会成员反复呼喊的口号已经变成了“应该做点什么”。翻译过来，就是“我们救救斯帕德吧”。

帕科或斯帕德是自己救自己，或者说任何别人都不能帮助他。

科尔特斯本人正是这样做的。结束堕落生活。他得出

这样的结论: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从少年走到老年。他决定去看看自己的父亲。

科尔特斯不对任何人讲自己家人。实际上,他这个人也从不讲自己。也许由于这一点他那样年轻轻的就成了小说家。当小说家,不必对任何人讲任何东西。他宁愿让书中的一些人物、一些玩具娃娃,也就是他不幸生活的木偶替他讲话。就是对多拉,他也不经常讲自己。

帕科的父母住在拉加斯加大街与帕迪利亚大街交叉街角处的一套公寓里。自女儿出生后,他就不经常同父亲见面。他曾带女儿去过,让父母看看小孙女,但是后来帕科·科尔特斯事后对多拉——她拒绝陪同他做那次一再推迟的拜访——谈到那事:如果说他们作为父母缺乏骨肉之情,作为公公婆婆、岳父岳母未免有些凶狠、盛气凌人的话,那么作为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好不到哪儿去。

会面是在一个星期天进行的,大家一起进餐,在场的还有他姐姐妹妹中的三个人,以及他的姐夫妹夫。

帕科对那个家的气氛没有好的印象,因为他对此太了解了,而且他二十岁时为了专心致志写作侦探小说才逃离那种气氛的: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生意,金钱,谎言,处处是家长式的专制或专制的家长主义。

姐姐妹妹见到他时,第一反应是饶有兴味地注视着他,好像看见一头刚刚送到动物园的野兽,如果走近去,不知道是否咬人或仅仅蹦一下,做个小动作。

因为这种情景出现在帕科·科尔特斯面前恰恰在他接触家庭气氛那一刻:恰如盐接触碱发生反应变成另外一种

物质。他不知为什么在同父母、姐姐姐夫、妹妹妹夫呆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是那样痛苦,一分一秒地数着,为什么表现得或不表现得像个不可救药的无耻之徒,说出那种蠢话,而在别的地方如果重复一遍的话,他都会羞得面红耳赤;由此,这样的相见,对他来说是一个莫大侮辱,但对此他要负更大的责任。

对他来说,幸运的是那个星期日家庭午餐气氛十分沉闷,从开始到结束可以不张嘴巴回答姐夫妹夫的挑衅,他们是想看见他像往常那样大吵大闹、丑态百出。

他等所有人离开,只剩下他与父母独处时,有一场科尔特斯几乎没有准备的谈话。

不是向父母借钱。借钱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了。是他父亲一直等着的事,那一刻他摆出胜利者的姿态,要对科尔特斯说,他等了二十年的事,终于变成了现实。

“你不再写侦探小说了?”他父亲一边问一边皱了下眉头。

科尔特斯先生看了科尔特斯夫人一眼,但是两位老人没有一个敢补充点什么。他们也许等待透露另一种性质的事。帕科等了几秒钟。他在等“儿子,你需要点什么”,“你还好吧?”或者简简单单的一句“你现在去做什么?”他的每个朋友都问这样的话呀,他如果是在等着这些话,而另一方远不能这样做时,也得忍受着。科尔特斯这位伟大律师和夫人没有降低身价说点什么,这也许为了不刺伤那个人,那个人对他们有时提出的看法总是嗤之以鼻。

帕科看到谁也不讲话,便站起身来,和父亲握手告别,

想以此缩短父亲的动作，因为他已经走近了，太危险了，要拥抱他，谁知道是不是也要吻他一下，他吻了母亲一下，走出不幸的大门，两三个小时之前他就是从那儿走进父亲的家的。

多拉住得不远，九月的下午仍然很热，他散步一样地行走着。星期天的午餐把萨拉曼卡街区的街道麻醉到那种程度，把它的影子拉得细长，甚至为了适应影子，街道本身都变得狭窄了。

马德里还没有失去天竺葵和针茅的残余气味，这使帕科·科尔特斯心中生出一种难以言状的焦虑感，从而感到嗓子发干，需要用点烈性的东西浇灌一下。

帕科向多拉家走去。六个月了，不知道她的情况。甚至都不知道多拉与她的记者未婚夫已经断绝来往。薇奥莱塔呢？在那六个月的时间里，他曾多次想到她，但他没有力气去看她。人的心就是这样奇怪。他没有一天不想到她，然而却没有力气穿过大街，去吻她一下。他走到电话亭旁。他想应该先打个电话，但他也知道，如果走进电话亭，与多拉交谈，那将见不到她。他从电话亭旁走过去，犹如从酒吧前走过一样，尽管他嗓子要喝点什么消除针茅样的干渴，他也染上了这样的干渴。

他一边行走一边自言自语，如果楼门关着，他就向左转。六个月了，没有去看前妻，也没有打电话，第一次谈话该说些什么呢。在他走到楼门口时，有人出来，而且认出他，便拉着门不关，让他进去。

帕科·科尔特斯后悔按了门铃，但按了门铃后没有动

静、没有声音，这给了他一线希望：她们可能不在。他后悔来到那里。他从少年时代起还没有过那样的星期天家庭聚会：父母、姐姐妹妹、姐夫妹夫、前妻、女儿……

当多拉打开房门时，帕科已经开始沿着楼梯往下走。这样，她一眼看见他的脑袋正渐渐埋在阴影里。他吃惊了。她发现他老了。

科尔特斯向她转过身去。

他发现妻子也有很大变化。

很庆幸，帕科·科尔特斯那时只是说了那样一句话，是这句话给他打开那套房子的大门，只有这样的话才能给他打开房门。

“我从我父母那儿来。”

多拉立刻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她刚才惊讶地看见他来到自己面前，此刻接踵而来的可能是一场不幸。

“出了什么事，他们好吗？”

公公婆婆给她的印象是一样的。但是，人死了，谁都会表现出怜悯之情，哪怕只是一闪而过。

“没什么。”帕科回答说。

多拉很紧张、很惶恐。她为自己辩白说，那时没有听见门铃声。她在睡午觉。女儿还睡在沙发上呢。帕科站在她身边，看着她，看了好一阵子，不敢讲话。

于是，多拉问道：

“进来呆会儿吗？”

谁也无法理解女人。这正是他放弃侦探小说创作的一个原因。无论在小说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他都不理解女

人。多拉在请他进到家里。出了什么事?

他们走进家门,互相没有说一句话。女儿还睡在沙发上,他跪在她身边。他也很想女儿。这孩子长得很快。

“叫醒她吧。”孩子的妈妈说,“叫醒她吧,已经睡了一个小时了。”

他蹲在女儿身边,拉起她的手。好像托莱多的杏仁糖。他把女儿的手拉到嘴边,轻轻擦了下。他注视着女儿睡觉,一直持续了十分钟。多拉坐在他身边,背朝向他,不说话。小女孩终于醒了过来,仿佛预感到了什么。她看着父亲,像在梦中那样笑了笑,用双臂搂住他的脖子。

“爸爸?”

帕科对孩子的问话一时答不上来。过了一会儿才说:

“我出差了,但现在回来了。”

“真的回来了?”

这后一句问话,是多拉说的。

帕科凄惨地笑了笑,但没敢回过头去看多拉。多拉想象着他是怎样发笑的,因为她很了解他。

这时,帕科才知道那个记者已经不住在那里。如果是别的什么时候,这个消息会让他心花怒放的,但此时此刻他无动于衷。

过了一会儿,多拉端来两杯咖啡,在那个盘子里还放了孩子的午后点心。

“到底出了什么事?”

帕科也许因为前妻以那种方式接待她,或者因为孩子的幻影,或因为过去了六个月神经已疲惫不堪,而感到吃

惊，觉得嗓子那里有颗豆粒，既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情况和与埃斯贝哈发生争吵那天下午一样。那天下午他不再是小说家了。

“我不知道，多拉。我的生活太可怕了，让人生厌。我本不该抱怨，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父亲如果知道你在这儿，一定大发雷霆。这两个月一直说，如果见到你，非给你一枪不可。你已经成了他的眼中钉。我把这事讲给了妈妈。我说已经六个月没见到你了，我求她不要告诉爸爸。但是，她不善于保密。我母亲的状况不能再坏了。每天都吵两三次。我真可怜我妈妈。只要我对她说去看看医生，我父亲就开始打她。她说不去看，说从来没有那样的事，说他从来不关心她的身体状况。我对妈妈说离开他算了。她说她哪有地方去呀，就是离开他，他也会把她杀掉。我对妈妈说过不下一百次，过来和我、小外孙女一块儿生活吧。但是她说，她的归宿是与丈夫在一起。一切都是那样可怕。你的生活可能是可怕的，但那是你自己选择的。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是谁为我选择的呢？好了，请不要在我面前对你的生活说一个字。帕科，我不想变成我母亲，不想像她那样，我不要再受罪了，因为我曾经爱过一次的男人想把我变成一个不幸的女人。你知道吗？生活让人厌了，你们这些人让我对生活厌了。如果说我们还不够多的话，现在又把我父亲塞进二月二十三日名单中，开除出警察机构，不发给他工资。也许情况更为糟糕，把他投进监狱里。而你过了六个月到这儿来，说有问题、对生活厌了？”

帕科感到羞愧，他不敢说请她原谅。

多拉在她熟悉的所有帕科·科尔特斯中，最喜欢那一个，没有面具，没有在她面前时时摆出的傲慢自负态度，没有自以为比所有人都聪明的欢愉，说能把数学公式运用到自己的小说中，并能使小说像方程式那样百分之百准确，没有公鸡的态度，就是说像公鸡那样在鸡栏里走来走去，勾引每一个女人。但她面前的帕科·科尔特斯已不是那个男人，即被几个朋友说他是天才而虚荣心大作的男人。也不是打了败仗或被战胜的人，而是重又赤裸裸地来到她身边的人，有心，没有逻辑，没有那些从别人侦探小说学来、塞进他自己写的侦探小说里的廉价语言。但是，她同时也感到惊异。她发现他身体十分不好，很瘦弱，可能生了病，头发掉了不少，剩下的头发已经明显变白。

“帕科，你知道，你会走出这困境的。你有条件走出去，不仅仅是走出去。”

“谁知道。我很遗憾这几个月没有给你带钱来。这是前几个月的和下两个月的。”

他把卖书得到的钱掏出来，放在床头柜上；钱是装在信封里的。

“帕科，我从来没有向你要钱。我所要的永远是另外的东西。可以给我吗？那时，我爱你并不是为我自己，我不愿意你在家中感到焦虑。可是，我也不愿意你因为我的过错而失败，因为，像你一次对我说的那样，一直生活在一堵高墙前面而斥责我。我希望得到那东西，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你。”

“你还爱我吗?”

小女儿坐在一把高椅上,双腿耷拉着,面前摆着牛奶和鸡肉,那是午后小吃。

帕科以那种方式、在那种情况下提出的问题,使多拉怒火中烧,深深地刺伤了她的心。

“你有什么权利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以为过了六个月到这儿来,能提出一个肯定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不知道。”多拉说着露出一副沮丧、讥讽的表情。

她很激动,把咖啡杯子端到嘴边,尽管杯子是空的。

“我们在几年之内不要相见,不要会面,我父母是这样,你父母也是这样。我不希望孩子像我们看他们那样看我们。如果那样的话,生活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她都将是无法忍受的。我曾多次希望你回到这个家。你最近那次来这里时,我哭了一整夜,我自责让你离开。但那时我不知道对你说些什么,因为我不是那种会讲话的女人。我不会讲像你讲的那样好听的话。我甚至都不喜欢侦探小说,因为那一切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自从我对你说离开这个家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惟一东西。我不能对你讲出别的事。在我们开始生活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那没有什么’使我气恼到了极点,你强迫我去做我根本没有兴趣的事。但我欺骗自己,勉强做了。我那时还像个小姑娘,没有任何经验。我后来交了男人,那是因为你在那之前已交了别的女人。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是因为你已经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但我并不喜欢他们。我只喜欢你,只指出一点,你在这里要像以前看我那样看我。你用双手

托着我的脸，仿佛不让我的目光转移到其他任何地方，而你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你对我说，多拉，你的眼睛像一口深井，我不知疲倦地从中喝到解除干渴的水。而我陶醉了。我希望那一切再现。但是，你晚上还是回来的，起初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直到后来我开始发现，你虽然和我在一起，但已离这个家很远了，因为你对我总讲些古怪的东西，你小说里的东西。我无法忍受你叫我洋娃娃，对我说小不点，过来，喂，做个好姑娘。我恨你像汉弗莱·博加特叫劳伦·巴考那样叫我小瘦子。我恨你小说中的所有女人，更恨我们分居以后你描写的女人。你像称呼我那样称呼她们。我不是你看见的那种女人，但是，特别要说的，我从来没有想成为这样的女人。我不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我不是劳伦·巴考，我只是多拉，我希望同你过正常生活，没有疯癫，没有狂想，一种完全现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出了什么事。你为什么变化这么大。我知道为什么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勾搭，但我不理解你做那事时还像以前讲井水那样对我讲话，说没有像爱我那样爱任何女人。我问你，对你说，你和那些女人在一起起码也感到一点幸福吧？你说不幸福，不幸福。于是，我明白了，你将把她们变成不幸的女人，也将使我们，使我和孩子成为不幸的人。”

帕科·科尔特斯听着前妻讲话，眼睛望着地毯上几根松了的线。

“我觉得你的主要问题，”多拉继续说道，“是你至今还不知道你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不知道想得到什么，是这把你渐渐地毁了。你看看 ACP 聚谈会那些可怜的人。他们每

个人的生活是和你一样的。你们是同一类战败者中的一部分人。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惟一的安慰是在小说里看见某某死了或某某杀了人。那些人之中每个人都想占有被害者的位子或占有刽子手的位子。有些人生来就是牺牲品，另一些人生下来就是刽子手。莫得斯托是牺牲者。玛尔普莱小姐是刽子手。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活着、生活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做到这一点。莫得斯托很可能因为父亲强迫他学习他厌烦的专业而杀了他，每次必须在法官面前讲述犯罪事实时他都很难过。贝娅对我讲过这事不下一百次。玛尔普莱小姐之所以要杀丈夫，肯定因为他多次对她不忠，如果不这样做，她会感到更为孤独。马尔洛维肯定做好了准备，打父亲几棍子，把店里值钱的东西偷走，让保险公司赔偿。他最后一定会干出那种事来。马格利特，好可怜的男人呀。怎样的生活在等着他？我父亲该怎样生活？我生活在一块云里，你说多么乌黑就有多么乌黑，但那是一块云。你看看阿古多。他同子女有那么一大堆问题，都不让他活下去了，他恨自己是医生，他是个厌恶女人的医生，对女人无法忍受下去，他之所以当妇科医生是因为他父亲也是妇科医生，所以只能在黑色小说里找到一点安慰。堂贝尼格诺，你说说，他哪一点像神父。应该脱下长袍，去找个女人。你不知道，他每次见到我时用怎样的目光注视我，好像要脱光我的衣服。还有可怜的莫得斯托。真是一个倒霉鬼。你知道，我喜欢他。我们分居时，我的律师对我说过：和他打交道，我们可以得到想得到的一切。他宁可让你杀死，他尽管很愿意，你却得不到他的帮助，因为

他不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他也不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他们敬重你，但你实际上知道他们当中谁都不可能为你做一点事。你刚刚不是说六个月没在商业咖啡馆露面了？我第一次看见你如此沉沦，第一次看见你需要一个人真正帮你一把，而又没有向其求救的人。这儿，你来到这儿，最应该向你关闭大门的地方。去你父母家，在他们那里不知道什么是最严重的，是不是让你难过，是不是让你厌恶或者让你发笑。你们这些同侦探小说那种东西组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集团。我是一个警察的女儿，又不得不和侦探小说的疯子结婚。你不知道，我多少次埋怨自己，那天下午不该去警察所找我父亲。你如果不去那里，我不去那里，我现在的生活将是不一样的……”

“我的呢？”帕科·科尔特斯悲伤地说，他是那样悲伤，犹如一个看见将他送到陆地的船断裂开的人。

“你和我不一样，你的生活仍然是那样的。你认识我的时候，你没有任何改变。你写小说，并且继续写小说。你在认识我之前，每个星期四都同你的 ACP 聚谈会的成员去商业咖啡馆，后来你继续那样做，没有缺席过一次。你在结婚之前，清晨五点钟就寝，十二点钟起床，后来你仍然是那个样子。如果孩子是星期四出生的话，我分娩时你都不会在场。你认识我之前，每天晚上都外出。后来仍然继续那样。你在认识我之前拥有的小说，后来仍然背着我阅读，直到被我发现为止。对，是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以为你会对把我变成不幸女人的那一切说永别了，但是过了四年，我仍然停留在以前的地方，有了一个女儿，那个父亲还是那样可

怕,母亲情绪不稳定,很不幸,以酒浇愁,B 系列的丈夫,口头上总说爱我,但继续做伤害我的事。当我结识了拉蒙以后,有那么几个月我以为情况会真的改变的。他不同,每天晚上都和我留在家里,没有别的女人,他爱我。但是,到七个月头上,我发现我永远不能把你从我生活中抹去。我一直思念你;全身骨关节都松了,双腿颤抖,不知道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每次来给我送每月的生活费时,我都是这种情况。我每每吻他时,都要小心翼翼,不让你的名字从我唇间跑出来,我一切都要小心行事。他忍受不下去了,不得不丢下我,和我丢下你的原因是一样的。”

说到这里,多拉开始哭起来,但是滴滴眼泪流出来,并不是作戏,不是要求什么,不是埋怨什么,不是辩解什么,那眼泪只不过是一棵树溢出的浆液,这棵树过去曾被一把锋利的斧子砍伤过。

“不,帕科。我一直希望你回到我身边,并且对我说点什么。不是我爱不爱你,而是不是继续爱你。你应该问问你自己,你是否曾经爱过我,这些年来,你和我,和孩子,和其他女人,是否知道了一点爱情,除了你的那些可怜的小说和你的那些荒诞不经的 ACP 聚谈会成员之外,你是否还能爱点别的什么,是否能爱一个人。”

“我都六个月没见任何人了,甚至没见 ACP 聚谈会的成员。”帕科开始为自己辩白,他不知怎样继续说下去。这时,他脑海中闪过了在他的小说里也常常发生的事。对话开始之后,他本人要在故事情节中为自己找到位置。但是他不想让那一切因为不知道文学应该走多远,生活应该从

何处开始，而再次遭到破坏。

“可是，尽管听起来令人悲伤，”她继续说道，“我是想改变自己的，但我不知道怎样改变。我知道我不想那样，但我不知道把自己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在这段日子里，我对我发生的事想得很多，女人的事呀，晚上出去不归呀，还有其他种种事。当你离得男人那些坏毛病很近的时候，那一切最终要影响你的，这就如同一块污迹。人们为卑鄙的利益而谋划可怕的罪行。一些人是因为嫉妒，另一些人是为了金钱，还有一些人是为了报仇。而最终当你离开那一切时，你只想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你觉得将可以呼吸到你同一些女人，另外一些女人在一起时所缺少的空气，同朋友一杯杯喝酒时所缺少的空气。可是当一个人自己损伤自己时，他并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不是为了金钱，不是因为嫉妒，不是为了报仇。一言以蔽之，他本人并不知道那些。而那给他造成更多的损伤。

“是这样，帕科，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罪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企图捉到罪犯的警察。那不是游戏，不是让图书馆老处女、乘火车旅行的人，或夜里失眠的人用来消遣的游戏。还有更多的东西。那时你如果把你的工作从你的生活中分离开来，对我的影响就不会大。可你把一切都混在一起。你以为侦探是那样的人，最终有个晚上同美女上床，事后各走各的路。我对你说过，你去找她们吧，去找一个女人，但是要让我同真实生活在一起，而你总对我这样说，那是一夜情，没什么了不起的。于是我对你说，很重要，因为你把这个晚上给了一个女人，把另一个晚上给了

另外一个女人，把晚上的时间给了那么多女人，加在一起便成了一个个生活的整个天地，而我的生活已经没了灯光，因为你把我生活的灯光熄灭了，但我现在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无论你还是别人，谁都无权把这生活变成一堆冰冷的骨灰。”

“多拉，别哭，我求求你了，你把我的心都撕碎了。”

“帕科，你很久以前就撕碎了我的心，所以我的泪水止不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流出来。你多少次看见我流泪？我以前从不哭泣。我离开我家时没有一滴眼泪。而现在整天在哭泣。我的心好像破碎的罐子。你那时是想让我在家里等着你，等你想像力枯竭时回来，去安慰那个在生活中为小说寻找素材的心毒手狠的侦探。你回来是这样对我说的：你是小说家，而小说家并不是一般人，小说家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恰如 007 警察随心所欲杀人一样。”

“咳，多拉，我可从来没有说过那话呀。”帕科苦涩地反驳说。

“也许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但实际行动却是那样的。你认为，要在生活中去寻找小说。我不太懂得那东西，但更应该说事情恰恰相反，是生活寻找小说，生活会找到小说的。如果不是这样，你还是放弃那东西吧，因为你最终将同所有认为自己是拿破仑的人一起进疯人院。只有你最后认为自己是山姆·斯帕德，伟大的山姆·斯帕德。在你和脑袋里装着诡计的拿破仑之间有什么区别？”

“多拉，对我来说，小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事已经结束了的?”

“那么说,你不知道呀。我认为我们的事永远结束了,但现在我们两个人在这里,谈论过去的事,因为事情还没有过去,不知多少次了,好像开始一样。”

“我要对你说,我不再写小说了。除我之外,谁都不相信这事。对于我来说,那是终点。我已经结束了。我要过有血有肉那种人的生活。马迪松们,贝特·奥康纳尔们结束了,死了,山姆·斯帕德死了,所有的聚谈会也死了。我爱你,爱女儿。再没有完美的罪行了。你也许从第一天看不见一个新的男人,但一定会看见一个不同的男人,他要从自己的骨灰中苏醒过来……”

“但那绝不是我的骨灰。”多拉打断他的话。

“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小说已是不大可能的事了。”帕科最后说。

多拉心存怀疑地笑了笑。这一笑,使她重现光彩夺目的风韵。她是一个高个儿女人,比帕科还高一些。她常常以一种怀旧的心情说,那时我想成为舞蹈演员,可我这么高,谁能用双臂托起我呀? 她每每想起这事时都发笑。后来想得越来越少了。已经变成了遥远的往事。她父亲断然拒绝她去上舞蹈课,她只好忍气吞声地去一家办事处工作,那时她刚刚认识帕科,放弃了经济专业的学习。而那堂路易斯也是从不原谅她的,只是为了一个作家那类游手好闲的人就中断学业!

“由于我的过错你放弃了学习,还责备我吗?”

“我没有为这事责备你,永远不会为这事责备你。你知

道我不喜欢经济专业。开始工作,我也没有半点犹豫。部分原因,是为了你。我对你说过,你如果想干点别的,即使我们两个人靠我的工资维持生活,我也没有任何抱怨。但你认为那对你脸上无光。”

帕科·科尔特斯用一种模糊表情否认,但不是那么坚决。

“你现在还那样说吗?”

“我现在只想让孩子生活在那样的家里,即不像我生活过的地狱一样的家里,只想她终生不拖着你我身上的那种看起来永远不可愈合的伤口。这是我现在惟一可以对你说的。其余的对我无所谓。”

那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他们一直谈到天明。

玫瑰色的晨曦赶走了阳台玻璃窗的黑影,多拉抚摩着帕科的手:

“自我们恋爱那天开始,还没有这样长谈过。”

帕科把自己的手指插在那只手手指中间,是那只手重新给了他遗忘多时、富有亲情的触感。长谈之后,他们在三个重要问题达成协议:佛朗西斯科·科尔特斯和阿多拉西翁·阿尔瓦雷斯[①] 重新共同生活,在不得不讲之前,对于此事不对堂路易斯提一个字,帕科·科尔特斯找个工作。什么样的工作?随便一种工作,哪怕是繁杂的校对呢。

---

① 阿多拉西翁的昵称是多拉。前后各省去一个音节。

ACP 聚谈会的成员们全部行动起来，为他们的朋友科尔特斯找工作。

他们欢庆科尔特斯的回归，如同亨利第四[①] 回到乞丐王宫一样。

当科尔特斯出现在商业咖啡馆时，在场的人一片骚动。所有人都盼望着聚谈会有个光辉的未来。咖啡馆服务生托马斯和阿布恩迪奥告诉科尔特斯，今天下午他喝的第一杯饮料由咖啡馆支付费用。大家那样热情地欢迎他，犹如欢

① 意大利作家皮兰德娄（1867—1936）的同名剧作中的主人公。

迎一个逃脱死神魔爪的探险家。但是谁也不敢向他问起他发生了什么事，害怕刺到他的敏感问题或者重新剥开愈合不佳的伤口。重要的是，山姆·斯帕德已经回来了。

“山姆，你想象不出，没有你这里是多么死气沉沉。”麦丽丝说，这个女人是从不说话的。

帕科·科尔特斯到那儿是为了告别的，不敢把实情告诉她。斯帕德已经死了，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个消息。

麦丽丝入神地注视着他，她可能猜到了点什么，因为她还没呆到半小时便站起身，离开那里，身后留下轻型香烟和迪奥公司梦幻香水味。

歇洛克像在最美好场合那样装满烟斗，准备开始他有生以来最漫长、最幸福的行程。

马格利特也是欢庆他朋友回归的最积极的成员之一。那天下午他还从路纳大街警察所带来一个引起轰动的消息，这个消息与他的长官有关。

“有个法官已经受理一桩犯罪控诉，指控你岳父犯有虐待和折磨罪。他摆脱了政变的速审，但看来这另外一桩案子很快提到日程上了。我从心底感到高兴。他是个畜生。”

“什么虐待呀？”

马格利特压低声音，仿佛他的答话与他有特殊关系，他说堂路易斯后面可能还有三个警察，他们参与了对巴尔科大街那个不幸男人的审讯。

好像没有人记得有那么个案子。

马格利特列举几个细节，包括有人在弹子锁上吊的事。

“马格利特，我和你去过那儿。”波埃说。

“我记得。”马格利特证实说。

“是他杀?”

“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大家都认为是他杀。”

波埃差一点说出他当时是惟一不认为是他杀的人,但他把话咽了下去,保持沉默。

“合乎逻辑。”梅生插嘴说。他了解案情的全部细节。

“逻辑?”马格利特回答说,他引用切斯特顿的话,“一个结论可能合乎逻辑,但并不因此就是真正的结论。”

在场的人并不都记得细节,他们开始一件件列数出来。

“我开个头儿吧。”马格利特继续说道,“老人的侄子不在犯罪现场,但他无法证明四点至七点之间在什么地方,而验尸结果说明老人是在那段时间里死的。”

科尔特斯默默地听着,不想介入,但是警察的习惯或病毒深深地植根于他的身上,从而使他开口讲话:

“这是警察的典型案例:犯罪现场没有人,我们有犯罪嫌疑人。警察局的人还是应该多读几本小说。”

“可是他最后供认是他作的案,或者说他没有否认,这是一样的。这不是足够了吗?”

“不对。”科尔特斯说。“他以前谈过什么?”

“他首先说自己在车间里,但是他的助手说他撒谎。互相矛盾的地方是那样多,大家都认为,如果拷打他的话,他会供认的。老人侄子的妻子证实她丈夫和伯父互相不讲话,但问题是死者在遗嘱中把一切都留给了他侄子,而且东西特别多,他住的房子,镇子上有两处不大的田产,等等。对他的车间进行了搜查,发现一大堆债务。他坚持了很长

时间,说自己是无辜的。直到挺不住了。后来,我们得知那天下午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他同这个女人有两年关系了,给她买了一套房子,每个月都给她一些钱。最大的嘲弄是,那个女人对他很不好,这些日子跟这几个男人,那些日子跟那几个男人勾搭在一起。他已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到钱给她。他想向伯父借一点,尽管他与伯父的关系不好。他已经借了一两次了。那位女邻说得对。那天下午他去过那里,想再借点钱,没想到伯父已经死了。最后,他绝望了,宁愿承认杀了伯父,也不对妻子和子女讲出借钱的事。”

“可是,那小子那么蠢呀。”马尔洛维跳起来。

“为什么?”科尔特斯说。“制定法律是为了惩罚罪犯而不是惩罚蠢蛋。我不认为他那么蠢。他这个人只是生活上遇到了麻烦。”

“可是,那么,怎么又发现了秘密?”马尔洛维问马格利特。

“好戏就在这里面。两个星期前,有一封信送到法官手里,这个法官那些日子刚刚在法院和佩斯大街之间奔忙过,信封上只写寄给卡斯蒂利亚广场法院。法院有人看到信不是寄给某个人的,便决定退回去,而那位信差可能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知道那套公寓里出了事,信又是由死者寄出、寄给法院的,便亲自把信送到卡斯蒂利亚广场法院,交给一位法官。法院顿时乱成一片。信封里有封信和身份证复印件,这事未免很荒唐,既然想自杀,那个奇怪的男人这样做想干什么呀?总之,我继续讲下去。他在信中说,面对国会发生的事,他要上吊自杀。他不想再看见那些事,不想忍受

内战不得不忍受，特别是战后不得不忍受的痛苦。看得出他这封信是在精神极度焦虑时写的，他预感到西班牙将又一次面临血流成河了。他已经看得够多的了，在天下大乱之前他要先走一步。不要把罪责加在任何人身上，他特别请侄子原谅，因为他的死肯定会给他带来伤脑筋的事。对此他没有把握。信尾他签了字，日期是同一天。老人很沉着、镇定，写信，复印证件，装进信封里，贴好邮票，找邮筒，塞进去，回家，以那种方式上吊自杀。他是怎样上的吊？这是一个谜。可以说这是一个疯子和一个白痴的故事。那位法官首先做的是，询问老人的侄子在什么地方，把他从监狱提了出来，和他谈了话，并把作证的人都叫了来，那个蠢蛋讲述了事情的真相，指控警察所长和警察逼迫他在证词上签字，法官看到这些，同时又昏头昏脑的，便认为有理由对他提起公诉。”

“这个故事怪有趣的。”梅生惊奇地说。

“你，你为什么知道不是他杀？”马格利特问波埃。

“是小伙子那么猜测吧？”科尔特斯问。

“只他一个人说不是他杀。”

科尔特斯的疑问从每一个人的目光里也能反映出来：他怎能猜得出来？

“我不知道。”波埃回答说。

他说完又紧张起来。大家都在等他继续讲下去。他没有习惯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

“首先，”他开始说道，“因为一切井井有条，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暴力的痕迹。我无法想象那一切，但是在客厅里，

除了别的东西我发现书架上摆着二百本全是关于内战的书,没有别的种类的书。其余的东西,从直观上讲,有些让人迷惑不解。”

“法官呢?”

“法官相信警察讲的,但是被控有罪的那个人在供词上后退了,说是在受刑之后承认的。是这样,看来他是个蠢蛋,不然谁没杀人,能供认杀人呢?”

“事情是一样的。人们就是没犯罪却说自己有罪,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在《罪与罚》中就是这种情况,作为惩罚小说,可以把它看做一部杰作,而作为犯罪小说,应该是败笔,我是这样认为的。小说里也有一个蠢蛋,承认自己杀了两个老太婆。”

所有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因为 ACP 聚谈会成员从警察观点分析,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部作品很一般。

“洛伦,你应该承认,这小伙子说得对。”科尔特斯说,“警察都以同样的观点解释这个案件:死者是疯子,假罪犯是蠢蛋,惟有警察是聪明的。”

“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那个案子远不是桩完美的罪行。”阿古多大夫在说《罪与罚》那部小说,他喜欢时不时地用颇有才学的演说显示一下自己,“杀人凶手不可能自己到警察局长那儿,对他说:喂,我对我犯的罪不能再忍受下去了,请把我从罪行中解脱出来吧。同时警察局也不能说:孩子,把你的罪行坦白出来,你在心灵上就会感到轻松。另外,有那么一刻,一个智力低下的人供认杀了那个老太婆姐俩。在一部小说里,要让事实讲话,而不是小说家、或罪犯、或侦探

讲话。我认为,侦探必须缄默不语。不管那位警察所长讲多少话或死者侄子讲多少话,事实是那里没有一点儿暴力痕迹,法医除了绳子之外在死者身上也没有找到别的暴力痕迹。所以不应该被蒙骗。那些都是证据。警察又一次被蒙骗了。”

科尔特斯插嘴说:

“你还要记住那一点:‘证据永远是一把双刃剑。’证据可以宣布死者侄子无罪,也可以宣布他有罪。对于一个罪犯来说,最好的手段是,不要把无法隐藏的全部隐藏起来,在这桩案子里,死者侄子无法隐藏的就是现场物品的秩序,不能很好保持原来的秩序,弄乱之后又重新布置了一番。”

波埃一直注意听他讲话,这时陷入了沉思。马格利特使了个眼色。他时不时地承受着对警察在各地犯的错误的批评。帕科觉得眼前的这个案子没什么兴味。

“可能是这样,”波埃终于说,“但是,在《罪与罚》中警长波尔费利·彼得罗维奇也说过,一百只兔子永远变不成一匹马,一百个疑点永远变不成一个证据或物证。”

“这孩子说得太好了。”玛尔普莱小姐一边像女学生似的拍手一边感叹地说。

科尔特斯本人也不慌不忙地为那个小伙子鼓掌,仿佛一位老师承认输给学生一盘棋似的。

玛尔普莱小姐既欢庆罪行也欢庆为揪出罪犯而进行的调查,她是那样兴奋,好像在那桩案子中看到了一点真正值得庆贺的东西。在案件没有解开之前,她无条件地站在狡猾的罪犯一边;一旦开始摧毁罪犯设置的障碍或排除他为

阻拦破案而谋划的层层疑团，玛尔普莱便毫不掩饰地从调查员或警察那边溜走了。报纸上无论讲什么说什么，她都能从中找到乐趣，如同那些贪吃的人一样，把市场上选购鱼肉、烹调制作或大口吃下当做快事。她是一个五十五岁的女人，臀部又宽又厚，头发染成银灰色，眼睛明亮、碧蓝，是聚谈会的一个特殊人物，因为从相貌上看她很像王后维克多利娅·埃乌赫尼亚① 本人，参加聚谈会时全身珠光宝气，光彩照人。之所以给她取这个名字，当然啰，并不是因为她十分机敏，而是从阿加莎·克里斯蒂那里学来的，总是哀叹美好年代，在那些年代里，小说中的人物投资开采缅甸矿产、美国石油、土耳其磷矿或罗得西亚钻石。她觉得现代犯罪世界不是那么复杂。她常常这样说，非要去市郊杀人，那不是怪癖吗？她的司机总在屋外等候，但是一旦坐进屋里，就表现得像 ACP 聚谈会的又一位同志，特别是她用手举着烟斗、掏钱支付分摊费用时更是喜滋滋的；她挎着名牌手包，用指头把硬币一枚枚搜出来。帕科·科尔特斯有好几个女人向其提供商务或娱乐电话簿，以及她们经常去旅行的欧美城市地图，她是其中最持之以恒的一个，她总陪同丈夫旅行，以尽可能多地阻拦其背叛和冒险行为。玛尔普莱小姐同她那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人一样，也是世人皆知的吝啬鬼，她把那些厚厚的电话簿像金羊毛② 一样送给帕科·科尔特斯，但帕科·科尔特斯很清楚是她从宾馆偷拿或

---

① 维克多利娅·埃乌赫尼亚(1887—1969)，1906 年与西班牙国王阿尔丰索十三世结婚，成为王后。

② 意为珍贵、不易获得的东西。古希腊神话对其有描述。

免费获取的，并且他总是热情庆贺，仿佛他的四分之三的小说已经解决。当然啰，玛尔普莱也这样认为。

说话间，聚谈会结束了。

帕科·科尔特斯刚刚离开，惟一能够谈论那些问题的布朗神父问玛尔普莱小姐：

“您丈夫能不能给山姆找个工作呀？”

玛尔普莱小姐是那样一个女人，每当向她提出令她不舒服的问题，她便开始发出丝丝笑声，想把谈话引到气氛更为愉快，如同吹着和风、伴着夜莺歌声的领域。

“假如他懂得一点钟表的话，我父亲可以招聘他。我们需要一个工匠……”

“马尔洛维，你别胡说八道。你怎么想让山姆懂得钟表呢？”马格利特气鼓鼓地说，哪能拿巴尔科大街的那个可怜男人的事嘲弄他呢。

“我那样说是好心。”马尔洛维辩解说。“侦探公司的事继续不下去了？”

“从哪儿弄来钱呀？”梅生问道。

在帕科·科尔特斯的所有朋友中，梅生对帕科·科尔特斯的隐居最感到痛苦。在那段时间里，他偷偷地、背着自己的妻子借给他一些钱；尽管帕科·科尔特斯向他保证把钱数记得清清楚楚，但律师认为那钱是一去不复返了，不过最为重要的是钱用在了正当地方。

在 ACP 聚谈会所有成员中，梅生不仅仅是侦探小说的最积极读者，而且由于反复阅读他朋友的小说，对它们的每个细小情节都了如指掌。他全部小说的最后一部是《州长

的肮脏交易》一摆在书亭里，梅生便如饥似渴地扑上去，他认为是一部杰作。他已经连续读了两遍。他没有把这些看法告诉他，奉承他。下班之后，读一本时尚小说，他认为是件愉快的事，他个人藏书根本无法同他朋友卖给旧书商的藏书相比。有那么一刻，这件事，对，是这样，很令梅生不快，他认为小说家不应该卖掉自己的藏书，那是野蛮行为。

“那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决定。帕科，我完全可以买下来。”

“对，我知道，可是我欠你的钱，不能卖给你，而我等钱用，要给多拉生活费。”

“可是，你连自己的小说都卖了呀，谁也不能那样做呀。你是一个野人。”

梅生也是斯帕德向其讲述与多拉和解的第一个人。

“我为你感到高兴。你想做什么呢？”

“和埃斯贝哈打官司。”

“帕科，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可能性不太大。不过，你如果坚决打的话，我永远陪在你身边。”

那以后的几个月里，帕科一直忙着这件重要事情。由于无法与老埃斯贝哈协商解决，便对其提出诉讼。指控他舞弊，反复欺骗，不守信用，欺诈，对法律明知故犯，用法律谴责的合同欺骗别人。帕科从老埃斯贝哈手里讨回一大半作品的版权，好像改变了命运。波埃的女老师、并正式成为波埃未婚妻的亨娜·奥尔森向科尔特斯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但过了好久他才接受下来，那样的事他以前从未做过，没有把握胜任。

帕科·科尔特斯重新回归市民生活——他是这样称呼自己的生活的——没有几个星期，便和 ACP 聚谈会年轻成员打得火热。

亨娜和波埃已经成为他最亲近朋友中的两个了。他们每个星期五见面，多拉在场，马尔洛维也常常陪他们。这个钟表商儿子不时说些粗俗话，让大家开心解闷。他很关心科尔特斯的命运，常常即兴为他提出最为美好的职位和工作。

“我听说巴塞罗那一家公司正在马德里寻找假珠宝代理商。是荷兰最佳假珠宝。很容易卖。帕科，这对你合适。”

“马尔洛维，我都不知道荷兰假珠宝业最发达。”帕科说。

别的日子，波埃和马尔洛维有时单独会面。钟表商的儿子把他的朋友拉到他家地下射击长廊，设法让他爱上射击学，这是他的原话。

“你干脆买支手枪吧。”马尔洛维劝他朋友说，“马格利特给咱们办理持枪证明。”

“不行，”波埃说，“我觉得亨娜不喜欢家里有把枪。她是素食主义者。”

那是帕科·科尔特斯和多拉同波埃、亨娜经常会面的另一个原因。波埃和亨娜已经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稳定下来，甚至那位女老师都鼓励波埃别再在马德里的旅馆和客栈中间搬来搬去地受罪，还是搬出来和她住在一起。

“我们可以各付一半房租。”

年轻姑娘用这个理由说服了波埃，波埃用白色帆布包好简单的行装，拖到东方广场的那间阁楼上。

对所有人来说，那是一段格外幸福的日子。那时正值秋季，天气还有些炎热，大片大片五光十色的晚霞映照在城市上空。那些日子里，波埃和亨娜有时同朋友们共度周末，把不大的公寓变成了寝舱。

帕科·科尔特斯还在找工作，心中很不安宁，但他和多拉开始重度恋爱期间的那些美好时光，每天都是那样愉快幸福，烹调美味佳肴。他们甚至嘲笑那种幸福了。

“你应该敲木驱邪。”科尔特斯提醒说。

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证实了那位小说家的老谋深算，它打破了他们两个人的十分和谐气氛，使他们感到不快和痛心，对多拉来说更是如此。

多拉曾请求帕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要把他们重归于好透露给她父母。她不想对父母解释那事，再说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正常状况应该永远是秘密的，或者说得确切些，是严加保密的。对于小女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她太幼小了，你就是言谈举止不慎，她也学不会重述重演。所以每当电话响时，都是多拉去接，星期天在父母家的聚餐，她像往常一样也去参加，但她只带着女儿。

但是，一个星期天出现了新情况，从而把事情搅乱了。那天，堂路易斯在家惊喜地等着，两台二十八英寸最新款式的彩电，是非正常没收品，两台一模一样，一台留给他们夫妇，另一台给女儿。

显而易见，除非有人帮忙，她一个人不可能搬得动那么

大的东西。堂路易斯说当天给她送到家，他下午在警察所值班，午饭后，顺路把电视机送去。多拉临时编了些借口，但没有一个能使那位警察放弃他的决定。她越来越焦虑，他来了，一定与帕科迎面碰在一起。

他来时正好看见帕科·科尔特斯靠在扶手椅里，没有穿鞋，手里拿本小说打瞌睡，面对一台旧黑白电视机，波依罗特趴在旁边；小猫看见生人进来，立刻跑进另一个房间躲起来。

堂路易斯一惊，差一点松手扔下那个战利品，沿着那场噩梦的崎岖、陡峭的深渊滚下去。他的脸顿时失去血色。他都不想问问科尔特斯那是怎么回事；他根本不想和后者讲话。

“那个白痴在我家干什么呢？”

他那是提醒他的女儿，那套房子是他付的款，直到那时还在他的名下。

帕科把双脚放在茶几上休息，那时甚至都没有把脚撤下来。为了多拉，帕科本应该那样做或做个相似的动作，但他没有做，因为他睡着了，肯定觉得自己处在噩梦中，那是噩梦的一部分，只是以那种方式看了堂路易斯一眼，后者认为那是傲慢无礼。

“别用那样不恭的目光看我，马上从这个家滚出去。”

“那是我们之间的事，”多拉插嘴说，但警察几乎没听见她的话。

他是个酒鬼，现在脸涨得更加通红，脖子和太阳穴的青筋嘣嘣直跳，都可以听到那声音了。

帕科注视着他，一句话不说，把双脚搭在一起。他的眼睛里，除了慌乱和惊愕之外，很难看出别的神情。帕科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又不打招呼，堂路易斯只能这样解释，那是有意所为，或者这样说，最大可能是有意挑衅，因此都没有想第二遍，便向他的女婿扑去，伸出拳头，劈头盖脑地打，对他那样年龄的人来说，可以说全然一副拳击手的攻击架势，最后他用双膝顶住帕科的胸部和喉咙。

帕科·科尔特斯的眼镜，由于遭到猛烈的侧击，一下子飞了出去，撞在墙壁上，然后垂直掉在地板上，一只腿儿折断。

那位小说家从攻击者的双膝下挣脱出来，一跳站立起来。他用手擦了下鼻子，放在眼前一看，斑斑血迹一下子使他怒火万丈，立刻向那个还处在酒兴中、身体坚实的老人扑去，狠狠的一记耳光让他瘫坐在扶手椅里。

“你干什么？”多拉一边对丈夫喊道，一边从后背抱住他。

那个警察害怕女婿扑在身上，便用双臂抱着脑袋，惊恐地、一声接一声地喘着粗气。

听到吵嚷声，有几个邻居探身到楼梯平台。多拉不知道如何是好，一边跑去把打开的房门关好一边频频回头望着父亲。

她父亲站起来，甩了甩胳臂，挺起胸，正了正领带，把衬衣塞到裤子里，拉了拉外衣，又往后甩了下，让人看清楚他是带着枪的，那副架势表明他仍然是原来的那个人。

“……我再对你说一遍，”他重复说道，“你立刻离开这

个家，不然，我要给你两枪。”

那两颗神奇的子弹本来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西班牙，恐怖主义，犯罪，他的家庭。

多拉终于反应过来，尽管父亲使她感到那样恐怖，她还是使尽全身力气，面对面地站在他面前。

“我住在这里，我决定和谁住在一起。一切都结束了。快出去！”

堂路易斯装作没听见的样子，目光一直不离开帕科。

帕科仍然四处寻找眼镜，没有找到，便把背朝向岳父。这种漠然态度更加激怒了他。小女儿目睹了那种场面，吓得不敢说话，此刻她走近父亲，用手碰了碰他的膝盖，把从房间另一端拾到的眼镜递过去。

“你别再把脚踏进这房子，知道吗？永远别到这儿来。”

这是多拉对父亲下的命令，她伸出胳臂，指着房门，让他快快出去。

堂路易斯又正了正领带，指头不停地抖动着。

“你会记起我的。”

那句威胁的话犹如一张脏纸扔在地上。接着，那个警察拉开房门，在那之前狠狠地踢了一脚电视机纸箱，那电视机纸箱放在过道里，绊了他一下。

那个男人走后，屋子里寂静得可怕。多拉坐在椅子上，神经紧张得难以用语言描述。女儿跑过去，趴在她的怀里。帕科·科尔特斯寻找那只折断的眼镜腿，找到后，试着接好，仿佛那时他只关心那件事，而不去想别的什么。

他向多拉靠过去。她像一头受了致命伤的野兽。她甚

至不敢对丈夫说出心里话，她的痛苦之泉并不存在于刚刚过去的那个场面，而是存在于更远的地方，一口深邃得无底的矿井。但是，她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也永远不会对任何人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这些秘密，既是神圣的又是剧毒的。她已不是因为羞怯，而是因为恐惧而死去，面对自己良心的眼睛已无法泰然处之。面对那样真真切切的现实，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她知道得十分清楚，她不知暗自重复过多少次。还是生活在谎言、忘却、欺骗之中吧，而只有胆小鬼才能有时幸存下来。因此，多拉尽量把那当做从未发生过的事，但却又不时地从她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犹如火山爆发，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灼痛感，好像吐出磨蚀的土块。承认发生过那事，她生活中的许许多多事都会改变的。不过，那事确实发生了。那天发生了，任何东西都无法把那事从世界最肮脏、最野蛮的罪行史中抹去。也许对她父亲来说并没有发生过。那天，他喝得过于醉了，多年之后也不承认真的发生过那事，但多拉知道得很清楚，他不可能忘记。她母亲同她姐姐留在曼萨那雷斯别墅里。她同父亲返回马德里，因为要考试。那已是夏季。自他走进自己房间，五分钟之后从里面走出来，她对每一秒发生的事都能一一讲述出来。当那一切结束后，他好像只关心一件事。他刚刚强奸了她，但对她十分不满，一副轻蔑表情，说：

“你不是处女。”

他觉得那场以秘密对秘密的交易足以使他心安理得、若无其事。对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要守口如瓶，我呢，对你的处女一事一句话都不说。看样子，他对这种对等交易似

乎是可接受的。也许他认为她应该被强奸，那是对她失去处女纯贞的惩罚。果然，从那以后从未发生过任何类似的事，也没有谈及那事。而是恰恰相反。第二天早晨，他起床时情绪非常好，那时他女儿正在晾晒床单和睡衣，她感到恶心和不安，当天晚上就洗了出来。不少细节至今还在搅动着她的五脏六腑，令她恶心，那只让人产生呕吐感的避孕套——可以用来指控他做那事是有预谋的——，他自己拿走扔掉，犹如罪犯从犯罪现场除掉证明其有罪的物证，那天早晨表现出的好情绪，还有出门上班时想对她吻别——他每天习惯这样做……

“帕科，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他。我几年前就应该这样做了。你要像往常一样，走进这个家门，抚摩我的女儿。”

过了一个小时，妈妈打来电话，不停地哭泣，从声音可以听出她惊魂未定，最后又是哀叹又是呻吟，使那场悲剧达到高潮，恰如舞台悲剧合唱之前常常做的那样，而且又一次站在她父亲一边（“孩子，你怎能让帕科动手打你父亲呢？”这是她的原话。）

多拉不再去看望父亲，星期天的家庭聚餐也彻底、永远地中断了。多拉的母亲有时背着堂路易斯，隔三差五找个下午时间来看外孙女。

其他事情则步入了解决的轨道。亨娜看到已经进入十月，而帕科还没有拿定主意对她的建议作出回答，她又在催促他。

“帕科，快定下来吧。现在我们的新学年都开始了，急需一位老师。”

帕科·科尔特斯从来没有想到最后竟然到学校工作，对一些奇异的学生教授西班牙语，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和加拿大人；这所新学校是为了淡化格兰维亚学校校长与亨娜之间的关系而部分从中分离出来，在过去几个街区的圣马太大街的一层宽敞、但破旧的楼房里创办的。

他有从教的经验，而这能使他渐渐地，最后永远地忘掉小说。他已经不需要别人的小说，对他自己写的小说也没有了怀旧之情。

“你应该把你自己的小说保存起来呀。”多拉对他说，“孩子长大了，肯定想有她爸爸的小说呀。”

“可我是个硬汉子。”帕科开玩笑说，同时做出山姆·斯帕德面对命运的最大挫折所能做出的同样表情。

自从与多拉第二次恋爱——帕科本人是这样说——后，他就成了一个新人。所以，两三个月后同米拉格露丝，即麦丽丝发生那样的事，外界的理解是错误的。

不过，那事在这部小说里发展得太快了。而亨娜同波埃的恋爱关系却是渐渐变冷的，最后演变成一种礼仪关系，不时出现的龃龉，也是很危险、伤人的，常常刺痛两个人的心。

因为那套房子里只有一张床，所以两个人仍然睡在一起，但在亨娜的要求下，立下那样一个条款，对签字双方之一大有好处，而对另一方的权利则有损害：只要在那套房子之外，当然啰，也就是在那张床之外找到睡觉的地方，每一方都可以自由地保持自己愿意保持的关系，如果有这种机会，且认为合适的话。

波埃忍受着这样的条款，他对这些强加的东西不知道反其道而行之。

开始时，他以为世界上每对男女之间的事情，无论怎样都必然那样发展。他从中学习世界范围的言谈举止的电影，常常描写这方面的内容，比如他们第一次约会共进晚餐他给亨娜买了瓶葡萄酒的细节。这样，他不得不接受关于同居的新规定，因为不那样他或许重新在马德里旅馆、客店之间跑来跑去，过着孤寂的生活。

波埃最终在大学注了册，他们几乎没有时间见面。

上午他把时间都用在银行里的工作上；下午，有时上课，有时参加 ACP 聚谈会，聚谈会又像以前那样正常举行了。帕科也去参加，多拉甚至认为那没有什么不好，尽管她知道麦丽丝也会在聚谈会上出现。

对于波埃和亨娜来说，同居使他们两人的性格、两人的真正天性接近了，相像了：他们都是喜欢安静的人，不爱讲话，爱读书，爱听音乐，爱默默地呆着。再说，他们没有很多事情要互相讲的，这样倒还能相处下去。在某种程度上，两个人觉得那样还很好，对各自的私生活的事互相问得不太多，这就是亨娜暗示的那种自由关系，周末在一起，生活和平时一样。如果天气好，坐在平台上欣赏马德里黄昏的美如舞台的幕景，或者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或做甜食，那是亨娜的一种嗜好。

一天，亨娜问道：

“波埃，我如果去另外一个地方，你还和我在一起吗？”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你我在一起睡得越来越

少,完全可以同我们各自喜欢的人睡在一起,而你很会做饭,你提出的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建议。你对西班牙已经厌了?我们去丹麦吗?”

“不是。我只是问问而已。”

亨娜有点走神,表情悲伤。

“我在那儿干什么?当木匠?”

“对,是有点难。”亨娜说,接着又把眼睛埋在正在阅读的书本里。

那个星期,她见到了前夫彼得·克隆贝格。他在马德里。给她打了电话,于是两个人见了面。他是路过。他向她保证说,他已经不吸毒,在一家德国公司工作,在巴塞罗那呆了五天。他来马德里是为了看她:公司把他派到马德里。

亨娜不知道怎样对波埃说,她见到了前夫,而且前夫要住到马德里来。他们从来不谈她的前夫,不谈丹麦,不谈与她过去有关的任何事。波埃也不谈。在他们之间没有亲人,没有未来的计划,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甚至两个人都不谈论互相之间的感觉。他们住在一起,各支付一半房租。星期六和星期日,不是睡大觉便是从阳台望着外面的典雅世界。王宫的影子总是让他们重新看到,他们的生活比实际上要和谐得多。他们有时做爱。波埃不知道做得好还是不好,因为他没有用来比较的条件。亨娜则知道他们做得不是太好,但也不因此就认为不好。她这个女人对这类事情表现得相当冷漠。人们看见她如此漂亮,谁都不怀疑那一点。他们两个人——头几次的动情

拥抱，对初恋情人来说未免有些节制——看来不需要性的刺激，但彼得的来访，对亨娜来说则是一次内心世界的破坏性地震。

她开始与他秘密见面。波埃过于年轻，脑袋里根本没有生出怀疑那根弦，对亨娜五个星期的冒险行动毫无察觉。

亨娜有时夜里不归，最后每个周末也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埃只是这样自问，亨娜提出那个建议，说每个人都有自由同别人来往，她这样说是不是因为见到了她的前夫，或者是纯属巧合。

亨娜对于这类感情上的事颇有经验，又自作主张地提出一个新条款，事前根本没有谈及这个条款。

“我们说过，每个人有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之间就是一种自由关系。我们没有说过，如果一方不愿意，还必须向另一方讲出自己的事。我认识了一个人，我同你住在一起，这与那个人也无关。”

这对波埃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他们共同度过的第一夜已成为遥远的往事，已经完全蒸发，在他们中间破壳发芽的魔力，那个奇迹为他们生出的略显不足的兴味也都不翼而飞。亲昵抚摩，热情拥抱，寻找共同快感的好奇心好像凋谢了；为了找到共同的快感、惬意，他们曾双双走向那张矮床，或来到平台前欣赏五彩缤纷、变化万千的黄昏景色。

波埃思索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他开始观察一些在女友身上发生的怪事。有时，星期一她也不回家，这是很少有的事；但更为少有的事是，她在学校也不露面了。

这样,有一天,ACP 聚谈会结束后,波埃通知亨娜说:

“我一直在想,打算搬到别的地方去。”

亨娜用悲伤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但没有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她没有理由那样做,只是靠近他的身体,温情地抚摩他的头发。

科尔特斯甚至猜到了事情的缘由。

“亨娜和你之间发生了点什么。”

“你真是个好侦探,科尔特斯。”波埃讥讽地说,在 ACP 聚谈会成员中他是惟一认真看待前小说家决定的人,对他称呼真名实姓,而不是山姆或斯帕德。

斯帕德给波埃讲了一些情况,并向他证实了令人不安的细节。

“是这样,她有时不来上课,她的英语课由我代她上。但这样一来,同学之间和同事之间的气氛很不好。”

与帕科谈过话的那个晚上,波埃找到一个机会,那时还没有关灯,他和亨娜像许多晚上一样躺在床上看书。

那个年轻姑娘一下子迸发出怒火。波埃从来没有看见她那个样子。亨娜要求尊重她的私生活。

那时已进入五月,很快就进行年终考试了,重新开始以前那种游荡生活不是什么大问题,于是他提前提出搬家的决定。

“我一旦考完试,就另外找套房子。”

亨娜大概也心存疑虑,波埃是不是知道了她与毒品重又有了关系才决定离开东方广场的小阁楼的。

不管怎么说,亨娜表示同意,也许波埃本人是为她而做

出那样的决定，由此心中感到轻松了许多。但是亨娜表现出的冷漠无情倒使他心痛如绞；而他的冷酷又使她有一种灼痛而苦涩的感觉。他能做什么呢？她能做什么呢？他们两个人还能做什么呢？

波埃向马尔洛维讲述了正在发生的事，马尔洛维是他在马德里的最好朋友，也许是惟一的真正朋友。

波埃同他处得很好，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同龄人，而且也因为他的性格、爱好等与他完全不一样。马尔洛维最后表示保护波埃，仿佛那是他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坚信在马德里如果没有一个好向导将寸步难行，而他在这方面是个知识广博的专家，是个知心朋友。马尔洛维看见波埃要找个洞穴，便发现了个好机会，同他一起找套房子，也搬过去，把“二老”丢在一边。

“你家里同意吗？”波埃问他。

“我家老太婆同意，老头子不同意，他什么也不喜欢，只喜欢事事同我作对。不过，在我家里，老太婆做主，老头子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忍气吞声。”

马尔洛维从根本上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这幸福，对他来说就是：关心女人、武器和侦探小说，其余东西则在这个宇宙——其局部是无序的、混乱的——周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旋转。女人是那样远离他，犹如土星远离太阳那样；对武器，有时爱得发狂，有时冷漠如冰；他只是在侦探小说里能够找到伴侣和快乐，他说他对生活的了解都是从那些小说里获取的，对女人应该说哪些东西呀，在她们面前怎样表现自己呀，手枪的道德观呀，都取之于侦探小说。

那个天才想法——我们应该这样评价——,即搞个完美罪行的想法,就是他提出来的。

他当着 ACP 聚谈会其他成员的面,在一张白纸的上方写下“一桩完美罪行”。

在 ACP 聚谈会成员举行聚会的全部时间里,在现实中,当然是在现实中,从未碰到一起可以称为样板的罪行。最多的是没有侦破的案件,它们距离所追求的完美性十分遥远,而完美性能把恐怖、凶残行为变成当然不是令人欣赏的、但起码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东西。

他是五月的一个星期四提出这一点的。他的想法在聚谈会上引起了巨大骚乱。

“一桩完美罪行;我说的是完美。”他言简意赅地总结说。

布朗神父表示完全不同意。

“武器是魔鬼把子弹推进枪膛的。”他说。“正直的人应该做的事,是为罪犯想一想,他如果身陷邪恶之中的话,甚至在他犯罪之前就要把他拉到善良这边来。我们绝不能为了显示自己的身手而把他推到邪恶那边后,再同他演示一场挽救行动。没有比乐善好施更美好、更正确的了,没有比以高尚的方式和自然的形式生活更为困难的了。”

“贝尼格诺,你总是把这些东西想得那样坏。”帕科·科尔特斯说。“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马尔洛维,你想到了什么?”

“想到崇高的东西。像威廉斯案件那样的东西。”

他说的是爱尔兰海员的案件,有的人认为是苏格兰海

员,他作了七桩凶杀案,在伦敦郊外海员区把两户人家统统杀光。ACP聚谈会的全体成员对那桩普通案子再熟悉不过了,德·昆西用了几页平庸文字对它进行了描述,虽然内容没有任何值得夸耀之处,但他有幸取了个好题目:《杀人,一种美丽的艺术》,P.D. 詹姆斯① 写了续篇,题目是《第八个牺牲品》,是侦探小说的精湛之作,那里可能有美丽的艺术。

“能引起众人注意的东西,”马尔洛维继续说道,“但是,实际上那是波埃的想法。”

波埃不喜欢抛头露面,只轻轻地点了下头,乐于把那想法归到自己名下。

“只是一个想法而已,不过,我不能把威廉斯案件称为完美的罪行,”他说。“我只能把它称为那样的东西,即有一八一一年伦敦码头那样好的现场,原则上讲是一桩凭空想象出来的案件,对任何人都不会带来益处,兜售它的欣赏性,被害人手无寸铁,不予以反抗,缺乏作案条件,作案迅速,后果惊天动地。应该知道,那不是完美罪行,只不过是桩普普通通的案件。”

歇洛克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喜欢评判,这时也以那种口气说:

“完美就是古典意义上的完美。”

“可能是那样。”热爱逻辑学的梅生反驳说,“可是,古典的东西已经不时兴了。现在讲的是现代的。一八一一年作

---

① P.D. 詹姆斯(1920—),英国作家。

那样一桩古典式普通案子或谋划这样的案子是极为简单的事。在今天,那种杀人案件,警察一旦取证了指纹,不出一刻钟就能破获。”

“我完全同意。”马格利特证实说,他把梅生的看法视为对全体警察,特别是对他的鉴别室的尊重。“只要把罪犯衣服上的血化验一下,就能知道是否与被杀人的血一致。今天,什么地方都能做这种化验,花上三百比塞塔,一刻钟就出来了。如果发生这种案件,绝不会有完美罪行,也没有经典之作。完美和古典主义已经一笔从地图上抹掉了。当对指纹一无所知就去作案,那是初始罪犯的鲁莽之举。现在,把一台机器拿到犯罪现场,分析一下空气就知道某人去没去过那儿。”

“没有那种事!”容易轻信的玛尔普莱小姐叫起来。

“只是那么一说而已,小姐。”布朗神父在一边说,他不喜欢拿善良人的天真开玩笑。

“无论如何,”波埃说,“今天没有侦破案件的数量,肯定同二百年前一样多。如果是完美的罪行,先进的科学仪器也没有多大用处。在这方面,如同艺术一样:我们已经登上了月球,但谁也不能像贝拉斯盖斯那样画得惟妙惟肖,如果说杀人犯今天不比德·昆西时代多的话,那起码是同样多的,而且遍布各地,因为现在有更多人爱好这方面的事,为什么爱好呢,肯定有更多的理由。人们有一种绝望感,而二百年前的人却没有,如果杀的人多,说明再无法忍受下去了。”

“我得说一句,波埃。”布朗神父说。“你不能用那种方

式为杀人犯开脱。”

“神父先生，我没有做任何开脱呀。”波埃为自己辩护说。“我们大家对完美罪行有一种理解，我也想弄清楚呀。”

“一桩罪行的完美，直接同缺少发现杀人凶手的手段联系起来，我不能称那是完美。”马尔洛维补充说，他好像与波埃的看法一致。“更应该说，那是粗制滥造的东西。我是说为一九八二年的警察选一桩一九八二年的完美罪行，为一九八二年的 ACP 聚谈会成员选一桩不落旧套的凶案。”

“太好了！”玛尔普莱小姐感叹地说，她认为那个计划很开心、很刺激。

“哲学家说过，”科尔特斯缓缓地说，“‘文学里的凶残是杰作的标记。’”

“哪位哲学家呀？”不知谁问了一句。

“山姆·斯帕德。”科尔特斯说。“因为我们是在讲文学中的罪行，对不对，波埃？”

“这还用问，斯帕德。”布朗神父说，他不喜欢别人拿神圣的东西做戏，也不喜欢拿不是神圣的东西做戏。

“好，”尼录说，那一刻他可以停下来，不再在记事簿上记录每个人的发言了。

“首先，”迈克突然说，“要好好选择一个作案地点。我在统计一九〇〇年至今发生在西班牙的案件作案地点。”

迈克·迪兰[①] 这个女人，你无法说出她的准确年龄，性别也是如此。因工作关系，她无法次次如愿地参加 ACP 聚

① 在第 66 页中为麦克·多兰，似原文有误。

谈会。说她四十岁也行，说六十岁也不过分。说她是女人也行，说是使馆男性专员也过得去。她衣着打扮像男人一样，也穿外套，打领带，甚至心血来潮穿件巴尔扎克式的绣花坎肩。她也抽烟斗，烟嘴又长又直，像乐队指挥棒一样地摆弄着；她留短发。她和一位记者结婚，这位记者完全可以在《浮士德》中充当魔鬼靡非斯特，他有时下午到商业咖啡馆来接迈克，像歌剧中女士的追求者。迈克讲话常常像侦探小说家那样，但这一点绝不能帮助别人听懂她的话。

“首先，”她皱着眉头说，那表情看上去很狡黠、很有小说情趣似的，“不能把被害人的住处当做作案地点，除非是府第或者具有某种特征的房舍。凶案绝不能发生在过道、厨房或卫生间。凶案名声极坏极臭，就是因为作案地点的名声也极坏极臭，被凌辱的特性就想甩掉它生存的地狱……”

ACP 聚谈会的成员对别人向来是尊重的，此刻他们完全可以模仿迈克——她这个绰号是从谢斯特·海密斯① 的令人难以忘却的人物海伦·奎恩那儿取来的——的讲话方式，但很注意做出那种举动来，因为她出的主意，剔除修辞学的缀饰后还是很好的。

“重新上演无声电影的电影院，”她建议说，“是个很好的作案地点；马戏团驯兽师的带篷大马车，也可以；银行保险柜；教堂忏悔室；火车站的候车室；船坞和仓库。前两年，在一座小麦仓库里发现福尔帕公司的一位工程师。人们找

① 谢斯特·海密斯(1909—1984)，美国作家。

了八个月，以为他出逃了，把仓库腾空以后发现了他，好像刚刚死去，如同埃及木乃伊一样完好；人们说麦粒起到了干燥剂作用，而且小麦本身的自然发酵消耗了氧气，所以他的尸体犹如保存在真空状态之中，这种环境最为适宜：尸体已完全干燥，像鞣制过一样。”

玛尔普莱小姐大做惊愕之状，这更加鼓励迈克对案情细节添油加醋。

对于如何制造一桩完美罪行，谁都没有一个清晰思路，特别是在谴责一切罪行的布朗神父面前和对一切罪行望而生畏的玛尔普莱小姐面前更是如此，但迈克仍然继续列数着完美罪行的理想作案地点，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每一个地点都在尼录·乌尔弗详细记录的记事簿上做了注明。

那是五六本大簿子，是专门为那项任务制作的。

由于开本那样大，又是那样重，我们才称它们为大簿子，长约为四十厘米，宽是二十厘米，二百多页，尼录·乌尔弗很少拿到 ACP 聚谈会上，除非他想展示某项精心致力于的特殊工作。另外一些时候，这几本大簿子放在商业咖啡馆里，由服务生托马斯，也就是重音落在后一个音节的托马斯保管。

有时因为懒惰，有时因为聚谈会没有兴味或因为缺乏新材料，从而没有什么可概述的，这个罪行统计簿的每页起始部位只记录着出席会议的成员名字。而另外一些页上则

记满了可怕的东西，杀人凶手的照片，葬礼照片，被害人照片，凶器照片以及相关报道。这些东西摆放在记事簿上，如同干净整齐公墓里的一座座真正的陵墓。今天，任何一个有名望的艺术家都可能为这一页页的东西花上一个金比索，将它们变成一座引人的现代艺术宫。

八月份之前一两个月的每次聚谈会几乎都用在了筹划一桩完美罪行上了。

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尼录·乌尔弗用自己特有的速记方式，把 ACP 聚谈会成员经过艰苦讨论后得出的结论记录在案：

“被害人，年轻，前途无量，善良家庭。这样更令人悲伤。男性，不能是女性。理由很明显：公众不喜欢被害人是女性。公众很喜欢完美罪行，公众以他们的想像力和寓言般的能力能造出完美的罪行。公众认为如果是女性，损失较少，十个男性读者要有八个认为部分过错是女性。社会也是这样，罪行发生在社会，但并不想改变社会。如果社会由于发生罪行而改变，那将是破天荒第一次。另一点也很重要：十个读者中，七个是女性，但十个侦探小说读者中，八个是男性，女性更喜欢女性写的侦探小说，更喜欢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P.D. 詹姆斯、帕特里露·赫金密斯，而不是柯南道尔、爱伦·坡或切斯特顿。这一切都是科学的，有统计数字。杀人凶手：电影中的那种坏蛋，凶残、毫无顾忌，比被害人年龄大。排除的动机：嫉妒或金钱……这些是百分之七十二罪行的动机。不是纯粹的动机：只是因为爱，只为了金钱。应该忽略以下动机：嫉妒、凌辱和阶级心理；金钱、仇

恨和自傲。非常无耻,非常丑恶,丑恶中的无耻,无耻中的丑恶。还有凌辱和堕落的感情和感情的堕落。完美罪行也是一样。作案地点:对被害人来说,绝不是惯常地点,不是他家,不是工作地点,不是他的汽车。但可以是游乐园的旋转车,朋友婚礼,餐馆出口或餐馆洗手间,也可以是公证员的前厅,日期只有被害人知道;也是好的作案地点:圣诞节子时弥撒。绝不能有对罪犯的拯救。罪犯非常凶恶,越凶越好。”

尼录像理事会秘书似的读完那些笔录以后,大家都认为非常合适,但布朗神父表示反对。

“很显然,让罪行发生在圣诞节子时弥撒上,我认为太过分了。我如果不阻止罪行发生在圣诞节前夜,不把它干干净净地送到上帝面前,人们就不知道我在 ACP 聚谈会上起什么作用……”

迈克眯缝着双眼,呼吸着咖啡馆里的浓重空气,仿佛那是罪行艺术的真正、令人陶醉的香精。

“必须稳准狠。”她一边说一边玩味着她的残暴性。

后来几个星期,每个人都为完美罪行提供点东西,但只有帕科·科尔特斯除外,他用宽容的态度关注着他们的准备工作。

“我作为小说家已经自娱自乐了几乎二十五年。现在该轮到你们了,轮到你们这些年轻人和业余爱好者。”

不过,大家要求他作为裁判,在众多情节、细节和不在现场犯罪的理由中选择哪一种更具有说服力、更具有艺术性、更具有逻辑性。

“被害人应该是个雷诺机械师。”有人举例说。“应该让艺术走近民众,应该用民众语言对民众讲话,给他们讲述他们熟悉的东西和环境。要具有范例性:让这个社会看到,那么多人在如此粗鄙的条件下工作,不产生暴力事件才怪呢。”

“从那儿到社会小说,只有一步之遥。”帕科想起了埃斯贝哈对他讲的话,纠正说。

ACP 聚谈会的成员们在这样的研究探索中,紧张而创造性地工作了两个月,尼录一直兢兢业业。

如果一位法官或警察手上在侦破一件实案,而又无法解释作那些笔录的缘由,很可能把掌握那些大簿子的人推入极大的困境中。

好像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日记虔诚地保存着与他变态有关的一切情况,并且井井有条,仿佛那是自我满足的祭坛,把低级的潜意识供奉给一个邪恶神明。

可是,尼录·乌尔弗和那样一个看上去没有任何病理知识的人完全相反。帕科·科尔特斯像习惯上做的那样给他取这个名字,看重的不是他具有侦探的细致工作作风——他确实如此,而且有过之而无不足(是一个天生的侦探)——,而是他的外表。他很像雷克斯·斯托特的侦探:体重一百三十公斤,在拉腊大街开家饭馆并以此为生,声名越来越大。他酷爱侦探小说和钓蟹,这完全符合他的哀伤性格: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小说,西班牙河流里也没有一只螃蟹。他是帕科最老的朋友。他们是在死去的埃斯贝哈出版科尔特斯第一部小说《夜是年轻的》

那天认识的。

那本书的封面堪称收藏家的极品，上面有个姑娘躺在地上，她倒下时裙子掀到上面，膝盖以上到大腿根部同松紧带完全暴露在外面。那时还处在书刊审查年代。姑娘身穿白色衣服，袒胸露背。艺术家动情地用透视法记录下了那一刻。她的两只脚，一只穿着尖头高跟鞋，另一只鞋则随便扔在身边。那只没穿鞋的脚五个趾甲都染成红色，但是由于印刷拼版问题，红色印迹没有完全覆盖在趾甲上，存在些许错位，从而看上去像似五只红色蟑螂在从趾尖往那儿啃咬。那时，在封面上署名为雷米·伯内特的帕科·科尔特斯甚至没有注意那个小小纰漏。而署名中的雷米取自贝特·切尼[①] 小说中的人物雷米·考森[②]，伯内特取自《小小救世主》的作者威廉·赖利·伯内特[③]，而爱德华·G. 鲁滨逊[④] 在银幕上惟妙惟肖地演绎了这部作品。雷米·伯内特——他这样说——恰巧走进拉腊大街那家餐馆，同他当时与之相恋的未婚妻庆贺《夜是年轻的》一书的出版。还没有上来第二道菜，他们就喝醉了。餐馆主人走过来问他们是否满意时，帕科·科尔特斯的未婚妻把放在水杯上的那本书拿给他看；他们把书放在水杯上，是为了让书时刻在眼皮底下，以免丢失。

---

① 贝特·切尼(1893—1951)，英国作家。

② 雷米·考森，法国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的《阿尔伐城，雷米·考森的奇异历险》中也有这个人物。

③ 威廉·赖利·伯内特(1899—1982)，美国作家。

④ 爱德华·G. 鲁滨逊(1893—1973)，美国电影演员。

"是这位写的。"

尼录·乌尔弗——他当时不叫这个绰号,而是真名实姓,即安东尼奥·索伯拉多——不相信,因为封面上署名作者并不能讲帕科·科尔特斯那样完美的西班牙语。他觉得那是酒后开玩笑。

帕科变得严肃起来,对他说:

"我们是喝多了,但这部小说是我写的,还有另外五部呢。"

"我不认识这位作者。"索伯拉多对他说。

"我不是刚刚对您说那个名字就是我,而且我是第一次用这个名字,您怎能听得耳熟呢?这是第六部小说。"

"我不相信。"

五分钟后,他们已经入迷地谈论起侦探小说了。

"你喜欢哪些小说?有名的?"科尔特斯问。

尼录·乌尔弗意识到他面前的这位真的是专家。

"什么样的是有名小说?"

"很遗憾,"刚刚发表作品的小说家自辩说。"我说的是经典作家,你知道马莱特①、麦科伊②、威廉·艾里什③ ……"

"我认为道尔、阿加莎、西默农是有名作家。"

"那几位是经典作家。"

"我同意你的看法。"安东尼奥·索伯拉多开始讲起来。"你的那些我喜欢麦科伊的《告别明天》和艾里什的《新娘—

---

① 马莱特(1909—1996),法国作家。

② 麦科伊(1897—1955),美国作家。

③ 威廉·艾里什(1903—1968),美国作家。

身黑装》;而我的那些我喜欢亚瑟[①] 爵士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回来了》,西默农的《整夜听见火车驶过的男人》和贵夫人[②] 的《罗杰·亚科洛德凶案》或者《十个小黑孩》,我不知道哪一部最好。”

他一口气谈出那么多书目,十分令人钦佩,他好像一个接受考试的学生,希望得到免费入学的资格。

帕科和未婚妻感到惊讶。

“不错。”小说家说。“可是,你熟悉加斯顿·勒鲁[③] 的《黄色房间的秘密》、多罗西·塞耶[④] 的《贝特勋爵》和《陌生人》、范·戴恩[⑤] 的《本森事件》、迪克森·卡尔[⑥] 的《电报员问题》,还有埃勒里·奎恩[⑦] 的《丝帽的奥秘》吗?你刚才讲的那些是优秀小说。而这些是大手笔,应该倍加赞赏的,是经典之作。它们是探案小说之最,如同劳斯莱斯是汽车之最、米开朗琪罗[⑧] 顶极之作西斯廷小教堂天顶画。我明天给你带来。”

科尔特斯和索伯拉多就这样开始成了朋友。科尔特斯把他介绍给他的律师,这是另一个纸上罪行爱好者。律师莫得斯托·奥尔特加对侦探小说的激情比索伯拉多更高,科

---

① 亚瑟,柯南道尔的名字。

② 贵夫人,指阿加莎·克里斯蒂。

③ 加斯顿·勒鲁(1888—1927),法国作家。

④ 多罗西·塞耶(1893—1957),英国女作家。

⑤ 范·戴恩(1888—1939),美国作家。

⑥ 迪克森·卡尔(1906—1977),美国作家。

⑦ 埃勒里·奎恩,是弗雷德累·达奈和曼弗里德·李二人写作的笔名。

⑧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

尔特斯早已把他拉进那个团伙里。

他们这样经常见面六个月后,创建了聚谈会,即完美罪行之友俱乐部,索伯拉多、奥尔特加、帕科·科尔特斯和帕科·科尔特斯的未婚妻米拉格露丝是创建核心,米拉格露丝很年轻,她与一个富人结婚不到一年便分居了,除此之外对她便没有更多了解了。

从第一刻起,对会计工作有丰富经验的索伯拉多自荐为 ACP 聚谈会开立几个账簿,记录收入和支出,同时为聚谈会举行会议时做记录。他不能出席会议时,别人替他记录讨论的内容,而这几年,ACP 的历史记录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文献:世界范围犯罪现象中的最突出案例,这些方方正正的剪报已经分类并且附以评注,整整齐齐地贴在那几册厚簿子上;聚谈会成员每人都要凑份子,用这些钱定期从法尔马西亚大街的一家小印刷厂购买这种簿子。

当调查路纳大街警察所所长堂路易斯·阿尔瓦雷斯被害案件时,那些厚簿是首先被查抄的,而且调查涉及到帕科·科尔特斯和 ACP 聚谈会的成员,看来调查之路比想象的要曲折得多。

那件凶案把所有人都牵连进去了,有的是几个小时,有的是几个星期,当然可以预测到,造成的后果是令人痛心的。马格利特本人也认为凶案是对他的威胁,可能葬送他在警察机构里的前程,因为调查结束后,不但使他与 ACP 聚谈会的关系,而且工作中的事,比如他自己设计的可以安安稳稳呆在他的实验室而不受任何人干扰的装置也暴露出来。

凶案的关键事实是：人们发现堂路易斯躺在他自己的汽车里，头部中了一颗子弹；汽车停在瓦耶加斯村附近的荒野里，瓦耶加斯过去叫富恩格拉拉村，现在叫埃拉斯村。

子弹直径为七点六五毫米，和堂路易斯本人手枪的直径相同，只是他的手枪是一把卡迪克斯牌左轮手枪，还放在枪套里，挂在身体右侧腰间；没有发现行凶手枪。

由于行凶子弹直径与恐怖组织埃塔暗杀使用的不一致，首先排除了埃塔作案的可能性，这也许是正确的，由此不得不将凶案归罪于当时还在流动的其他恐怖组织中的“格拉波”①，这个组织常常使用从警察那里偷来的手枪。虽然把罪责推到格拉波身上，但并不意味那就不是第三者作的案，因为在警察所里认定那个组织的成员比智力障碍者强不了多少，而埃塔成员则不一样，他们丧尽天良、有谋略，由此，很多人，甚至审慎的人，把他们列为精明之列。

第二天，这个消息便出现在所有报纸的第一版，并且作为电视日报的头条新闻播出：“格拉波重现马德里。警察所长被害。”

在路纳大街警察所为被害人举行追悼仪式，新设了小教堂，尸体上覆盖着西班牙国旗，追授警务功勋奖章，死者遗孀、多拉和琼的母亲堂娜阿松西翁·阿布利尔将享受相当于她丈夫百分之百工资的抚恤金。

阿尔瓦雷斯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出席了追悼会，真的，两个女儿不得不向这儿和那儿的女友借用服丧衣服，因为

---

① “格拉波”是“十月一日抵抗法西斯组织”的缩写。

她们身边没有，那时也不能跑商店寻购。

多拉的感情在那时是很复杂的。自从那个下午——父亲给她送去电视机、碰见帕科·科尔特斯的那个下午——，她就再没有见到父亲。从那时起，堂路易斯对女婿的威胁越演越烈，甚至到新学校去找他，并且在一间教室门口，当着学生的面搞了一个令人羞怯的场面：他发现帕科继续偷偷去看他先前的未婚妻米拉格露丝。

当然啰，帕科·科尔特斯向多拉做了保证，不再去看米拉格露丝。那么，他与多拉重归于好之后他第一次去她家干什么呢？帕科本来可以解释的：在麦丽丝家里还有他的一些东西，衣服呀，书呀，笔记本呀，他想取回来。麦丽丝对他说过，如果想要的话，你就来取吧。事情清清白白。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很不简单，他对发生的事讲不清楚，帕科本人也不理解，他既感到羞愧，又感到气愤。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麦丽丝已没有任何特殊感情，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已与多拉相爱，而那是不可饶恕的不忠。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他们还见过三次面，这样的重蹈覆辙使帕科陷入阴郁的思虑之中，因为他与她的关系只不过陪她喝几杯，既像清白无辜又如同谋犯那样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聊聊天，麦丽丝是在耐心地等待风向转变。堂路易斯在学校大吵大闹以及他的种种威胁起码使前小说家认真考虑一下事态，不再去看麦丽丝。如果说帕科很清楚多拉和她父亲再没有互相说过话，但他不能肯定，在他们和好的头两个月他去看过几次麦丽丝，他岳母对多拉不谈起这个话题。

帕科正在考虑这些事情时，来到了岳父遗体前。

多拉、警察所长的妻子，还有大姨子坐在他的身边。

警察所长死了多时，但他嘴边痛苦的皱折印刻着的怒容，还没有完全抹去，清晰可见。

那一整天都有陌生人前来，向母女三人表示哀悼和同情，并与她们一一拥抱。

帕科·科尔特斯有时站在后面，有时坐在多拉身边，强忍着守灵、祈祷、悼念亡灵，遵从殡葬的其他礼仪。正是他的朋友马格利特首先对他讲了一些与他直接有关的事。

遗体停放在大厅中央，周围摆满了万寿菊和黄菖蒲花环，空气中充满着又香又甜的气味。这时，他从大厅出来，想活动活动身子。

“那天有几个同事陪堂路易斯去学校，其中一个说，他去那里是朝你要那套房子，他要租出去，而你说如果不让你和多拉安宁，你就杀死他。”

“事实完全相反。房子是有那么回事，可我只对他说，把问题留给我们好了。”

“已经从那个角度开始调查了。要提审你。只是走走手续。没人相信格拉波作案。我估计，你不在犯罪现场。”

“当然不在现场。我在看电影。多拉可以证明。”

“她和你在一起？”

“不在一起。但她知道我去看电影。”

“帕科，听我说。你在这方面可不是初次呀。”

“可是，事情就是这样的。那天下午，我在学校没课，我一个人吃的饭。没有人看见我，我没和任何人在一起，谁也认不出我，看完电影，我一个人散步回到家中。”

“是哪家电影院?”

“在格兰维亚大街。”

“你从格兰维亚步行走到你家? 帕科,这可是严肃的事呀。连我都嗅得出你在撒谎。看电影两个小时,再用上个把小时。你说散步,完全是编造。”

帕科泰然自若。

“不管别人怎么看,但那是事实,我不会供认别的的。我如果想杀死我岳父,很久以前就把他杀死了。另外,是怎样的动机? 洛伦,你在这方面也不是初次呀。”

“你们把房子留给了自己。这就足够了。人们杀人,可以因为很小的事。你岳父是希望多拉在你和房子之间选择房子。”

“洛伦,疯子才那样呢。”

人们走进闷热的小教堂,都很惊异地看见那两个人热烈地争论着,从来不提高声音。

“喂,我为什么要杀我岳父? 因为他是一个坏人? 是在气头上? 为了省下租金? 在气头上,我不会跟他到瓦耶加斯,走到一处荒野,给他一枪,然后转身往回走。肯定有人看见我呀。你们问过那儿的人没有? 在那些城郊的破房子里,也有人呀,是不是? 城郊的房子也是有人的呀。他们看见人没有? 看见我没有? 不会看见的。只是一辆神秘的白色标致。我几乎不开车。我没有在现场之外犯罪,但你们也没有证据……”

“可是,很遗憾。请你不要说‘我们’,因为我不是‘他们’中的人。我已经知道你和那一切没有关系,但你是我的

朋友,我是想告诉你,你将受到惩罚。你心里应该有数,让他们别碰你。”

“肯定是格拉波那伙人干的。他们那样粗心大意,有时干事却像艺术家。”

“不是他们干的。”马格利特说,他很确信这一点。

“那好,”帕科·科尔特斯继续说道,“如果在警察所问我或法官问我,我是否对我岳父的死感到痛心,我将说一点也没有。他作风不正派,毁了他妻子的一生,毁了他两个女儿的一生,毁了所有与他有关系人的一生。应该把他埋在一块几吨重的巨石之下,以防止他没有死透。”

当然啰,把他埋葬了,但并不是用几吨重的花岗岩,而是几铲子石膏封住了阿尔穆德纳公墓的一孔墓穴。

第二天夜里十一点,刚刚把小女儿薇奥莱塔安顿好睡觉,就有人来找帕科。多拉打开房门。她从来没有见过那几个警察。请他们进来,他们并没有进来。他们只问帕科在不在家,如果在,请陪他们走一趟。由于她是警察机构的女儿,刚刚在一次暗杀或凶杀案件中失去父亲,那几个人克制住自己,没有对她辱骂。

“可是,能不能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了还来打扰人呀?难道没有方法通知我丈夫明天到警察所去?”

这个捕人小队由两个便衣检察官和一个着装警察组成,还有一个人留在车上。看上去完全像几个呆子。连句为自己辩白的话都不会说。具体的指控?他们一无所知。

多拉的怒火一下子燃烧起来,这是可以预料的。

不过,那时帕科还没有到家。过了半个小时才回来。

多拉给他讲了发生的事，帕科吃了晚饭，便向警察所走去。

多拉不可能把女儿一个人丢下。她在家里不知道向谁求助，因为她脑袋里都没有想到找母亲商量一下，也没有闪过在那紧急时刻怎么办。

最后，多拉决定给莫得斯托·奥尔特加打个电话。

莫得斯托·奥尔特加生活有节制、有规律，那时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

多拉向他讲了发生的事。

半个小时后，莫得斯托·奥尔特加来到坐落在圣佛朗西斯科·德·萨利斯大街的警察所；第六凶案大队附属这个警察所。

作为特殊关照——他们是没有这个义务的——，值班检察官向他讲述了详细情况。随后把帕科关进一间可以称为单身牢房的房间里，据他们对帕科的律师讲，还没有提审他。那么，为什么拘留他？怕他逃走？

这样的问题，没有必要回答：拘留他，就是因为要拘留他吗。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依据警务的某些理论，需要把被告——甚至被告本人提出来——关进临时设置的小教堂里，因为如果是负罪在身，需要减轻良心上的疚痛。十个警察所中九个都这样做。如果被捕者无罪，只在警察所过一夜，这谁都能很容易地熬过来。是否有那样的情况，即被捕人中有无辜者，远不是给他一点光亮，而是在其做出供词时把他弄得迷迷糊糊、加害于他？佩斯大街那个老人死亡案件就发生过这种事。

谁也不想稍稍花点时间回答这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警

察和任何一个司法机构的座右铭依然是真理最终会放射光芒的。

第二天上午十点,莫得斯托·奥尔特加按照那位检察官的指示来到圣佛朗西斯科·德·萨利斯大街。那时是负责帕科案子的警察所长,即一个名叫堂安赫尔·德·布恩的人到岗的时间,然而他十一点半才到。考虑到被捕者的名望和被害人的身份,他对莫得斯托·奥尔特加非常严肃,仿佛担心将来有人指控他渎职。

当然啰,那件凶案不是格拉波所为。那时,他们在马德里和周边地区都没有搜查到任何这类团伙的踪迹。疑点十分明显:被害人的汽车里,随便一个地方都发现了帕科·科尔特斯的指纹,而更为重要的是,有一支他吸的那种香烟的烟头,但他一直强调,除了在学校与岳父不期而遇外,已经六个多月没有与他单独见过面。惟恐这还不够,他还说不在犯罪现场。他说去看电影了。

“我的客户怎么说?”梅生问道。

“就是那句话:他去看电影了,和所有被告一样:他不是。”

警察所同意通知莫得斯托·奥尔特加——他终于成为一桩真实杀人案子的培理·梅生——什么时候将案子从法官手里转出来。莫得斯托从那儿出来回到他的办公室,警察所长叫人把被捕疑犯带上来。

帕科非常平静,他看见现实中的事情与侦探小说,起码与他写的侦探小说没有多少关系时可能感到惊奇。那是他的第一个教训:前景变化是很大的,因为要看是站在法律一

边还是对立面，法律认定一个人是无辜还是嫌疑，是站在行刑队的一侧还是恰恰相反，而一个人认为谁是无辜还是有罪，那前景当然就与那人无缘了。帕科可以早就放弃写作小说，他一点儿也不后悔，没有把小说情节、环境移到西班牙，没有描写西班牙警察。那根本不像一桩罪行。那只不过是点儿令人伤心、令人痛苦的事，在这样的事里，所有人都错了，任何东西都与自己无关。

“佛朗西斯科·科尔特斯？”被捕的人被带上来，堂安赫尔·德·布恩问道，同时皱了皱眉头，满脸严肃表情，内心有那种恰似某些医生对病人做出最糟糕诊断时感觉到的快感。

“对不起，警察所长或检察官或别的什么人，”帕科说，“如果您叫人把一个名叫佛朗西斯科·科尔特斯的被捕的人带到了这儿，还能把谁带来呢？”

有各种各样的警察所长：高傲的，复杂的因而不易看透的，狡猾的，凶狠的，蛇一样阴险的，心情不快的，居心不良的，残忍的，无耻的，严格执法的，平平庸庸的，偶尔有个把聪敏的……我们在各处看到的情况都是这样的。不过，他们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非常清楚，那非法占有的权力是不知受了多少苦，在同事中不知受了多少暗算和侮辱才捞取到的，所以毫不犹豫地使用那种权力，冷酷，不让步。

那个警察所长不喜欢被捕人的回答，可是后者说得对，而且他又是一个聪敏的警察所长，也就悻悻地接受了。他知道——因为他面前的报告就是这样说的——这个被捕的人是侦探小说和一般阴谋小说的作家。这种东西他一点儿

也不喜欢。事情是如此完美的相对应:如果作家认为警察中的呆子占有很大比例的话,警察对作家也没有好的印象,认为他们是可恨的骗子,应该送进监狱,因为他们到处散布最为恶毒的流言蜚语,攻击警察这种职业。当然啰,他没有读过帕科·科尔特斯的小说,但调查罪行从业人员的锐敏下意识告诉他,可以从哪儿对这个被捕者进行侮辱,并打打他的气焰。

“你不要以为我们这儿的人都是傻瓜,你这个乳臭未干的,而你们却像那些小说中说的,每个人都聪明过人。”

毋庸置疑的是,检察官被提拔到警察所长时,常常要做的事情中有一件是丢弃辱骂,认为那是低级人员干的;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他们时不时地重新品尝那种粗鄙味道,犹如那些来自平民阶层的天使般明星也时不时地像平民那样,在空无一人的厨房里偷吃一块血肠。

警察所长笑了笑,看了助手一眼,因为他也不能容忍被捕人对他如此无礼。

“为什么用你称呼我。”

帕科·科尔特斯非常严肃,不想再争论下去,强调了“以你称呼”这个词。

这是检察官提拔为警察所长后不容忽视的第二条规则:除了提拔前还是他上司的所长外,不再以“你”称呼任何人,就是对十年来一直以“你”称呼的清洁女工也以“您”相称了。

在帕科·科尔特斯的所有回答中,这是堂安赫尔·德·布恩最没有料到的答话。那个警察干咳了一声,装作没有听

见，开始对他审问——已经对他审问了三次——，尽量避免使用“你”和“您”，以让在场的检察官和门口守卫不想到失职问题。

“我先前已对您的同伙说了，”帕科开始这样说道，“我在电影院看电影。前一天，我岳母到家里来，把车放在车库我们的车位上，我把车给她开出来，因为女人在车库里开车不灵便；我可能在吸烟，把香烟塞进车内烟灰盒熄灭……”

堂安赫尔认为案子破了，捉住了凶手。

“可是，这儿说佛朗西斯科·科尔特斯供认不开车。”

“是这样，不开车并不是说不会开车。”

堂安赫尔不得不把审问拉到另一边。

“可是，犯罪嫌疑人佛朗西斯科·科尔特斯留下指纹的地方，”他用加强语气说出“犯罪嫌疑人”这个词儿，“是在副驾驶的门上，而不是驾驶的门上。”

“您，”帕科问道，“对我们留在那里的所有指纹都一清二楚？我们留下的指纹如同蕨类植物的孢子，以百万计算。”

“这可不是侦探小说，”警察所长提醒说，他越来越缺乏理由了，沉默下来，仿佛在面前的文件中寻找什么。

“请您原谅，我要介入您的工作，”帕科·科尔特斯开始说，他想不让自己过于盛气凌人。“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但是您如果想知道为什么我岳父汽车里有我的指纹的话，我无法对您解释。也许我是从车内开门，让我岳母进来。应该问的是，我为什么镇定地作那个案子。这样能得到什么？我妻子从六个月前就不与她父亲

讲话了,正因为这一点她变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那天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有人因为工作上的事进行报复或者我岳父为某人花费了一个工作日,这样的事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也可能有人劫持了他,让他把他拉到那个村子。那附近不卖毒品?有人钻进他车里,对他说拉他走。盗贼偷窃殡仪馆装着死人的车,直到最后才发现那是送葬车,这种事我们不是见过上百次吗?你们是严格执法的,应该提审我岳母,丈夫死了,她是主要受益者,她将大大松口气,这一点你们想象不到,因为我岳父是个坏人,把她变成了一个不幸的人。或者提审我妻子。或者也有可能是他的同事干了那事……”

“够了!”警察所长没有从文件上抬起眼睛,看样子也没听帕科·科尔特斯的话。“那是个什么团伙,研究并谋划完美罪行?我们已经和您的同伙谈过,他们都指认您是头头。多么无耻呀,医生,律师,银行职员……”

“……警察。”帕科补充说。

警察所长用目光寻找站在门口注视审问的检察官,半笑着,好像对他说,“我们已经掌握了”。

不过,谁也不知道从哪里继续下去。

“我们已经审问过路纳大街警察所的洛伦索·马拉维亚斯……”

“一个好朋友……”帕科说。

“商业咖啡馆里,所有人肯定都是奇怪的人。”

帕科意识到那个人要采取严厉措施。

“我要提醒你,”堂安赫尔用威胁的口气说,“我们已经

知道，是你们所有人搞了这起凶案，你是指挥。”

他又用“你”相称了，我们知道，这是留给证明有罪人的称呼。

“我们没有半点怀疑，我们不会放过你。我们要一个一个审问你们。你们最终将倒下去。你们将犯一个大错，我们已经找到一个证据。大厦将倒塌。事情总是这样的。由于你们读了许多小说，罪犯将落进监狱。”

“您讲完了？”帕科非常严肃地问道。“您知道我的理论是怎样的吗？我不知道谁可能杀了我的岳父，也不知道为什么杀他，对于杀他的人，我对他完全理解，并且非常敬佩，因为我在想他会从杀人中得到什么好处，很可能得不到任何好处，除了把一个坏人从这个世界上除掉之外，我还想不到在这桩凶杀案中还有别的动机。就是说，是善举。这是从一个方面讲的。警务功勋奖章应该授予杀人凶手，而不是堂路易斯。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是您领导这个案子的调查，而又没有找到那些罪犯……”

“哈哈，你怎么知道凶手不止一个？”

“警察所长，请您不要威逼我。让我把那句话说完。我是说，您如果找不到那些罪犯或那个罪犯，就不要抱幻想了。之所以是一桩完美罪行，并不是因为某某人找不到那个作案人或那些作案人，而是因为没有具体方法把案子展现开来。您理解我这些话的意思吗？”

甚至都没有把他送到法官那里。那次审问之后便把他放了，没有任何罪名，但有一个警告是非常明确的，即永远用“你”称呼他。

“帕吉多①,你认为自己很聪明。可是,你最终要落入监狱的。”

他从那个地方带走的全部凌辱,可耻的声名和声名的可耻,全聚于那个不祥的“帕吉多”。

① “帕吉多”是“帕科”的小指词,有轻蔑之意。

第一例私自脱离 ACP 聚谈会的是玛尔普莱小姐，她也是第一个被叫到警察所提供供词的。

她的司机把她送到那里。那天她特意穿了件皱绸衣服，玫瑰色，非常漂亮。她认为自己正在经历着她那样喜欢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某部小说的场景。提问由同一个警察所长，即堂安赫尔主持。

“夫人，我们知道您与那个密谋没有关系，但是您如果向我们提供……”

玛尔普莱平静地吸了一口气。

“……我们知道你们那个团伙使用……”

“所长先生,什么团伙?”

“就是你们在商业咖啡馆的那个团伙。”

“团伙!可是,我这几年一直去那里,那是最为清白……”

“夫人,那是您的看法。团伙的危险就在于表面看不出,就连在里面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参与了进去。所以,我们很难发现它们,摧毁它们,将头头关进监狱。我们已经知道,那个团伙——当然啰,没有您,您只不过是它的不在现场犯罪人中的一个——在搞一个罪行代理公司,他们称其为完美的罪行……”

“他们?”

“对,佛朗西斯科·科尔特斯……”

“山姆?山姆·斯帕德?”

“谁是山姆·斯帕德?又出来一个?”

堂安赫尔看了一眼身边的官员,十分惊恐,想看看他是否知道得多一些。

“山姆是帕科。”玛尔普莱澄清说。

“对,是帕科·科尔特斯,绰号叫埃斯佩……”助理检察官看了一眼事先准备的纸条,证实说。

“好。”堂安赫尔继续说,“他是负责的。我们跟踪他已经好长时间了。”

“我的上帝!”玛尔普莱说,她已经惊恐万状。“怎么可能呢?”

“事情就是这样,夫人。一个精神病患者和一个声名扫地的狂躁病患者。”

“可他很有魅力……”

“精神病患者都是这样。但请您不要忘记，我在谈好几桩杀人案子，一直没有搞清楚，我们怀疑这些案子的后面，可能他在……”

这个善良女人佩戴的首饰一起抖动起来，仿佛是粒粒流沙，要把她吞食。

“不会的！”

“完全可能，夫人！好几桩凶案。还不算堂路易斯这桩凶案。”

可怜的玛尔普莱小姐像海鸥一样尖叫了一声。

警察所长的脑袋庄重地抖动了下，他的断言证实了。他认为施加的压力足够了，应该对那位夫人发起最后进攻了。

“您向我们提供的任何情况，都将是很有用的。他经常对你们谈起受害人吗？”

“什么受害人？”

连警察所长都开始发现，那个如此有教养的可怜、不幸女人还有一点儿迟钝，因为连一半事情都不了解……

“您喜欢侦探小说吗？”玛尔普莱小姐问。

“当然啰，夫人。”堂安赫尔含糊不清地说。

“可这儿除了山姆之外再没有别的受害人了。”

“好，可是，发生凶杀案的前几天，他对你们谈起过他岳父吗？”

“没有，先生。在那儿，谁都不谈自己的事。在案发以前我几乎不知道那位先生是山姆的岳父，案子也是听别人

讲的。”

玛尔普莱小姐离开那个办公室，双腿有些颤抖，心里颇为惧怕。她都没有力气把事情讲给丈夫。

“你想想看。一个精神病患者。我们给他当不在现场犯罪的罪犯。利用我们给他出主意、提供想法。他可能作了好几桩凶案，警察一直跟踪，寻找线索。神圣的上帝哟！他，还有聚谈会的几个人。我怀疑马尔洛维和尼录。我对厨师没有好印象，身边总放着几把刀。马尔洛维整天把手枪的话题挂在嘴上。太可怕了。一想到我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人……”

一个寒战使她前臂的茸细汗毛竖立起来。

那天下午，她给布朗神父打了电话。

“堂贝尼格诺，我可以在电话里做忏悔吗？”

“我说，那么急呀？”

“我对您讲的，应该看做忏悔的秘密。我对您讲的事，只能您知道我知道。我刚刚从警察那里回来。对我进行了审问。”

她对神父讲了审问的每一个细节，一个细节也没有遗漏，为自己从容地走出审问室感到自豪，她一直表现得像个机敏女人……

“而我如果对您讲实话的话，那可是我一直怀疑的。我不知道他岳父的案子里的确切情况，但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您还记得他那么长时间没来商业咖啡馆吧？整天睡大觉，到了晚上，醉醺醺地到那种地方，找三陪小姐。山姆的岳父堂路易斯一心想让他女儿好，看见女儿再次陷入争

吵之中感到痛心。夫妻间的事，堂贝尼格诺，您知道，有点什么就闹得满城风雨。我从来不喜欢介入那种事情之中，不过，说心里话，这些日子我发现可怜的山姆很古怪。判若两人。”

布朗神父还想多知道点细节，尽量让玛尔普莱小姐平静下来；不过，玛尔普莱小姐已经拿定主意，退出 ACP 聚谈会，接着，神父给山姆的最好朋友莫得斯托打了电话。

“莫得斯托，我想请你转告帕科，或者干脆对你说了吧，在这困难的时刻，你们完全可以指望得到我精神上的帮助。”

“困难时刻，为什么？”

由于他不能打破电话忏悔的秘密，便抓住无人称形式讲述得到的消息。

“我得知可怜的帕科卷入了十分可疑的事端中。不是这两个月，而是前几个月，他发生危机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呀。肯定地说，他起码患了突发性精神狂乱症。”

“……突发性的？”

“对。你不知道我身上压着怎样的灾难呀。好几天不能睡觉。已经对 ACP 聚谈会全体成员展开调查。由于我不能把主教辖区卷入到那里面，这一点你应该理解，我不得不停止去那儿。如果问你，我请你这样说，我参加聚谈会和出席会议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另外，事实也是这样。你能做到吗？”

“可是，他们已经把帕科放了。我刚刚和他谈过话呀。”

“我知道。我认为放了他，是因为他们知道他将给他们

引出其他牵连的人。他们盼望他出的错越少越好。事情不能再明显了。不只是那桩凶案，看来，还有另外八桩，都有了证据。”

只几个小时工夫，对于帕科·科尔特斯的重大指控就像突如其来的巨震，使 ACP 聚谈会那面敏感的蜘蛛网抖动不止。

这消息通过两条渠道到达波埃和马尔洛维的家，即马格利特和亨娜这两个人的渠道，而且都是人工邮路完成的，因为那两个朋友共居的房子还没有电话。

第一个来的是亨娜。他们仍然时而见面。波埃比任何时候都严肃、沉默，他说很怀念那些日子欣赏日落的情景。亨娜温情地责备他：不怀念我？也怀念她。但是，波埃几乎对他自己没了那种亲情。他生活得不好，但没对一个人讲过。

在玛尔普莱小姐提供供词那天下午，由于使用警察行话，两个检察官登上亨娜的顶楼。

那是波埃大学注册时填报的地址。他们本来向马格利特问一句，后者就可以把他们引到波埃的现住址，但警察所终究是由钟情官僚政治的官员组成的，干起工作来从不着急，恰如罪犯喜欢捷径那样喜欢绕弯子。

亨娜看见那两个警察——一个穿便衣，一个着制服——，吓了一大跳。

有那么一秒钟，亨娜的脑海里涌现出上百个不幸或灾难的场景，这不幸和灾难总是同她现在的生活和她经常交往的朋友联系在一起：她的丈夫，海洛因，为了获取海洛因

而采取的不总是正当的捞钱方式……这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一个人临死之前，他生活中的每一刻一秒钟之内的事情都在眼前闪过，亨娜眼前也闪过了，但那是她未来的每一刻：她想到了在西班牙某座监狱度过的生活，想到了她的末日、她的死。如果那两个警察来搜查毒品，只需打开桌子上的小盒就够了，盒子里存放着一块大麻，用锡纸包着……她有一点像似轻松的感觉，后颈有了点热气。也许她想到，她两次无法结束的东西，最好让别人来一次结束。

便衣警察问拉法埃尔·埃尔瓦斯·马丁内斯是否住在那儿。

亨娜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奇异的怪相，尽管警察拒绝告诉她为什么找波埃，但那位女老师觉得事情相当严重，应该跑一趟，到他的新家去，把消息告诉他。

波埃吃了一惊。自从帮助他搬运他的那些东西，即海员一样耐用的东西和两箱子书的那天，他还没有在那儿见到她。他与马尔洛维共居的公寓不大。那个年轻貌美的女老师显得很憔悴。左右黑眼窝好像两只百合一样，但更能看出她极度消瘦的是那两只手。

“刚刚有两个警察问起你。没有说为什么。一切还好吧？他们来过没有？”

波埃过了一阵子才回答她。亨娜到他家来，不禁使他的脉搏跳动加快。那副病弱的面容，犹如一只真正病态花朵，使她显得更具有魅力。他们坐在一张桌子前。波埃把一只手放在上面。亨娜把手移过去，放在波埃手上，他觉得如同一层雪毯落在上面。他很久以前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不

能住在一起。他们还是没有谈她丈夫回来和重坠毒品深渊的事，但是波埃看看她就知道，亨娜感到她被谅解，知道他知道了一切，由此没有必要谈那事了。

“对，一切都好。”过了几分钟波埃说。

亨娜心中忐忑不安。她不得不对他说谎。她的生活已经变成一条痛苦的链子，没有尽头的争吵、纠纷，吸毒者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那境况严重得仿佛她仍然处在那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如同亨娜那样想说服自己，如果下决心的话，还来得及走回头路。

她悲凄地看了波埃一眼。她仍然抚摩着波埃的手，波埃不敢把手收回去。还是那个力，她身上的吸引他的力，现在好像在排斥他。只是他的心还在中间地带扑通扑通地跳着，怀有某种期盼。而她的心已经奄奄一息，在回忆中渐渐衰竭，恰如那样一只无力吸收水分的花朵，叶茂花盛期已不复存在。

“拉法埃尔，你怀念那些日子吗？”

他又是过了好几分钟才作答。他们坐在四壁光秃的房间里。所谓的家具只是那张四条腿支着一块木板的火盆桌和两把刚从拉斯特罗① 买来的椅子。

“你呢？”

波埃突然觉得全身力气不翼而飞，并且想起家乡的沼泽地。不，不能陷进浮动沼泽里，陷进去就出不来，或者像第一次那样，即使出来了，也被搞得筋疲力尽，于是他倍加

---

① 马德里的一处旧货市场。

小心。而亨娜呢,是从她那最为崎岖陡峭的一面考虑她的事情。

“他是我有生以来最爱的男人。我们两个人十六岁时就相识了,后来在那段时间里一直在一起,上大学呀,有共同的朋友呀,头几处房子呀,第一辆汽车呀,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分离过。”

“我们两个人住在东方广场时,我从未要求你讲任何事情。”波埃说。

“可是,现在不是那种情况了,我想讲。我们从醒来到上床睡觉都在一起。我们走遍了半个世界,对重要的东西都是一起认识的。毒品那种东西,也是这样。但是,我离开了,离开了他,来到西班牙。但我仍然爱着他。你不知道我爱他有多深。开始时我割不断那种爱,痛苦极了。我离开他,如同把他丢弃在麻风病院里,我良心上感到疚痛。我觉得自己无权逃走,如果他不能跟我来,我更无权逃走。那样做,犹如把一个受伤的同伙抛在后面。当我认识你时,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头两年我在这里生活,好像都麻木了。我没有和任何人外出,对那事没有一点儿兴趣,直到开始同哈伊梅一起外出。我那是退缩了,降服了,厌了孤独无伴的生活。和你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还活着。说心里话,那时一切都很顺心如意。但是重新见到他后事情开始变了,我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我爱你,以为永远会爱你,但没想到他会出现在马德里。从第一刻我就发现他也丢弃了毒品,你不知道那令我多么欣喜若狂,但我们相见以后,发生了一点奇怪的事,仿佛我们两个人重新怀念起那个

地狱。我们尝了一次。我们说:我们从来没有告别那东西;我们要彻底告别。我们不知道,那是怀念死亡。你不要说那是怎么回事,可是我们这些深陷毒瘾之中的人,那种感觉别人是感受不到的。那种怀念之情胜过一切,因为那是怀念实际上谁都不了解的东西。是对天堂的真正怀念。我们觉得那是妙不可言的东西。我们说:再尝一次,第二次,然后真正告别,前一次只不过是尝试,我们觉得生疏。而第二次则是决定性的。起初只是周末。那如同重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向天堂,周围的一切都开始隐而不见,那天堂已经变成了你看见的那种东西。现在,事情重又变得可怕起来,波埃,很可怕。这彼得知道,我知道。”

“可是,你在爱着他呀?”

现在是亨娜在考虑怎样作答了。她想对某个人说出心里话,哪怕一次呢。她点了点头。

“当你上了钩时,你的惟一的爱就是你的剂量。你知道我这话的意思吗?那已经像似一种习惯:他,我,那个危险的东西,那间房子,我的家,一切重又染上我们熟悉的颜色,仿佛是座象牙塔。而一切永远如此的话,一切都将是井井有条的。”

“你每天都要吸吗?”

“当然不……”亨娜坚定地回答,仿佛要回击直接涉及她的诽谤。随后,她好像接受了现实,退缩回去,如同讲什么秘密似的低声补充说。“实际上也没什么……只是周末……彼得还有他的工作,不过我已经离开学校了。”

波埃知道亨娜向他讲述那些是因为在去往天堂的路

上,她在每个星期的各个歇脚点都要停下来,想向他要点钱。但他没有说什么,亨娜也不知道如何继续讲下去。她只是温情地看着男友。波埃发现亨娜又在抚摩他的手,那是一种机械动作,恰如我们一边想着别的事一边抚摩一只小猫或一条小狗。

“你需要钱?”波埃突然问道。

亨娜说不,对,不,好吧,对,一点儿,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波埃走进一间屋子,拿着几张钞票走出来,把钱塞进女友挂在椅背的手提包里。

这使亨娜突然改变话题,用欢快语调说:

“你们怎能这样生活呢?”她问道,仿佛那真的是她不说的另一件事。

她用目光迅速地扫了一下光秃秃的四壁,两个装满书的纸箱放在地上,不知谁把一双鞋胡乱扔在那里,冰冷的地板瓷砖上没有铺地毯,窗户没有窗帘,墙壁刚刚粉刷过,但没有图画,火盆桌没有裙围,椅子上没有坐垫,房间里除了那三四件破烂家具……

……我们没有很多可讲的。

在这句话里,波埃的语调也和女友一样很自然。

“我不是那个意思,波埃。我和你在一起时,总是按照我的方式继续向你讲述许多事情。我知道那已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我常常想象着,你仍然住在那里。看见你好像有时坐在沙发上,从来什么都不说,沉默不语,总是那样温存,在你的角落里,在你的影子里。还想到我那儿去和我在一起

吗？帮助我付房租。我现在一时厄运缠身。我已经不教课了。”

“你刚刚对我说过。”

“和我去吗？”亨娜坚持说。

“去做什么？那样能帮助你摆脱那种麻烦事？开始，我是最幸福的男人。我觉得那样的事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你是一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女人，我同你从未在一起过。实际上，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波埃把声音压得更低，讲出这句心里话。“你更像一个梦。我那时一直希望你和我在一起，多少像我那样。我们像两只小猫，在同一屋檐下相遇的小猫。我一直希望你那样安宁，那样默不作声，对一切那样有条理，那样彬彬有礼，从不问什么，从不难为我，时时刻刻高兴快乐，在屋脊上走动不晕眩，你的爪子像棉绒一样，踩在什么东西上都不出声……但是，从第一刻我就知道，我对于你并不是你对于我的那种人。事情几乎永远是这样的。但是，我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永远不谈那事。当一个人习惯做点什么，那是没有办法的了。”

“可是，你愿意和我重新住在一起？”

“我想还是不住在一起吧。”

这时，是波埃寻找她的手，深情地抚摩一下，那个年轻小伙子本来想哭，但他是从不哭泣的，他从来没有哭过，这也许因为他在家中只看见他母亲为什么事都哭泣。他一点儿也不重视没有流出的眼泪，让它们在心里滚动，不再记起，犹如他那落在东西上的部分目光。亨娜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近他，想用抚摩抹去那个痛苦的痕迹，但是却把痛苦

扩展到全身。波埃觉得难受。波埃仍然坐着，亨娜站在他身边很不舒服，于是在他面前跪下来。

“拉法埃尔，给我做爱吧。”

像第一次一样，是她主动。

和整个房子一样，卧室也好不到哪儿去，空空荡荡，不像久住的样子：一张床包括在租金里，穿衣柜是二十年前式样，房间没有窗帘，街上嘈杂声不绝于耳，光线明晃晃的，地板瓷砖没铺地毯，吊在顶篷的电灯没有灯罩。

亨娜想给那个悲凉时刻带回一点儿欢乐。波埃躺在床上，脑袋枕着双手，注视着天花板。亨娜把头靠在那个小伙子的汗毛稀疏的胸脯上：

“你怎么可以住在这里呢？”

门铃响了。

“是警察！”亨娜说着下意识地盖好身子，仿佛警察已经站在她面前。

波埃穿上裤子，便跑去给马格利特打开门。

“就你一个人？”

“不是。”

波埃请他进去。两个人坐在他和亨娜半小时前坐过的地方。亨娜仍然在卧室里。

“一个白痴想烦扰我们。”马格利特说，“他确信帕科杀了他岳父，但不是他一个人作案。他认为我们 ACP 聚谈会一半成员都参与了。过一会儿他们就来。马尔洛维的枪还放在这儿吗？”

“我想会放在他的房间里。”波埃说。“他从这儿直接去

射击。今天应该去。傍晚时应该回来。亨娜也来了,她说今天上午警察去了她那儿。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呀?”

“他们去了聚谈会地点,但没有一个人。现在去吃饭了,吃完饭肯定来。”

他们还有时间。

马格利特向他朋友重述了案情进展情况。

“负责凶案的警察所长正积极调查一些指纹和同帕科一个牌子的香烟烟头。”

不一会儿听见马尔洛维用钥匙开门声。

他背个运动包,里面有两把手枪和半盒子弹。

马尔洛维认为从来没有严重的事情。

“我敢赌它三次连盘赌,那些警察什么都不会弄清楚。”

马尔洛维说,他并不完全懂得什么是连盘赌,但他读过迪伦马特① 一部小说的糟糕译本后就记住了这个词。接着,他钻进他的房间——这个房间坐落在这套“租赁”房子的“后”半部分——,回来时又拿着一支手枪和五六盒子弹,把这些东西统统塞进包里,嘴上仍然挂着笑容,说也就是几分钟的工夫,穿过大街,上楼到他父母家里,把枪支弹药放下就回来。

当马尔洛维回来时,警察已经来了,但马格利特不在。他宁愿走开,他不想让警察在那儿遇见他。亨娜也走了。

警察开始搜查,他们一副厌倦表情,脑子里想着的与其说破获杀害一个对其毫无敬意的上司的案子,毋宁说快点

---

① 迪伦马特(1921—),瑞士著名剧作家。

结束工作,回家去。

波埃把他的朋友介绍给警察。

“你也在那个团伙里?”

“什么团伙?”马尔洛维惊异地问。

一颗子弹——那是马尔洛维用来练习射击的——,由于慌乱,忙着藏匿,而遗漏在乱糟糟的床单里。那真像是加勒内狂风中的一条小船。

波埃跟在一个警察狗子的身后,发现子弹在那儿。在一部扣人心弦的电影里,那个发现可能早已伴着骤然奏起的音乐,把观众从座位上拉起来。波埃做的恰恰相反,他立刻坐在子弹上,看着警察翻箱倒柜。他站起来时,子弹已经握在手中。他把子弹塞进裤兜里,一直等到搜查完。

“你们明天到警察所去。所长要问你们几个问题。”

“为什么不现在问。”马尔洛维问道。“我们可能逃走的。”

警察是国家职员机构的人,肯定最不会开玩笑。

“好,你这个机灵鬼,”那个用歌声讲话的警察说,“那么,你们现在就去,给我在警察所过夜。”

马尔洛维觉得那太好了,把那看做刚刚受到邀请去做一次美好的郊游。

“我也去吗?”波埃问。

“两个人都去。”

“你有逮捕令吗?”

这是最不应该向警察提出的问题之一,第一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看做白痴,第二是因为他们一般总是带着

逮捕令,第三是因为三个提这种问题的人有两个最终被宣布为有罪。

“好吧;明天给我在那儿度过。明天上午。”

“我在银行工作,不能旷工呀。”波埃说。

警察开始生怒。

“那你请个假。”

第二天的审问像对其他所有人的审问一样十分荒唐。但是,只要警察稍稍把嗅觉伸到 ACP 聚谈会里,其成员几个小时之内就会被肢解,而在十六年的时间里,那个星期聚谈会会议第一次在附近的迪斯科歌厅举行,以前从不缺席的人没有到场。

“我们将像布朗神父预测的那样,走第一批基督徒的老路,最终被送进坟墓。”马尔洛维断言说。

“我并不担心。”帕科·科尔特斯这样说,想让他平静下来。“那些东西根本不能成立,但还是要调查的,为什么把他拉到郊外荒野。如果警察走上坏路,我们把他们拉到好路上来。我不大愿意是我岳父,但更不愿意一个这样的案子不能破获,更不愿意想让我对他的死负责。”

在场的只有波埃、马尔洛维和马格利特。

“他是开自己的车离开警察所的。”帕科·科尔特斯继续说道,“走前给我岳母打过电话,说赶回家里吃饭。但他一去未归。我岳母看见他不回来,并没有太放在心上。说他已经离开办公室但又不在家里露面,这是他经常做的,屡见不鲜的事。不过,到了夜里十一点左右,她还没看见他的影子,想到常常发生的事,不禁害怕起来。打电话把我们叫回

家,我们立刻给警察所打电话。没有人看见什么,但大家还记得,他三点半离开办公室。可是谁也没看见他开自己的车离开,不过那时他应该开车,因为第二天上午发现他死在自己的车里。也许在警察所,也许在路上某个地方,他拉上了杀害他的凶手或凶手们,也许是这些凶手拉上他,并将他杀死。也许他去了某个地方,凶手在那儿等着杀他。尸检说明他死亡的时间为下午五点,而从路纳大街到埃拉斯村,那时是车流高峰期,少说需要三刻钟到一个小时。有半个小时时间发生点什么,这也许是他死亡的关键时间。”

“最为奇怪的是,”马格利特说。“我们调查了他亲自处理的最后几桩案子,没有一桩同那个地区多少有点关系。”

虽然每个人都对 ACP 聚谈会会议感兴趣,但从六个月前就退出聚谈会的玛尔普莱小姐、尼录·乌尔弗、歇洛克、布朗神父、米拉格露丝,还有迈克和梅生的朋友、律师盖特曼,从来没有露面。那是第一桩现实中的完美罪行,人们便一个个逃走了。这就是生活。

“我认为你岳父是自己去那儿的,谁也没有逼他去,他一定去找什么东西。”波埃说。

也许惟有波埃觉得那个案子不开心,也不是令人伤脑筋的事。

“我有点想不通。”帕科·科尔特斯反驳说,无论如何他还是很尊重那个年轻朋友的。“下了班,不吃饭,径直去马德里郊外?”

“你自己不是说过,你岳母也没感到奇怪呀?”波埃提醒说。

“确实奇怪，”马格利特插进来说。“第一，从三点半离开路纳大街到五点被害，没有人看见他；第二，直到第二天才发现他的尸体，而且在那样一个地段，你放下汽车，别人不认识你，但二十分钟之内，神不知鬼不晓地把你完全杀死。不过，发现他的汽车时，天已大亮，汽车上什么也没丢，堂路易斯本人身上的东西也一样不少，公文包呀，钱呀，合法携带的武器呀，都还在。那两颗子弹……为什么打两枪，而不是一枪？如果两枪挨在一起，也就不奇怪了，可情况并不是这样，一枪打在腿上，一枪打在头部。”

“我认为不奇怪，”科尔特斯说，“我的理论是这样的。他给他妻子打电话，说回家吃饭，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想法。为什么呢？因为随便一件事。接着，同那个人或那些人到那个地方，其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在那儿，对他敲诈或为点什么发生争吵，往他腿上打一枪，让他明白事情是严重的，随后将他杀死。”

“有点说不过去，”波埃提醒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人往他大腿开了一枪，是想杀死他的。因为谁也不会往大腿开一枪，放警察所长一条生路。”

“是这么回事，”科尔特斯如同一个涉世不深的人承认说，“除非凶手是些蒙面人。”

“可能是这样。但是，他身上带着手枪呀。甚至都没有夺他的枪。如果像开始说的那样，凶手是格拉波里面的人，早把他的枪拿走了。他为什么都没想到开枪？我要说的是，一个警察，特别是一个堂路易斯这样的警察，从老学校出来，能对所有人开枪，如果带着枪，看见自己有危险，一定

想方设法掏出手枪，进行自卫的。”马格利特说。

“如果我岳父必须自卫的话，可能是那样。但他之所以没有自卫，是因为与我岳父同行的那个人或那些人，他认识他们，并且相信他们。弹道指出是从前面座位向他开枪的，这又一次说明，如果是一个人作案，这个人一定是我岳父完全信任的人，因为他坐在前面，而不是后面，而如果是劫持他的话，坐在后面更合乎逻辑。凶手可能是两个或三个人，那么在我岳父的案子里，他们必然坐在两个或更多的座位上。法医的报告你看了吗？”

科尔特斯那是问马格利特。

“你知道，帕科，是怎样杀死他的。”马格利特突然说道。他的声音确实如同粉笔一样干巴。那个问题听起来酷似指控，帕科还给他另一个问题，如同经典作家说的，那问题和老虎机一样。

“你不会也想我与那一切都有点关系吧？”

“我不会的，但请你不要试探我，因为如果我发现是你作的案或策划的，我将犯了包庇罪。你岳父对我来说和对你一样不是什么好人。对，我看了法医报告。”

“报告为什么说，第二颗子弹，即夺走他生命的那颗子弹的轨迹是从前面射向后面？”

“不是那么回事，帕科，你搞错了。那上面说的完全相反。子弹是从后面打的，射中右边太阳穴。这证明是从后面射击的。一个人向他大腿开枪，另一个朝太阳穴开枪。所以我们倾向认为，最少是两个人。”

“或者是一个，是左撇子。用左手从前面座位向他开

枪，先是射中大腿，之后是头部。”

“波埃是左撇子。”马尔洛维开心地说。“我见过他打过一次枪，是用左手。”

马格利特看了他一眼，哪有心思逗趣呀。

“住嘴，马尔洛维，我们在谈严肃的事。”他说。“我们对所有假设都试探过了：他卷进某件脏事，毒品呀，走私呀，外汇呀什么的，但我们什么都没发现。你岳父只是个法西斯分子而已，并不是腐败分子。只是政治腐蚀了他，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不懂。”帕科·科尔特斯说，“我们知道，那两件事并不是一件事。但是，我们把这个先放在一边。那案子到现在，你们该了结了。谁都知道：铁匠家，木头刀[1]。波埃，你有什么看法？你的看法总是很准确的。”

马格利特表示同意；越早了结案子，对大家越有好处。但他已经向波埃提了个问题，波埃想回答：

“你们都知道我的理论是：对一个人判刑或宣布无罪，与其说要看他现在做了什么，毋宁说要看他的过去。而那个人看上去是那样的人，肯定有不止一条而是上百条理由以那种方式死去，所以可能有一百个凶手作案。并不是每个凶手作案都是为了眼前利益。许多凶手只想用一点平衡的东西献给不平衡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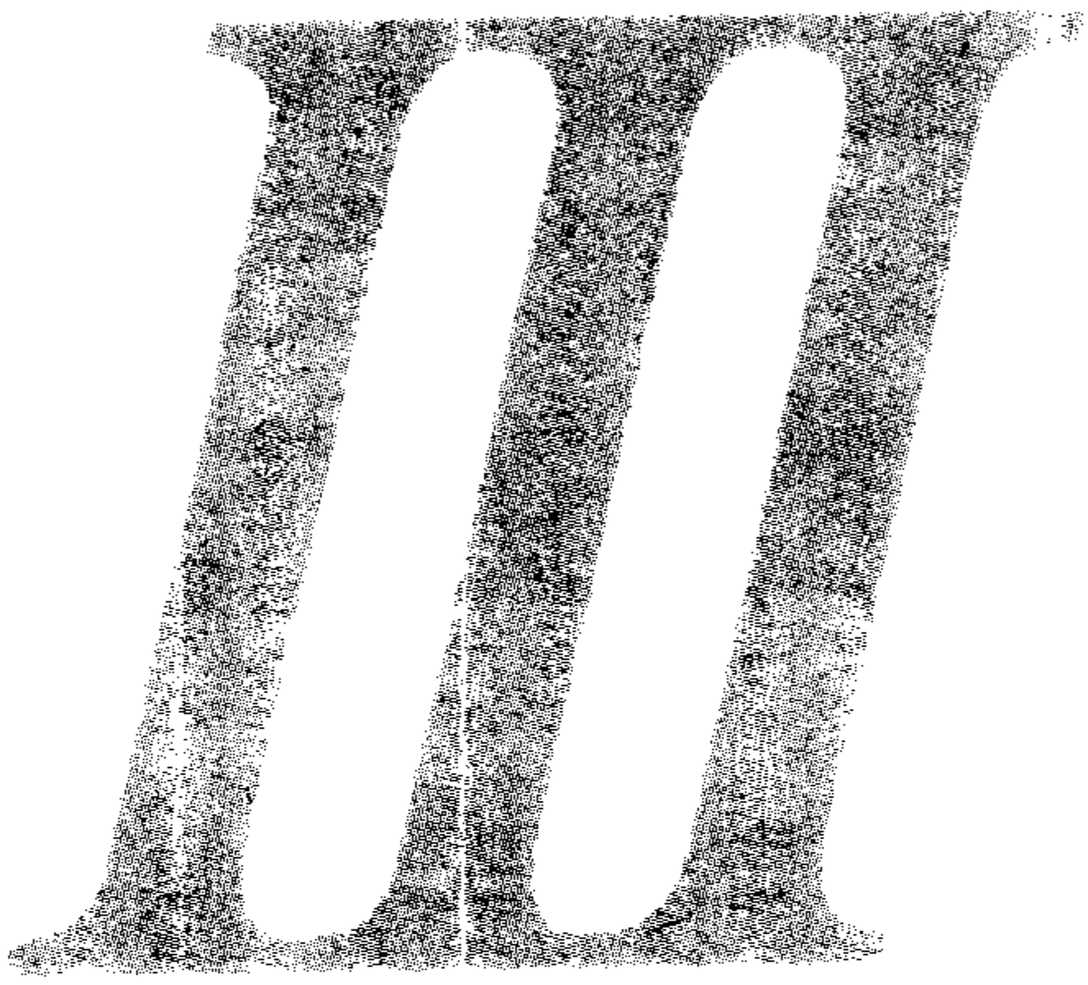
“可是，对一个我们已无法了解的警察，我们能调查出

---

1) 这是西班牙的成语，意为“铁匠家里，不一定使上好刀”，如同“教师家里，不一定出好学生”，“医生家里，不一定人人健康”。

什么来?”马格利特问。

“可调查的东西比一般人多十倍。”波埃继续说道。“警察总是与犯罪的人接触,罪犯是为了他们并不负有全部责任的过去而在现在犯罪,所以应该用过去的总是过时的、不完善的法律审判,以剥夺他们的未来。如果杀人是件容易的事,没有很大的痛苦和问题,可以被人理解的凶案,在数量上将比不被人理解的凶案要多得多。有几个银行家能活到老?有人偷盗那些人,诈骗那些人,欺诈那些人,毁掉那些人及其家人的生命,那些人会消灭他们的。对于医生、律师、法官,我们也这样说。有几个法官失职而从来不发生事的?政治家们呢?我想调查那个警察的生活。你们将看到有一千条理由,有人想杀死他。”





ACP聚谈会的成员不再见面了。当然啰,对于一个想在西班牙确立完美罪行科学原则,即像人们说的那样,对开创美丽艺术的一个篇章——这是德·昆西对完美罪行的讥讽命名——的团体来说,那并不是令人怀念的结局。

但是,ACP聚谈会成员又不得不忍受另一个死亡事件带来的痛苦,这件事对许多人有直接影响,并使他们再次对团伙和有组织的杀人进行假说的探究:四月十四日星期一下午,亨娜·拉尔生在她的住房里死去。是波埃发现的尸体,他立刻向警察所作了报告。堂路易斯·阿尔瓦雷斯的案子还没有了结,但卷宗被丢弃在一间办公室的桌子上,等候

时来运转或一直没有迹象露头的证据突然出现。

警察所很快将同这两个死人有关系的人——而不是将两个案子——连在一起，尽管亨娜的死是过量吸毒所致，而警察是中弹死亡。但是，当对一切一无所知的时候，很可能十分容易地形成多个虚无领域，越来越荒诞、可笑的理论开始在负责调查的人中间流传开来。如果 ACP 聚谈会的成员继续开会的话，他们会很开心的。但是，第一桩死人案件就把这个俱乐部的最软弱、最动摇的成员吓得四处逃离，而这第二桩死人案件——有的人从警察所那里得知，有的人从 ACP 聚谈会成员打来的焦虑电话了解到——使大部分成员陷入十分紧张状态，有的人辨听出电话另一端的声音是某位老朋友时，不接听便把电话挂上，害怕电话受到监听。所有人都互相怀疑，担心被老谋深算、残忍至极的杀人凶手所利用，谁知道他是否是他们一手培养起来的。亨娜因过量吸毒而死，堂路易斯在贩卖毒品的村子附近荒野里被枪杀，这促使警察当局层层多方调查，拖拖拉拉地搞了好几个月。

原则上，对波埃既没有逮捕也没有指控什么。尽管是警察当局把那个侨民之死的消息告知丹麦领事馆，请他们找到并通知其家属，但波埃收拾、整理亨娜的家，他仍然拿着一把钥匙，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去那里。实际上，不能说他们是未婚夫妇，这个词已经排除在他们的用语之外，但确实应该说他们是情人，或者翻译成警察用语：姘居。警方认定波埃是亨娜的情夫之一。警方至少还发现另外两个男人的踪迹，波埃对这两个人一无所知。他们对亨娜做的事情之

一，是向这位前女老师提供金钱，顺便说一下，对此警察得以暗示说亨娜是暗娼，以肉体换毒品，因为她放弃学校的工作以后，除此之外再不知道她有别的收入渠道。

“你和她在这儿住过？”

波埃以为再次看到了佩斯大街那个老人死亡的场面，只是现在这个现场不是把他看做犯罪嫌疑人，而是起码是特殊见证人。

警察一边认真搜查房子一边等候法医解剖研究所的职员到来；波埃跑到平台上，花盆里的植物，除了天竺葵在缺少灌溉、缺少管理的条件下仍然顽强地活着，其余的已干枯了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土壤干裂，昔日绿油油植物只剩下了毛刺，花盆的碎片堆放在角落里，与美不胜收的街景形成鲜明对比。

向波埃提出问题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身穿灯心绒衣服，胡须和头发都很长。

“你们住在一起？”

“不住在一起。”

“那你怎么进来的？”

“有一把钥匙。”

“她给你的？”

“对。”

在侦探小说里总是有个人记录那些事。而那个警察在向他提问的同时，好像只想着找到打火机，点燃香烟。最后，他点燃烟，才提一些更为深入的问题。

“是你未婚妻？”

“我想不是。”

“那些事谁都知道。你是她的未婚夫?”

“不……”但是波埃回到第一个答话上。“我想不是。”

“好。你来这儿干什么?”

“她星期天下午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来看她。”

“你吸毒吗?”

“不吸,先生。”

那个警察年龄没有那样大,也就比波埃大三四岁吧,好像不该如此礼貌地称呼他。

“你知道她吸毒吗?”

“我觉得她已经不吸了。也许正在丢弃毒品。不久前我重新与她在一起时,她对我这样说过。我是这样认为的。”

“平静,小伙子。没有什么事。你别紧张。”

波埃并没有紧张。

下午的景色十分优美。波埃不禁记起了第一次站在那块平台上的情景。和那次一样,面前的画面壮观宏伟,但好像并没有打动那几个警察。警察什么都看见过,不为任何东西,甚至不为从那个惟一的瞭望台看到的王宫所打动。还差两个小时天就黑透了。天空中到处是楼燕,不时从他们脑袋旁边飞过。楼下,两辆警车横跨着停在人行道上,警灯一闪一闪的,警报闹得满城风雨。第一批看热闹的人早已聚集在那里。

“你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吗?”

“不知道。来办那事。谈那事。”

波埃看着那个警察,那表情被微笑一分为二,疲倦表情和悲哀表情。

亨娜和他在一起度过了星期六的下午时光。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坏。他们时不时地见面,每两三个星期见一次。有时见面以同床共枕结束,有时则不这样。亨娜对他谈回国的事。波埃对她说要回家乡。他们处得很好,以他们的方式相爱着。他们共同承受着悲伤。他们并不把那称为悲伤。他们甚至都不互相讲话。有的时候,亨娜出于礼貌对他说:我们如果早些相见,那该多好呀,波埃,是吧?波埃微笑着。她还对他说:拉法埃尔,你不属于任何人,你什么也不讲,不知道你内心出了什么事,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波埃对她说:我什么都不想,我不讲话是因为我想不出说什么,我像在屋顶走动的猫儿。亨娜也对他说,那不是真话。我常常看见你同帕科或马尔洛维说话。波埃说,那不一样,因为我们谈罪行,谈侦探小说,而谈那些如同缄默不语,一点儿也不费力气。罪行好像一盘棋。波埃说,同不懂得棋艺的人谈论下棋,我觉得没有趣味。他补充说:亨娜,你讲话也不多呀。她反驳说,那不是实情。亨娜给他讲述事情,讲要重新授课,想回北方去,或者在南方、在摩洛哥某个海滩永远漂泊下去,都一样。想积攒些钱。积攒钱是她梦寐以求的。而我永远是这样,在一家银行工作一辈子,之后退休,再后死去。亨娜问他,只这样?波埃问:你指的是什么?我只做这些还是我一个人做这些?亨娜说指的是后一种情况。我一个人,一个人做那些事;你怎么希望我拖上一个女人去过那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容

易改变。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了，比我姐姐哥哥的生活好多了。他们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但生活并不好。他们有丈夫，有妻子，有儿女，但几乎见不到他们。我认为他们没有生活。当一家人凑到一起时，互相之间、同儿女整天争吵不止。他们也不幸福，但他们几乎不知道，甚至有的日子以为还很幸福，因为他们几乎一直是不幸的。

那个星期六他们谈到了这些。但那一切对警察有什么关系？他什么也没有说。到了夜里十一点，亨娜当着波埃的面卷了一支大麻烟丝。之后，她说：你是不是想让我也抛弃大麻烟丝？另外，很多医生建议抽这种东西。

他们听了音乐，晚饭是面条，亨娜草草准备的。

那一切同第一次相比是多么不同呀。房子，变化多大呀。不仅仅平台。平台已经变成了垃圾堆。在堆满破花盆的角落里还有一把旧椅子，是亨娜在一个垃圾箱的废弃物中拣到的。她拿到楼上，心想修理一下能用得上，但她改变了想法，扔在那里，像拣到时一样破烂不堪。如果有壁炉，可以把火烧得很旺。晚饭后，波埃离开了。亨娜也没有让他留下。

“你真的不知道她吸毒？”

那几个年轻警察并不想给他设置圈套、陷阱。那一切再简单不过了。那个警察甚至不记得在他的助手到来之前向他提过同样的问题。也没有再问他什么。随便同他聊聊，说不定对他有点帮助，让他平静下来。还对他说，如果警察所长需要，要向他提更多问题。

“她说她已经抛弃了那个。”波埃补充说。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警察想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同她有什么关系。把亨娜的尸体运走以后，他不得不陪警察到警察所。他想告诉他们，他有个朋友是警察，但立刻记起堂路易斯被枪杀的事，把话咽了下去。

警察寻找亨娜的丈夫彼得，但没有找到。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找到他。

过了几个小时，通知了领事馆，并同负责与年轻姑娘亲属联系的官员谈过后，波埃又回到亨娜的家。他想，她的家人万一决定到马德里来，说不定希望那个家是另外一种样子。警察把那里弄得太乱了。

房子被法庭封条封住。他撕下封条，走进去，整理好东西。之后，走出来，重新贴上封条，毫不在意人们发现他去过那儿或进去过。

当天夜里，他把那消息讲给马尔洛维之后，便打电话给帕科·科尔特斯。ACP 聚谈会已经成为历史，但这个俱乐部的老成员仍然继续见面。

帕科·科尔特斯的脑袋已经习惯了警察的行动，总是把事情想在前面。

“你没对他们说我岳父的事吧？他们没时间顾得上了解。还好，星期天我全家在塞哥维亚，我岳母也去了，星期一我在莫得斯托办公室和出版社办事。”

老埃斯贝哈同他的老合作伙伴、侦探小说家达成了协议。没有什么不可补救的，这是那个老狐狸的座右铭……

波埃听到这消息很是一惊，帕科答应改日给他详细讲讲采取了怎样的步骤才达成那个解决方案。那时最重要的

是关注亨娜的事。

第二天上午,马尔洛维陪同他的朋友波埃到法医解剖研究所。不一会儿,帕科和多拉也到了。在某种程度上,亨娜的死对那两个人有教育意义,他们在那个悲剧面前好像把他们的全部个人问题都赶跑了,那些问题一下子变小了,他们在那儿停留时一直拉着手,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波埃觉得他们就是他的在那个死亡森林里的朋友亨泽尔和格莱特,不禁记起了他与亨娜第一天独处时为亨娜找到的那个比喻。二十多个不幸者的遗体停放在茅屋里,等候埋葬。而在那里,死亡的悲剧气氛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在许多情况下,谁也不为乞讨者、穷困潦倒者、自杀者、吸毒过量者、服毒者、陌生者的尸体守灵。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生活漂泊、死时惨不忍睹。为其中一些人的尸体守灵是极为痛苦的:一个悲惨生命结束了。大家用一块白布把亨娜的尸体连同脑袋包好。双手露在外面,那是两只细腻的木雕,肉和指甲犹如石蜡制作的,身体酷似大理石,雕刻家可能只想给她的面部和双手以生命,其余部分保持原始石料状态。

大家终于找到了波埃,他一个人躲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隔着玻璃能够看见棺材。

那两个朋友,以后又陆续来了几个朋友:梅生、马格利特、布朗神父;几个人走到波埃身边,他仿佛命里注定要独自一人——没有比较近的亲戚——承受着那孤死带来的痛苦,这对他那二十二岁的年龄来说担子太沉重了。

他们谁都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事,应该做点什么,在言谈

举止上该怎样做。是否把亨娜尸体埋葬？还是火化？把她的尸体运回丹麦？她的骨灰？领事馆是否来人，她家是否来人？

上午十点多，朋友们按照波埃的要求一个个离开，去上班。波埃一个人在那儿守了一整天。只是到了最后一刻才告诉他第二天火化尸体，把骨灰运回丹麦。他返回自己的家。他把女友的尸体丢在那儿，心中是那样困惑。他暗暗自问：这样的事能否以另外方式处理？他觉得犯罪比埋葬死人更为合乎情理，使一个人的尸体消失，比毁掉一条生命更为不人道。

第二天，火化时他一个人在场。仪式持续时间很短，也就是几分钟。他没有与任何人，甚至殡仪职员谈话，那个殡仪职员在殡仪馆大门口高声呼叫死者的名字，想知道身边是否有与死者有关的人。波埃推测，殡仪职员可能知道如何处理骨灰的事。他还没有想到亨娜的死是否对他有影响，影响有多大。也是的，她刚刚死去呀。不过，他知道他要回到家乡去，也许想到了。如果不回去，另一个与亨娜之死同样荒诞的死亡迟早在等候着他。在家乡，他感觉会好些。也许已经到了逃脱的时候了。他二十二岁，但已经是个老人，或者说感觉老了。

他与马尔洛维共住一套房子，但生活得并不比以前好。纸箱子没有打开，放在角落里，还是那样乱糟糟的，日子拮据，一切同第一天一样。房屋租赁合同为一年，夏天到期。他们不会续签合同。马尔洛维将回他父母家里。他那个人不能单独生活，他对波埃讲过，喜欢母亲做的饭菜，衣服洗

得干干净净的，星期天坐在电视机前，买东西呀，洗衣服呀，饭菜呀，他什么都不管。

在所有的朋友中，只有帕科·科尔特斯好像未来对其微笑。老埃斯贝哈已经恢复理智。他酷爱的作者的离去对出版社的收入是个严重打击。他一收到诉讼通知，便毫不犹豫地与帕科取得联系，并写了一封信。毫无疑问，死去的埃斯贝哈对此很可能感到骄傲的。

“我亲爱的帕科：十四个月前我就应该给你写这封信，现一并附上我的解释。我是一个高傲的人，但我也承认我的不足和错误……”

帕科给莫得斯托读过那信以后，又在大声地给多拉读，他不得不做这样的评注：

“承认自己的不足是骄傲的人，还是狂妄的，而且他们认为骄傲是一种美德，所以把它坦白出来。他做事是万无一失。”

“你还是要重新写作。”过了不几天，一个精神抖擞的莫得斯托对他说。他已抱有幻想，能读到他喜爱的主人公的新的冒险故事了。

“我不会重新写作的。”帕科打破他的幻想说。“那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今天下午把自己的想法对埃斯贝哈讲了。我不是作为作者，而是作为经理回出版社的。在现今的生活中，一切都有自己的轮回周期。”

“你去见他了？”

“去了。”

“你如果不再写小说，”莫得斯托问道，“为什么去见

他?”

“我有个想法,一个天才的想法:抄袭我们自己的小说。”

大家看了他一眼,表情惊愕。

“必须创作具有西班牙特点的小说。现在很流行这样的小说。读者对发生在三千公里以外的罪行已经厌倦了。罪行完美与否,他们的评价标准并不在这上面,而是关注能不能嗅到血腥味,血腥味越近越好,血腥味越是来自亲人越好。所以,在西班牙特别喜欢内战。我要用《芝加哥的阿玛宗人①》做个试验。”

《芝加哥的阿玛宗人》是一部描写假币制造者的小说,这些人以名为“阿玛宗人”的一家三陪女俱乐部为据点。

“我要把这部小说移植到这里,使之具有马德里特点,地点在‘半人半马’……”

“那儿全是假女人假男人,”马尔洛维说,他为熟悉小说尚未描写的场面感到骄傲。“我去过那儿。”

“马尔洛维,谁那样说呀。”

帕科站起来,过一会儿拿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埃斯贝哈为他准备的合同。他递给莫得斯托,请他看看。

“这次不会像以前那样了。一切都要合乎法律。”

“帕科,我对你这个人真搞不懂,你怎么又要同那个人打交道,你不是要把他送上被告席吗?你怎么能相信他呀?”

---

① 阿玛宗人,希腊神话中善战、善骑射的妇女族。

“我并不相信他。可是，我生来并不是当老师的。我的事业是侦探小说，我熟悉，如果可能，还是写这种东西。埃斯贝哈希望我和他一块儿干，去布列西亚多斯大街，有合同，有工资。原则上是下午工作，而他几乎大半个下午不在，小埃斯贝哈又不愿意听别人讲那事。人们把他看做经济学家，应该在别处工作，他对父亲说过，别想让他管理出版社。正因为这一点，老埃斯贝哈才来求我。现在，我们已经是个大家庭了，老埃斯贝哈，克列门蒂娜和我。多拉同意。”

多拉点头表示同意那个说法，同时把脸部的头发移开，谁想看的话，可以从她的微笑里看到她表示同意并非出自真心，而是模棱两可的。

这样，那便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巨大变化。不过，还发生了另一个变化，属于秘密那类的，只有帕科·科尔特斯觉察到了。

“帕科，我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多拉对他说。“夜里我们睡觉时，有时我常常醒来。有时则梦见醒来。但情况总是一样的。我想起了他。想到他带我和姐姐去雷阿尔城看斗牛时的情景，那时我们八九岁的样子。他有赠票，领着我们，为两个女儿感到骄傲。在那时，我们看见他总是一副笑脸，衣着打扮像个斗牛士。妈妈不去。他领着我们姐妹俩。我还记得买他的第一辆 1500 时，我们去石鸡坡喝饮料、试车的情景。我还记得许多幸福时刻，瞬间即逝，但那是百分之百的幸福。我对他非常亲。我无法不让自己表现得那样。事情很奇怪，因为你无法想象他对我的伤害有多

大。有时,我记起我们结婚时的情景。他喝醉了,他向我告别时,他放声哭了起来。那时看见他那副样子,我感到很恶心,我还记得他对我做的那事。”

“对你做了什么?”帕科问,他觉得他妻子讲的是他没有给以足够注意的什么事。

多拉为自己说走了嘴而一下子瘫了似的,立刻设法从窘境中摆脱出来:

“那种事,那么多年对我们大家做的那种事……但是,在梦中,他来向我们告别时,看见他那副样子,被人杀了,我的心都碎了。”

“只在梦中。”帕科想安慰她。

“我们小的时候,我觉得他还不是坏人……”

“多拉,像你父亲那样的坏人,生下来就是那种人。”

帕科开始不知道对妻子的想入非非是断然阻止还是置之不理。

“可是,多拉,现在你父亲倒成了圣神。”

“是周围环境使他变坏的。”

“你们的周围环境,不是比上天给他的好得多吗?你们母女并没有变成坏人呀。”

“是这样,可是……”

几个星期里,她每当提起父亲时,父亲的形象都发生明显变化,她无法控制自己,总是要谈起他,因为他死后要办理许多证明,多拉不说“爸爸”或“我父亲”,而是“可怜的爸爸”或“我可怜的父亲”,而如果不经常谈起他,是因为他死的那种情况,应该说是令人羞辱的,这阻止她那样做。

帕科·科尔特斯对于岳父的死是恭敬的，尽量不在多拉面前提起这事，免得去忍受那种场面。

他岳母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她对女儿的变化没有置若罔闻，不得不同意，表示有同感。自从丈夫死后，她下午常常和他们一起度过，或者把小外孙女留在身边。帕科对岳母既怀有亲情又有怜悯，每次去接小女儿时，都留下来与她聊天。

她是典型的警察妻子，对她来说，一生中的天地只是：晋升再晋升，一个五年[1] 又一个五年，对警察所的仇恨，服役，同事间的报复，上级的凌辱，特殊任务，令人不快的出差，讨厌的学习班、短训班，平常那些事……但是，她对那一切实际上没有兴趣。堂路易斯被害身亡对她是范围宽广的解放，她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则把那种感情视为罪恶的、没有人性的想法，赶快埋葬掉。

“孩子，”她对帕科·科尔特斯坦白说，“我觉得什么都很奇怪。到现在我还不相信他已经死了。你不知道那多么让人感到轻松，请上帝原谅我。”

很难知道她讲那话的意思是勉强接受了那个悲剧式的结局，还是对她肯定暗自——她可能从来没有承认这一点——盼望的解放如此迅速而广泛地降临始终不敢相信。

她像丈夫活着时让她过着惨不忍睹的生活时那样放声哭了，心中有幸福感和罪责感，那是幸福的眼泪，同时又是

---

(1) 在西班牙，依据职业的不同，国家工作人员有长短不一的考核期。考核合格者，给予增加津贴。

罪责的眼泪，因为她是个虔诚教徒，不应该为任何人的死感到高兴，而一生又是那样不幸，不应该把那幸福拒之门外。正因为这一点，她始终坚持，她忍受了只有她和她的忏悔神父知道她忍受了的痛苦。

但是，一天下午发生了一点事。薇奥莱塔放学后，外祖母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帕科·科尔特斯要去那里把孩子接回来。

帕科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些赶到。他到出版社工作，他的工作还不很明确。五十多年了，那里的事情，印刷厂呀，分销商呀，退货呀，招贴广告呀，收据呀，一直自行运转着。一次，克列门蒂娜曾经对梅生说过：在这里，我们看守着一切。正是由于这样的呆滞、惰性，工作已经不能称其谓工作，那是一种舒适的看守。很多时候，在同老埃斯贝哈预先商定的时间，即晚上八点之前，帕科·科尔特斯便离开出版社，一边散步一边步行回家。

那天，他七点便到了岳母家。岳母住在桑斯·德·巴兰达大街，那套房子坐落在一幢三十年代楼房上，阴森森的，到处是又长、又高、又阴郁的过道。

多拉去看医生，提前看完病，不到约定的时间就把孩子接走了。

“她说往出版社打电话找你，”岳母对他说，“但你已经出来了。”

他看见岳母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摆着小盒子、大盒子、卷宗、泛黄的信封，还有各种各样的文件，个人的和加盖印章的，家庭的和商务的，信件和旧发票……

“我在打扫卫生，”她这样说，为房间那样凌乱找理由。“我得找点事干。”

那是她孀居后头几个小时，喝了酒，不多，控制着酒量。

文件旁放着丈夫的手枪，老式的卡迪克斯，放在黑色皮套里，难看，使人感到压抑，油光光的。

帕科·科尔特斯看见左轮手枪心中一阵恶心。岳母可能发现了他的表情，因为她急忙把手枪从眼前拿走，仿佛那是一副陈旧的假牙。

“我说了不下三十次，叫他们过来把手枪拿走。”

她叫帕科·科尔特斯坐下，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而自己斟了一杯桂皮颜色的浓稠白酒。

一个纸包有被撕成四块的纸张露出来，而照片却半露半掩着。

“最少四十年没看了。”岳母对他说。“我知道放在那个大盒子里，但我不想看。过多的过于悲伤的回忆。”

帕科顿生猎奇感。岳母想遮掩起来，与此同时露出一丝过于做作的微笑，她想以此表明自己是坦诚的。

“你能看到什么？没看见我都这么老了？”

那些照片中有她童年照片，她父母照片，路易斯照片，她丈夫父母照片，他年轻时照片，她独身时照片，以及好久以前的照片，别人——帕科不认识他们——的婚礼照，男人和女人坐在婚宴上，杯子里仍然闪耀着幸福的七彩光，人们在宴会上翩翩起舞，还有女儿的照片，他们全家四口人在那辆 1500 汽车——多拉在前面谈起过这辆车——前的照片，都是女儿多拉和安帕利托出生前的照片，出生后的照片

也……

“这是我的婆婆……”她开始讲起来。

看上去那女人七十岁左右，是一张四分之三开张的照片，四周被涂抹过，如同公墓里常常放置的那种照片。她是一个肥胖女人，几乎是游艺会的怪物。她的脸好像要突破照片的边框。那道短髭使她显得厚颜无耻，可笑，可怕。她穿一身黑色衣服，这多少掩盖一点压在珍珠项链上的肥厚下巴肉。她半侧着身子，能够看见她的一只大耳朵，也吊着一颗珠子……

“她简直让我无法活下去。她是个魔鬼。这没有使我哭泣。我们结婚不久，公公死去了，她便来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年，直到去世。她整天唠叨，说我没有用，什么也不会干，她儿子做了一生中最大的错事，因为同那样一个小姐结婚……在那个年代，路易斯夜里已经常不回家。在那种地方过夜。他说值班。我婆婆知道这些事，因为他结婚前可能就是那个样子。但是，不管儿子做什么，她都疼爱如初。他一直是掌上明珠，后来又成了独生子，所以对他爱不释手。他好像一个未婚男人。开始我还有力气，我们常常争吵。我婆婆从她房间听我们吵架。第二天，她一见到我就这样说，他重又到外面去，是去寻找在家里找不到的东西，她认为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她很坏，坏透了。她那样说是为了侮辱我。我对路易斯从来没有讲同他母亲争吵的事。如果说了，肯定使他怒火万丈。我批评他母亲呀，那可要使他发疯的。一天，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举起手，站在我面前，把巴掌伸得老大，好像控制住了才没有拿我脑袋

撞墙。他性子很暴。每次喝酒以后，都要发脾气。一天，他对我说，我如果有胆子的话，就和我母亲回家去。我们已经把我母亲送进一家疗养院。由于发生那么多事，战后我母亲就疯了。对我说那种话，太狠了，太可怕了，我才十九岁，还是个孩子，那时不得不把母亲丢在那儿，不得不对她说，你留在那儿吧，可是……听不懂。”

岳母大声呻吟了几下，嘴唇发干，用那讨厌的白酒润一润，又继续讲下去。

在那以前，帕科从来没有同岳母认真谈上五分钟。他成家那么多年，两个人只是互相寒暄几句。这次，他对那一切感到很奇怪，对他来说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梅生很可能这样说，过了那么多年，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我还是和我丈夫过下去。从那一天我知道了，我这一辈将受尽折磨。每当我往下坠落一寸，他都长高一尺，狂暴增加一尺。谁都想象不出我在那个家看到了什么，谁都想象不到，包括多拉和琼，我不得不忍受了什么……太可怕了。我都吓坏了。对于生活，我一无所知。你们想象不到战争时的情景，你们太年轻了。我对自己说，他和其他男人不一样，他说什么我都相信，因为我已经不知道可以相信还是不相信那些东西。后来，把他派到外地几个月，不在马德里。我想，这儿的生活会方便些，我婆婆会留下的，不会跟我们走。但是，我们不得不带上她，她整天发脾气，埋怨不得不住在一个那样无名省城里，和小村子没什么两样，于是又拿我出气，因为她不能对儿子发脾气，尽管他说他比谁都不喜欢那个地方，但我知道是他自己提出调动的，因为可以

晋升,另外他也喜欢那工作。在马德里,你也见不到我的影子,在这儿或那儿对你有什么关系,反正你整天都做那些事。那是地狱。我根本不想记起它。他工作很忙,每天都把逮捕的人送到他们那里。他几乎不在家停留。总是在外面。而我在那儿,同婆婆关在旅馆里,关在那个我们不认识一个人的省城里。他的衬衣都是由我洗,他不愿意洗衣女洗。他把衬衣拿回来时,如果不沾上口红的话,就染上血迹。还好,请上帝原谅我,过了三个月,我婆婆死了。后来,琼出生了,我们又被调回马德里。一天,他说,游击队的人已经对他判决了,他们是从逮捕到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而且他有了妻室,便提出调到马德里。我十分担心。我总是想象着,他随便一天都有可能被杀死……你的岳父不是好人,帕科,他对任何人都不好。你如果追问我的话,我要说对你母亲也不好。他容不得她,他容不得任何人,实际上他恨每一个人,所以开始酗酒,尽管我认为好久以前,即战争期间他就开始酗酒了。战争使所有人都变成了酒鬼……”

岳母仍然拿着她婆婆的照片,不知道如何处理。她好像从梦中醒过来,轻轻摇了摇头,把睡梦赶走,把那张照片重又放回盒子里。帕科控制住猎奇心,不敢看那里的那么多照片。有些照片很小,是证件照,他岳父的照片,有的身穿长枪党制服,有的只着便装,唇胡有点长,没怎么修剪,穿制服的照片,没有留唇胡。

他回到家里,多拉对他解释说没能及时通知他,也没能给他捎个口信说去接小女儿,帕科呢,也做了解释,为什么晚回来两个多小时。

“怎么遇见我母亲了?”

“遇见了,她在整理文件,打发时间。”

帕科把同她母亲的谈话内容讲给了妻子。多拉对他说:

“是有些奇怪;她讲的有一大半东西我不知道。也许我姐姐都不知道。”

下个星期天,多拉装出生气的样子对母亲说,她对帕科讲的她和父亲年轻时的事,几乎有一大半对她没讲过,母亲则竭力辩护说:

“孩子,我对你讲过不下一千次,只是你不记得了。”

这时话题变了。讲述心里话的合适时刻已经过去,也许永远不会再出现,恰如那颗彗星再回来时,我们早已死去。

不过,那天帕科和岳母谈了那么长时间,这位前小说家已经找到了破获岳父被杀的关键。

他甚至都没有把他的怀疑讲给多拉。第二天,他打电话给马格利特。他说事情十分紧迫,必须马上见到他,不过在电话中没有透露出什么,他担心多拉听见。之后,他又给梅生打了电话。三个人商定在原来的商业咖啡馆见面。

马格利特比另外两个人早些到达会面地点。他走进咖啡馆,他们已经好长时间没到这儿来了,现在有回到家乡的感觉。那里的东西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单腿小圆桌,镜子,顾客,柜台,服务生……一切和那时、和已经变得模糊的那时一样。但是,在那面患了麻风病的镜子里,他认不出自己。

当 ACP 聚谈会成员聚在一起时，他拥有的东西很少。但是，他那时的生活并不缺少内容。他认为，友谊本身就是生活，就是生命。堂路易斯死后，他们还可以继续见面的。恐惧持续了很短时间。没什么严重的。事情没有解决，可是百分之三十的凶杀案都是无法解决的呀。他记起了，在那个咖啡馆里，他不知多少次在心里暗暗地说：完美的罪行之所以是完美的，并不因为发现不了凶手，而是因为无法证明谁是凶手；由此，一个人看上去像罪犯，就不能还他一个清白。

马格利特看见梅生走进来，便举起胳臂，让他发现自己。梅生看见马格利特在那儿，不禁惊了一下。帕科·斯帕德没有对他们两个人中任何一个人说另外一个人也被约会了。

“终于有了这么一天。我们 ACP 聚谈会的人又重新上马了。”梅生一坐到他朋友身边就这样宣布说；那个惊喜一下子使这位律师心情变好起来，并且唤起他的遐想：

“托马斯，今天给我们上一瓶威士忌，麦芽威士忌，真正的，不要国产的……”

“或者我们并不是重新上马？”服务生走远以后，梅生问。

“我想不是重新上马。”警察想让他明白过来。“好像没有那种可能性。”

帕科·斯帕德还没有到。这两个朋友谈起了他们现在的生活。

“莫得斯托，我对生活厌烦透了。如果有可能，我想放

弃现在的工作。可是,一个警察能做什么呀?无论你走到哪儿,你都是一个警察。仿佛你是军人一样。军人和警察永远是警察和军人。就像神父一样,即使结婚了,还是神父。有些职业太坏了。”

“按照那个比例法,我也要发生同样的事。没有一个人满意自己的事。”

“我们 ACP 聚谈会成员举行会议时,我们至少有一点更有价值的东西。”马格利特说。“我怀着真正的幻想盼望聚谈会的日子,就像足球球迷盼望他们球队的比赛一样。只是我们关注重要事情。知道一个人为什么杀另一个人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可能的话,知道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以后,怎么还能身上背着罪行生活下去也是十分重要的。邪恶的本质和谎言的本质。而另一端是善良和真话。在这里,我们好像很开心,但小说和罪行那些东西是很严肃的事。至少我对那些事是严肃、认真的。”

“还有我呢。”莫得斯托·梅生同意地说。“对于我来说,另外还需要知道一些东西。我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了解帕科,我是看着他开始起步的,他的生活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喜欢看见他写作。你一定看见过他一个星期就从头脑里创作出一部小说。真不可相信。他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写作。对于我来说,那是最美好的,我从未有过那种事。他向我咨询些事,问一些事,请我为他写起诉报告。一切与法律有关的事,都由我来解决。有些时候,我还为他解疑释惑。由于他不到外地去,我要给他描述我们去过、经过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给他带回各地的旅游指南,各个城市的平面

图。他常常要我给他讲述送到我办公室的案件。我有个客户,他把他的一个代销商送上被告席,说此人把两大提包精美假珠宝占为己有。我把这事讲给了帕科,我根本没有想到,他竟然给你写出一部枝繁叶茂的小说:《你不要做那事,轻浮的女人》,完全取材于珠宝那件事。你给他讲什么,看上去他没有注意听,可他完全塞到脑子里,然后从脑海里出来时已经是产品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再相聚、会面?”洛伦索悲伤地问。“我们大家都想念 ACP 聚谈会,为什么不保留它?”

“我多次向他试探过,可帕科总是这样说,你们聚吧,别算我。我对他说:可是,你去去,有什么难的? 以前不是很容易做到吗? 去吧,你坐在那儿,我们其余的人聊。可是,他已经不想那个了。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它的时间。我觉得这一点对他有伤害,对于小说创作的事,再也不想知道什么了。对于他来说,那一切已经结束了,已经干枯了。他看看另外一些刚刚起步的年轻人,看看那些一切向其微笑的人,便认为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不谈那事,但我知道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月之前,他开始重新在出版社工作,我又发起攻击。我对他说,你现在又同侦探方面的事打交道了,我们也该开始举行聚谈会了。是不是,帕科? 他对我说,不,现在比以前有更多的理由。我有家,我要挣点钱,把二十年间没挣到的钱挣回来。我们一无所有。我已经不再写作了。我问他,那么,你在出版社做什么? 他回答说,改头换面。找别的人来写小说。我对他说,那么,ACP 聚谈会成员允许你继续当正式成员。而他对我说,不,当把

罪行当做消遣的时候，聚谈会对我来说是有存在的必要。当罪行变成工作以后，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我什么都不相信；我一直在想，某一天可以写我自己的小说，我的小说，不是杀人凶手的小说，不是警察的小说；那一切与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的生活是和平生活，但需要一个地狱以幸存下来，在纸上描写这个地狱，需要在一部小说里结束另外一些人的生命，以使我们的生命有点价值。但是，实际情况是，如果说生命有点价值的话，就在于生命的意义，我一直在想，某一天我要写一部我的炼狱的小说，而不求助于别人的地狱。不过，那样的时刻没有到来，我知道已经不会到来。我的地狱是不能写一部只是我自己的小说；我的炼狱是知道这种境况，我的可怜的天堂是写了三十三部使我之外的其他人都幸福的小说。我对他说，帕科，你可以使那两样东西，使侦探小说和你的小说重合起来；我对他说，骑士，骑士和塞万提斯有什么关系？帕科这样回答我，我不是塞万提斯，而为了做到你提出的那一点，应该是天才，而我不是天才。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是天才。侦探小说是思维小说，而小说是来自生活的东西，不是来自方程式。已经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侦探小说家，但是这个文学品种的救世主，侦探小说的耶稣呀，侦探小说的塞万提斯呀，侦探小说的莎士比亚呀还没有诞生，我并不是那个救世主。一个既哼唱小说的最动人心弦的哀歌，又哼唱他的天鹅之歌[①] 的人。他还对我说，另外，你一旦看见一个人围着一个东西兜圈

---

① “天鹅之歌”，意为辞世之作。

子,就会对那东西失去兴趣。”

“没有他,ACP 聚谈会不可能是一样的,不是吗?”马格利特说。

不知道洛伦索那是肯定,还是提出那个问题时留下一道细缝,看到希望。

“在团体里,总是要有个人是骨髓。没有骨髓,那一切如同一堆骨头一样散落下来。有了骨髓,骨头就能站立起来,还能行走。其次,ACP 聚谈会已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了。玛尔普莱小姐、歇洛克、布朗神父对聚谈会表现得那样恶劣、扔下聚谈会不闻不问,你还重新和他们坐在一起? 他们简直是胆小鬼。他们可以成为完美罪行的朋友,但首先成为朋友们的朋友,如果一个朋友成了罪犯,更有理由是朋友。”

“还是你说得对。”洛伦索承认说,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而我们在这儿等什么呀?”

帕科·科尔特斯过了半个多小时才露面。

“你们知道吗,波埃已经不住在马德里了?”

那两个朋友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我这是从马尔洛维那儿来,我刚才和他在一起。我路过他父亲的表店。把他拉去喝杯咖啡,波埃没和我们当中任何人告别。他为什么这样呀? 我们大家对他都很好。为什么对我们不辞而别? 真让人沮丧! 马尔洛维对我说,亨娜的死对他打击很大。不和任何人讲话,不给任何人打电话,非常沉闷。几乎不出家门,他的表现很反常。他本想回家乡,但没去那儿,卡斯特利翁有个空位子,他便去了那儿。

完全可以告别的呀。亨娜的那些事,最后是什么结论?”

帕科是在问马格利特。

“什么结论也没有。说是吸毒过量。我不太清楚。我甚至都不想知道。骨灰送回丹麦了。”

“波埃走了。这个小伙子呀!真是个怪人。”梅生感叹地说。

“可是非常聪明。”马格利特补充说。

“我正想要对你们讲这一点呢。”帕科说。

梅生和马格利特对视了一下,马格利特又重复说道:

“他非常聪明,只有他一个人看出佩斯大街那位老人是自杀。”

“我来说说这事吧。”帕科·科尔特斯说。“我们在聚谈会上议论那事时,波埃说,一个案子的一半要从了解受害人的过去和嫌疑人的过去来侦破。我不知道谁可能是我岳父之死的嫌疑人。但我确实知道,在那个案子里,受害人可能同时也是嫌疑人。”

“什么?你是说有人杀害了你岳父,而那个人就是你岳父?”洛伦索·马格利特说,“帕科,实际上,你已经不是从前的你了。”

“我是说,是我岳父的过去杀害了我岳父。我岳父是内战的另一个牺牲品,或者说,他自己的牺牲品。”

“劳驾了,你别张口内战闭口内战的了。”警察央求说,“我对内战已经厌烦了。稍稍提下内战,我都受不了。再出现内战电影,我们大家都得自杀了。不要讲过去的事了,不要再讲游击队的事了,不要再讲国际纵队的事了,不要再讲

谁输了战争谁赢了战争了。他们输了战争或者他们赢了战争。输赢不是我们。我忍受佛朗哥主义和佛朗哥统治四十年,已经厌了。我听那些打赢战争的人喋喋不休地讲话,忍受了四十年呀,不能再听人们讲述战败者,再忍受四十年。我更无法忍受那些智慧超人的人,他们说什么内战不是内战,是非内战,那场战争谁也没有赢,而是西班牙输了战争。难道在西班牙除了内战和埃塔,再没有别的什么了?在佩斯大街那位老人的案子里,我同意。但他自杀,一定是疯了。当一个人自杀时,是因为他很久以前就死去了。内战期间,那个老人就被打死了,这么多年他几乎不知道。这我也同意。在那种意义上,波埃说对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和那个老人一样。那个老人同堂路易斯有什么关系?堂路易斯是个畜生,这你知道,帕科,我们所有同事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他为打过内战、打赢内战感到高兴,还想打内战。但如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当杀死他时,我想他不会想到内战。当杀死他时,他一定很平静,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深深卷入了二月二十三日政变中,但最后把他排除在政变阴谋之外了。所以请你说说,一件事同另一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

"应该有关系的。"帕科说。"我并不是说同遥远的过去有关系。可能同近期的过去有关系。"

"调查了,"马格利特说,"最重要的案件,我参与了最近五年案件的调查。"

"为什么只最近五年的案件?"

"因为在那个时间期限里,我们大家都会把事情忘

掉的。”

“如果不是疯了的话。”

“在那种情况下，随便一件事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谈论疯子的话，最好去呼叫精神病护士，而不去呼叫警察。”马格利特说。“有些案件是牵连在一起的，毒品案吧，一个团伙专门偷盗珠宝，它把店主大卸八块，另一个团伙专门伪造文件，第三个团伙在托雷莫利诺出售公寓，专门向人们诈骗钱财。可是，我们一无所获。那些案子，没有一件跑到富恩格拉拉那么远的地方。”

“不对，波埃说的是很明确的。侦破案子，一半在于过去。”

“好一个推理呀。”梅生说。“那东西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是这样。但人们讨厌寻找。”帕科说。“人们不喜欢过去，甚至不喜欢大教堂的过去。很快就厌了。人们对过去感到惧怕。喜欢吃当今的虾。在最近的地方和东西里寻找，因为远离几步，他觉得累，因为你离得越远，越容易迷失方向。当你加大活动范围，事情越加困难，你越需要更多的手段，特别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如果说警察需要什么的话，需要的就是那两样东西：手段和时间。可那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工作。一个私人调查员。”

“你现在是不是又要搞侦探公司了？”梅生问。

“不是，那是个人的工作。我们这样说吧，我是为了家人的利益去破获那个案子的。”

三个朋友凑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没费多大劲儿便把堂路易斯的生平重现了起来。

他，于一九一八年出生在埃尔费罗尔，和独裁者一样，他也出生在这个地方。这种情况使许多人认为佛朗哥亲自保护了这位同乡的仕途青云直上，至少在最初的年代里，有两三次关键时刻关照了他，而如果没有一个权势兼而有之的保护人，他的仕途会像许许多多人一样原地驻足。也是与佛朗哥的同乡关系并且得到后者的保护，才能解释堂路易斯对他为什么怀有爱。

不过，帕科认为他岳父与佛朗哥之间除了是同乡外，再

没有别的关系。如果像流言蜚语讲的那样，堂路易斯与佛朗哥有什么关系的话，他会知道的，因为那种事家里人都会知道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再次问了问岳母。

“路易斯认识他，因为他也是埃尔费罗尔人，他还认识佛朗哥的父母、兄弟姐妹。”岳母对他解释说。“现在，只是这么多。一次，那是战争结束后，路易斯执行任务与他相遇。手下人对他说，阁下，这个小伙子是您家乡的人。那时我们还没有结婚，我还不认识他。佛朗哥问他，您叫什么名字。佛朗哥非常傲慢，对所有人讲话都以‘您’相称。路易斯回答完，又对他说，我认识您的父亲和您的祖父。后来，再没有讲过话。”

但是，许多同事知道他是埃尔费罗尔人，便猜测他与那个军人应该多少有点关系，对此堂路易斯没有否认，从而不时得到好处。

那些回忆又引来别的回忆。

“共和派分子还杀了他的一个兄弟，是长枪党成员。”阿松西翁继续说道，“说老实话，你们无法想象战争期间马德里是什么样子，无法想象我们看到的事……”

她好像要说，如果不是由于佛朗哥，那些人肯定会干掉他们的，不放掉一个活的，不是他们的人，绝不放掉一个。

现在对帕科来说，那已是一样的了。他又对岳母说：

“我正在写一部有关那个年代的小说，需要创造时代气氛。你能不能让我看看路易斯的材料？”

“可是，孩子，你不是把你的小说都放在外国环境里吗？”

“是那样,阿松西翁。可现在时代变了。”

那只是一个计谋,想再看看那一大夹子照片,那天下午去接女儿薇奥莱塔时曾经看见过。

帕科偷偷地,什么都没有对多拉说,利用从岳母家接回小女儿的机会,经常光顾那里,用些时间看那些材料,在许多情况下,借口帮助岳母整理。

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看他的岳父。他活着时,他出现在哪里,就把影响带到哪里,他本人是那样令人讨厌,外表丑陋、衰弱,有一张葡萄酒颜色的脸,那是酒精浇灌出来的,指尖染着尼古丁,富有嘲讽意味的唇胡,修剪得像戏弄法西斯分子一样,那副深色墨镜把他自己漫画化了。他与人打交道的方式是,总是寻找最能伤害谈话的对方,精心选择最恶毒的词、最刺伤人心的词,对陌生人,那样彬彬有礼,那样虚伪,那样亲切,对最接近的人从来没有过的亲切;他很诙谐,可以使任何一个人晕头转向,甚至以为他是一个很欢快的人,可以对他进行各种判断的那一切渐渐消失了。他的方法很科学。

帕科看着那些照片,竟然觉得面前是那样一个人,可以毫无危险地走近他。面前的好像一头死去的害兽。

堂路易斯年轻时甚至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由于照片上看不出身材多高,在身份证上、驾驶证上、警察证上、代理人证上……好像还显得英俊、潇洒。还有别的东西也能唤起兴味的,比如一张旧的剪报,上面有将何塞·安东尼奥①

① 指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

遗体运往马德里的照片，一支庞大的送葬马队，点着大蜡烛，五彩缤纷的晚霞，满天星斗，富有诗意的远景；在这张剪报上，有一支用手画的箭头，墨迹已经陈旧，箭头指向一大群人中的一个年轻人，可以推测——不是从相貌相似，而是从制服、皮带、蓝色衬衣上——那是路易斯·阿尔瓦雷斯。

阿松西翁·阿布利尔把那个盒子推给帕科，但看那样子不准备继续讲述第一个下午的那种心中秘密。

“孩子，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都不记得了。”她挑选这样的词句，是想改变话题。

岳母对他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讲述了那么多东西，应该满意了。共同生活的全部历史简述在笔记本的一页纸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认为所有人的生活缩化成一页纸。对于某些人来说，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难找到点什么置于墓碑——这墓碑立在公墓里，立在他们的遗体之上——的两个日期中间。

“这是我了解到有关我岳父的情况。”那次在商业咖啡馆约会过了十五天，帕科对他的朋友这样说。“他一九一八年生在埃尔费罗尔。他父亲是海军，退役时是少校，死于一九三六年，即战争开始后两个月。一直生病。他母亲住在埃尔费罗尔，直到战争结束后她儿子想留在马德里，儿子把她接到那里。他在两兄弟中是弟弟，哥哥是长枪党党员，在马德里被打死。据我岳母说，路易斯的母亲是粗鄙女人，真正的少校夫人，养成了下达命令的习惯，粗暴，专断。让她无法生活。她认为大儿子被杀害，这给了她各种权利，任意对小儿子施暴。战争爆发时，小儿子在圣地亚哥读法律

系四年级。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起,在长枪党第三团当志愿者,战争结束时,他同军法处紧急处治科进驻马德里。那段时间迷雾重重。我岳母又不想给我讲任何东西,也许因为她记不得了,也许因为他们那时还没有相恋,也许因为她不想讲。”

“这儿由我来接着讲述。”马格利特说。“他五月十六日到达马德里,立刻派往一个什么刑事调查局。已经成为警察。他可能读完了法律专业,因为他在各种登记材料上都说明是法律硕士。”

“看样子法律这个专业把四面八方的垃圾都收拢在一起。”梅生哀伤地说,那是为法律界感到悲痛。

“也不需要那种专业知识,但是毫无疑问,这个专业助了他一臂之力,因为他很年轻时就当上检察官。那时他才三十二岁。头几个月在巴伦西亚的集中营工作,辨认囚禁的人,后来在阿尔马格罗大街的所谓特殊案件中心工作。”

“太糟糕了。”梅生断言说。“那些案件充斥战争法庭,从那里出来的人被判处一次或多次死刑,这是检察官提出的。”

“我接下去。”马格利特打断他的话。“他一九四〇年提出调到蓬特维德里,想离他母亲近些。他的请调报告得到了批准,但过了九个月又同母亲回到马德里。那时,他认识了你岳母,三个月后同她结婚。他被提升为分队长是结婚以后的事。”

“战争使所有人做事都急促促的,我家二老的婚礼也是那样。”马尔洛维说;马格利特请他加入进来,顺便说一下,

帕科·斯帕德对此很不高兴。“只是我家二老的事更有趣：他们结婚以后才一个星期，我的老头子就同蓝色师去了俄国。简直都疯了。”

“我觉得多拉应该知道，她母亲和父亲只谈三个月恋爱就结了婚。”帕科说。“她大概给我讲过一次。”

“先孕后婚，那是正常现象。我家的二老也是先孕后婚。”马尔洛维推断说。“看来所有人都是快速结婚。”

“也许以前就认识，”马格利特指出，“但是，他回到马德里以后两个人结婚。如果谈上恋爱了，那段时间没有见面或者很少见面。那时是他的第二次调动，已经晋升，工资很可观。他很年轻，二十四岁。他们把他母亲接了来。”

“调动？往什么地方调动？”帕科·斯帕德问。“调到阿尔瓦塞特，是不是？”

“好家伙，你他妈的怎么知道？”马格利特这样回答说。

“谁是阿尔瓦塞特人？”帕科这样问，也算做对马格利特的回答。

梅生和马格利特对视了一下，对那个问题不甚了了。他们停了一会儿，在脑子里思索着。他们不知道谁是阿尔瓦塞特的人。

“波埃是阿尔瓦塞特人。”马尔洛维说。

“我以为他是一个小镇子的人。”马格利特纠正说。

“是一个小镇子的人，名字叫阿尔莫尼亚。但他的老家是阿尔瓦塞特。”马尔洛维介绍说。

“而那和你岳父有什么关系？”梅生问。

“只是一个直觉。”帕科说。“波埃是怎么出现在我们聚

谈会的?”

三个朋友中没有一个记得细节了。帕科解答了那个问题。

“他说在这座楼上的学校学习。他还对我们说,准备进大学。是不是这样?”

梅生和马格利特开始记起来了。马尔洛维同意帕科的说法。

“我去过大学校长办公室。看见了波埃的学历材料。他在大学注册的是下午班,但在法律系三年级,这就是说他两年前就入学了。他为什么在这样的事情上说谎,不是太天真了吗?”

“你这不是把话题拖得太远了吗?”

“战争结束以后,在阿尔瓦塞特进行的镇压很可怖。死了好几百人。这事所有人都知道。”

“又是内战?”马格利特问。“等一等,帕科。你岳父是一九四九年重新调回马德里的。”马格利特看了看一张纸条,上面抄录着堂路易斯的工作简历。

“另外,”马格利特补充说,“波埃的父亲大概死于六十年代。”

“准确地说,是一九六〇年。”帕科·斯帕德确认说。“波埃生于一九六〇年。他现在二十二岁,或者今年满二十二岁。”

“你这不是在暗示,波埃对什么有嫌疑?不合乎逻辑。”梅生说,他又关心起逻辑来了。

“在内战的这些事情上,逻辑学根本派不上用场。发生

的事情也是没有逻辑的。惟一应该知道的是，在波埃父亲和我岳父之间是否有联系。”

“我们这样想象一下，就算有联系吧，是生活把他们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在这里，一个人的儿子杀死另外一个人是那样令人难以置信，如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部小说。”

“洛伦，你别总把阿加莎·克里斯蒂挂在嘴边上。”梅生提醒说，他一副痛苦表情。

“一时心血来潮。”

“心血来潮？”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心血来潮时写成的。每个人都有心血来潮的时候，案件常常能够侦破，也是因为侦破人员心血来潮。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人有心血来潮的时候，而西班牙人没有。我是说，”帕科继续说道，“波埃是个特殊人物。他内向，严肃，做事用心。他非常聪明。从不相信任何人……”

“相信马尔洛维。”马格利特说。“对我也相信。在他去卡斯特利翁之前，我们一直见面。他并不很内向。和我在一起，有话说。”

马尔洛维看了马格利特一眼，但没说什么。

“有关他的生活，他对你说过什么没有？”帕科问道。“你们在一起那么多次，你对他有什么了解？你如果知道什么，现在该是说出来的时候了。如果他那条线索是错的，我们就丢弃它。但是，你什么也讲不出来，因为波埃从不讲他自己。他甚至完全可以看做一个很开朗的人，善于社交。喜欢加入到谈话中来，也讲话，但实际上谁对他都不了解。”

“那是实情。”马格利特承认说。“第一天他对我说，他没见过他父亲，因为他出生时父亲就死了。从那以后再没对我讲起那事，也没讲起他的姐姐哥哥。他说姐姐和哥哥比他大好几岁。但他在那打住话头，不再讲他家的私事。”

“你对我岳父还知道什么？”帕科问马格利特。

“他回到马德里以后，再没有离开过。他的名声，你自己知道是怎样的。”

“那是，”帕科说，“等于什么都不知道。一定有人知道更多有关他的事。”

“一个警察的生活，”马格利特承认说，“一方面是他介入的案件，另一方面是他与同事们的关系。但是他们比谁都容易遗忘，因为他们无法带着生活抛在他们身上的东西生活。他们甚至对最接近的人都不讲发生在他们工作中的事，哪怕十分之一呢。一个警察总是过着两种生活，对于其中一种生活，准确地说，警务生活中的事，他们离开警察局时便忘得一干二净。不过，也常常发生一些引人注目的事。如果一个警察必须记起的话，可以记起甚至过去五十年的案件。”

“一定有个办法进到你岳父全部历史的中心。每个人的历史都有一个中心，没有谁的历史不可能进入它的里面。你们想想 ACP 聚谈会这个词的拆拼法，简直是个迷宫……”

“对，可是，”梅生提醒说，“那个迷宫，永远无法到达它的中心，刚刚碰到，就又把你抛出去。”

帕科意识到他没有选好例子，便立刻纠正过来。

“不过，在这儿，我们要使一个人到达终点。我们当中一个人要了解到关于我岳父的更多情况，另一个人要了解到关于波埃的更多情况。”

三个朋友的调查——就称为调查吧，总得给这项工作取个名字吧——遇到了与警察遇到的相似困难。

时间过去一年了，他们一直在这同一条线上进行清理工作。对他们几个人来说，直到那时生活依然如故。

当然啰，ACP 聚谈会成员没有重新聚会。有几个成员很希望恢复活动，比如尼录·乌尔弗，可能是最怀念老朋友的成员之一。他甚至开始启用新的记事簿，以及时记录每天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凶案，因为以前那几个记事簿已被没收了，无论怎样要求，至今没有归还，说不定某一天会像许许多多东西一样出现在一个垃圾箱里，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拾起来，拿到莫亚诺或拉斯特罗那里——实际上，确实被拿到了那里——卖掉。

已经没有人记得堂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也不记得波埃，更不用说亨娜了。生活依然平平淡淡。帕科，梅生和马格利特甚至看不见马尔洛维的踪迹。这个年轻的钟表商已经有了未婚妻，快结婚了，他终于自己亲自管理父亲的店铺。他已经没有必要像多拉某次怀疑的那样偷窃自家店里的东西了。现在，只有马格利特、帕科和梅生不时见面，一起共进午餐，互相介绍生活情况。

马格利特对自己的职业越来越失去信心，只是维持工作，没有大的业绩；梅生快退休了，每天处理些常规案子；帕科·斯帕德呢，在老埃斯贝哈死去——他虽然不喝酒，还是

得肝硬变,而且逐渐恶化,要了他的命——以后,征得依然是那个家族出版社主人的小埃斯贝哈的同意,开始负责出版社日常工作,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强化,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聘任了新的作者和译者。在三个朋友的感情生活、家庭生活方面,情况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马格利特也将于近期结婚,多拉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梅生的女儿做了修女。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做修女。”父亲痛苦地抱怨说。

“总是比警察好呀。”他的朋友马格利特安慰说。

“或者说,比向一个埃斯贝哈汇报工作好。”帕科确认说。

一天,发生了点事,这改变了事情的状况。

帕科的岳母,在丈夫死后看上去许多方面显得年轻了,但在另一些方面,即脑子方面,那种老态越来越让人担心,染上了新的怪癖,害怕社会党人取消她和佛朗哥时代服役的军人和警察遗孀的抚恤金。

很自然,这个怪癖在她的也是军人和警察遗孀的女友中得到了响应,她们大呼小叫地表明自己的忧虑,并且组织了一个照管她们利益的社团,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那是一个维护她们问题的社团。

“你岳父一个同事的妻子给我打电话,她丈夫很担心。外面盛传在警察内部进行清洗、缩减抚恤金。甚至有可能取消我的抚恤金。”

堂娜阿松西翁担惊受怕,一切都令她窒息。除了沿街乞讨外,她看不到什么前途。

“别担心,出了什么事?”

那是一个星期天，人们正在帕科和多拉家里吃午饭。

“在阿尔瓦塞特出了一本书，我这位女友的丈夫和你岳父在书里的境况不很好。”

她说的那位女友是卡门·阿尔米略，此人的丈夫也是警察所长，名字叫加梅洛·凡胡尔。

多拉知道母亲谈到卡门·阿尔米略和加梅洛·凡胡尔时是指的哪个人。她记得他们，她和姐姐都很小的时候，他们是父亲的朋友。帕科只知道那两个名字，但与本人对不上号。

堂娜阿松西翁不愿意讲起他们，而如果讲起他们，也不那么爽朗，她讨厌回到已经过去的、她认为彻底埋葬的生活，因此她确信生活并不是生活过的东西，而是记起的东西。她已经遗忘了一切。可她是无辜的，如同后来所知道的，她的丈夫路易斯也遗忘了一切，按照比例法，他的无辜并不逊于她。

“是本什么书呀？”多拉问。

“书里讲你岳父战后在阿尔瓦塞特做的事。”她对帕科回答说；讲那些事，她觉得面对帕科比面对多拉容易些。

阿松西翁生活很平静，有外孙、外孙女，两个女儿很孝顺，结婚四十年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了。那件突如其来的事给她生活带来了一些疑惑和不安。丈夫死了还不到两年，她已经觉得同他一起生活的漫长岁月已经是遥远过去的事，已经永远埋葬了。甚至当她提到那个和这个，即丈夫和过去——这一切都是同一团迷雾和痛苦的一部分——时，是以那样一种方式讲述，好像与那个和这个、与丈夫和

过去没有任何关系。比如，她从来不说“我丈夫”。从来不讲过去的年代。总是“你父亲”，“你岳父”，“你外祖父”，当没有别的办法时，她或者说“路易斯”，如同叫一个汽车修理工“拉米罗”。而讲起过去的时候，只是那个不确定的词儿“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这个词儿既涵盖她的童年时代，也涵盖她的青年时代或婚后时代。

“说你岳父做了可怕的事……”

阿松西翁摇了摇头，但无法确认她那样做是不同意那种说法，还是由于某种老年性颤抖造成损伤。她放声哭起来。多拉竭力安慰她。帕科保持沉默，并让在身边吵闹的小女儿薇奥莱塔安静下来。那个善良女人为什么泪流满面，这不是很容易解释的。当然啰，那绝不是因为她丈夫的在天之灵受到玷污或侮辱。她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她应该是诋毁他人格的第一人。但是，对于她这样的“另一个时代的女人”——她常常用这个词儿作为盾牌来解释她始终弄不懂的东西，而不是无法解释的东西——来说，我要再说一遍，对于她来说，堂路易斯仍然是她两个女儿的父亲，尽管令她痛心，她也仍然是与他共同生活了四十年，在那张床上睡了四十年的妻子。

不过，对帕科·科尔特斯来说，那消息令他兴奋至极。像条纯种狗那样，他觉得侦探特有的直觉猛然醒过来，接近真实情况的快感大大超过那真实情况可能给亲人造成的疼痛。他想到了多拉。

堂娜阿松西翁走了以后，这次，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不得不向多拉讲述，他、马格利特、梅生，还有马尔洛维，是如

何背着她竭力了解她父亲的情况的。

多拉默默地听着。她父亲悲惨地死去，一定在女儿的感情上造成一场真正的混乱。那如同巨浪的拍击，寝舱里的家具和器皿完全移了位。之后，一切恢复平静。父亲活着时，多拉从不放过机会，有意折磨他、气他，但他死后，她曾有过短暂的、瞬间即逝的快慰，之后便从不提起他。可以说，需要整整二十个月的时间才相信父亲在她心中真正地死去，永远从她感情中根除出去。

“我父亲的一切很让我痛惜。我已经没有力气忘掉他。”

他们两个人坐着。多拉心不在焉地抚摩着圆鼓鼓的肚子，她已临近分娩期了。

“你说说看，阿尔瓦塞特的事会不会给妈妈带来影响？”

“不会的。甚至报纸都这样说：在这里，除了警察什么都变了，所以在西班牙，事情可以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以前的人，还在。其余的就是你母亲的事了，一切对她都有很大影响。但是，我想问你一点事。假如你认识杀害你父亲的凶手，知道是谁，你揭发他吗？”

多拉对那个问题感到恐惧。她注视着帕科的眼睛，仿佛能从那双眼睛里获取可怕的真情。帕科发现了那一点，但仍然静静地等候妻子说点什么。

多拉用另一个问题回答他：

“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不过，是可以知道的。我只是希望你回答我刚才向你提的那个问题。假如你认识杀害你父亲的凶手，

你揭发他吗?”

“我想会……你不揭发吗?”

“我不知道。”帕科说。“很多罪行被看成罪行,但实际上并不是罪行;而另外一些罪行呢,实际上不是罪行,但被认为是罪行。你母亲只是从你父亲被杀以后才开始生活。你想想看,假如你父亲退休以后,她同你父亲朝夕生活在一起,那她将是怎样的。如果说他正常上班,那是个地狱,退休后呢,他每时每刻呆在家里,她将是怎样的?还不把她杀死,或者两个人不得不分居。你父亲如果仍然活着的话,你想想看……”

多拉觉得那个假设很不适当,不禁感到很震惊。

“我们从未看见我母亲像现在这样快活过。如果我父亲死而复活,她非死去不可。但是,帕科,对那当中的人不能视而不见。小说是一回事,真实生活是另一回事。这一点你知道得很清楚。在真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过着不完整的生活,不少东西是破碎的。那才是生活。而我们可以换来我们的小小乐趣,孩子们出生了,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和他们团聚。那种幸福是真切的。在小说里,坏的东西很沉重,但并没有一件真实的好东西。黑色小说之所以称为黑色的,因为在这种小说里看到的是人类垃圾。阅读黑色小说的人,这样想:我的生活比那些人的生活好得多,谁也不会向我开枪,我死不了。相反,我们设法看到生活中的洁净一面,是这样。我们有我们的乐趣。但是我们如果必须在良心上承受某个人的死的话,我们将无法生活。不单单是死亡,邪恶也是这样。邪恶只不过是谎言的面孔,

而谎言只产生罪责。这我在你写的小说里读过不下一百次。我们想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而不是丑恶的世界。而从文学角度来看,那也许并不是及时的、合适的,但我们应该生活,可不是生活在小说之中。为了生活,我们需要的不是虚幻,而是必要的东西。这是你这段时间一直对我讲的,想对我解释你为什么不再写小说。”

“人们也和谎言共处,也想创造一个美好世界。”丈夫反驳她说。“犯了罪的人,对别人表现不好的人,不会去警察局,并对警察说:把我抓起来吧,我是杀人凶手。谁也不会去某某朋友那儿,并对他说,我表现得像猪一样。我刚刚去了那个地方,对你施了诡计。对于另一点,对于堂吉诃德来说,为了生存,有虚幻就够了。必需的东西结束了他的疯癫,但也结束了他的生命。”

“帕科,你不要把我卷进去。你不是堂吉诃德。我已经知道,对,我已经知道,谁也不去他妻子那儿,并对她说,我在和一个妓女来往。我要说的是,我反对死,同样反对国家实行死刑,反对个人打死人或使人致死。”

“可是,他后悔……”

多拉又颤抖起来。这时她想起了她同帕科那次由米拉格露丝引发的谈话,那次谈话导致了他们的分手。

“劳驾了,别再吓唬我了。”多拉把双手放在肚子上,仿佛在保护胎儿不受到迫在眉睫的伤害。正因为她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便以可以提出问题的最后方式提出下面这个问题:

“你杀了我父亲?”

帕科皱了下眉头。多拉总是使他感到震惊。他不懂得女人到底长着一颗怎样的脑袋。他作为小说家的失败,其部分原因是对女人了解得不够。在他的小说里,出场的女人都是从别的小说搬过来的,而不是源自生活。在他喜欢的那些小说里,所有女人都是特别可预知的。坏女人就是坏女人,好女人就是好女人。没有一个像多拉那样总是提出你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

“是你,帕科?”

帕科立刻想出一个强硬小说家应该做出的回答,比如,这样说,“多拉,警察才那样提问题呢”。但他没有那样做,因为当一个人爱另一个人时,总是把自己摆在弱者的地位。

多拉十分严肃。电视机开着,那台电视机见证了她最后一次见到还活着的父亲。那一刻发生的事太重要了,好像阻拦做出答话。所以,多拉手里正好拿着遥控器,立刻把音量放小。

“帕科,告诉我。我有权知道。”

帕科是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她的。只要真实情况不对两个人中任何一个人造成伤害,他总是对她讲出实情的。但他等候时机。此刻,多拉坐在他的面前。他发现他使她感到惊恐。她和那一次一样害怕,那次她向他问起了米拉格露丝。怀孕以后她变得更漂亮了。他不想对她露出一副凶相,便笑了笑。为了更好地了解她的心态,决定再把那个场面延长一会儿。

“你认为我能干出杀人的事?”

“那时我也没认为你能干出欺骗我的事,同那个婊子来

往。”

帕科·科尔特斯着实吓了一跳。他觉得自己把那场游戏拖得过远了。他不希望也没想到多拉那样回答他。为什么现在记起那事？他生自己的气，不应该像他小说中人物常常做的那样，同多拉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不对多拉的答话说点什么，他无法继续往前走下去。那一切和他岳父有什么关系？

“多拉，你为什么提那事？”

“帕科，因为我不喜欢你对我说谎话，也不喜欢你要弄我。对于我来说，他是我父亲，而不是用来开心的东西。你每次谈起他，我都心痛如绞，仿佛把一把刀子捅进我的心窝，你根本想不到。”

帕科想使气氛少一点戏剧性，便温存地说：

“我能想到。”

“你想不到，帕科，想不到。我是他的女儿，我比你清楚得多，一个人有我那样的父亲，他内心感受是怎样的，因为他摆在我面前的是我从心底感到厌恶的东西，我常常觉得那些东西在血管里流动。”

多拉不会哭的。她怀孕以后比以前敏感得多，但她不会哭的。那一切使她痛苦难忍，战胜这痛苦的方式就是像下达命令似的再次提出那个问题。

“你痛痛快快告诉我，是不是你杀了他。”

这次，帕科没有耽搁，立刻作答。

“不是我，多拉，不是我杀的。但我可以知道是谁杀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将怎么办？”

“所以我才问你呢。”

多拉也是需要时间才能回答帕科的。那一刻她脑海里闪过父亲的几件事。她又记起在圣伊西特罗看斗牛时的情景。她和姐姐，身穿白色衣服，白皮鞋，白袜子，父亲和她们姐妹俩坐在前排座位上，她们像两个公主，成了中心人物，人们亲切地议论着。父亲在他表弟胡安·路易斯的婚礼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笑着，心情从来没有那样好过。一天，圣诞节前夜，全家四口人欢声笑语。但是，另一个晚上的可怕幻影同时出现在她脑海最黑暗的角落里，父亲闯进她的房间。那个记忆从不完全闪现出来。那不仅仅是记忆，还是一个没有边迹的污点，在她心灵最深处扩展，然后变得干巴，其后留下一块时时有灼痛感的伤疤。她无法在那个记忆上停留二三秒钟，因为它仍然是她生活中最肮脏、最羞辱的一页。她感到箭插心头，现在终于记起来了，某一天我要杀死你，你对我做了那事，某一天我要杀死你。开始，她在心里暗暗地说，那事没有发生。对她不造成伤害的方法是，绝不会发生那事。到了她开始必须承认现实时，已经过去了那么长时间，那事已成了过去的一部分，而既然已是过去的事，就不一定对她造成伤害。而那事是怎样对母亲讲述的？母亲受了那么多苦，还要让她苦上加苦吗？她姐姐呢？姐姐对父亲一往情深，谁都知道，他们之间爱得到了发疯发狂的程度，他们自己也知道，父女间爱得很深很切。知道那事，有什么用？难道父亲对她也做了那事，难道她觉得无所谓？只是这样想一下，她就感到恶心。也许那恶心是怀孕

引起的。她偶尔想到要把那个千斤重负从身上推得远远的，把事情讲给帕科。但是，她总是为没有同任何人共享那个秘密而感到高兴。她丈夫与她父亲的关系，在哪些方面能够有改善？不可能有改善，完全相反。不可能，多拉心里明白，有些事情只能发生在女人身上，而又没有一个男人真正理解，那些事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整个人类中谁也不可能与那个人同享。

“那个人我认识吗？”多拉问。

“认识。”

多拉又沉默了。

“告诉我，是谁。”

“不告诉你。”帕科说。“你必须首先回答我对你提的那个问题。你如果知道是谁，将怎么做？揭发他吗？”

多拉仔细思考起来，因为脑子里想的东西成为真实的东西时，便和仅仅是可能的东西大不一样了。

“我不知道。”

“实际上，我也不是确切知道谁是杀害你父亲的凶手，我有我的怀疑，这些怀疑仍然处在模糊状态。”

多拉听到波埃的名字，立刻用手捂住嘴巴，把惊恐压下去。她是在她与帕科重归于好不久认识波埃的，波埃多次去过他们家。他们两个人，帕科和她在波埃与亨娜住在一起时经常光顾东方广场的那套小阁楼。在帕科与他打交道的那些日子里，他是他的一个好朋友。波埃是个机敏慎重的小伙子。他从来不觉得波埃和 ACP 聚谈会成员一样。这些人都有一个别人可以用来愚弄的弱点。而他没有。他

怯生,缄默不语,而逗着他女儿薇奥莱塔玩时不这样。他同这个小女孩处得很好。有时给她做出大袋鼠的样子。他喜欢小孩。他们的女儿对他很有感情。他已经完全征服了她。他不大可能伤害任何人。他不久前从卡斯特利翁给他打过电话。那是不久之前的事,为没有辞别而请求原谅。后来又打过两三次电话。问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小女儿怎么样。他沉默寡言,但很热情。他说,他一直很好,但不讲更多的东西。

帕科给多拉列举了他知道的东西。

"波埃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我父亲对他有什么重要的?"

帕科确信,堂路易斯的生活和波埃父亲的生活在某个时刻交错过。

"可是,波埃的父亲你刚才不是说很久以后死的吗?"

"是那样,但是我刚才也对你讲了马格利特一次带波埃去看那个自杀老人时说的话:在凶杀案件中,一半在于过去。在自杀案件中,也是如此。那时他可能已在筹划作案。一切都是吻合的。你父亲从警察所出来,回家吃饭。遇上了波埃。他有可能做那事。我们同马尔洛维谈过。他还记得那天波埃休假,患了感冒。他没去上班。你父亲对他还是很熟悉的,在警察所看见他等候马格利特。我和洛伦索谈过,他说二月二十三日那天带波埃去了他的办公室,两个人单独谈了一会儿。波埃好多下午去等候马格利特。他那只是等待时机杀死你父亲。你父亲以为洛伦索和波埃是表兄弟。所以,他大概看见了你父亲,对他说了点什么,我不

知道他是怎样，但最终说服了你父亲把他拉到某个地方。后来，就把你父亲杀死了。”

“可是，为什么呀？他那样做能得到什么？”

“一桩完美罪行，你觉得那还少吗？”

“好了，那不是你们那些小说中的某一部小说。我们在谈严肃的事。”

“我是在严肃地谈呀。现在我们掌握了一个线索，那本书的线索。我们要跟踪下去。这只不过是一场报复，迟到的报复，等了四十年。是一次政治凶杀案。谁会对你父亲说，一颗战争子弹四十年后要杀死他！”

帕科讲述的事情可能并不令人信服，但确实具有说服力。

当然啰，他们商定，他们讲的那些事一个字也不能透露给她母亲。

帕科把他的那两个朋友召集在一起。他对他们介绍他那些怀疑的最新进展。一个侦探的神圣座右铭是，要在别人只是投向目光的地方看见东西。从《被盗信件》① 开始，证据几乎总是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但人们却视而不见，因为只是用眼睛还是不够的。人们看，但却看不见，而侦探常常不必看就能看见。

帕科没费多大力气搞到了《内战和后内战前期的阿尔瓦塞特》，阿尔贝托·洛达雷斯和胡安·卡洛斯·罗德里格斯所著，也没有通过出该书的阿尔普埃尔托出版社，顺利地找

---

① 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作品。

到了作者。

当然啰,检察官路易斯·阿尔瓦雷斯,那些年被他审讯的人也称他“葡萄梗”,因为有个人突发奇想,觉得他很像葡萄串上的葡萄嘟噜,这个绰号不胫而走,他在那座城市工作期间留下了很坏的名声。他,他的一个上司,名字叫堂赫尔曼·几内亚·洛佩斯,和一个与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年龄相仿,和他一样战争期间是临时少尉的加梅洛·凡胡尔组织、领导、进行了战后多次最残忍镇压中的一次,在他们那个警察所,两年中关押、处治了九百多名政治犯。

马格利特觉得话题偏离了,很不高兴。

“总把内战挂在嘴边上。内战好像掉进鞋子里的屎疙瘩。在这个国家,怎么每走一步都要碰上内战?”

帕科·科尔特斯约好曼查的记者星期三见面。他乘坐上午早班火车,一点钟已经赶到阿尔瓦塞特。但是,如果说很容易地找到了那两个记者的话,这两个记者却很难想起一个人的名字,即波埃父亲的名字,后者二十年前就死去了。帕科又问了可能与波埃父亲打过交道或认识他的人,但他们都耸耸肩膀,只说句令人沮丧的话:他们没听说过有那么一个人卷入五十年代的政治事件里。至于内战的事,对他们来说更是遥远了。

那两个记者给帕科·科尔特斯约了一个人。这可能是最后的手段了;这个人对不太久远的过去很了解,是这个城市那类事情的活记事簿,什么都记得。他们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从他那儿了解到那个人的更多情况。两个记者把帕科·科尔特斯拉到一片新建工人住宅区的一

套公寓里，住宅区坐落在曼查玄奥原野的一处平整过的土地上。楼里还能嗅到未干的石膏味。那个人亲自接待他们。那是一个巨人，大约七十岁，仍然很精神，健谈，高个头，瘦身材，双臂长而有力，见面互致问候、握手时，科尔特斯的手完全消失在他的大手中。

巨人把他们让到一间小厅里，里面刚刚能容下他，还有三件套沙发、一个矮桌子和一台电视机，这些好像是刚从店里买回来的。他说，他是拉法埃尔父亲多米西亚诺·埃尔瓦斯的狱友。

“我们在一起打过仗……”

他把知道的东西都讲了出来。他们是邻村的人，他的村子叫梅尔加雷斯，多米西亚诺的村子叫赫斯托索。他们一同在机械化部队服役。他是坦克手，多米西亚诺那时已经同安赫莉塔结婚，驾驶救护车。战争一结束，就把他们关进了巴伦西亚同一个集中营。后来把他们押到阿尔瓦塞特，关进监狱。他们在一起几乎坐了一年大牢。多米西亚诺被释放了，而他被判二十年徒刑。他服了七年刑，出来后，和多米西亚诺一样以开货运汽车为职业。据巨人讲，多米西亚诺再没有参与任何事情，一心一意开汽车，搞运输。他们经常见面，保持着很深的友谊，恰如他所说，两个人处得“不能再好”了。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多米西亚诺发生不幸。多米西亚诺去马德里参观样车展销会。巨人亲自对多米西亚诺说过，那里有二手车，在马德里买比在阿尔瓦塞特划算。巨人陪他去展销会，买了卡车后，便分手了，约好晚上见面到城里逛一逛。

巨人不紧不慢地讲着，不哗众取宠，记者和帕科·科尔特斯不敢打断他。

“在样车展销会上，我们遇见一个人，此人和我们一同关在监狱里。完全是巧合，那个人名叫普里米蒂沃。我们谈了好一阵子。他想让我们和他一块去吃午饭。我不能去，因为在回家之前还有事要做。多米西亚诺对我说，在你办你的事时，我和他去吃午饭，咱们就约定一块儿吃晚饭吧。很奇怪，他一去不返。我想，他是忘记说的话了。”

后来，我们得知普里米蒂沃又把他带回家里吃晚饭，还想引见他的妻子。多米西亚诺说不去了，已经约好和我一块儿吃晚饭。而普里米蒂沃说，那有什么关系，都二十年没见了。这样，当他们在普里米蒂沃家里吃晚饭时，有人叫门。普里米蒂沃的妻子跑去开门。是警察。他们来搜查房子。几个孩子在睡觉。警察把他们两个人抓走了。我如果去他家的话，也得把我抓去。多米西亚诺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我在这儿，完全是巧合，实际情况也是那样。没有办法说服警察，警察已有了固定的想法。他们被带到同一个 DGS[①]，那时“葡萄梗”正好在那儿。多米西亚诺一看见他，便认出了。而“葡萄梗”呢，对他的面孔也不觉得陌生。警察翻阅刑事档案，发现有入狱前科和其他问题。

他们被指控是省委会成员，多米西亚诺来马德里是参加会议的，而对这个会议警察早已掌握了情报。多米西亚诺对警察讲了不下一千次，说那纯属误会。他在警察所被

① DGS，“安全总局”的西班牙文缩写。

拘留了三四个星期。这时,多米西亚诺的妻子打电话问我情况。我把发生的事对她讲了,说多米西亚诺对我讲了,他要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再留一夜,第二天开卡车回来。太让人着急了。

安赫莉塔赶到马德里。最后,那里的人对她说,夫人,您的丈夫病了。把他送一家医院吧。看那样子,他在牢房里得了肺炎。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回到阿尔瓦塞特。多米西亚诺不愿意讲那事,什么也没对妻子讲。他只说,是走了厄运,对那一切"葡萄梗"负有罪责。

过了一个月,多米西亚诺便死去了。安赫莉塔想控告那件事,但我们几个朋友劝她不要那样做。她的正在学习的大儿子,辍学了,开始打起工来,女儿也是这样。那女人正怀着拉法埃尔,担心孩子发育不好。那孩子一直很瘦弱,一副病态,性格孤僻,她认为这都是发生的那一切造成的。我们大家设法帮助她。我不得不把多米西亚诺刚买的卡车给他们卖掉,他都没开上一次,太遗憾了。

帕科·科尔特斯回到马德里,他确信波埃知道杀害他父亲的凶手的身份,堂路易斯就是那个"葡萄梗",而这个"葡萄梗"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多米西亚诺·埃尔瓦斯的死亡,因为说到底没有对他提出任何罪桩。

几个朋友重新聚在一起。马格利特对帕科反驳说:

"我们退一万步,就算堂路易斯是杀害波埃父亲的凶手,但这并不意味波埃就是杀害那个凶手的凶手。我们应该找他谈一谈。他肯定正盼望你去,都快两年了,他要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甩掉良心上的那个沉重负担。他一定像

《罪与罚》中那样对你说:你不知道,帕科,你给我从身上搬掉了怎样的重负:我杀害了你岳父,因为他先是抓走我父亲,然后严刑拷打,就这样杀害了他。很荒诞。帕科,忘掉那一切吧。就是我们这些警察也不会破获那个案子,你也不会去破获。快把那扔到一边去吧。即使破获了,也没有任何用处。时间过了那么久,不可能恢复事情的本来面貌。你去大街上找个人,对他说,你如果记得一年前某天从几点到几点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就证明你是无辜的,你不是罪犯。”

梅生同意那位警察的说法。

“不对,那是因为你不是罪犯。你如果是罪犯的话,什么都会记得。”帕科说。“没有什么比罪责更能使他对做过的事记忆犹新。”

“再说,帕科,你为什么硬要把杀害你岳父那种人的凶手抓出来?他根本不配。”律师补充说。“从你们讲述的他的那些事来看,死就死了吧,还抓什么凶手呀,恰如那些死无葬身之地的人,尸首喂狗算了。”

“莫得斯托,看来你是律师。对你来说,真理和谎言是一样的;不过,如果真理就在手边,那么谎言就要造成伤害。”

“你错了。”梅生对他回答说。“在这些事情上,知道的越少,对大家越好。对你岳母、对多拉、对你越好。”

“你忘记了我是侦探小说家。或者说以前是侦探小说家。我不能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

“帕科,这是生活;不要提小说那东西。”梅生继续对他

说。“退一步讲，波埃是凶手，你告发他能得到什么？你认为波埃对社会是个威胁，他能继续找到理由从而把他看不顺眼的人全杀掉？他在监狱能够得到重生、重新做人？你认为会那样吗？他难道是个系列杀人犯，把赢得内战，从而使他父亲之死的从犯统统除掉？你岳父太应该那样死去了。没有太多可说的。”

“打住。你们都忘了我是警察。”马格利特插话说。“我可能应该把这些甚至是假设的东西汇报上去，提议对波埃展开调查，是不是？”

“你真的那样做？”帕科问。

“不，为什么那样做？我同意梅生的观点。每天都有人从监狱里出来，如果说波埃作了那个案子的话，这些人的罪行和他一样重，或者比他还重。另外一些人罪行更重，甚至都没进监狱，而这里什么事也没出。当然啰，我都不吭一声，对于我来说，事情太复杂了。有一点我始终不明白，帕科，把事情的真相弄个水落石出，你能得到什么好处？你岳母如果得知谁杀害了堂路易斯，一定会有所行动的，而且尽管她憎恶丈夫，但她是个天主教徒，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满脑子陈旧想法，等等，也会使她憎恶那个凶手的，她会是第一个要求严惩凶手的人。而多拉，从你讲的那些事来看，说不定也不会饶恕你的。”

“不会饶恕我的将是我的大姨子，她如果得知我知道谁是杀害她父亲的凶手，而又不揭发的话。”帕科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又与大姨子有了关系？”

帕科默然不语。

“我们别追问了。”梅生语气和解地补充说。“我绝对不相信波埃同那一切有关系。另外,经验还告诉我,我们如果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会出问题的。”

帕科·科尔特斯允诺忘掉那个案子,但他一离开马格利特和梅生,就去找马尔洛维。

只有马尔洛维真正同波埃保持联系。帕科和多拉同波埃在电话中交谈过两三次,但都没有获知他的地址。帕科与那个年轻的钟表商谈了起来。

生活在对他微笑。他父亲已经退休,早早地去了阿利坎特,为他那把老骨头寻找更为美好的环境和温和的气候,让他掌管钟表店。他的渴望实现了,现在既独立又有靠山。他正在做准备,明年要举行婚礼。波埃有没有消息?当然啰,他们继续保持联系。

“他常来马德里。来时,在我家过夜。”

帕科那是第一次得知波埃常来马德里。那么,为什么从来不想看看他们?他很清楚,他对他的女儿薇奥莱塔怀有真正的感情。他得知在这事上表里不一,很是痛心,但对马尔洛维什么也没有说。他开门见山,想知道他父亲是否还保存着收藏的手枪。

“还保存着。”

“无论是收藏的手枪还是你们练习射击的手枪,他一次都没有发现缺少一支?”

“从来没发现。”

帕科·科尔特斯还问他是否很了解波埃。

马尔洛维对那样的问话基本上没有什么怀疑,对他朋

友表现得很合作的样子，甚至都不想知道问那几个问题出于什么目的。也许正是那绝好佯装出来的自然表情，首先使帕科感到不安。那时，他们坐在太阳门的瓦内莎咖啡馆里，这家咖啡馆刚刚开始营业。尽管他们躲在那个像鸡笼子一样、登上楼梯才能到达的地方，阿尔卡拉大街拥堵的公共汽车发出的隆隆声还是时时传到咖啡馆里，妨碍交谈秘密事。

马尔洛维是侦探小说的优秀读者，可能懂得了不能不表现得困惑些，终于提出自己的问题，但已为时过晚。

“你为什么想知道波埃的那些事，山姆？”

“我是帕科，伊西特罗。那可不是游戏。我只想让你告诉我，波埃是否对你说起过他父亲？”

帕科提的是那样的问题，在对方面部表情引起那么多变化，这比立刻作答更为重要，那尽管细微但可看出的脸相，那种眨眼，双眼扫视另一侧后又收回只用了几微秒的时间。一只手在寻找香烟，或者常常中断那个动作，这一眼就能看出，仿佛呼叫服务生，左顾右盼想穿过一条大街，或站起来想去卫生间，这一切都是为了赢得时间、想出合适的答话。

“我不想，山姆，帕科，我不想对波埃做出不慎重的事情。你应该明白这一点。告诉我，你为什么想知道那些事。”

“波埃一次也没有要你不要把他讲的有关他父亲的事讲给任何人？”

“没有，从来没有，不过我认为那纯属他个人的隐私。

我认为他现在没有权利讲出那些事。”

帕科·科尔特斯开始讲起来。他讲述了多米西亚诺·埃尔瓦斯的历史,战前参加 UGT[①],内战期间在不同地点、不同战线执行各种使命,被捕后关进阿尔瓦特拉集中营,后来无罪释放,不幸的马德里之行及被捕。

“波埃对你讲过我岳父吗?”科尔特斯继续追问。

马尔洛维无法拒绝回答。他的朋友坐在那里,这足以使他怀疑他的朋友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他们两个人都知道他们知道那事。对于帕科来说,那只是等一点时间的问题,而马尔洛维也许没有那时间,所以改变了眼色,用眼睛寻找服务生。如果还要咖啡的话,早就要了,他那是梳理一下思绪。帕科默默地观察着他。他现在明白了,一切取决于耐心。

“讲过,他知道是那个警察把他父亲抓了起来,”马尔洛维最后承认说,“或者说,他父亲被抓起来以后,至少是那个警察进行审讯,指挥审讯,后来让他回家。”

“那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马尔洛维满面惊异表情。在那个警察死前不久,他才有一次知道那事。帕科给他讲了波埃父亲第一次被捕和堂路易斯一九三九年在阿尔瓦塞特的所作所为。

“他对你讲了堂路易斯对他父亲严刑拷打过?”过了一会儿,帕科问道。

“对那事他只字未提。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或者说,

---

① UGT,“劳动者全国联盟”的西班牙文缩写。

是否愿意讲。我猜测,他可能想象到对他父亲进行了严刑拷打。你认为是波埃杀了他?我不相信。”

“他哪能杀人呢。”他继续说道。“他第一次拿起一把手枪时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那天恰恰是二月二十三日,在我家地下室的射击长廊。看见一个人拿起一把手枪,你就知道他是否可能是杀人犯,就像你看见一个人拿起一把瓦刀,便知道他是否泥瓦匠。那一眼就可看得出来。像常言说的那样,波埃都不敢踩死一只苍蝇。”

“你曾经说过波埃是左撇子。你还记得吧?”

“记得。那是开玩笑。我怎能想到他可能一个人杀死你岳父那样一个老练的人?”

“你怎么知道是他一个人杀死我岳父的?我们现在不谈那个了。你从来没发现你的手枪少了一支?”

“从来没发现。你快快醒悟,波埃不是。大部分完美的罪行从来不会破获,因为有一系列没有尽头的巧合。有时,巧合把本是完美的东西搅得杂乱如麻,有时把只不过是桩草草作的案子变成完美的罪行。另外,他是怎样把你岳父弄到那个地方?对你岳父说了怎样的话才使他上了钩?三枪呀……可怜的波埃。他打第一枪就有可能被吓死。你沿着那个线索走下去,不会有任何结果。”

当天上午,他告别马尔洛维后立刻去警察所见马格利特。

他想看看警察所的报告。一直是说开了两枪呀,一枪打在腿上,一枪打在头部。马尔洛维提到打了三枪。那个细节很重要。马格利特证实说,事情确实是那样,事发后第

二天,在警察所附属车间对汽车仔细检查过程中发现了第三颗子弹。右侧副驾驶的座位的底盘上,有一个弹孔。座位的脚垫已经有点破损,把弹孔掩盖住了。由于直到那时警务记录上还在说打了两枪,而那第三枪尽管能为帕科提供了线索、从而弄清岳父的死因,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回到家后,要检查岳父的车——现在是多拉和他在使用,实际上是他一个人使用,因为多拉知道父亲是在那车上被杀害的,没有力量钻进去——,看看是否真的有第三枪。

马格利特和帕科的意见一样。

“马尔洛维知道事情的真相。”那位小说家对警察说。“波埃对马尔洛维说过,他力图掩盖住。这很自然,他们是朋友。”

帕科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前侦探小说作家像个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具有心理学方面的良好理论,就带着一两个假想去卡斯特利翁,并且期望波埃坦白、承认是杀害堂路易斯·阿尔瓦雷斯所长的罪犯。他还需要更多的线索。而惟一的机遇恰恰是那第三颗子弹。假如他还在继续写小说、把那桩案子搬上稿纸,小说的题目可能是《第三颗子弹》。那是毫无疑问的。

他经过波斯塔斯大街的钟表店,把马尔洛维叫到附近一家酒吧,一边喝咖啡一边继续交谈。

“你怎么知道有第三枪?报纸和电视只说开了两枪。甚至我都不知道开了三枪。洛伦索昨天对我证实了这一点。”

“我说开了三枪？我不记得。”

马尔洛维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愿意合作了。看得出，他在竭力保持镇静，甚至他的纯正。

“两枪，三枪，帕科，现在还问那个？特别是，那两枪、三枪，和谁有关系呀？”

“你说得很清楚呀，波埃不可能开三次枪，开第一枪就吓死了。”

“而那就那么重要？”

马尔洛维完全知道，在那种性质的讯问中，根本不能调换讯问者和被讯问者两个角色的位置，不能首先讯问讯问者已经知道的东西。可是，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马尔洛维知道帕科已经知道。

“伊西特罗，不要再那样，你我都是懂得世故的人。”

“像在你的小说里。”

“正是如此。”

“帕科，你知道，如果需要的话，我要永远保护、掩护一个朋友的。我不再说了。你不是警察，你即使把事情讲给马格利特，他也不大可能理睬你，警察所的人甚至都忘掉的事，谁也不会重视。你也不是第一个知道，你岳父根本不配花两个小时给他进行尸检，或者说不配对他开三枪。”

“波埃对你说过那是他干的？”过了一会儿，科尔特斯对他问道。

马尔洛维用悲凄的目光看着他。他们讲话声音很低，又不时中断很长时间，这掩饰了两个朋友之间的紧张气氛。那一刻，马尔洛维好像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仿佛只一秒

钟便长满了胡须，盖住了面孔。

“帕科，我不再对你讲更多的东西。如果警察来审问，我也不会对他们讲什么。他们甚至比你知道得少，而你什么都知道。”

“你想说什么？”帕科问。

“什么也不想说。”

帕科对多拉说，他因工作问题必须去巴塞罗那一趟，见一位新作者，杜尔西内娅出版社想聘任他，而多拉一点也没怀疑。

由于马格利特的帮助、卡斯特利翁警察局的合作，神不知鬼不觉，很快打听到他朋友波埃的工作地点和租住的公寓。三点差五分，他已经站在了那个年轻人任职的大楼底层前面，等候他出来。尽管不完全排除马尔洛维把与他的谈话告知他的朋友，但他认为惊异这个因素对他来说可能是适宜的。

他看见波埃同其他职员走出来。波埃向他们告别，独

自一人往前赶路。帕科一年多一点没有见到他了。应该说,这个小伙子比那时更瘦弱了。帕科在他身后跟了几分钟,来到大街上的一处行人通道,佯装与他偶尔相遇。

波埃尽管仍然表现很怯生——这是他的一大特征——,但脸上同时露出又惊又喜的表情;开始时说话结结巴巴,每句话要重复一两遍。

“帕科,很高兴见到你。见到你很高兴。在这儿做什么?怎么到这儿来了?多拉呢?她好吗?多拉好吗?小女儿呢?薇奥莱塔好吗?”

他们一起在一家小饭馆吃了午饭,波埃说,多少天来他常常在那儿吃午饭。

“我来看一位侦探小说家,他住在卡斯特利翁,叫艾特·多诺凡。”帕科·斯帕德说。

“他是卡斯特利翁当地人?”

“是地道的英国人,但几年前就开始在他的小说上署西班牙笔名何塞·卡尔瓦利奥了。世界颠倒过来了。”

那些即兴编造的话,在帕科·科尔特斯身上是那样自然、富有艺术性,如果看做一大谎言的话,那可能是一件憾事。

波埃觉得他朋友的解释还好,但仍然埋怨他没有提前通知来访。

“我不知道,”科尔特斯辩解说,“事情这么快。我们一下子便达成协议。我把合同留在他家里,他下个星期通过邮局寄还给我。我今天上午到的,准备乘最后一趟火车赶回去。遇见你完全是巧合。”

“住在什么地方?”

“艾特·多诺凡? 离这儿大概两个街区,在玛尔加利塔·加乌蒂耶尔大街。”

已经送上饭后甜点,他们仍然谈着 ACP 聚谈会过去的岁岁月月。指控一个人犯有谋杀罪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帕科利用吃蛋黄甜食的时候,往谈话中加入儿滴不快的味道:

“我是为我岳父之死来这儿的。”

波埃把双肘支在桌子上,合拢两手,交叉十指,支着鼻子。他只是观察帕科。没有讲话。

两个人沉默着。他们周围仍然充满活力,盘碟声音,说话声音,有人交完钱,站起身。但那里也许正在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帕科意识到,马尔洛维说得有道理。波埃不可能是杀人犯,他不可能杀任何人,他突然感到羞怯难抑,不该指控他是杀人凶手,他根本没有作案,找不到指控他的证据。

“你知道吗,马尔洛维杀了我岳父?”

“你问我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了,还是想知道?”

“坦白地说,我不知道。直到十分钟之前,我还认为是你作的案。只有你才有那种动机。一个星期前我同马尔洛维谈过,那时我认为你们两人合谋作案。现在,我明白了,只有他才能作案。是为了他人作了一桩完美罪行,是为了把他从我面前除掉。”

“你可能搞错了。”

“可能错了，但我离真相是那样近，迟早要用手摸到的。我要找到一个证据。”

“或者找不到。或者可能找到，可是那尽管是个证据，但如果不能帮助你找到杀人凶手，那证据对你有什么用？对于那些完美的罪行来说，当警察和侦探从其身边走过时，它们善于控制自己，几乎都不呼吸。之所以是完美的，那是因为它们即使高呼‘是我！’，也暴露不了自己。他还不如在电影院大门口，夜幕下，被一个盗贼或吸毒犯用刀子错杀，甚至不知道他是警察，不知道他是无耻之徒，或者某个人在夜晚把他扔在他家的黑乎乎的楼门洞里，流一夜血。他们不知道他在为一生中犯的种种罪行而死去。而这个甚至称不上完美罪行，只不过是一桩正义的凶杀案，多少伸张了一点正义，是富有诗意的处决。那些人从不为自己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次他为他们付出了代价。”

“那些人是谁呀？”帕科问。

“是谁？”看上去他费了很大力气才露出那丝凄惨的微笑。帕科·科尔特斯知道了，他的朋友波埃不想回答他的问话。

“可是，拉法埃尔，你不可能亲自报仇。”

从波埃到拉法埃尔的转换把问题带到现实层面上来。

“帕科，是生活本身报了仇。所以说那是富有诗意的处决，因为它源自生活，因为当已经没有另外一种方式时，那是可以盼望的惟一报仇方式，所有人都有权利那样做。而我父亲却没有。对正义的渴望唤起对报仇的渴望，许多人认为自己想报仇，其实只希望得到一点正义。那就足够了。

我们认为犹太人做得对，他们追踪纳粹分子到天涯海角，一定要抓到他们，押回以色列，进行审判，关进监狱，处以绞刑。他们做的无法与犹太人遭受的相比拟。他们没有忘记纳粹分子犯下的罪行，我们认为很好。像你岳父那样的人犯下的罪行没有受到法律制裁，是因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得以让今天的西班牙还存在这种现象。一次，有人问那些追捕纳粹分子的人中的一位，是否不能赦免。他说，可以，我可以赦免，但不是以死者的名义赦免。而这里却恰恰相反。所以四十年前的死者在死了以后还继续付出代价，以使我们得以继续活下去。剥夺了他们的生命，但仍然玷污他们的声誉。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而另外一些人则觉得太过分了，而这并不是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忍受的很多了，而是太多太多了。并不是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到达了民主的彼岸。有些人乘坐救生筏，到达时身体健康、衣着洁净。另一些人则不是这样，到达时一副败兵惨相，疲惫不堪，犹如从沉船上刚刚爬上来。还有些人到达时已经窒息，是被海浪推上岸的。现在绝不能对沉船遇难的人这样说，你们那么多人，这么多年一直乘坐娱乐快艇游玩，就用你们的金钱和痛苦支付船费吧。”

“可是，你不能一辈子生活在不满和渴望报仇之中呀。那对侦探小说是个好素材，但生活要建立在更为坚实的东西之上。一切都应该有个了结呀。”

“我同意你的说法。对于我来说，事情已经了结了。你岳父死了。你就让他那样死去吧。他和我父亲一样，是为西班牙而死的。如果逮捕杀人凶手，能够解决点什么问题，

让社会变得好起来吗？不会的，而是变得更坏，因为逮捕杀害你岳父的凶手，惩治他，那么你岳父好像比实际好，而实际上他比我们想象的坏得多。我认为你到我家乡去打探我们的生活，向这些人和那些人问这问那时，他们一定对你讲了这一点。”

帕科装作没有听懂波埃的话，这样说：

“我知道我离真相很近了。博依内博士已经说过，我几乎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罪犯不推究哲理、高谈阔论的。”

“但我不是一个罪犯，也没有推究哲理、高谈阔论。再说，我家乡很小，镇上的事谁都知道。镇上人告诉我你去过阿尔瓦塞特，我听说后在心里想，可怜的帕科，嗜好支配着他的行动；他以为小说和生活是一回事，那天晚上我母亲就知道，从马德里来了个人，打听我父亲的情况。你应该直接去找我母亲，她完全可以向你真实讲述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你还想知道吗？”

山姆·斯帕德做了个模棱两可的表情。

“战争结束后，把我父亲送进了集中营，接着被关进监狱。几乎一年不知道对他指控什么罪状，不知道是否要杀掉他，他每天都看见和我父亲一样的人，不比他好也不比他坏的人被拉出去杀掉，他们的罪状和那些人是一样的，就是曾为自己的理想战斗过。在那样的监狱里蹲一年，那滋味是很难讲述的。但他还算走运，从监狱出来后，与我母亲团聚，那时她刚刚失去第二个孩子。她说那是那些人使他们遭受的贫苦和各种苦难造成的后果。父亲开始工作。千辛万苦买了辆旧卡车。我姐姐和哥哥先后出生，当一切好像

很顺利，当谁也不记得内战和内战的一切时，当已经忘记长枪党徒、好像让他们平静地生活时，父亲在马德里发生了那事。从他被抓起来到去世前后两个月时间。我父亲不明白，为什么当一切都很顺利时发生那样的事。那时，他有两个孩子，都长得很好，另一个孩子也快降生了。他整天只讲那个警察，说他第二次闯进他的生活。在我父亲生病期间，我母亲为生活四处奔波。我父亲去世后，天好像塌了下来。她不得不卖掉卡车，设法把我们抚养大。她去各地见每一个律师，她说要起诉警察局对她丈夫做了那种事，但没有一个律师想受理那个案件，医生也不想开具医疗证明，证明他被放出来时身体状况已经堪忧，后来发展成为肺炎；对于他身上那两根折断的肋骨，他们说随便怎样，比如下楼梯，都可能碰断。那是一九六〇年的西班牙。现在，当时不想为我母亲辩护的律师，有两个成了议会的议员，他们乘坐豪华轮船，即投票，在议会登了岸，说他们一辈子都是民主派，为‘另一边的人’请求养老金，确认他们的身份，因为那是一场‘不文明’的战争。是谁把那场战争变成了不文明战争？那难道不是滑稽可笑的吗？我父亲死时那个不肯在死亡证明书上写明病情、死因并签字的医院医务主任，今天当上了省医院院长。”

“你们要杀掉所有人？你们要杀掉那些律师、那个医生、那些在一九六〇年不想确认对你父亲犯下暴行的人？”

“我没有杀害任何人，也将不会杀害任何人。你岳父故意干坏事。其他人只是出于恐惧才那样做的。”

“我岳父也是出于恐惧呀。谁都知道，你一旦骑上老

虎，就不能从它身上跳下来。政府的所有人都是这样情况。他们一直生活在威胁之中。我见过我岳父发怒，因为他认为共产主义分子可能随时卷土重来，战后他们对共产主义分子和其他人做了那些事，共产主义分子将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们。所以，他们继续进行镇压。他们也是非常恐惧的。”

“是这样，帕科，那是刽子手的恐惧。这一点你刚才说过了。那么，对于受害人的恐惧，应该怎样称呼呢？应该在受害人和刽子手之间，而不是在恐惧中间进行选择。支持佛朗哥的人，并不都是杀人犯。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向你让步。但是，你还应该了解更多的情况。我父亲是一九六〇年被杀害的。他是内战的又一个牺牲品。但是，更为可怕的事还在后头。他们打破了我母亲对生活的希望。她钟爱我父亲，没有他她无法生活。人们说，他们结婚二十二年，但仍然像谈恋爱似的。每当谈话中提到我父亲时，母亲的脸上就滚落下泪珠，而我就是看着母亲的泪珠长大的，现在她依然抑制自己，家里到处挂着父亲的照片。我不是在一幢房子里，而是在一座神殿里长大的。那时，我母亲三十五岁。三十五岁。她和我父亲结婚时还是个小女孩，一生中从未结识另一个男人。但是，那时她的生活已经完结。我母亲从来不知道为什么那灾难降临到她的头上，但却知道是谁干的事。对于她来说，那个家伙是罪魁祸首。你对她不要讲西班牙历史，不要讲内战。但她知道，一九四〇年阿尔瓦塞特来了个人，在城里到处杀人，二十年后又碰见我父亲，以为是因为他那时干了那事而前来杀他。当他确认我

父亲是哪儿的人及其前科后,对我父亲说,对,对我父亲说,我认识你们,你们想亲自来报仇。你们是复仇狂,是野兽,是坏蛋。我父亲说,几乎都不记得他了。我父亲说的是真话。我是说,他发现是他,但已经十九年了,根本没有记起他,我父亲已经把他从自己生活中排除出去了。因为为了生存,多少人必须忘记发生的一切,忘记知道的一切。但那些人不是这样。罪犯只能生活在作案的那一天里,生活在作案现场里。但我父亲早把他忘记了。因为无辜就是遗忘。而你岳父又让他记起来了,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让他记起来的。我早就希望有个人审判那些罪行,因为我们是受害者。事情没有这样出现,将永远不会这样出现。如果有人把佛朗哥杀死,我们很可能过上幸福日子,但我们看到那可怕的事一天天死去就感到满足了。对此我们也称做富有诗意的报仇,或者说,称做代替报仇了,而你岳父之死是另一种代替。”

好一阵子之前,最后几个客人都起身离开那个小饭馆了。只剩下波埃和山姆·斯帕德坐在那里,面前摆着咖啡。服务生在等着腾出餐桌,铺上干净桌布。别的餐桌都已收拾停当,恭候晚餐客人。服务生等料理完这张桌子,好回家休息。

波埃提出陪他到火车站。他们在候车室找一条长凳坐下来。

“我在这里生活很平静。”波埃对他说,“如果由我,还有你,掌控的话,我的生活会仍然平静的。我不知道你岳父怎么会死去,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那一切,如果我在自己家里

按一下电钮,任何人都不知道,就能杀死佛朗哥,我早就杀死他了。像埃萨·德·凯依洛斯① 在他的《官吏》中讲的那样。还好,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们还算走运,有些事只能发生在小说里。那样我们可以避免一些难以解决的道德问题。对于我母亲来说,佛朗哥是个恶棍,但她个人的佛朗哥,对她造成伤害的那个佛朗哥,其名字和你岳父一样,她即使能悄悄地结束他,而又不受法律追究,她也不会那样做,你根本不必怀疑,但是她要让怒火在心中燃烧、渴望报仇。我也是一样的,因为用与暗杀多少相似的法子结束他的生命,比一桩罪行更为可怕。对于我来说,宁可忍受不公正,而不做不公正的事。这是我的信条。我没有做任何应该赎罪的事。我甚至对自己想报仇都不负罪责。而你岳父,应该赎罪的事太多了,但不只是死亡。所以,我最后想做的,才可能是结束你岳父的生命。”

帕科的朋友滔滔不绝地讲着,他都走神了。

“那并不意味你不结束他的生命。但是,你如果不那样做的话,为什么马尔洛维做了呢?”

“帕科,我把前面的话对你讲讲:你问那事是因为你知道,还是你说出来让我确认?你岳父是形势杀害的,恰如形势杀害了我父亲一样。谁也没有为我父亲被害付出代价,谁也不应该为你岳父之死付出代价。我再对你重复一遍,那就是称为富有诗意的报仇。”

“波埃,那根本不能说服我。要想杀害一个人,总会找

---

① 埃萨·德·凯依洛斯(1845—1900),十九世纪葡萄牙著名作家。

到理由的,而这理由无需费力寻找。”

“你不要诡辩。多年来我一直想象着,总有一天找到杀害我父亲的凶手,这个想法根深蒂固。我在十四岁和十八岁之间不想别的事。我每天夜里都做同样的噩梦,惊醒过来。对于我来说,那只不过是个名字,每时每刻在我家各个角落低声重复的名字:堂路易斯·阿尔瓦雷斯,‘葡萄梗’。没有面孔。我母亲害怕极了,担心类似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那种事发生在我们之中某个人身上,于是我们几乎不谈论他。但是,他从未离开那里。在梦中,你岳父只不过是附着在一个名字上的邪恶之灵。我经常与他相遇,我手上拿着武器,他站在我面前。我对他说,我是多米西亚诺·埃尔瓦斯的儿子。他说,我不知道谁是多米西亚诺,别打扰我。他什么也不记得。现在你看见了,对于仅仅十年前发生的事,没有一个人记得什么了。但是,我母亲和我母亲那样的许多人有着完全相反的问题:是不可能忘却的,不可能忘却永不忘却的东西。他们被剥夺了清白,并使他们觉得自己负有罪责。他是魔鬼。我母亲想过不下一千次,如果我父亲那天不去马德里的话,可能发生什么事呢。我父亲不会遇见他的朋友,不会发生任何事。那么多年,我每天夜里都梦见遇见了他,但从来没有想到在现实中碰见他。对于我来说,他只不过是一种可怕虚构东西的一部分。在梦中,我对他说他是谁,并讲了他对我父亲做的事,直到他跪在我面前,请我原谅,请我母亲原谅,请我姐姐哥哥原谅,请求宽恕。当我准备开枪时,醒了过来。当报纸上公布了二月二十三日的全部事实,我看见了他的名字、知道是他时,假如

把他逮捕起来、进行审判,我很可能拍手称快。如果因为现时所作所为对他进行判决,把历史上的事挂起来,对我来说也无所谓,那恰如没有支付税款而不是因为所犯其他罪行将艾尔·卡彭① 关进监狱,对人们来说也无所谓一样。你应该看到那天夜里的事。但是,他在那种事情上都是走运的。把他杀了再简单不过了。手边有把手枪,你知道,我如果想那样做的话,可以打一百枪。但我不想开枪。我从来没想那样做,而现在事情发生了,他死了,我并不拍手称快,不过也不为他的死感到难过。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都无所谓。我只对你讲一件事:你岳父甚至都不配知道为何而死。”

波埃这番话使帕科记起了马尔洛维的话,他们两个人共同作案的假设重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你在给我们讲述考大学的神话时已经在那里注册了,是不是这样?你为了与马格利特交朋友,从而可以走进警察所,就近看见我岳父,才谋划走进商业咖啡馆,接近 ACP 聚谈会成员,是不是这样?”

“帕科,你认为我那样聪明,是过奖了。但是,我把多拉对你讲过不下一百次的话给你重复一遍。你既然不相信我,那就记住多拉讲的话:这不是一部侦探小说。这只不过是生活,而生活很少有闪光的地方。说到大学,向你们讲那样的话,是随便说说而已。是我脑海首先闪过的。我是为

---

① 艾尔·卡彭(1899—1947),美国黑社会首领。靠设赌场、妓院和私运禁酒等成为亿万富翁。

了亨娜才在那儿的。一天，我看见她，跟在身后，走进语言学校，报名听她的课。但那是不能讲的。我那时甚至都没对她讲。我讲的话，你相信还是不相信，都无所谓。我再对你讲一遍：你岳父甚至不配知道为什么杀死他。”

“他知道，对不对？你也知道。”帕科断然地说。

“是这样，帕科，你也知道：因为他做的坏事太多了。我们的军人和警察中，有些人在许多方面都不如纳粹分子，但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有工作做或领取养老金，因为签订了一些协议。以谁的名义？以和平过渡的名义？问过我，问过我母亲吗，问过我父亲吗？就让事情那样吧。谁也没要求杀掉他们，甚至都没要求判决他们。哪怕对他们审讯一下，也就心满意足了。但不会有人对他们审讯，这时生活便要求对等的补偿，即有些人要像你岳父那样死去，他们的死永远不会侦破，而对你岳父的死，人们认为是大快人心的事。”

“可是，甚至共产主义分子都说过，应该了结了。”

“问过死去的共产主义分子、问过在大牢蹲了三十年的共产主义分子、问过意大利人开进来时在阿利坎特海港防波堤自杀的人吗？谁也不想要求杀死那些杀人凶手、杀死那些刑拷的人、杀死那些共犯？几乎都没有像把赫斯[1] 关进监狱那样把他们关进监狱，尽管有百分之百理由对他们这样做。但我们不忘记他们罪行的惟一办法，是我们可以依据事实对他们进行审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你岳父死

---

[1] 赫斯(1894—1987)，希特勒亲信。1946 年被判终身监禁。

后,却授予他警务功勋奖章。什么样的警务功勋?而我父亲,给了他什么?我母亲甚至无权得到抚恤金。但是,当我把有人杀死那个大坏蛋的消息告诉我母亲时,你知道她的反应是怎样的吗?她用眼睛注视着我,一句话没说。我从来没有向她讲述我认识你岳父,在路纳大街警察所里见过你岳父,帕科,她不知道这事,不管发生什么,她也将永远不会知道这事;你要向我保证这一点。”

帕科只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不想打断他。

“可是,她一句话没说。”波埃继续说道。“她坐下去,没有张开嘴巴。你岳父被杀的事,我从未对我姐姐哥哥说过。你了解我。你知道我不爱讲话。但是,我必须把那事讲给我母亲,你岳父被杀以后,我母亲坐下去,把一直放在餐厅小桌子上我父亲的照片拿起来。用双手捧着,放声大哭起来。我不知道那一刻她脑海里发生了怎样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请你不要告诉我那是怎样的——,可一下子明白了那滚滚落下的眼泪意味着对你岳父的理解,而那是不公正的。我勃然大怒。对她大声呐喊,不要哭了,那是个好消息。而她这样对我说,惟一的好消息是我父亲没有死去。她感到痛心,因为也许那个男人遗留下一个和她一样的女人,也许还有孩子。我母亲给我上了一课,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打败了内战。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降到罪犯的位置上。或者说,你岳父去了另一个世界,甚至还得到他的受害人的原谅,而这更加显示你岳父是多么卑鄙,事情是怎样的,就让它怎样吧。”

“也许吧,但是所有的罪行都应该有个凶手呀,这桩案

子也应该这样。这是这些年我惟一学到的东西。”

“不对,帕科。杀死凶手的凶案可能令我们感到高兴,但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恰如世界不会因为少了一只老鼠而变得好些。”

他们还在等候开往马德里的火车。帕科·科尔特斯没有侦破他手中的惟一一件现实生活里的案子。在小说里,他知道,一切都很容易地解决。而在他自己的那部小说,他甚至还没开始承认为小说的小说里,情节却戛然而止,发展不下去了。他要离开那里,他确信波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杀死了他岳父,一个人或在马尔洛维的帮助下干的,一个人或诱使他的钟表商朋友作了案。但他也知道永远不可能找到证据。

“真奇怪了,所有事都发生在我身上,拉法埃尔……”

帕科·斯帕德,这个伟大的山姆·斯帕德又用洗礼名字称呼波埃了。

“什么?”

“事情真奇怪,”前小说家重复说道,“因为在侦探小说里,表面上看一切都有现实感,但这些小说里的事,同一块棋盘上发生的事具有同样的道德价值;在棋盘上,小兵走到一定位置,可能与皇后同等重要,具有同样的价值,而国王和皇后可能降到小兵的位置上。只有马好像总在它自己的位置上。你就是马,一会儿跳到这儿,一会儿跳到那儿,而这就是你这一整天一直对我所做的事。”

波埃对他朋友笑了笑。广播喇叭已经通报,他们等候的火车就要开进站台。

“波埃,作案是出于下面三种缘由中的一种:为了爱情,为了金钱,或为了权力。很少有人为了荣誉而去杀人,更不会像你说的那样为了富有诗意的报仇去杀人。当这样的事发生时,我们是站在一个浪漫主义者,而不是凶犯面前。我不知道。我这一天所弄清楚的是,我永远不起诉你。”

“帕科,感谢你。”波埃十分悲伤地说,“但我不是浪漫主义者,也不是杀人凶手,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是怎样发生的。假如是桩凶杀案,而且是我作的案的话,那我是为了爱而作的案。是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如同医生割掉癌瘤一样。但是,我没有作案。生活对我们非常宽容,宛如在噩梦中,我们总是在恐怖好像已经无法避免的关键时刻醒来。”

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火车在刺耳的摩擦声中开进站台,停下来。

“我曾很喜欢你朋友笔名是何塞·卡尔瓦利奥的艾特·多诺凡的那些东西。”波埃说,“帕科,你为什么不重操旧业,创作小说呢?对遭受深重苦难的人说谎是很难的。”

“波埃,我一直说,在 ACP 聚谈会所有成员中你是最聪敏、最精明的人。你现在为什么不相信艾特·多诺凡的东西?”

“因为在全卡斯特利翁根本没有一条叫玛尔加利塔·加乌蒂耶尔的大街。”

帕科笑了笑,他的表情就像一个把指头伸进果酱罐时当场被发现的孩子。

他们握手告别。波埃站在站台上,站台上已经空无一人。火车开动,帕科·科尔特斯脸上又露出友好、告别的模

糊表情。波埃用另一种表情回答他,那是更为模糊不清的永别表情。

帕科放下车窗;他听不清他朋友在说什么。

“波埃,你说什么?”帕科从开动的火车上大声喊道。

“不管你多么聪明,完美的推理也常常会错的。”

“什么?”

帕科没有听见后面几个字,便一边摇着脑袋一边用手在耳朵后边做个屏障。

“没什么。”波埃回答道,嘴角露出了一丝凄惨的笑容,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仿佛至少要听见自己的声音,“这不是一部小说。”

第二天,帕科·科尔特斯又去见马尔洛维,地点还是太阳门那家咖啡馆。他的事很忙,空闲时间不多。

“你可能知道了,我昨天去了波埃那里。”

“不知道,我不知道。”马尔洛维撒谎说。

“波埃没给你打电话?”

“没有。”

“我不信。你们两个人让我岳父把你们拉到富恩格拉拉,在那儿,你们当中一个人杀害了他。”

“你是知道了,还是在问?”

“你和波埃谈过话。”

“眼下那还不是一桩罪行。另外,如果有人指控你的一个好朋友是杀人凶手,你将怎么办?事情确实如此。可能是波埃。我对你说过,他杀人,我感到很奇怪,因为他还不怎么会使用武器。现在你说可能是我。确实,可能是我,尽

管我没有杀人动机。可能是我们两个人,他提出动机,我拿出武器。但是,可能是随便一个人。而正是这一点把这桩罪行变成一桩完美罪行:我们有尸体,我们有动机,我们有一个或多个怀疑对象,但我们没有杀人凶手。以防这还不够,那个死亡事件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首先对死者的家庭,对死者的同事,对死者的受害人,对社会,社会少了一个害虫。还想要求得到什么呀?你如果希望我们两个人中的一个人说'是我,或是另外一个人,或是我们两个'的话,你会落得两手空空。时到今日,你们将在什么地方找到目击者,从而排除有人在现场之外作案?不是波埃或我在现场之外作案,不是随便一个人在现场之外作案。你们还是快些找到个嫌疑人吧,而那个人可能这样说:那时我正在某某地方吃午饭。已经过去十八个月了。警察局没有找到凶器,也不希望在某个衣柜的某个角落找到你岳父的血衣或沾有富恩格拉拉泥巴的鞋子。波埃对你讲过,我现在再重复一遍:对于完美罪行来说,碰巧这不是一部小说。要知道,我并不因为你想了解实际情况而与你作对。他是你岳父。如果是我岳父的话,我也会那样做的。但是,请你忘掉那一切吧,你找不到杀人凶手,因为没有杀人凶手。"

"可是,警察局差一点把事情推到我身上。我想告诉你,有个人一连好几天都以为我已经承担了罪责,他甚至认为那是 ACP 聚谈会成员共同筹划的阴谋。你们让祸水泼到我身上。"

"帕科,你不要推测。"钟表商说。

帕科·科尔特斯和马尔洛维像知心朋友那样分手了。

帕科也许从来没有想到,马尔洛维不仅仅可能作案,而且有能力把自己保护得天衣无缝,把你的论据完全抵挡回去,虽然看上去像个奇异、怪诞的人。

“他们两个人都很聪明。”过了两天,帕科对马格利特和梅生说;他们三个人坐在福恩卡拉尔大街的特拉法加尔迪斯科歌厅里,面前摆着几杯威士忌。“谁会这样说呀。ACP聚谈会的小鱼苗在给我们这些老家伙上课。马尔洛维惟一疏忽是说漏了嘴,道出开了三枪,但他相当机敏,立刻十分镇定地否认了这一点。波埃对马尔洛维讲了他父亲的事,讲了我岳父对他父亲做的事,也许说服了他去完成一桩完美的罪行,而马尔洛维呢,总是有股子运动员的劲儿,自告奋勇去干那事。只是有一点不吻合。他们不可能单独行动。发现尸体的地方是旷野。离最近的地铁站口也要步行一个小时,离最近的公共汽车站半个小时。他们身上还要带着凶器。我认为他们不会冒险在那样的地方行走,随时都可能有人看见他们,认出他们。那时,无论波埃还是马尔洛维都没有汽车,我认为他们也不会开车。所以,应该想到有人在等候他们。除了在ACP聚谈会成员中,还能有更好的地方去找那个人吗?”

马格利特和梅生用惊异的目光看了他一眼。那个人永远是山姆·斯帕德,铁面无私,有分析头脑,一点儿可能性也不放过,那双乌亮、冷酷的眼睛一下子就能看穿繁杂的事物,行动像猞猁一样敏捷。

“你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排查一下,看看谁有可能帮助他们。”帕科坚持说。

“你忘记了，波埃的未婚妻，那个丹麦姑娘还活着，她有车呀。”

“对呀。”前小说家这样说。“她有可能参加了进去，这里有两个理由：金钱或爱情。波埃对我说过，假如他作了案，是为了爱而作的。或者，她那时既然重新卷入毒品之中而不能自拔，就一定需要金钱。但是，任何对完美罪行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为金钱而作案的问题上，不能相信任何人。这是那条锁链最先断裂的环节。为了爱她可以去做那事，但可能性不大。那时她已经同丈夫恢复了正常关系，再说她没有一点作案的经验，也没有前科。罪犯不是一蹴而就变成的。我们往下说下去。布朗神父，我们把他排除在外……”

“从逻辑上讲，他不会。”

“一个神父可以暂时容留、隐藏罪犯，但我认为神父本人不会作案。”

“可怜的玛尔普莱小姐……真的，她一个月前给我打过电话，问我，咱们大家是不是永远不会重新聚在一起了。我对她说，我们如果见面、聚会的话，会通知她的。她如果得知我们在议论她，说她对一桩真实的凶案知而不报，一定仓皇出逃，这辈子再不会见我们。可怜的玛尔普莱小姐……歇洛克可能干出那种事，可能干出许许多多那种事。他这个人很会算计，有私心，私心是那样重，能暴露其动机。而在这个案子里，他不会去杀一个不认识的人。我们也应该把无论波埃还是马尔洛维不熟悉的 ACP 聚谈会成员排除在外，因为他们交往不多……”

“米拉格露丝也有车。”马格利特想起来了。

“米拉格露丝不仅仅可能帮助他们作案，她本人也有可能作案。她是个非常离奇的女人，但是，无论波埃还是马尔洛维，除了在聚谈会上与她见见面之外再没有别的联系，而在聚谈会上，她不是什么人物，另外，你们都知道，她和斯芬克斯[1] 是亲姐妹。我们把尼录和其他成员排除在外吧。现在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你梅生，你不要生气，在杀人事情上，你是个废物。”

“那并不是杀人案子。”他朋友抗议说。

帕科转动双肩，面向马格利特，那意思是问题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我听你的，”那个警察说，他很热心。“我真想看看是什么新鲜事。”

“可能是我。”帕科承认说。“实际上，开始时，警察局就是这样认为的。但假如我一个人可以作案，还同别人合谋就未免很荒诞了，原则上我想象不出那对他们有什么好处。那时，我不了解波埃和我岳父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很难让他参与作案。对于马尔洛维，很可能是惟一我向其讲述那种性质秘密的人。我会开车，这一点也不假，但巧合的是，我惟一可以使用的车那时由我岳父开着，我很难说服他那天下午一起去干坏事。洛伦索，只剩下你了。你是有车的。”

“帕科，马德里的小轿车足有一百万辆。”马格利特非常

---

① 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人物，带翼狮身女人面怪物。转意为猜不透的人，守口如瓶的人。

幽默地说,“不过,杀害你岳父的嫌疑人不可能有一百万。”

“但你不同,你有很多理由杀害他,他是你的上司,并且要把你调到别的地方去。”

“你怎么知道那事?”

马格利特本来一副欢快表情,一下子变得惊愕、奇异起来。梅生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看了他朋友帕科一眼。他认为那个玩笑开得不当,但他并不敢插话。

“这几天的下午,我们都在整理我岳母的文件,她想离开那个家。她突然产生了这个念头。要搬到另一个住处。在一个文件夹里,我发现一份纪律处分公文草稿,上面有你的名字。日期是我岳父死前一个月。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分歧。但我首先要对你讲的是,尽管你帮助了波埃和马尔洛维,事情也不会有所改变。对我来说不太重要。尽管你的理由不像波埃,甚至不像马尔洛维的理由那样高尚,我不会深追下去,甚至不想重新开启这个案件。一个人在没有正义的地方要求伸张正义,我认为是对的。像马尔洛维那样的人,为了友谊而挺身帮助朋友,这我也理解。而现在,一个人只因为上司对他不好就杀死上司,我认为是卑鄙的、下流的。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现象,案发那天下午,有人在富恩格拉拉看见一辆白色标致,而你那时正好有一辆白色标致。”

马格利特让他讲下去。他手里端着威士忌杯子,但从帕科阐述理由开始,那个警察甚至忘记喝了,上下嘴唇干巴巴的。帕科没有放过这个细节,因为无可辩驳的推理正是从这些细节寻找出来的。

“快喝吧，洛伦，威士忌都变热了。”

那一刻，帕科·科尔特斯是这样想的：如果洛伦不喝酒，并且把杯子放在桌子上，我很难从他嘴里掏出什么。而现在如果喝酒的话，他最终会把发生的事讲给我的。

马格利特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剩下的威士忌一大口灌进肚子里，甚至有块冰都吞到嘴里，接着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像任何一个嫌疑人一样，他想利用几秒钟考虑如何作答。在警察的术语里，他嘴里的那块冰就是间歇，争取一点时间，然后再讲话。

“像我那辆的白色标致车，那时在马德里可能至少有一千……”

“我们从一百万嫌疑人降到一千……”科尔特斯讥讽地说。

“不过，那页公文的事，你是完全搞错了。我今天第一次得知有那么一份公文。你可以相信我，也可以不相信我。几个星期前，我同堂路易斯发生一次激烈争吵。凡是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有过一次或多次争吵。案件调查的程序之一就是从这方面开始的。也对我们进行了调查。你岳父确认是我在以前对二月二十三日之夜事件的内部报告中揭发了他。他对我从来没有忍下那口气，我对他没有任何好感。我不知道他在起草关于我的报告。这和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关系。”

马格利特举起手，想引起服务生的注意。帕科确证了，嫌疑人玩卑劣手腕到了那样的程度，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洛伦索，把事情讲给我们听听吧。事情是怎样发生

的?”

他拖了一会儿才作答。他双手开始出汗。他的内心世界正在展开一场斗争,精神压力很大。他看了帕科一眼,又看了莫得斯托一眼,他知道那是关键时刻。

“一天,”那个警察最后终于这样说,“ACP 聚谈会结束以后,波埃和我两个人留下来,我们一块儿去吃晚饭。我们常常一块儿吃饭。他对我说,喂,洛伦索,你有车,帮我一个忙。他对我说,几点几分可以在某某地方等我一下吗? 他还说,亨娜常在那个地方买毒品。他解释说,那个地方很怪,很偏僻,很恐怖。波埃对我说,亨娜对我讲过,在那儿有个家伙骗了她的钱,那钱是我借给她的,她说那个家伙不想把钱还给她,我如果去的话,可能追回一点钱。但我甚至都不相信亨娜,因为她被骗得很苦,总是说谎话。钱相当可观。一共二十万比塞塔。我很相信波埃。他为什么要骗我呀? 他从不说谎,不吹嘘,不夸张,他和马尔洛维不一样。当时,我对他说,最好我和他一块儿去那人家里。他说,不行,亨娜认识我,你最好呆在附近。我如果很久不出来,你再进去。我完全相信他讲的话。我们按照他讲的做了,第二天,他一个人去了那里,我在约好的地点等候。过了半个小时,也就是按照我们约好的时间,我终于看见波埃出现了。但马尔洛维陪着他。前一天,他没有提到马尔洛维。他们钻进车里,波埃对我说,洛伦索,我刚才把路易斯·阿尔瓦雷斯杀了。我看了马尔洛维一眼。如果马尔洛维说那样话的话,我会认为那是开玩笑,因为他总是开那种玩笑,你们了解他,但那话是波埃说的,他从不为任何事情笑一下,

总是非常严肃。我想知道发生的事情。波埃对我解释了，他非常镇定。马尔洛维却不然，一副茫然的样子，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波埃对我说，路易斯·阿尔瓦雷斯杀死了我父亲。我从来没有和他谈起他父亲，对他的家庭也一无所知，只是我们第一次谈话时，说了点事，但他没对我讲很多东西。我问他，你把他带到这儿，然后杀掉？他回答说，不是。我说，我得上报。波埃说，好吧，那样做很自然。他一点儿也不紧张，他补充说，但我希望你知道，我只想同他谈谈。我反驳他说，为了和他谈谈，没有必要把他弄到瓦耶加斯。在警察所旁边有上百家咖啡馆，完全可以找一家，和他谈话呀。波埃对我说，如果只是为了对他讲讲我要讲的话，可以找家咖啡馆；但我要有把握，不让他走掉，因为我想听听他的声音，哪怕只是一会儿呢，也想让他感受他使那么多人、使他父亲感受的那些恐惧。所以，他去时带上了枪。对他进行审判，他父亲已经看不见这个审判了。他对我讲了他总是做一个梦，在梦中盯着杀害他父亲的凶手。那时我们坐在车上，我把车发动起来，离开那儿，还好，谁也没有看见我们……无论如何，波埃讲的事情中，我觉得有不少不对劲。我们回到我家里。波埃要马尔洛维陪着，那是害怕你岳父甚至会杀死他。他去见堂路易斯，对他说，您还记得我吗？我是马格利特的表弟，并且讲了，帕科，讲了你的流言蜚语。那时，堂路易斯找你的麻烦，你应该记得，他跑到语言学校，对你搞了一场恶作剧，波埃去见他，对他说，堂路易斯，您女婿卷入到毒品中了。为了刺激他，波埃还说，堂路易斯，我看您女儿也卷了进去；是您女婿把她拖进去的。一

切都想好了,我是这样认为的。当你岳父咬上钩以后,与其说为了使他的计谋没有任何漏洞,毋宁说急着让那一切看上去是真的,他又对你岳父说,我知道您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那个家伙。他对我讲过一个故事,又对你岳父讲了个相似的故事,帕科,说你欠他很多钱,是你同多拉分居时借给你的,还没还给他,他说那钱在瓦耶加斯的一个毒品贩子手里,你对他说过那个毒品贩子第二天就有钱了。波埃对你岳父说:我只想把我的钱收回来,其他事无所谓。你岳父首先想到的是把刑警大队调来,搜查波埃说的毒品贩子活动或居住的那套公寓,他猜测你会去那里,这样可以把你们两个同时抓起来。但波埃对你岳父说,不行,不行,您不要那样做,因为很可能多拉也在那儿,注射毒品,我不愿意把您的女儿也抓起来。最后,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你那当警察的岳父竟然轻信了一个那样的故事。也许他之所以轻信,是因为他确实是个容易轻信的人;这样的事我们见过的太多了,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堂路易斯一下子疯了似的,怒火万丈。他本来可以给女儿打个电话,和她谈谈。但他没有那样做,一个心眼地相信一个陌生人,因为相信这个人可以证实他讲的有关他女婿的那些事。他假如给女儿打了电话,并且同她谈谈,你岳父也许还能保住命。命运不想让他那样做,于是走上了不归路。帕科,你常常这样说,当命运从中作梗的话,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你岳父给你岳母打了电话,说不回家吃饭了。按照计划,是把你岳父弄到那个旷野里。他们到了富恩格拉拉,在那儿等候的马尔洛维一下子钻进车里。波埃想同你岳父谈谈,在一个证人面前审讯

他，让他害怕害怕，对他说，你杀死了我的父亲，你对他严刑拷打，阿尔瓦塞特半个省的人都受过你的严刑拷打，然后把他扔在那儿。为此他把我叫了去。”

马格利特又做了同样的手势，告诉服务生再给他端一杯威士忌。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岳父看见上来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说了什么？”

“什么也没说。因为波埃对马尔洛维打了招呼，你岳父可能以为是毒品贩子或游手好闲的人，随便一个什么东西吧。马尔洛维上车以后，车一开波埃就问你岳父：多米西亚诺·埃尔瓦斯这个名字，能使你想起点什么吧？开始，你岳父什么也没想起来。波埃对他说，我是多米西亚诺·埃尔瓦斯的儿子，你杀死了我的父亲。你岳父听到这话时，好像很紧张。他不记得那个多米西亚诺，但认为确有其事。波埃只想让你岳父说出来，对，我记得你父亲，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感到很难过。但你岳父什么也记不起来。他们在那儿呆了好一会儿。一直谈话。”

“那么，马尔洛维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坐在后排座位上，听着。”

“他带枪了吗？”梅生问。

“不知道，他们没对我说。我想应该带了。”马格利特补充说，“开始，你岳父什么都否认，根据他们讲的，你岳父很害怕。双腿打颤。他太紧张了，说不出话来。开始时，说什么也不记得，随便说他那是执行命令，上面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但他发誓、一再发誓，对波埃的父亲什么也不记得，因为

他那时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了一九四〇年，直到波埃对他说不是一九四〇年，而是一九六〇年在马德里，不是在阿尔瓦塞特杀了他父亲，好像才记起来了。他很想掏出自己的手枪，但波埃立刻掏出马尔洛维留给他的手枪。你岳父想夺下来。波埃对我说，在那一刻他意识到你岳父会像杀死他父亲那样杀死他。他们厮打起来。一枪打在底盘上，另一枪打在大腿上，第三枪打在头部。这一切发生得很快。”

“你，作为警察，相信他讲的故事吗？”帕科·科尔特斯问。

“相信。”

“没有人听见枪声，没有人看见汽车？”

“没有。”

“你为什么不上报？如果发现你，你可是拿自己的生命做游戏呀。”

“我和波埃达成了协议。他如果看到对我进行调查，便去自首，编造一些事实，不提马尔洛维和我的名字。我从经验中知道，百分之十的凶案都会成为死案，找不到凶手。等上几天不会有所失的。我总是可以对什么都否认的。后来，怀疑的目光指向了你，我们便放下心来。”

“你认为波埃会自首吗？你在什么地方看见过有人向警察局自首、坦白他的罪行？”

“什么地方都有呀，每天都能看见。波埃会那样做的，对这一点我敢保证。”

“你们好像把我孤零零地抛弃了。”帕科说，没有太多的痛苦，也不很确信自己讲的话。

“指控是站不住脚的。很清楚，你什么也没发生。”

“不对，事情有可能把我卷进去。生活中到处是假罪犯、假无辜者。我一直这样说，伴随完美罪行的是一个假罪犯和对一个无辜者的判处。”

“你别夸大其词了。”马格利特继续说道。“问题是事情过去三个月时，那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在警察所里，格拉波分子制造暗杀、制造恐怖的说法又占了上风。真是幸运，在西班牙有这么一个团伙，每当有点什么搞不清楚时，都可以推到它身上。”

“可是，我想你大概也有个说法，以防备用呀。”

“我没有。我有时想，那是一次意外事件。波埃不具备杀人凶手的特点。但我同时又想，他为了同堂路易斯谈话，会组织、策划那样的绑架事件的。我一直坚持，对他说：你完全可以在别的地方同他谈话呀。他总是重复说，不行。他想在一个他无法走掉的地方同他谈话。我父亲的话他一句也不想听，我这次要让他听我把那些话讲出来。另外，应该相信我。波埃还对我说，假如你岳父请求原谅的话，也不会发生什么事，但他只想掏出手枪，还要夺下波埃的手枪。我永远不得而知的是，为什么要马尔洛维陪他，为什么要我去。波埃是相当聪明的，完全能够想出别的法子结束你岳父的生命，如果这是他想做的话，或者他的目的是让你岳父听听他讲的话，也完全能够想出别的法子。不需要马尔洛维，也不需要我。”

“我不相信。”帕科若有所思地说，“我和他们两个，和波埃和马尔洛维谈过，现在在和你谈。他们两个是好朋友，特

别是都非常年轻;他们不相信伸张正义,但相信富有诗意的伸张正义。他们所做的,是为了伸张富有诗意的正义而共同做的。他们是否做了那事。我是说,是否可以证明他们做了那事。在无法找到证据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作那桩案子。只要你继续否认去接他们就够了。波埃对我说过,原话是这样的:你岳父最后是因为愚笨而死去的;对于他的死我也觉得有责任,因为他死了我并不感到痛苦。”

“对我,”马格利特说,“他说的更多些。他对我说:实际上,我很希望那支手枪不扣动扳机;让他生活在我们大家一直生活的恐惧之中,把他的地狱带到这个炼狱里。”

梅生一直沉默寡言。这时,他终于张开嘴巴,说道:

“既然他们是罪犯,那就把真相说出来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也成了共犯,真相会使我们摆脱罪名。这至少是我们在法律系学习和研究的。”

“不对,梅生。”马格利特说。“如果让人知道真相,肯定不能使我那么容易地摆脱罪名,同时也不会使波埃得到更为公正的待遇。你应该记住歇洛克·福尔摩斯说的话:很多时候,抓住罪犯造成的损害要比罪犯作案造成的损害大得多。在这个案子上,事情很明显。”

“就让事情像现在这样下去吧。莫得斯托,你有一次不是说过,在某些情况下你会隐瞒某一桩罪行,而正因为如此你才是律师?你现在不这样做,以后可找不到这么好的机会了。”

梅生想了想朋友帕科的这几句话,点头表示同意。

“你应该把这看做结束那内战的一种具有象征意义和

诗意的方式。”帕科·科尔特斯补充说，“波埃说过这样的话。一切存在于过去。如果对波埃和马尔洛维进行审判，如果证明是他们两个人杀死了我岳父——这还要看看能否找到证据——的话，将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现在，波埃，或者说波埃和马尔洛维不是执意地，但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更多的正义和安宁。是生活本身收回了它所付出的代价，而波埃和马尔洛维只是执行者而已。”

“但是，那是永不结束的故事。像波埃这样的情况，在西班牙至少有二十万人。”梅生气呼呼地说，他总是一副怒容。“如果他们当中每个人都要除掉特定的刽子手，十五天之内西班牙又有二十万人死去。又将产生二十万件不公正案子。”

“梅生，你不要夸大其词。”帕科说，“如果能像这次这样静悄悄地伸张了正义，那将是一件特大好事。如果所有坏蛋统统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几个小时之内消失，世界一定变得好起来。”

“我的上帝，帕科。你刚才这番话太可怕了。我们不是杀人犯。坏人也能把世界变好的。”梅生提出这样一个理由。

“莫得斯托，那是想讲讲话呀。像在小说里那样。”

那三个人默默地沉思起来。

过了一会儿，马格利特说：

“波埃和马尔洛维是在暗地里行动。如果说警察所里实际上谁也不想考虑那个案子，那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那桩凶案早就对准你岳父了。”

“正是这样，洛伦索。”帕科说完，把头转向梅生。“让我

们把事情颠倒过来。你想想看，我岳母的指尖有个小钮，轻轻按一下就能让她丈夫死而复生。她是个大好人，信教，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她在可以做到的各个方面一定是个好妻子，还是一个好妈妈。你是否认为她会按一下那个小钮？”

梅生垂下头，想找个合适答案，但没有找到。

“那样的事永远不会出现。傻瓜蛋想出的东西，哪能成为现实，再说也不应该提出那样的事。那是侦探小说中制造气氛的手法，而不是个道德问题。你把这一切都讲给多拉吗？”他质问他的朋友科尔特斯。

“对，以后要讲的。当事情真相对她不仅能缓解绝望情绪还能有点别的用处时，我要讲的。”

天渐渐黑下来。他们聚会已经超过一般时间。

“真奇怪。”帕科·科尔特斯最后说。“在小说里，完美罪行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这违背了侦探小说的准则，因为首先是，侦探和警察都成了多余的。那些完美的罪行只能发生在生活中，正是在生活中，完美的罪行才能实现它的功能。在完美罪行小说里，一切常常是这样开始的，偶然发现一具尸体，应该调查死者的身份，调查谁是凶手。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恰恰相反，我们最后发现了，是 ACP 聚谈会成员中的一个人，并且我们大家都认识。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像炼金术士① 那样寻找一桩真正的完美罪行，而始终没有找到。而现在我们有一桩完美罪行，但对我们没有一点

① 古代的中国、印度及十二至十四世纪的欧洲，很盛行炼金术和炼丹术，企图把普通金属变成黄金、长生丹。

用处,因为我们甚至都不能向其他人通报我们的发现。不过,多少有所得;炼金术士那样的所得,就是说我们找到了点金石①,但我们绝不能把我们的秘密吐露给任何人。”

“那是不是说将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梅生问道。

“什么也没有发生,又什么都发生了。”帕科说,“生活永远不会结束,当看来好像要结束时,它又为别的人打开大门。机械论近似于机械学,机体近似于生命,生命在转动。生命好像一架装置,但并不是装置。”

“或者这样说,”律师莫得斯托·梅生总结说,“我们把这些年的时间都浪费了。”

“你如果硬要这样说,也许是那样。”前山姆·斯帕德表示同意。“但是,请你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生活从这边夺去你的东西,从那边给予了你,在这个角落没有解决的,在另一个角落解决;以前不是完美的罪行,生活把它变得完美,而以前是完美的罪行,因为偶然事件不再是完美的罪行。我已经放弃写作小说,一桩完美罪行却终于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侦破了这个案子,案子像张开手掌拳头就消失了那样,消失了。但是,手是永远存在的。”

“巴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马格利特讥讽地说。

那场微不足道的讽刺剧结束以后,生活又开始驶动了,像小儿游戏转盘那样摆动着,那样响着欢快旋律。

二〇〇二年春于马德里

---

① 意为根本不可能有的东西、根本办不到的事情。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完美罪行之友
作者=（西）特拉别略著　　李德明译
页数=350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01月第1版
SS号=11462482
DX号=000005246923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5246923&d=749F0FDE71CC5A2F5AA8F60F42268A7A&fenlei=0906&sw=%CD%EA%C3%C0%D7%EF%D0%D0%D6%AE%D3%D1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